

「文革」造反派真相

周倫佐著

THE HISTORICAL TRUTH ABOUT REBEL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1世紀中國叢書



ISBN 962-339-063-7



9 789623 390637

HK\$ 80.00

田園書屋
80



作者簡介

周倫佐，大陸體制外思想者。1952年出生，20世紀60年代上山下鄉，「文革」時以造反知青身份參加四川大學「八二六」戰團，並在西昌地區造反激進派負責宣傳。曾於1971年和1978年兩次入獄。1973年分配到西昌八五六廠工作，1985年畢業於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漢語言文學系。20世紀70年代初起致力於現代哲學及心理學研究。80年代中期，以體制外思想者身份在成都、重慶、武漢等地多所高校舉行學術演講，引起轟動性反響。曾在體制外學術刊物《大時代》、《非非》上發表〈詩質論綱〉、〈愛的哲學〉、〈當代文化運動與第三文化〉等多篇有影響的論文。2005年5月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哲學專著《藝術人本論》。現在四川西昌居家讀書和寫作。

「文革」造反派真相

THE HISTORICAL TRUTH ABOUT REBEL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周倫佐著

Zhou Lunzuo

宋永毅 主編

Yongyi Song

Editor-in-Chief

21世紀中國叢書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Series

田園書屋出版

目 錄

《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新版說明 (宋永毅)	①
序 (宋永毅)	③
作者題記	1
前言	2
第一篇 造反紅衛兵與保守紅衛兵的分野	10
第一章 完全對立的等級要求和行為指向	12
第一節 保守紅衛兵：特權階層子女的惡性表演	12
第二節 造反紅衛兵：弱勢青年絕境中的反抗	24
第二章 對造反紅衛兵的誤指與妖化	37
第一節 失憶與誤指	37
第二節 附勢與妖化	42
第三節 良知與真相	49
第三章 造反與保守之間的主要界線	54
第一節 認定造反紅衛兵與保守紅衛兵的歷史範圍	54

第二節 兩種紅衛兵在共同青春背景下的行為差異 ..	60
第三節 造反與保守的根本區別	68

第二篇 三年造反與十年「文革」的區別

第四章 造反派的有形構成與無形演變	79
第一節 造反派的構成	80
第二節 造反派的分裂	95
第三節 造反派的成份演變	106
第四節 三年造反不等於「三年文革」	113
第五章 有名無實的造反派掌權	120
第一節 造反派掌權時期	121
第二節 軍人掌權時期	132
第三節 幹部掌權時期	140
第六章 受迫害的造反派	145
第一節 「文革」中的三次政治迫害	145
第二節 試探「二月鎮反」的內幕	155
第三節 「文革」後的政治迫害	162

第三篇 造反派同毛澤東的合與分

172

第七章 毛澤東的個性特徵與理想實質	174
第一節 毛澤東的非制度化個性行為.....	175
第二節 毛澤東的反歷史社會理想.....	179
第八章 造反派與毛澤東的利益契合點	189
第一節 毛澤東的政治假想敵與「文革」的爆發.....	189
第二節 毛澤東與青年學生和下層民眾的利益契合.....	193
第九章 歷史的誤會	203
第一節 造反派與毛澤東的利益分離.....	203
第二節 1972-1974：為落實政策被動造反.....	209
第三節 1976：造反派對毛澤東最後召喚的微弱回應.....	218
第四節 最不應該發生的誤會.....	222
第四篇 造反派在現代性進程中的特殊站位元	228
第十章 極權體制下變態的民主運動	230
第一節 民主要求與專制威權的對立.....	231
第二節 造反運動與歷史進步的間接聯繫.....	244
第三節 造反派與「右派」的真實關係.....	253
第四節 公共話語空間左右概念的顛倒.....	261

第五節 造反一代的雙重有效資源.....	269
第十一章 在苦難中擺脫異化的第二代人	282
第一節 中國現代變革遭遇的文化阻礙.....	282
第二節 八代人在中國現代文化轉變中擔負的使命.....	288
第三節 新三代人的歷史遭遇與群體覺醒.....	295
第四節 「文革」一代的驚醒與疏離.....	304
第五節 三代人逐代加速的疏離步伐.....	312
第六節 「文革」身上的第五張皮.....	316
主要參考文獻	327
後記	328

《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 新版說明

宋永毅

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決定出版一套新版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囑我作為叢書的總策劃寫這個出版說明。提筆之際，我首先感到由香港《開放》雜誌社、田園書屋、美國博大出版社等民間出版機構協助出版這樣一套叢書，對我們已經身置於其中的二十一世紀有一種自然而然的「顧名思義」之理：因為「二十一世紀」應當是一個最為「開放」的「博大」相容的新世紀。

如果說「邪惡帝國」在歐洲的徹底垮臺的二十世紀和電視、電臺、電腦科技的崛起所帶來的資訊滲透有極大的關係；那麼，以開放的互聯網對全球的覆蓋為標誌的二十一世紀，是一定會崩坍所剩不多的那幾個專制堡壘的。追求自由和民主，要求一個開放的社會，這已經為歷史證明是人類的天性。這裏便是一個有趣的例證。文化大革命中曾經有過風雲一時的「四大民主」，在這樣一種被扭曲了的民主形式下，群眾可以以大字報的形式變相地發洩對中共官僚階層的不滿。文革剛一結束，鄧小平便迫不及待地從憲法中取消了有關「四大民主」的條款，因為他們懼怕這種開放的形式，哪怕只是一種囚籠中的「民主」。歷史又似乎在頑強地重複，今天在互聯網這個「虛擬的中國」裏的民意——數以千萬計的「電子大字報」，無論是對貪官污吏的揭露還是對公民

權利的維護，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已經遠遠地超過了當年「四大民主」下的紙質大字報，而且正獨立地影響著中國的民主進程。

然而，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套傳統的印刷出版物。是否在這一新的開放的世紀裏，傳統的資訊傳播手段就不那麼重要了呢？這顯然是一管之見。二十一世紀的開放性還高度地體現在它的博大相容的多元性上。如同電視沒有消滅電臺，飛機沒有取代汽車一樣，傳統的書籍在以互聯網為旗幟的二十一世紀中仍然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一套嚴肅的、以其思想和學術深度區別於一般通俗政治文化讀物的叢書，不僅為海內外學者提供了一個傳播資訊的平臺，對中國的民主進程也會有一定的影響力。

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曾經把它的指導方針歸結為這樣四句話：「突破資訊封鎖，推動民主變革，促進族群和解，建立憲政民主」。我想，這大概也是這套新叢書的出版宗旨吧。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
於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

序

宋永毅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三十餘萬字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不僅僅是目前為止的由大陸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本有關文革造反派研究的著作，而且是一本有份量的學術專著。我在這裏之所以強調這是一本學術專著，是因為造反派問題和文革中的許多問題一樣，在文革爆發四十年後已經在客觀上成了一個嚴肅的學術研究的歷史對象，而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翻案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及其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造反運動捲入了數以千萬計的民眾，決不是用非黑即白的中共的「階級分析」的套路——無論是說造反派是「好」還是「壞」——可以說得清楚的。可喜的是，我們在這本專著中看到不僅是周倫佐先生追溯歷史真相的執著，還看到了他評析研究物件的客觀和冷靜。因為對文革造反派問題的研究尚還處於一個起步狀態，周倫佐先生的一些方法和結論可能未必一定會被讀者和同行所全部認同，也當然有值得商榷之處。但是，任何學術見解都不可能是追尋真理的終極點。有時候，起點上的踉蹌的足跡遠比以後堅厚腳印來的可貴——如果沒有難能可貴的播種，就不可能有未來的黃金豐收。

誠如周倫佐先生所指出的：造反派在已經被完全妖魔化了。在今天大多數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恐怕「造反派」已經成了文革罪孽的兩個最重要的集體記憶之一：上層是「四人幫」，下層則是「造反派」。在某種程度上，造反派成了誣陷、陰謀和暴力的抽象代名詞，承擔著文革中所有罪惡的大半責任——因為在人們的記憶中，即便是林彪、「四人幫」的罪惡，最終也是通過他們的造反派「爪牙們」去具體執行的。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這類錯誤的歷史記憶並不是發生在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一代的腦中，相反卻大多是在文革的親歷者身上；而這些親歷者們，又大多是文革後話語權的主要掌握者，例如中共老幹部、社會名流、教授學者乃至今天的文革研究者。他們的回憶錄，控訴書乃至研究

文章都不約而同地助長了這一錯誤記憶的廣為流傳。倫佐在他的專著中用不小的篇幅提出了上述的集體失憶現象。但是他的目的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為造反派「平反」的政治訴求，更不是要掩蓋文革中造反派組織及其個人確實參與了的任何錯誤和罪惡，而是表明我們今天嚴肅的歷史研究的態度：對造反派和文革中的任何歷史派別和現象，既不能美化，也不能醜化，更不應當簡單地妖魔化。歷史，尤其是文革這樣風雲際會、瞬間變幻的歷史事件是極其複雜的。而澄清歷史真相，糾正流行的記憶偏執卻正是我們任何一個嚴肅的歷史研究者的責任。

對於這一集體失憶的描述和澄清，倫佐的專著已經從現實和歷史兩個角度作了大量的論述，因而我也就不再贅說。但是我這裏還想談一下兩場對造反派不公的中共的政治運動——「揭、批、查」和「清查三種人」。這些可能因為周倫佐先生作為一個身處大陸內地的學者，許多新的資訊和材料還是不太能及時得到的。

追溯上述錯亂的集體記憶，原因不外乎以下幾種。其一是一些在1966年運動初期就被打倒的社會名流，因為長期身處「牛棚」，對「桃花源」外的群眾運動已經分不清什麼「造反派」，「保守派」和「專案組」。因為文革結束後的主流媒體上對「造反派」的一片討伐之聲，自然也就把整他的「革命群眾」和「專案人員」也當作了「造反派」。不少文革前的高級知識份子在他們晚年回憶錄中的混淆，大概都屬於這一類的錯誤。其二是一些中共老幹部和社會名流，雖然心知肚明整他們的其實是毛澤東或劉少奇為代表的「黨中央」，但又無法向最終又帶給了他們榮華富貴的「黨」發作，心中又對文革中批判過他們的群眾有氣。便就自然地緊跟黨已經定下的官方口徑，把所有的罪責全部推在犯上作亂的「造反派」頭上。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文革後官方輿論誤導的結果。1976年10月以後的中共，尤其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重新執政的中共老官僚集團，既不想否定文革實際上最大的罪魁禍首毛澤東，又不想承認造成文革的制度性的原因（比如承認他們都曾經發動文革的支持者）……其邏輯結果就必然要積極尋找替罪羊。在中共上層，當然是林彪和「四人幫」；在社會下層，就是「造反派」。這裏僅舉一例便可以借一斑而觀全豹：如果你檢索一下自1976年10月到1983年的

《人民日報》，便會發現竟有260篇把「造反派」作為文革最大的罪孽來批判的社論和理論文章。至於把「造反派」作為一個罪惡的公共貶義詞的文章，共有1229篇之多！換句話說，在中共的中央黨報上，每天便至少有一篇醜化造反派的文章，更遑論數以千計的地方性的官方報刊、電視電影裏對造反派描述的簡單化和臉譜化了。

論及官方對造反派問題的蓄意誤導，就不能不提及在1976年年底後全國範圍內的「揭、批、查」「四人幫」幫派人物的運動，和1980年到1982年中共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期間，審判了百餘名在全國範圍內較為著名的造反派領袖的事件（如果連同地方的審判，恐怕至少有數萬人之多）。毋庸違言，這些人中確實有一部分積極參與了「四人幫」的幫派活動的，如上海的徐景賢、王秀珍等人；也確有一些是觸犯了刑律的壞人。但是，鄧小平、陳雲為代表的中共老官僚集團側重清算的卻主要是他們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行為」，乃至明眼人一瞥間便可以洞悉這些中共老官僚的公報私仇的陰暗心態。例如，被判重刑的不少人只是學生造反派的領袖，例如北京的「五大紅衛兵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和譚厚蘭。其中除譚厚蘭因癌症後期而沒有起訴外，其餘四人一律被判15至17年不等的重刑。毫無疑問，這些「領袖們」在文革中都犯有極大的錯誤、有的甚至是罪行。但對比判他們的重刑和起訴他們的罪名，卻令人啼笑皆非。例如，在對他們的「起訴書」和「判決書」裏，人們都可以讀到他們在文革初期（1966-1967年）「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重要罪責。而一個簡單的歷史常識卻是：在文革初期根本就不存在一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只有「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在號召「造反」。而無論是鄧小平還是陳雲，都是這個黨中央的一員，都是對發動文革的綱領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投了贊成票的！另外，1979年中國便有了新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新的《刑法》第九條明確規定：「本法自一九八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實施以前的行為，如果按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認為是犯罪的，使用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毫無疑問，造反在文革初期完全是一種合法行為，完全無罪可定。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刑法》中還明確規定了追訴

的「時效性」。在中共 1982 年起訴他們 1966-1967 年的造反行為時，時間已經過去了 13-14 年，其實已經沒有了法律上的追訴的「時效性」。而這些學生造反派領袖其實從 1968 年起便被毛拋棄，自當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到 1971 年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中，長期處於被監禁狀態。他們根本沒有也無法和 70 年代中後期才形成的「四人幫」的活動有什麼關聯。

鄧小平等人對他們的定罪還帶有很大的私人挾嫌報復的陰暗心理。例如，在對聶元梓的起訴和定罪中特別突出了她對當時的北大學生，鄧小平兒子鄧樸方和女兒鄧楠的迫害。事實上，聶並沒有參與任何直接的迫害活動，只是在 1967 年 1 月全國第一個寫大字報要打倒鄧小平的人。而鄧的兒子鄧樸方在文革初期，也還是一個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曾經策劃過在北大的高幹子女中組織類似「紅衛兵」的秘密組織「貧協」，鼓吹「高幹子女掌權」論，也擔任過系裏的文革委員。他的被抓和在自殺中摔壞了腿其實和下面的派性鬥爭有很大關聯。鄧小平無法找到和追究和他兒子自殺的直接有關者的刑事責任（因為是自殺而不是他殺），便把所有的罪責都推倒了其實與此事無關的，但公開寫過大字報要打倒他的聶元梓的身上。可見他個人的挾嫌報復的陰暗心理和作為一個政治家氣量的狹窄。

更為嚴重的是，自 1976 年開始的在各省市大抓「四人幫」黑幹將、黑爪牙的「揭、批、查」運動，在不少兩派鬥爭本來就嚴重存在的省市迅速地演變為一場專門針對造反派的新的「清理階級隊伍」。成千上萬的參加過造反的群眾又一次被鬥被關、致傷致殘。這便使得這一政治運動失去其合法性，而又一次墜入「翻烙餅」式的派性的泥潭。1982 年 7 月 4 日，湖北工人造反派領袖胡厚民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時說：「我認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錯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評價，而且得到了各種優厚的照顧；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盡不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評價，而且仍然背著各種罪名（包括其子女及親友仍然遭到歧視和排斥）……不是說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嗎？我想在這裏也應該是平等的。造反派這邊傷害了那邊的問題，我願承擔一切責任，那麼百萬雄師那邊傷害了這邊的人，該由誰來承擔責任呢？」

接著，他又提出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省委大抓牛鬼蛇神，1967 年武漢軍區搞所謂的「鎮反」一夜抓成千上萬的群眾，1968 年軍人政權搞的清理階級隊伍和 1969 年在武漢鎮壓所謂的 516 集團和「北決楊分子」，以及 1976 年底以來的「揭、批、查」運動的責任追究。因為所有這些運動都造成成千上百人被鬥被關、致傷致殘。僅僅因為不是湖北的造反派搞的，都不予任何法律追究。胡厚民在法庭上最後說：「如果上述情況屬實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實就該給上述人員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以上問題如果真正得到了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決，槍斃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決，槍斃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無論從今天法律公正的角度，還是當年中國已經制定了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來看，胡厚民的辯護都非但是合法的，而且是合理的。儘管胡在湖北造反派領袖中只是第四、第五號人物，但是結果卻以他「認罪態度惡劣」而重判了二十年徒刑，最後慘死在獄中。值得一提的還有：當時領導和主持整個審判工作的省委第二書記、省長韓甯夫正是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湖北省委大抓牛鬼蛇神的第一線領導，又是在一月奪權中被胡厚民等造反派的批鬥物件，此案的個人恩恩怨怨，便盡在不言之中了……

如果說 1982 年對造反派領袖的審判還只是針對百餘名著名人物，而且經過了一定的——雖然很不像樣的——法庭程式，那麼中共在 1983-1989 年間發動的「清查三種人」的運動，就把一場新的「清理階級隊伍」非法地推向了全國。本來中國八十年代初的政治局面已一派大有希望的改革景象。但是鄧小平為代表中共老官僚集團先是發動了「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後又自由地聯想到文革中的造反派會「從當年搞極『左』跳到另一個極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起勁得很。對這些人，只要我們稍一疏忽，他們就會爬上來。等到將來土壤、氣候對他們有利，他們就會會興風作浪，乘機上臺。所以對這些人的能量，對這些人對於我們的危險性、危害性，千萬不能低估。」（〈鄧小平同志關於如何劃分和清理「三種人」的談話〉，1983 年 11 月 16 日）為此，中共中央在 1982 年 12 月 30 日和 1984 年 7 月 31 日連續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清理領導班

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和〈中共中央關於清理「三種人」若干問題的補充通知〉。什麼是「三種人」呢？按這兩個文件的解釋，是「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一開始，這一運動還只是中共黨內整黨運動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發展成了一個波及全國全民的政治運動。對全國高校參加過造反的學生，中共還特別「青睞」，於1983年4月23日向全國頒發了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文件中說：「對『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中造反組織的重要頭頭和有嚴重問題的人，應由原所在院校認真負責地將經過調查核實的材料，通知這些人現在所在單位的黨組織和有關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門，記錄在案；」¹今後，凡從『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在校學生中選拔領導幹部和選派出國人員，用人單位都必須主動與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聯繫，取得他們在校期間的表現材料。高等院校黨組織應積極協助。換句話說，這些被「黑材料」記錄在案的年輕人成了隱性的「黑五類」，起碼喪失了「被選拔」和「出國」兩項重要的公民權。

如同我們前面所分析的，在一個國家已經有了正式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情況下，一個黨以它自己黨規黨法不通過任何國家法律程式，而只是政治運動來刑罰陳千上萬非黨群眾，剝奪他們的公民權，本身就是一種違法行為。從中共文件定義的「三種人」來看，除了「打砸搶分子」尚可能依法追究實實在在的刑事責任外，所謂「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和「幫派思想嚴重」都沒有觸犯刑律；前者不符合起碼的歷史常識；後者以思想定罪，必然具有極大的隨意性而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即便對「打砸搶分子」的刑事責任的依法追究，這裏也有一個追訴的法律「時效性」的界限。

除了合法性之外，「清查三種人」的運動還缺乏公平性和公信力。如果是清查「打砸搶分子」，那麼無論他們在文革中屬於哪一個派別，無論他們的現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應當一視同仁地清查處罰，「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而實際上，中共老官僚集團發動的這一運動，只是針對曾經造過他們反的造反派群眾而來。在1966年北京的「紅色恐怖」中，由高幹子女組成的「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西糾）可謂無惡

不作，血債累累。在「清查三種人」運動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訴中共中央，要求清查已經入黨並任要職的孔丹等人。不料陳雲立刻在上訴書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是我們將來可靠的接班人，他們不應當是清查對象（大意）。由此，這批高幹子弟便一直被包庇了下來。即便在發動這場運動的講話裏，鄧小平也公開指出：「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不能叫『三種人』。那個時候，不說違心的話行嗎？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贊成，不違心地去做行嗎？不能把那時在特殊情況下說過一些違心的話，做過一些違心的事的，也說成是『三種人』。」（〈鄧小平同志關於如何劃分和清理「三種人」的談話〉，同上）——換句話說：即便中共的老幹部在文革中緊跟毛澤東、迫害無辜，指揮逼供信，操縱武鬥，打人致傷致殘，都沒有關係，只要用輕輕一句「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便一點事也沒有了——用這樣的截然不同的兩套標準來清查「打砸搶」，會有公正的結果嗎？廣西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韋在文革中直接指揮軍隊和他操縱的保守派組織「聯指」屠殺了近二十萬群眾。既有反對他的造反派「四二二」，又有從不捲入兩派鬥爭的「黑五類」。文革後數十萬群眾和受害者家屬上書中央，要求清查這一廣西最大的「三種人」。但是因為韋國清和鄧小平私交甚篤，非但被包庇下來，還一路官至政治局委員和人大副委員長。內蒙古原革委會主任、北京軍區副司令滕海清是另一個例子。滕海清是一手製造「內人黨」罪魁禍首之一。僅據中共自己的文件承認：在他的直接指揮下，這一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髮指的刑訊逼供中共打死16,222人，致殘87,188人。但因為滕海清是在軍內很有人脈的「老幹部」，晚年照樣在他的大軍區副司令級別上頤養天年。相反，內蒙古師院學生造反派東方紅縱隊的頭頭之一的高樹華，在當時僅是內蒙古革委會常委，更曾經對這一冤案公開提出過異議。但卻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種人」的運動中被逮捕入獄四年，作為滕海清等老幹部罪行的替罪羊。結果在查了四年都無法查出他任何「打砸搶」問題的情況下，才於1983年7月5日被迫以「不予起訴」的名義釋放。比較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清查」標準，這場運動有什麼法律公正可言？

如上所述，造反派問題無論在文革研究中還是在中國的社會的現實裏，都成了一個函待澄清的歷史真相和急需深入研究的歷史課題。在這一時候，周倫佐先生的《「文革」造反派真相》寫成出版，不僅對於文革研究的學科有很大的建設性，對於官方的文革「結論」——如中共的《決議》——更具有極大的挑戰性。這毫無疑問是一本有價值的文革研究的學術著作。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

一架瘋狂的飛機突然撞毀，龐大的機體炸裂成碎片。記錄事件經過的黑匣子丟失了，無人知道其中的真相。

——這是今日眼中的昨日「文革」。

機上的乘客全死了。因為黑匣子丟失，他們和機組人員一起都成了可能的罪犯。

——這是今日眼中的昨日「造反派」。

——作者題記

前言

不知從哪一天起，「造反派」變成了「文革」的同義詞。人們提起「文革」便會說到造反派，提起造反派便會說到「文革」，造反派成了一群以「文革」為舞臺壞事做絕的歷史罪人。

對造反派的認知並非歷來如此。「文革」時期人人都知道，造反派特指那些首先在本單位、本地區造當權派的反，觀點激進、口號極端、行為激烈的群眾組織和群眾派別。就是在「文革」結束之初的官方文件和民眾常識中，造反派的界限也十分明確：特指那些過去造過當權派的反，眼下正成為「揭、批、查」運動嚴懲對象的人。雖然80年代初胡耀邦說過「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是造反派，但那是為了防止原保守派群眾乘機對造反派反攻倒算引發新的派性鬥爭所採取的權宜之計，事實上在同時開展的「揭、批、查」運動中，官方並沒有忘記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區別。

只是在後來，造反派這個名稱才逐步變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泛指詞：「文革」中的造反紅衛兵和造反民眾是造反派，運動初期的官辦紅衛兵是造反派，進入各級革命委員會的軍隊代表、幹部代表、群眾代表是造反派，開進各單位「支左」的「軍宣隊」和進駐文化教育領域的「工宣隊」、「貧宣隊」是造反派，甚至以林彪為首的高層軍人政治集團和以江青為首的高層文人政治集團，也成了造反派¹。造反派真是成了一個垃圾箱，什麼髒東西都可以往裏裝。

於是，不僅揪鬥當權派和大搞武鬥之事理所當然歸到造反派名下，而且，「文革」初期以「教育革命」之名層層批鬥普通教師，以「破四舊」之名肆意毀滅優秀文化遺產，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之名殘酷迫害高級知識份子，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名兇暴虐待「黑五類」及其子女，以及「文革」後七年各級革委會和司法機關在「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眾多官方運動中所製造

涉及數百萬人的冤、假、錯案，都毫無例外地記到了造反派賬上。至此，造反派終於成了「文革」舞臺上人性喪盡的惡勢力的代名詞，在中國現代史上，恐怕只有萬惡的日本鬼子才能與之比醜。造反派完全妖魔化了。

按理說，1966-1976年捲入「文革」漩流的八億中國人，現在大多健在，無論當初他們是造反派、保守派還是逍遙派，對這段歷史以及造反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應該還記得清楚。可是，我們很少聽到說明歷史真相的聲音。

這不奇怪。造反派的妖化，原本是享有公共話語權力的「文化精英」們造成的。多數民眾，歷來只有聽話權而無說話權，他們不僅無從傳達自己的聲音，而且很容易被公共話語反復發出的聲音所同化。

造反派的全面妖化，大約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當時，部分文化人為了抗議官方針對知識份子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維護並爭取自身的言論權利，自然而然地選擇了一個令官方無可置疑的話題：「文革」反思。本意自然是借題發揮——通過回顧「文革」中的種種反理性反人道現象，來控訴極權主義「封建法西斯專制」的暴行。這些控訴者大多在「文革」中遭受過來自不同方面和程度不同的迫害，為了敘述方便，更為了與官方口徑保持一致，他們便將各種各樣的加害人統稱為「造反派」。

這是在否定「文革」的共同前提下進行的。「文革」的最大特徵是什麼？是造反。要否定「文革」自然就要否定造反。官方重點否定的明明是1966年10月以後罷他們官奪他們權的「造反」，知識份子重點否定的明明是1966年10月以前整他們人抄他們家的「造反」，現在卻用一個抽象的「造反派」名稱——既包含了兩種所指又達到了口徑一致。

後來的「文革」反思話語逐漸習慣了這種籠統的提法；到90年代末「文革」反思行為達到高潮時，這種提法不僅約定俗成，而且逐步深入人心——幾乎成了公眾的共識。

文人們將「文革」中原本出自官方和保守紅衛兵的種種惡行統統歸到造反派名下進行鞭撻的招式，既避免了政治風險又增強了轟擊「封建法西斯專制」的火力，卻無意中歪曲了原本清清楚楚的歷史事實。歪曲

的結果，不僅使參加過造反的人承受很多莫須有的罪名，而且給身處同一話語空間的「文革」研究者製造了一層層迷霧。

少數人的記憶偏執不應該泛化為群體性的記憶偏執，少數人的歷史失憶不應該泛化為群體性的歷史失憶。為了對歷史負責，必須恢復造反派的本來面目——既不神化，也不妖化，而是人化。

造反派問題研究，至少已有五種話語形態：一是官方式的否定；二是海外極左派和國內極右派式的肯定；三是海內外自由派知識份子式的否定；四是海內外平等派知識份子式的肯定；五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的客觀式論述。

這五種話語形態又可從對造反派的價值評判上分為三大類：否定、肯定、不作肯否。在我眼裏，客觀式論述的第三類話語最能體現公正、嚴謹和相容，至今只為海外宋永毅、華新民和國內何蜀、葉曙明等少數學者在沈著建構，實際凸顯於公共話語空間的只有否定和肯定兩大類。

在否定類話語中，以昔日嚴家其和今日金春明為代表的官方式否定話語，由於體制立場的深深踏印和體制視角的長長軌跡，經受不住人心的評判和時間的檢驗，誕生之時學術生命即已終結。

在肯定類話語中，海外極左派和國內極右派式的肯定話語認為：現在的中國，修正主義上了台，走資派得了勢，資本主義復了辟，工農大眾遭了罪；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和群眾造反運動仍然有效。因為完全囿於毛澤東反歷史的話語體系並忽視「文革」結束後中國的歷史進步，它除了能在西方反體制青年中激起小小狂熱和在國內少數人心中引起大大聯想，並沒有獨立的學術意義。

於是只剩下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否定式話語和平等派知識份子的肯定式話語。兩派中人都是民主知識份子，只是前者更看重知識份子的自由權利，後者更看重下層民眾的平等利益。稱前者為自由派，屬於他們的自認和海內外的共識；稱後者為平等派，是因為他們的視角和言說尤其注重社會平等。從國內輿論和海外中文刊物 20 世紀 90 年代圍繞造反派問題所發生兩次辯論的資料來看，不僅大陸如此分野，國外也這樣劃界。

這很正常。過去不久的「文革」事件給中華民族留下的深刻創傷和

重大影響，使每個人心裏都有不同程度的痛感和刻痕。對於在這個事件中先風光一時後遍體鱗傷的造反派，即使站在體制外的評價，人們也不能不在思想和情感上帶著強烈的褒貶色彩。我自己理智上希望客觀公正，情感上卻也難免傾向平等派的肯定式話語。至少現在，不偏不倚的客觀式話語形態還不可能完整呈現。

這兩種話語與官方式話語和海外極左派及國內極右派式話語的最大區別，是它們都站在體制外。除此之外它們之間還有一個共同點——都以否定「文革」為論說前提。

但分歧仍然很大：

自由派抱定進步觀念，認准包含著多元主義文化、民主主義政治和自由主義經濟的社會制度是中國歷史的下一站目標，並將社會利益、理性訴求、和平方式、法制秩序、制度建設、經濟發展，視為實現這一進步的基本途徑和基本內涵。他們由此認為：造反派服從毛澤東的錯誤政治導向，目無法紀踐踏人權亂揪亂鬥並自相殘殺，停工停產大搞破壞造成國民經濟接近崩潰，最後導致幾無一絲自由氣息的極端專制。從社會進步的要求來看，造反派的歷史作用理應否定。其言說者，主要包括海外的嚴家其、劉再復、侯一謙、徐明旭等和國內的徐友漁、朱學勤、丁東、李輝、蕭功秦等一批言及「文革」造反派話題的自由派知識份子。

平等派立足正義觀念。在他們眼中，「文革」前十七年推行的政治等級主義，已將社會成員之間的政治不平等推至極端，人際關係已經緊張到了必須打破的地步。政治上遭歧視受迫害的龐大弱勢群體遍佈國中，個人權利幾乎被剝奪殆盡，人生境遇更是處處險阻，他們在可能的時機所進行改善現實政治處境和爭取自身平等權利的行動，於情於理都無可厚非。造反派主要由渴望改變現狀的社會弱勢群體構成，毛澤東所發動的「文革」和所宣揚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只為他們提供了反抗政治不平等的現實可能性，他們並非完全被最高領袖所利用。從 1966-1969 三年群眾性造反運動的實際內容看，他們並沒有太多偏離由切身感受所激發的反抗要求。雖然自相殘殺必須譴責，但十年「文革」中更多罪惡的責任人並不是造反派。他們最初造反的原因和造反過程中多次遭受鎮壓的緣由，都表明其反抗行動的正義性。他們造反失敗後的心理應

激和精神反思，也為今日的社會進步準備了人文條件。現在自由派知識份子和普通群眾客觀上應和官方話語，不僅完全否認這些事實，而且對他們1976年至今遭受的政治迫害和社會歧視也熟視無睹，表現出了巨大的社會不公正。這一派的言說者，主要包括海外的楊小凱、陳佩華、鄭義、華林山、劉國凱、印紅標、胡平等一批言及「文革」造反派話題的平等派知識份子。

事實上，這兩種體制外話語之間的具體分歧比我簡單歸納的還要多，各自言說者的名單，更能超出所舉列人員許多倍。我的歸納和列舉只限於自己狹窄的感知範圍。而且，兩派言說者的傾向也並非一成不變。例如：自由派的朱學勤也曾對造反派的受迫害遭遇深表同情；平等派的鄭義在揭露廣西人吃人事件時也曾無意中往造反派臉上抹黑。自由派的丁東和平等派的印紅標，又都表現出客觀性的傾向。

比較而言，在海外公共話語空間，似乎平等派的聲音更為響亮，自由派的聲音相對顯得微弱；國內公共話語空間正相反：除了自由派的聲音此起彼伏，幾乎聽不見平等派的聲音——這自然與官方的言論控制有關。

兩種話語雖然都以否定「文革」為言說前提，但對造反派的態度又不相同。自由派把造反派和「文革」視為一體給予否定；平等派試圖把造反派從「文革」中分離出來給予肯定。

兩種話語的言說文本也各有特點：

自由派為了證明造反派的行為屬於非進步甚至反進步，更偏重論說造反的結果，在挖掘與正義問題緊密相連的造反原因時不能不有所回避。其文本雖有可以說服人的學術理智，卻缺乏能夠感動人的道義激情。

平等派為了說明造反派的行為屬於正義性反抗，更偏重分析造反的原因，在闡釋與進步問題密切相關的造反結果時不能不顯得牽強。其文本雖然飽含足以感動人的道義激情，卻缺乏足以說服人的學術理智。

歷史研究本來就有雙重秉性，當它作為科學時必須講究學術品質；當它作為人學時又必須堅持道義立場。在造反派問題研究中同時兼顧雙重秉性十分不易。兩種話語都有所犯難。

文本中道義感的欠缺，無疑是自由派話語面臨的突出問題。

道義感——一個人心中帶有道德褒貶色彩的情感反應。它源自人類的同情心，又奠立起人類的良知，賦予個人情感以超越自私範圍和利己層面的公共評價品性，使人不至於成為只有高智慧而無愛憎傾向的機器人。中國人習慣將「天理良心」當作衡量世間百態的標準。這種天人一律的用法並非類比不當。如果說天理的基本法則是保持自然界各種要素和各種物類之間的相對均衡，那麼良心的基本法則就是追求人世間各種成員和各種人群之間的相對平等。過度的不均衡和不平等必然導致衝突、震盪和劇變，並導向新的相對均衡和相對平等。對於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應激感受和道德判斷，肯定是任何歷史研究者都不可或缺的公共情感。造反派問題的研究，同樣不可偏離研究者內心的真實感受和直感判斷。自由派的文本之所以缺乏道義激情，恐怕就來自——為了觀念的真實而犧牲了感受的真實。

由於具有與官方話語相同的否定性向度，自由派招來了「共產黨話語系統」和「超事實歷史研究」的隱隱責難。這種責難雖然來自海外平等派人士之口，國內不少人其實也有同感。這當然是對自由派的嚴重誤解。相同的否定向度，並不等於相同的否定內容。官方話語否定「文革」造反派，是為了說明現行極權體制的進步；自由派話語否定「文革」造反派，卻是為了證明整個極權制度的反動。二者的動機和目的完全不同。只不過，否定向度相似引起的言說糾纏和道義判斷缺乏造成的良知傾斜，還是給自由派帶來了某種並不情願的彘扭。

為了成全觀念而犧牲感受所付出的代價如此之大，自由派並非毫無知覺。他們大多屬於親歷過造反然後覺醒的優秀一代，不僅無法抹去當年的切身感受，內心的道義感依然和常人一樣強烈。即使在造反派問題上發生如此傾斜，他們中的傑出者也在及時捕捉足夠打動自己的新穎資訊，以對照自己已經成型的思想走向。我說的是國內自由派話語的主要言說者徐友漁。這體現於他對構成平等派「造反有理」說基礎的「社會衝突論」和「家庭出身論」的特別關注。他甚至為之使用了只有內心被觸動才會出現的肯定語：「這固然是有價值的發現」、「這種觀察相當有深度」、「他們的觀察和分析也是深刻的」²，「為還未成熟的文革研

究作出了貢獻」³。雖然帶有明顯的保留語氣，但是期待深度見解之心還是躍然紙上。

平等派話語的缺陷也不容忽視。他們試圖闡明造反派與歷史進步關係的言說大多停留于表象，自然難如人意。事實上，造反派與「文革」後出現的民主運動之間存在巨大的斷裂，任何想在其間尋找直接因果關係的努力都是徒勞。造反派中的不少人轉變為後來的民主主義者，一般發生在他們與造反運動徹底決裂並否定了自己的造反派身份之後，在認同造反派身份的前提下實現轉變者極其罕見。海外平等派話語主要言說者——楊小凱文章中的道義激情無以倫比。但他1968年即已入獄，沒有經歷這之後才普遍發生的造反一代的精神轉變過程，所以其言說不能不瀰漫著1968年之前的記憶情緒，而對此後造反派身上顯現的決裂和轉變缺少洞悉。儘管他的歷史記憶不失真實，仍然填補不了造反運動與民主運動之間的斷裂之壑。國內平等派話語主要言說者劉國凱比較冷靜，為造反派所作辯護也更有力量。但他試圖在造反運動與民主運動之間直接架設因果之橋的努力，同樣缺少堅固的事實支撐。像他這樣直接以造反派身份進入80年代民主事業的人鳳毛麟角，很難視為全國的通例。那巨大的斷裂之壑仍然無法跨越。

這不等於說造反派與中國後來的民主運動和社會進步毫無關係。關係仍然存在，只是藏得較深，目光停留于表象，自然難以發現。研究者只有放眼更長的歷史鏈條和潛入更深的歷史層面，才能看到其中某種間接曲折隱約的因果關係。

能否站在否定「文革」的立場上，把看似與「文革」這幅歷史巨畫融為一體的造反派從其背景色中區別出來，從社會正義和歷史進步兩方面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要做到這一點難度很大，因為諸多現象一開始就攪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為了逼近歷史的真實，必須逐層地進行剝離和分析。

這包括：

- 從性質上分清造反與保守的區別；
- 從時間上分清三年造反與十年「文革」的區別；
- 從動機上分清毛澤東與造反民眾的區別；

從歷史上看到造反一代與中國現代性進程的聯繫。

從最寬泛的角度考察，「文革」中各種主動性人群的激烈行為，都是社會邊緣群體對中心秩序的打破和對自身權利的爭取。只不過「中心——邊緣」式結構的社會圈層又是多種多樣的：有以大民族為中心而以小民族為邊緣的族類圈層，有以男性為中心而以女性為邊緣的性別圈層，有以成年人為中心而以准成年人為邊緣的年齡圈層，有以統治階層為中心而以下層群眾為邊緣的等級圈層，在統治階層中又有以掌握權力者為中心而以喪失或者嚮往權力者為邊緣的權力圈層，在下層群眾中又有以紅色出身者為中心而以黑色出身者為邊緣的成份圈層……這些社會圈層，大者存現於全國範圍，小者存現於一個個具體的企業單位、事業單位、機關單位。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西方的學生運動、女權運動、黑人運動，主要爆發於年齡圈層、性別圈層、族類圈層，那麼中國同時期的民間造反運動便主要爆發自年齡圈層、等級圈層、權力圈層——並表現為學生造反、民眾造反、幹部造反。「文革」中這三個圈層邊緣人群的造反，還包含著錯綜複雜的關係，比如學生身上就不只體現著一種邊緣特性，而且學生中「紅五類」子女和「黑五類」子女的邊緣特性及其造反指向，也有完全不同之處。這都需要深入分析和嚴格區別。

本書試圖把造反派從「文革」中剝離出來，從不同方面探尋造反運動的直接正義性、相對獨立性、間接進步性——

第一篇和第二篇，著重闡述造反運動的直接正義性；

第三篇，著重闡釋造反運動的相對獨立性；

第四篇，著重闡明造反運動的間接進步性。

注釋：

- 1 欠學勤這位對造反派真相頗有洞察的學者，也會不自覺地將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集團稱為「造反派」。見所著《書齋裏的革命》，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367頁。
- 2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1頁。
- 3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09頁。

第一篇

造反紅衛兵與保守紅衛兵的分野

「文革」十年，並不是每個時期的領導者、依靠者、打擊者都一樣。為了認清其中的區別，有必要對「文革」的不同歷史時期進行劃分。國內外有多種觀點，我更傾向於國內「文革」研究學者何蜀的說法。⁴

從政治舞臺上各個時期的主角身份和角色轉換來看，我認為可將十年「文革」劃分為這樣四個階段：

- (1) 黨委支配運動局勢階段——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達至1966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始；
- (2) 造反派支配運動局勢階段——1966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始至1969年8月《八二八命令》下達；
- (3) 軍隊支配運動局勢階段——1969年8月《八二八命令》下達至1971年10月「批林整風」開始；
- (4) 幹部支配運動局勢階段——1971年10月「批林整風」1976年10月「揭、批、查」開始。

保守紅衛兵運動爆發於「文革」伊始的第一時期——黨委支配運動局勢階段。領導力量是各級黨組織，依靠力量是黨員、團員、勞動模範、積極分子、「紅五類」及其子女，打擊對象是「黑幫」、「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黑五類」及其子女。

造反紅衛兵運動興起於「文革」開始後的第二時期——造反派支配運動局勢階段。領導力量是中央文件、兩報一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以及掌控它們的中央文革和毛澤東，依靠力量變成了曾在第一階段受到打擊和壓制的非「紅五類」子女，鬥爭物件隨之變為第一階段運動的領導者——曾將成千上萬群眾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各級當權派。

就像兩個階段之間是逐漸過渡的一樣，兩種紅衛兵的角色替換也有交叉。但是二者人員構成和鬥爭物件的明顯差異，仍然無法抹殺。

「文革」中任何一個神智正常的人都知道：在北京以及全國各大中城市最早打出「造反」旗號的「老紅衛兵」，從來就不是造反派，而是貨真價實的保守派。可是，現在很多神智同樣正常的文化人卻由於記憶上的失誤或理論上的偏差，僅僅憑著「老紅衛兵」最早喊出「造反」口號和採取獸性大發作式的極端行動，便把他們視為最早的造反派，他們所犯下的那些反文化、反人道的法西斯暴行，也被自然而然地歸到了造反

紅衛兵名下。

這是對造反紅衛兵張冠李戴式的歪曲。

第一章 完全對立的等級要求和行為指向

「文革」中的保守紅衛兵，主要活躍於1966年8-10月「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全面推行時期和1967年「二月鎮反」全力進行時期。他們由家庭出身「紅五類」的青年學生組成，又以「高幹」子女為發起人、中堅力量和領導核心。保守紅衛兵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由這批「高幹」子女策動和指揮的。

「文革」中的造反紅衛兵，主要活躍於1966年8月——1968年8月。他們多數由家庭出身非「紅五類」的青年學生組成，「黑五類」子女在其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

第一節 保守紅衛兵：特權階層子女的惡性表演

「老紅衛兵」的主導力量，是中央到地方各級「八旗子弟」。

他們自小便隨同父母身居中國社會的特權階層，尊貴的社會政治地位和優越的物質生活待遇，將他們與現存體制融為一體，也使他們養成了唯我獨尊和視天下為己有的狂傲心態。泛政治化的社會環境所產生的純政治性的意識形態，使青年人特有的青春期幻想在他們身上畸形地表現為一種權力狂想。他們身上也有兩重現實處境施予不如意者的邊緣特性：一是因為屬於准成年人而處在成年人年齡圈層的邊緣，二是因為屬於特權階層無職無權的子女而處在統治者權力圈層的邊緣。這使得他們那扭曲的激情，除了包括青春期的叛逆衝動，便只能表現為對父母權力的嚮往以及對「異己階級」行使權力的渴望。「文革」爆發前他們對現實的不滿，主要來自在這種權力狂想對照下現實中存在的不如意之處：

他們渴望像父輩一樣轟轟烈烈地投身於革命洪流，再光榮地上岸來成為各級政權的當然接班人，可是偏偏身處風平浪靜的校園環境，而且要受「舊知識份子」的管束，無從煥發自身的鬥爭激情並施展自身的政

治抱負。

三年大饑荒迫使極權體制對知識份子的政策有所放寬，十多年來一直被視為「思想改造」物件的知識份子處境有所改善。這就給他們一貫藐視「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內心帶來衝擊並造成失衡。

這個時期，政權高層彭真、陳毅等人先後提出對「可以教育好」的「黑五類」子女要重在表現，學校對學生的實際要求開始從「只紅不專」向「又紅又專」方面傾斜。大學和中學裏那些品學皆優但歷來遭受等級歧視而只能夾著尾巴做人的非「紅五類」子女，逐漸受到老師的重視。這使缺少文化根基的「八旗子弟」深感憤慨，認為自己在學校裏享有的特權受到了「反動階級孝子賢孫」的侵犯。

「八旗子弟」們貪心不足式的不滿，自然不能與苦苦掙扎於社會等級結構下層的非「紅五類」子女所懷生存匱乏式的不滿同語而論。不難想像，一旦有機會，他們「造反」的鋒芒將會指向什麼。

機會果然出現了——毛澤東開始發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憑著特權階層優越的資訊快線，首先獲知毛澤東最初「開展上層建築領域革命」和「向資產階級反動黑線開火」的政治意圖。這個機會及其所包含「反右」式的政治內容，正好與他們心中所懷的不滿不謀而合，於是他們最先起來「造反」了。

在北京，他們的組織形式和行為方式純屬自發，在北京之外全國所有的人中小城市，從組織到行為，他們完全由當地黨政權力機構一手策動。無論北京還是外省，他們在1966年8-9月發起的大破壞行動，都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權直接操縱和支持的結果，所以又稱為官辦紅衛兵。

毛澤東在「文革」發動之初的1966年八次接見紅衛兵，包括10月18日這次在內前五次接見的絕大多數都是他們——由各地官方選派並以「高幹」子女為首的「紅五類」子女。

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高幹」子女亮出「紅衛兵」旗號並寫出《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算是他們「造反」的開始。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了《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又於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百萬官辦紅衛兵並戴上紅衛兵袖章，使他們的「造反」達到了高潮。1966年8-9月，他們不僅成

了學校裏名為「民主選舉」實為官方包辦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掌權者，而且成了社會上世人敬畏的「孫大聖」。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發出《緊急指示》，要求為被學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群眾平反。1966年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進一步強調為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平反，並把上層紅色子弟大力推行的「血統論」列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表現形式之一給予否定。保守紅衛兵的「造反」勢頭逐漸退潮。同年12月16日，在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出席的「首都中學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江青宣佈解散保守紅衛兵當時在北京的三大組織：東城區糾察隊、西城區糾察隊和海澱區糾察隊，正式宣告了他們政治主流地位的結束。

為什麼最早的紅衛兵組織是由他們成立，最先針對學校領導的「造反」是由他們發起？這是當時中國嚴酷的專制現實結出的畸形之果。在當時中國的校園裏，兩人以上正式或非正式的結社一律被視為「非法」，一旦被發現，輕者定為「反動組織」，重者定為「反革命集團」，參與者要麼開除學籍，要麼入獄判刑；學校領導更不能反對——因為他們代表黨行使權力，反對領導就是反黨=反革命。因此，在1966年6-8月這個時段，不要說「黑五類」和「麻五類」子女，就是普通「紅五類」子女，即使得到毛澤東開展運動的準確消息，也不敢有什麼異常舉動。只有這批「高幹」子女擁有這種可能：他們是紅色政權的當然接班人，成立大造資產階級之反和大樹無產階級之威的群眾組織——總不能說是反對紅色政權的「反革命」吧？他們頭上還有父母站在權力高位撐起的「紅色保護傘」——小小學校領導還不自矮三分？更何況學校領導雖然在普通學生面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黨代表」，在他們眼中卻是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何畏懼之有？真是天降大任於斯人——運動之初最早成立組織和最先「造反」的除了他們還能有誰？

毛澤東在確定開展「文革」的目標之後最初所能支援和發動的群眾，自然只能是他們。只是毛沒有想到，他們獲得政治合法性後繼續把鬥爭矛頭指向「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黑五類」及其子女的行為，會

壓制更廣泛的群眾投入運動，並妨礙自己實施打倒劉少奇的戰略部署。

當毛澤東把鬥爭的主要對象公開確定為這些特權子弟們的父輩——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權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那種專把鬥爭矛頭對準「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造反」行動，明顯干擾了鬥爭的大方向，理所當然遭到毛澤東的否定。他們立即站在保衛各級當權派的立場上，成為頑固的保守派。北京的「老紅衛兵」更于1966年12月26日成立了只有行政十三級以上幹部子女才能加入的「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淪為專搞打、砸、搶的破壞分子。

除了北京和那些造反派與保守派一直對峙到革委會成立的省份之外，全國各地的保守紅衛兵，後來多數都加入了分裂為兩派的造反紅衛兵組織。例如：重慶官辦的中學生紅衛兵總部因傾向造反而於1966年9月20日被市委強行取消之後，多數成員紛紛赴京告狀並加入到造反行列中去；我所在地區第五批赴京接受毛澤東檢閱的中等學校官辦紅衛兵，就在1966年10月18日檢閱完畢後的當天，在北京的接待站裏批鬥了官方派去帶隊的地委宣傳部宋某，宣佈集體造反——成立了名為「一〇一八」的造反紅衛兵組織。

北京中學生的情況比較特殊：

第一、1966年8-10月，北京大學生和外省大中學生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劃分，主要取決於對工作組的不同態度；北京中學生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劃分，卻主要取決於對「血統論」的相反立場。

第二、1966年10月以後，外省中學造反紅衛兵逐漸取代官辦紅衛兵的位置，與大學造反紅衛兵一起成為新的政治主流；北京中學造反紅衛兵的活動卻主要圍繞反對「血統論」和爭取平等權利的主題展開，從未真正進入以大學造反紅衛兵為主體的主流政治行列。

這主要是由北京中學生中「老紅衛兵」的特殊身份造成的：

1966年6月3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向首都大中學校派工作組並制定了「八不准」的規定後，工作組對5月29日至6月初清華附中、地院附中、石油學院附中、北大附中和二十五中上層紅色子弟成立的紅衛兵組織，是持否定態度並採取了壓制措施的。正因為如此，清華附中紅衛兵才于7月29日給毛澤東寫信，並附上兩篇論「無產階級

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文章；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開始的8月1日，毛澤東除了給他們回信表示全力支持外，還將他們的三篇文章與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一起，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下去。毛在這次全會上公佈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中，所說在五十多天裏劉少奇等人圍剿的革命派和壓制的不同意見，明顯包括了他們。

而且，他們首創明顯區別於官方的共產黨、共青團、工人聯合會、青年聯合會、婦女聯合會的群眾組織——紅衛兵，為隨後的學生和民眾造反運動提供了有效的組織形式。

這也是今日人們在認定他們的保守派身份時略感疑惑的原因之一。

這個時期，毛澤東決定打倒劉少奇的政治意圖尚不為世人所知，毛、劉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對待群眾問題上。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批判和對造反學生的支持，使他們擺脫了來自工作組的壓制，自然贏得了他們的狂熱擁護。

然而，自從8月18日毛澤東首次接見百萬「紅五類」紅衛兵，他們正式成為政治主流之時起，他們的特權階層本能所決定的「造反」真相，便全部暴露出來，並與全國各大中小城市官辦紅衛兵的步調完全一致了。

在「文革」風雲變幻的過程中，此時正處於「文革」的第一時期——各地運動的主動權還完全掌握在黨委手中。「文化大革命」看似全面發動起來了，其實運動的領導力量、革命動力、鬥爭物件與過去的政治運動大同小異。全國各地在黨委領導下紛紛將文化界的「黑幫」、「三家村」、「小鄧拓」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揪出來進行批鬥，並像以往一樣由上級黨委向一些基層單位派出工作組領導運動。這時的革命動力，仍然是以往政治運動中的依靠對象——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勞動模範、先進人物，復員轉業軍人、政治積極分子和「紅五類」出身者；鬥爭物件同樣是歷次政治運動反復打擊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和官方新劃定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這個時期揪出的一大批所謂「黑幫」、「三家村」，無一不是經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後拋出來交群眾批鬥的。除北京市委是一鍋端，他們都分別出自黨委宣傳部門和文教系統。例如：北京市委彭真、劉仁「黑幫」和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中宣部和

文化部周揚、陸定一「黑幫」，安徽省李凡夫、居薈明、王世傑「三家村」，陝西省委趙守一「黑幫」，山西省「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周揚樹立的黑標兵」趙樹理，四川省張黎群「黑幫」和省文聯馬識途、李亞群、沙汀「三家村」，貴州省委汪小川「黑幫」，《雲南日報》總編輯李孟北為首的「雲南三家村」。上海市由曹荻秋代表市委宣佈打倒的文教系統「反動學術權威」——復旦大學教授周毅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華東師範學院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李俊民、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上海電影局副局長瞿白音、上海作家協會王西彥。北京大學陸平「黑幫」，清華大學蔣南翔「黑幫」，天津南開大學婁平「黑幫」，遼寧大學邵凱、楊俊超「黑幫」，西安交通大學彭康「黑幫」，重慶大學鄭思群「黑幫」，南京大學匡亞明「黑幫」，浙江大學劉丹「黑幫」，武漢大學李達、何定華、朱劭天「三家村」，廣州中山醫學院柯麟、劉志明「黑幫」，雲南大學李廣田「黑幫」。運動的方式和性質如同「反右派」、「反右傾」的翻版，只是揪出來的人換成了過去那些運動的積極分子或漏網者。

「老紅衛兵」瘋狂的身影就活動在這個階段的社會舞臺上，其政治背景、人員構成、鬥爭內容完全具有官方傾向。第一，8月18日後各地出現的紅衛兵，大多由各級黨委部署成立並聽命於各級當權者；第二，8-9月份「造反有理」雖已成為主旋律口號，但這時的「造反」者主要是社會的強勢群體——得到各級官方支持並以領導幹部子女為首的「紅五類」子女，被「造反」者主要是構成社會弱勢群體的各種人員——「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前國民黨軍政人員，前工商業者，有「海外關係」者，歷次政治運動中首當其衝受到傷害的文藝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包括這些人群的家屬子女。其中相當多的打擊對象是在5-7月間由各級黨委或上級黨委所派工作組對各單位人員進行「政治排隊」時內定的「三、四類」。第三，各級黨政權力機構這個時期都在正常運轉，牢牢掌握著運動的領導權。

個別學校在這個時期成立並全然得勢的造反紅衛兵組織，其思想和行動也難免打上這個階段運動特有的官方傾向標記。例如北京大學的「文革委員會」和「新北大公社」。

從1966年8月到1966年10月，官辦紅衛兵的「造反」行動席卷全中國，史無前例的破壞力震撼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明星般耀眼的光芒吸引了八億人的視線。縱觀他們短暫的「造反」生涯，儘管存在北京自發與外省官辦的區別，儘管北京與外省的行動步驟之間存在時間差，但他們的主要「業績」依然不難歸納：

「教育革命」——層層揪鬥家庭成份不好和非黨團員身份的教師及品學皆優的「黑五類」子女……

「破四舊」——以「封、資、修」的罪名對人類優秀文化遺產進行大破壞：搗毀文物古跡，焚毀書刊字畫，沒收玉器珠寶，改寫街道店堂名稱……

「鬥爭反動學術權威」——對黨報點名和過去劃為「右派」以及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挨過整的教授、專家、學者、作家、藝術家，實行抄家、批鬥、掛黑牌、遊街示眾……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將身處社會底層的「地、富、反、壞、右」輪番揪出，戴高帽、掛黑牌，列隊遊街示眾，有的還要一邊敲鑼，一邊自報姓名、身份、罪行……

「紅色恐怖」——在學生中大搞「血統論」，以家庭成份劃分尊卑貴賤，將學生劃分為三類十五等，並對「黑五類」子女和反對他們觀點的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批鬥、罰跪、捆綁、吊打甚至殺害……

這是一種什麼性質的「造反」？

分明是將特權階層對無權階層的隱蔽性剝奪公開化。

分明是將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文明式迫害野蠻化。

「文革」中的第一批冤、假、錯案，就是這個時期製造的。

這些瘋狂的行動大多由各級官方親自主持進行。

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認為：「『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組織自始至終都是以大、中學生為主的一種自發性的群眾組織，無論地方或是全國都沒有統一的規劃、統一的領導和統一的組織系統。它一開始就完全脫離各級黨組織的領導，是所謂『踢開黨委鬧革命』的產物。」⁵ 這種說法雖然符合黨校教授的思維邏輯，卻不符合「文化大革命」不同階段的具體實際。

1966年8月之前，北京少數中學出現的紅衛兵組織確實具有某種自發性和秘密性，並脫離學校黨委領導。但是到了8月初毛澤東支持紅衛兵的親筆信傳開後，紅衛兵組織便雨後春筍般出現在首都各大中學校。從8月1日至8月18日半個多月時間裏，「紅衛兵」幾乎演變成了北京所有大中學校合法的青少年學生組織。

8月18日毛澤東公開檢閱紅衛兵，宣告紅衛兵運動正式登上「文革」舞臺。這以後各地響應中央號召聞風而動所湧現的紅衛兵，幾乎全是按照各級黨委的佈置並仿照北京模式建立的。上海市委為了控制局勢，率先在人民廣場支持成立上海紅衛兵。中共四川省委在1966年10月2日發出的《關於目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幾個問題的通知》中也指示：「認真加強對紅衛兵組織的領導，積極發展壯大，但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及農村不成立紅衛兵組織。」可見當時地方黨委對紅衛兵所起的組織和領導作用。這樣的紅衛兵當然不能算是「自發」組織。他們都有統一的規劃、統一的領導、統一的組織系統。比如廣州的「主義兵」，長沙的「紅色政權保衛軍」，南京的「黑字兵」，合肥的「紅總」，武漢的「一司」，重慶的「思想兵」等，都完全聽命於當地黨委。他們的「破四舊」、抄家、揪鬥「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都是由當地黨委統一部署進行，抄家物件的黑名單大多是地方黨委指示公安派出所提供，一些地方還有公安派出所直接參與行動。

例如建在大江之濱巨大岩體之上的山城重慶：8月18日之後，中共西南局領導人便指示各地大中學校成立紅衛兵。重慶各學校迅速在黨組織布置下由「紅五類」學生成立起紅衛兵，「紅五類」教職「則組織起赤衛軍。8月下旬，紅衛兵、赤衛軍在各區、縣黨委或社教工作團的統一部署和公安派出所密切配合下對社會弱勢群體——「牛鬼蛇神」實行抄家並破壞文物古跡。9月1日，時任中共西南局宣傳部長並列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劉文珍到重慶所抓試點——重慶市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宣告成立。劉文珍和市委領導到會祝賀，並安排了銅管樂隊演奏助陣。9月5日，經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提議，按照中共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的部署，由李井泉親自命名的「工人糾察隊」在首家試點單位中梁山煤礦宣告成立，並發表《宣言》。隨後，全市紛紛建立起了實

際上由各級黨委領導的「工人糾察隊」。9月8日，按照市委安排，由市學聯出面串聯，選拔「紅五類」子女組建的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成立，駐軍領導經市委提議並報經成都軍區黨委批准奉命擔任「輔導員」。接著，市委號召各單位發動「紅五類」家長踴躍「送子當兵」——自然是當「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重慶日報》連日重點報導，全市掀起「送子當兵」熱潮。9月15日，《重慶日報》以套紅通欄標題報導〈全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舉行誓師大會〉，並配發社論〈熱烈歡呼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成長壯大〉。這次大會有西南局劉文珍、重慶市委和駐軍領導人出席並發表祝賀講話。此後，因中學生紅衛兵總部態度日益傾向造反派，在市委授意下，又由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于9月20日將中學生紅衛兵總部強行合併，統一改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6

我所在城市1966年6月19日成立了官方「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之後，又於1966年9月5日正式組建了官方「破四舊」辦公室，辦公地點設在當時縣圖書館，由城關鎮主任和武裝部長負責指揮「破四舊」的全部工作。「破四舊」辦公室下設五個工作小組，分別由公安局、銀行、衛生局、商業局、文化局派人組成。

「破四舊」運動涉及範圍很廣，重點很多，不僅涉及了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出版發行界、工商界、宗教界，而且還涉及到人們的生活習慣和日常用品。從「批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資產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開始，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結束，所有的活動，都由地委宣傳部和縣委宣傳部指揮的官辦紅衛兵一手實施，並由公安、宣傳、文化等部門協助。

1. 把1950年「土地改革」到1963-1965年「小四清」和「大四清」期間，歷次政治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五類分子，以及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四不清」幹部、被公檢法列為「內專」的人和在新中國任過「軍、警、憲、特」的人，全部劃入「牛鬼蛇神」範疇作為「破」的重點。先由公安部門提供嫌疑人名單，再由官辦紅衛兵對這些人搞突然襲擊進行抄家。抄出問題的，便掛黑牌、戴高帽、遊大街、站高凳、跪硬地，白天黑夜交代，大會小會批鬥，甚至進行捆綁吊打或拳腳相加。很多人不僅被觸及肉體和尊嚴，而且還被「繩之以法」

並株連子女及親屬。一個小小的縣城，直接受害者超過千人。

2. 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當作封資修的「黑據點」來破。破法有四：一是停止各教會的一切活動；二是將教會活動的廟宇、寺觀、教堂等進行查封或改作他用，例如縣境內的清真寺，有的被生產隊用作保管室，有的被用作牛馬羊廄，被毀壞不堪；三是直截了當拆除廟宇及其設施，例如瀘山上的道教廟宇「文昌宮」、「玉皇殿」、「青羊宮」、「五祖庵」，佛教廟宇「光福寺」、「三教庵」、「觀音閣」、「瑤池宮」等的佛像、菩薩、經書、掛匾、楹聯、碑碣等宗教文物，連同寺廟一併毀壞；四是沒收道教長老、佛教仲尼、伊斯蘭教阿訇、天主教神父和基督教牧師及其他教會人員念經、誦佛、禮拜、祈禱活動時穿戴的服飾和其他用品，如經書中的《佛經》、《古蘭經》、《聖經》，用品中的器樂、樂譜等。

3. 把文化事業單位列為「破」的重點。運動一開始就把縣電影管理站、縣文化館、縣圖書館等單位宣佈為宣傳貫徹「封資修」文藝黑線的「據點」。首先將縣電影管理站放映過的影片全部宣佈為「反動影片」，並連同影片劇照一齊封存。其次是命令縣文化館封存「文化大革命」前為農村、廠礦、學校所購置的器樂、道具、服飾、文房四室等物品以及文藝宣傳作品。縣圖書館被宣佈為封資修的「黑窩」，除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著作之外的圖書雜誌，全部被封禁。勒令新華書店、桃園書店和各個租書點停業清理「壞」書。

4. 把縣城所有街道、商店、單位的傳統名稱當作「四舊」來破。原來的上西街、下西街、順城街、南街、北街和西昌釀造廠、北街幼稚園、西昌群眾報等名稱，本來與「四舊」無關，但為了立「四新」，也分別改為東風路、向陽路、紅旗路、東風釀造廠、紅旗幼稚園、新西昌報。

5. 把人們的髮型和穿著當作「四舊」來破。男性的髮型只要不是光頭、小平頭、太平頭、學生頭，都被視作「四舊」。女性的髮型只要不是女式軍人短髮、學生短髮、農民短髮、長辮子、小辮子的，都是「四舊」。男性和女性服裝，只要不屬於軍人式、幹部式、工人式、學生式的，都為「四舊」。

官辦紅衛兵兩個多月的「破四舊」，使整座城市籠罩在一片紅色恐

怖之中。成千的家庭被抄，上萬的個人被破，原來的社會秩序被全部打亂，所有的人都過上了一律化的生活。

從動機到效果，保守紅衛兵的行為都是在強化現存的社會等級秩序，純化現行的意識形態統治。這是地地道道的保皇。

這當然不是「文革」中真正意義上的造反。

讓我列舉一些這個時期發生在北京地區的反人道反文化暴行，來證明以上論斷並廓清責任人的身份。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首次檢閱主要由全國各地上層紅色子弟組成的百萬官辦紅衛兵後，北京「老紅衛兵」名聲大振，紛紛從學校殺向社會，在他們所稱的「紅八月」裏，製造了用人血寫成的「紅色恐怖」業績。

迫害「黑五類」：

由派出所、街道辦和居委會提供「黑五類」名單，「老紅衛兵」照名單抄家，並施以殘忍至極的各種肉刑。東四一帶有一戶「資本家」，「老紅衛兵」將老夫婦打得半死，又強迫兒子用啞鈴砸碎父親的頭顱，兒子也被逼瘋。作家劉心武在街上親眼目睹：一群男「老紅衛兵」用鐵鏈和皮帶將一老婦打得不能動彈，又讓一個女「老紅衛兵」在其肚子上蹦跳，直到將其活活踩死。8月23日，崇文區欖杆市一帶，一位不堪虐待的「房產主」用菜刀威脅了看押自己的「老紅衛兵」，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兇器的暴徒聞訊趕來，將「房產主」全家活活打死。北京吉祥劇院成了當時最大的施虐集中營，各校「老紅衛兵」抓來的「牛鬼蛇神」都關押在那裏，每天都有卡車往火葬場送死人。僅官方後來公佈的數字，1966年8至9月的40天裏，「老紅衛兵」在北京就打死了1772人。

迫害學校裏的「黑五類」子女：

北京六中、一中成立了駭人聽聞的「勞改隊」，專門關押「黑五類」出身的學生。每天都要對他們施以殘酷的肉刑。對出身「黑五類」的教師也不例外。五十二中「地主」出身的女教師鄭兆南，因為給領導寫了一張大字報，被該校「老紅衛兵」整整折磨了47天，摧殘至死。十三中一名女教師，因「地主」出身，頭髮被剃，又挨槍托、鐵鏈，遍體傷痕。其老母被趕回老家，在烈日曝曬下死去。在整個北京市，沒有打死

人的中學很少。

作為這兩方面的綜合表現，8月26日——9月1日，在「老紅衛兵」血腥行為的影響下，京郊大興縣對「黑五類」及其子女大開殺戒。打死鬥死325多人，其中最年長者80歲，最年幼者才出生38天，有22戶人家被斬盡殺絕。

迫害知識份子：

8月間，「老紅衛兵」首領宋彬彬所在北師大女附中，逼校長卞仲耘當眾上吊。8月23日，作家老舍在國子監孔廟大院裏遭到「老紅衛兵」批鬥和毒打，8月24日投湖自盡。蕭乾曾在9月4日選擇自殺，原因是8月以來與樓適夷、韋君宜、曲六乙以及馮雪峰一起被批鬥，特別是眼看妻子文潔若挨鬥所帶來無可奈何的憤怒和痛苦。8月下旬，黃苗子和郁風遭受首次衝擊。同是8月，「大右派」儲安平驚惶出走並永遠消失，原因是經不起「老紅衛兵」們的七鬥八鬥。8月24至31日，章乃器在絕食中遭受萬般拷打和凌辱，施暴者也是「老紅衛兵」。

這當中，老舍之死最為著名。人們只知道他是紅衛兵迫害致死的，卻忘了說明害死他的是保守紅衛兵，而非造反紅衛兵。

「破四舊」：

8月19日，30多萬狂熱的「老紅衛兵」湧上街頭，一切帶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皆被視為「四舊」而招致搗毀和破壞。「榮寶齋」畫店被「門市部」的字樣所覆蓋，「全聚德」的招牌被砸得稀爛，換上了「北京烤鴨店」的木牌，店裏掛的山水字畫全被撕毀。「瑞蚨祥」綢布店內所有的字畫、契約、宮燈、畫屏，都被毀壞。在批鬥老舍的孔廟大院，火焰在無情地吞噬書籍。北海公園白塔上曾躲過八國聯軍洗劫的小佛像，被一塊塊地敲下來砸碎。頤和園長廊裏的花鳥和人物繪畫，也被厚厚的紅漆蓋去。被認為帶有「封資修」色彩的街道名稱，也一夜之間全部改換。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道」。據遇羅克1966年8月22日日記介紹：市內叫「東方紅」的大街不下五條，叫「紅旗」的鋪面不下五十個。

1966年8月，首都高校造反紅衛兵正在興起，他們並未介入「紅八月」暴行；首都中學造反紅衛兵尚未產生，根本不可能參預此類行動。

時間作證，北京城作證，這都是上層紅色子弟之所為。

這些史料摘自下列嚴肅書籍：

遇羅文著：《我家》；

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

李輝著：《風雨中的雕像》；

葉永烈著：《反右派始末》；

余傑著：《愛與痛的邊緣》。

遺憾的是，這些令人髮指的醜行、惡行、暴行，現在都被推到了下層家庭出身的造反紅衛兵身上，而使真正的責任人洋洋得意地逍遙於眾人的譴責聲之外。這究竟是他們的幸運，還是社會良知的悲哀？

第二節 造反紅衛兵：弱勢青年絕境中的反抗

真正意義上的造反，在北京正式開始於1966年8月——以8月4日晚周恩來親臨清華大學宣佈為蒯大富平反，並親自推薦蒯擔任清華大學造反組織司令為正式標誌。這是接受採訪的原北京林學院造反紅衛兵組織「東方紅公社」負責人Z的觀點，他說當時北京的造反大學生都這樣認為。

外省大城市稍晚，一般在1966年8-10月。從重慶「八一五」、成都「八二六」、青海「八一八」等大學生造反組織的名稱可以看出，他們最早的造反行為也發生於保守紅衛兵最為瘋狂的「紅八月」，幾經波折後才終於崛起。中小城市的造反要延至1966年11-12月。

這種造反也是首先在校園裏發起，而且沿用了由「八旗子弟」發明並受到毛澤東高度認可的群眾組織形式及其名稱：紅衛兵。

1966年8-9月，一些大城市開始出現自發的造反紅衛兵組織，但在多數地方造反紅衛兵還普遍處於被壓制、圍攻、打擊的少數派地位。當時，全國各地都不約而同地發生了黨委組織或號召保守的學生、工人、機關幹部等出面圍攻、批鬥、打擊造反學生的嚴重事件。例如：桂林「八七」事件，西安「八一六」事件，哈爾濱「八一七」事件，長沙「八一九」事件，上海「八二五」事件，合肥「八二七」事件，重慶「八二八」事件，成都「八三一」事件，青島「八二五」、「九一」事件，武

漢9月初的大抓「南下一小撮」事件，貴陽「九五」、「九六」、「九七」事件，南寧「九九」事件等。正因為出現這種全國性的緊張局面，9月2日才傳出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9月7日毛澤東又給林彪、陳伯達、江青等人寫信指出：「組織工農反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似宜中央發一指示，不准各地這樣做，然後再寫一篇社論，勸工農不要干預學生運動。」9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不准用任何藉口、任何方式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人民日報》也於同日發表了〈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

這段時間，全國大多數地方還沒有「踢開黨委鬧革命」，各級權力機器都還在正常運轉，只是比往常艱難了許多。這時所出現後來被造反派吼得震天響的「炮打」、「炮轟」之類口號，並非都是造反紅衛兵提出，恰恰相反，這類口號最初普遍出自各級黨委之口。這在今天看來十分反常的做法，其實是在仿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異常之舉。各級黨委負責人紛紛提出「炮打司令部」、「火燒司令員」、「引火焚身」之類口號，自然是為了緊跟黨中央的部署，以積極的姿態領導運動。比如：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8月19日在鄭州大學群眾集會上宣讀《我的一張大字報》，號召「炮打省委司令部」。中共重慶市委8月25日召開各大專院校文革籌委會代表和學生代表「炮轟市委」會議，中共西南局宣傳部長劉文珍代表西南局講話，號召「集中火力，炮轟市委」。同日，陶鑄、張平化、王任重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接見中南地區赴京學生，一致譴責中共湖南省委提出的「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組」的「三個相信」口號，號召學生們回到湖南去「對市委、省委、中南局開炮，一齊炮轟司令部」。8月27日，中共黑龍江省委機關報《黑龍江日報》發表了〈向「司令部」開炮〉的短評。9月3日，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主要領導人在廣西大學貼出《歡迎大家向我開炮！我的一張大字報》，要求廣大師生員工炮轟自治區黨委「司令部」。當然，相當一部分黨委提出「炮打」時，還以為這是「反右派」運動前夕那種「引蛇出洞」式的「陽謀」。

9月份，已有少數省會城市的造反紅衛兵開始「炮打」當地黨委，但在全國還未普遍化。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檢閱紅衛兵時，林彪在其不脫舊運動模式痕跡的講話中嚴厲提出：「一小撮反動資產階級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他們企圖炮打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我們能容許他們這樣幹嗎？不能，我們要粉碎這些牛鬼蛇神的陰謀詭計，識破他們，不要讓他們的陰謀得逞。」造反紅衛兵剛開始的「炮打」行動因此受到了一定的遏制，各級黨委也暫時被注射了某種強心針。這個時期也有個別地區向前邁出了急步。如河南鄭州造反紅衛兵因得到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書記處候補書記紀登奎的支持，9月5日召開了首次「省會各界革命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線煽風點火大會」；陝西西安造反紅衛兵9月13日召開了「炮轟陝西省委、火燒西北局、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大會」——不過這時陝西省委和西北局還沒有癱瘓，大會還特地邀請西北局和陝西省委各派兩名觀察員「列席大會」。

這時「文化大革命」還處於黨委支配運動局勢階段，全國大多數地區的運動模式還跟以往一樣，沒有多少實質性改變。

造反紅衛兵在全國普遍興起，是在1966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中，這也是「文革」第二時期——造反派支配運動局勢階段的開始。

造反紅衛兵的成員主要是非「紅五類」家庭出身的子女。他們的造反，並不單純是長期受革命思想灌輸的結果，而有著更為深刻更為複雜的社會背景和政治背景。

「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國，完全按照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提出的階級成份劃分原則，將社會成員分成了三類十五等。借用保守紅衛兵首創並在「文革」中風行全國的通俗說法，這些類別和等級為：

「紅五類」——革命烈士、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產業工人、貧農下中農；

「麻五類」——小商、中農、上中農、職員、自由職業；

「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

「破產地主」、「資本家」、「舊官吏」、「工商業兼地主」等，實際歸入「黑五類」。「城市遊民」、「小土地出租」、「國民黨起義人員」等，實際歸入「麻五類」。「農村雇工」、「城市貧民」、「城市手工業」、「城市小販」等，實際歸入「紅五類」。

「文革」後期有過一種將「黑五類」擴展為「黑九類」的說法，現在的回憶和研究文字中也還有人在用。增加的四類包括「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其實並不成立。因為「叛徒」、「特務」已包括在原來的「反革命」成份中，所謂「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從來沒有成為兩種成份。

極權體制對三類十五等社會成員的政治態度歷來十分明確，並且具體化為一整套關係到個人生存權、選舉權、教育權、勞動權、發展權……，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勞動人事、社會福利各個層面的法令、方針、政策、規定。總的原則是：優待「紅五類」，照顧「麻五類」，歧視「黑五類」。

將社會成員分為三類十五等的政治成份劃分和社會待遇規定，本來是針對50年代初全國統一劃成份時年滿十八周歲以上的成年人和隨後政治運動中揪出的「新生敵對分子」的，可是怎樣看待他們的子女卻成了一個問題。

在一個頭腦稍微開明的人眼裏，這個問題本來很好解決：即使對父輩的政治定性可以成立，但子女並沒有從母腹中先天地帶上榮耀或罪孽的等級標誌降生人世，子女不等於父母，他們都同樣生活於新社會，都同樣享受著毛澤東思想光輝的普照和共產黨雨露的滋潤，各種人群的子女之間不應該有等級之分。然而「集全人類優秀文化成果於一身」的當權者不這樣認為。他們以革命戰略家的眼光，將問題提到關係紅色政權在第二、第三代人身上是否會變色的高度來認識，本能地認為子女身上打有父母的「階級烙印」，父子之間的政治等級身份理應一脈相承。雖然沒有對此下過正式文件，但多年來高層的政策傾向和各級權力機構的具體操作，實際就是這樣。

「黑五類」子女因為投錯了胎，命中註定只能成為「人下人」。他們

除了飽受社會歧視之外，自小便面臨著「政治審查」關卡的嚴酷檢驗。上小學，不允許他們擔任少先隊大隊長一類的職務；有幸升入中學，無論品學如何優良，學生會及班級的主要職務也不允許他們擔任；除少數象徵性錄取者，大學校門一般禁止他們跨入。走出中學校門，人生之路處處險阻：參軍、沒資格；招工，最多只能去工作最髒最苦而福利和收入又最差的街道企業；入黨，休想；提幹，更不可能。這一切都僅僅因為在各種表格上「政治審查」一欄特別強調的原則：家庭出身和個人歷史。無論在校外還是校內，他們的處境都如覆薄冰，言行稍有不慎，便會被「深挖階級根源」——遭受開除或入獄的厄運。

報告文學作家胡平從自己的切身體會出發，這樣描寫他們的處境：

自1957年以來，一個接一個有如車水馬龍的運動，頻繁地製造了一批又一批決非是「百分之五」的「百分之五」，同時也就製造了一批又一批幾乎從下地就蒙受歧視的孩子。他們從懂事起，就隱隱約約覺得，生活在他們的額頭刻下了兩個無形的紅字——「賤民」。

他們大多崇尚知識的力量，有著較好的學養稟賦，卻不得不持久地批判自身，以證明自己「脫胎換骨」。

他們內心鄙視某些幹部子弟，卻不得不整日拼湊起謙恭的笑容，以證明自己「靠攏組織」。

從《中國青年報》上的通欄標題「以階級鬥爭的觀點去對待一切，分析一切」，到毛主席寫下「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他們總感到風聲鶴唳。

從學校組織吃「憶苦飯」，到聽老工人、老貧農訴說「血淚仇」——他們總有芒刺在背。

壓抑感與不安全感，將他們的靈魂絞成麻花，把他們的言行捆成粽子。無數嚴峻的事實在提醒他們：「有成份論」是鐵打的，銅鑄的；而「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不過是沙撻的繩，風塑的塔。因此，他們最大的安慰，是聽說了毛主席出身于富農，周總理也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他們最大的痛苦，是被要求與「反動家庭」劃清界線，那是一種分裂了的二重人格——一邊，得像狼崽一樣撕咬出父母心頭的血淚，

一邊又像羊羔一樣依靠著長輩的養活。除了領取生活費，他們極少回家，儘量少跟父親說話，既怕他流露出什麼，曾經不住階級鬥爭觀點的分析，更怕他真流露出了什麼，自己雖是兒子，更是決心跟黨走的青年，將陷入批判還是沈默的兩難境地。……

在共和國的憲法上，他們和其他公民一樣，都是站著的人，但在現實社會裏，他們卻是跪著的人。7

那些有幸跨進大學校門的「麻五類」子女，境遇與中學裏的「黑五類」子女差不多。他們的父母無權無勢，加之或多或少有點「歷史問題」，在「紅五類」獨霸天下的大學校園，他們只能被視為另類。這裏涉及的僅僅是個人戶籍上的家庭成份劃分及其所帶來的社會不平等。

中國的「成份制度」實際包含兩種：一種是顯性的，可稱為「戶籍成份」；另一種是隱性的，可稱為「檔案成份」。前者公開登記在每個家庭的戶口名簿上，一次評定便不可更改，而且人人自知。後者隱蔽地記錄在個人的檔案袋裏，由單位政工部門或轄區公安機關秘密書寫並掌管，自己不知內情。「檔案成份」的內容同樣可分紅色、麻色、黑色。黑色內容包括當事人自己及其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子女、親戚的歷史和現實問題。這些問題自然是用階級分析的放大鏡透視出來又經過階級鬥爭的尺子丈量的，有的是做了結論的罪行或錯誤，更多則屬於政治表現、生活作風、過激言論一類嫌疑。它們的來源，有的是有關部門直接掌握的，有的是各種運動中他人揭發的，有的是政治高壓下自己被迫交代的，有的是為了向組織靠攏自己主動暴露的。如果說「戶籍成份」的評定基本上是硬性的，「檔案成份」的評定則有彈性：寫好寫壞、寫輕寫重，大多取決於領導和執筆人。後者同樣能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於是形成這樣的特情：很多人的戶籍成份本屬「紅五類」，但檔案中存有關於自己或父母的黑色記錄，紅色的天平便不再向他們傾斜。他們升學、就業、參軍、入團、入黨、提職之路因此而橫互障礙，同樣在現實中深感壓抑。例如1967年夏季湖南省零陵地區武裝部和保守派對造反派和「黑五類」進行大屠殺時，其中有1049名成份為「貧下中農」的人被殺——就因為他們「大多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8

我認識不少這類外紅內黑的人：王某，家庭成份貧民，因涉嫌書寫「反動詩詞」之事而不能入團。倪某，家庭成份小手工業，因成立的「文學社」被定為「反動組織」而不准報考大學。岑某，同母親一道生活，家庭成份小販，但早與母親離婚的生父曾任國民黨員警所長而在勞改，報名參軍時政審不能過關。雷某，家庭成份貧民，初中畢業時政治鑒定為「思想落後」，高中時政治鑒定升級為「思想反動」並與父親解放前曾當過甲長之事相聯繫，特地注明「不能重用」。官方對這一類人的政治態度有某種隨機性：想重用時偏重「戶籍成份」，想整治時偏重「檔案成份」，完全取決於形勢走向和領導好惡。例如雷某：1966年12月造反並擔任群眾組織頭頭，1968年成為革委會副主任——此時被看好的是貧民家庭出身。1971年「一批雙清」運動中以「現行反革命」罪名被捕並判刑十年，父親當過小小甲長之事和自己高中時的政治鑒定，又成了鐵定的歷史根源。

1966年前十七年和「文革」之中，這種事很普遍。

我手裏就有一份上面這位雷姓朋友的個人檔案，是他主動提供的。時間跨度為1965-1971年，檔案內容包括1965年的高中畢業政治鑒定材料、高考政治審查材料和1971年「一批雙清」時的刑事判決書。我知道他是怎樣得到這份材料的，只因中國的個人檔案制度還處在黑幕中，所以在此不便透露。徵得本人的同意，將其中內容摘要如下：

[1] **家庭情況**：家庭成份城市貧民。父親解放前當過甲長和袍哥賢字大爺，母親、兩個姐姐和兩個姐夫、一個妹妹，皆歷史清白表現良好。

[2] **高中畢業政治鑒定**：1965年6月17日由班主任填寫的政治評價，雖然寫了「屢犯校規」、「經受不起困難的考驗，對三面紅旗和黨的政策不滿」、「攻擊我國對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援」等評語，但只定性為「該生在校思想品德表現不好」。

[3] **高考政治審查**：但在十天前的1965年5月18日，由學校黨支部在《高中畢業生政治審查表》上「學校對學生報考高等學校的意見」一欄填寫的意見卻是：「該生在校一貫表現不好，思想反動。我們意見不予錄取。」6月1日，學校黨支部專門寫了一份四頁篇幅的政治審查

材料報送市委宣傳部和市招生委員會。列舉了該考生七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是「辱罵民警和解放軍」；第二是「反對黨和政府支援民族解放運動，認為是『窮大方』、『打腫臉充胖子』」；第三是「反對集體化，主張單幹，提出『至少也應該百分之五十包產到戶』」；第四是「反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給中央鄧小平寫信和給《中國青年報》投稿，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大材小用』、『浪費人才』」；第五是「反對教學改革」；第六是「對現實生活不滿」；第七是「在生活紀律上表現也很不好」。這份材料上有四處用了「思想反動」來特別強調。最後結論是「我們意見不予錄取」。6月7日，市委宣傳部、市招生委員會政治審查組和市招生委員會分別在《政治審查表》自己負責的欄目裏決定：「同意學校黨支部意見，不予錄取」。

[4] **刑事判決書**：高考不被錄取，他便於1965年秋季上山下鄉到遠離家鄉的一個農場當了知識青年。1966年12月帶頭造反並當了造反組織的一號負責人。1968-1971年擔任農場革委會副主任。1971年7月「一批雙清」運動中，被縣軍事管制委員會和人民保衛組逮捕並判刑十年。[71]字第40號《刑事判決書》是這樣給他定性的：「父親是偽甲長和袍哥賢字大爺。1959-1965年讀初中和高中期間，思想一貫反動。文化大革命中，打著『造反』旗號，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偉大勝利大肆惡毒攻擊、誹謗、污蔑，為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鳴冤叫屈。」

如果沒有1979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和政策，他的一生絕對就被這幾頁檔案材料給毀了。

這批外紅內黑的青年，無疑是顯在的「戶籍成份」背後隱在的「黑五類」。

事實上，「文革」爆發前中國社會的等級歧視和政治不平等，比這還要嚴重百倍。大學中的「麻五類」子女和中學裏的「黑五類」子女，在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代，大多轉承著父母的政治重負，默默掙扎於絕望之境。

他們同時置身於三重邊緣處境：一是處於成年人年齡圈層的邊緣，

二是和父母一起處於社會等級圈層的邊緣，三是處於學生成份圈層的邊緣。由這種岌岌可危的人生處境產生的生存壓力和心理焦慮，自然與特權階層子女截然不同。甚至其青春期叛逆衝動所裹挾的反抗情緒，也不能不是指向現實的等級歧視和政治迫害。

這就是非「紅五類」子女造反的直接社會背景。

「文革」爆發時，他們也曾產生過由革命熱忱、青春期自我表現衝動、打破現存社會等級秩序而改變自身政治處境的願望綜合構成的激情。然而他們很快失望了：學校當局向他們亮起「禁止通行」的紅燈，把他們列為嫌疑對象。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公佈了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炮轟校領導的大字報。他們受到鼓舞，少數膽大者和「紅五類」學生一起向學校當權派發出造反的聲音。結局可想而知：劉少奇立即派工作組進駐各大中學校，指令對鬧事學生和教師堅決鎮壓。在二十多天裏，僅北京二十四所高等院校就有上萬名學生被打成「右派」，數千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⁹。清華大學有八百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原北京林學院造反紅衛兵組織「東方紅公社」負責人Z接受採訪時告知：當時僅該校就有一百多名學生被打成「反革命集團」成員。全國受迫害人數不知有多少。

就在周恩來到清華大學為蒯大富平反的第二天——1966年8月5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在嚴厲斥責劉少奇的同時，對以「紅五類」子女為主體的學生「造反」行動表示了支持。1966年8-9月，這批受到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當權者支持而不可一世的上層紅色子女，為了維護和加強現存的政治不平等狀況，變本加厲地對非「紅五類」學生進行壓制和排斥。1966年10月，中央下發文件號召批判工作組，正式為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師生平反，同時對官辦紅衛兵大肆宣揚的「血統論」進行了否定。於是，以非「紅五類」子女為主並將鬥爭矛頭直指各級當權者的造反紅衛兵組織，在全國範圍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

這就是非「紅五類」子女造反的直接政治背景。

不難看出：他們造反的動因，除了正統的革命熱忱和青春期的自我表現欲望，主要是被長期的等級歧視和現實的政治迫害逼到絕地，所激發改變自身政治處境的生存衝動。

家庭出身不屬於紅色及其帶來的政治歧視和心理壓抑，的確是不少學生參加造反的隱蔽原因。

過去看到書中介紹湖南著名造反學生楊曦光是「高幹」子弟，我一度不明白他激進的造反傾向從何而來。現在才知道這是誤說。其父曾為原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的親信，從這層關係和顯在的家庭成份來看，他無疑屬於「高幹」子弟；但是其父1959年已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文革」之初又被省委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而遭到批鬥，他隱在的家庭成份又是自己所說的「黑七類」。他因此在運動初期沒有資格參加學校高幹子女成立的官辦紅衛兵組織——紅色政權保衛軍，反而被省委派到長沙一中的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學生」。多年後談到當時的感觸時他說到：「我對前途失望，感覺到家庭和自己被全社會歧視和不被社會所容的痛苦。那是我第一次體會到五七年右派在政治迫害壓力下的感受。」¹⁰

湖南省長沙十二中學生、「井岡山紅衛兵」負責人、著名中學造反紅衛兵領袖謝若冰，運動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後赴京告狀，1966年8月18日被毛澤東邀請上天安門城樓親自接見而名動一時。其家庭出身也和楊曦光一樣：顯在成份是「高幹」，隱在成份也是「黑五類」。

現居美國的原湖北華中工學院造反大學生徐明旭，對自己當年參加過的造反派持否定態度。論及當年參加造反的心理動因時他曾回憶：由於父親在國民黨政府當過小官而被中共迫害致死，自己也在「文革」之初受盡工作組和保守紅衛兵的歧視、迫害，內心自然對中共極為憤懣。當陳伯達批判「血統論」時，自己深受感動和欣喜若狂，便積極參加了學院造反組織「新華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隨後參與了武漢市幾乎所有重大的造反活動。¹¹

就個人的造反行為而言，心理動機往往是多層面的。雖然直接投身造反可能只由其中的一個動機所觸發，但這之前還有其他動機的預備，這之後又有其他動機的參與。

1965年初中畢業使上山下鄉到城郊地委試驗田代管的青年農場的T，曾向我談到他參加造反的過程。雖然他不是學生，也沒有置身學校那種特定的環境，但其動機構成與青年學生並無多大差別。

他出身于「黑五類」家庭，下鄉後便寫了入團申請書，發誓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政治和勞動表現都很積極。一次維修農場的豬圈房，見十多隻乳豬落入灌滿雨水有近兩米深的糞坑裏，他奮不顧身跳下去將乳豬一隻隻救起。1965年底報刊廣播對「資產階級反動文藝黑線」的批判如火如荼之時，他不僅積極參與農場領導所組織對知青Z和M「資產階級腐朽論調」和「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批判，還滿懷熱情地自己負責主辦的壁報上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地委試驗田領導讓知青排演的雲南花燈《春遊》「有資產階級情調」。這篇文章埋下他後來挨整並造反的伏筆。T說，其實自己的這些表現都是出於正統而愚昧的革命思想。與此同時，他又對報刊廣播上的大批判深懷疑義——除了對受批判者的弱勢處境感到同情，還覺得他們被批判的言論挺有道理。T說這種感受可能出於一個青年尚未完全泯滅的人性。1966年春季，放假回城見許多單位的文藝宣傳隊在街頭宣傳毛澤東思想，場面十分火熱，很受感染，認為農場的文藝演出隊也應該進城宣傳毛澤東思想。回去後向農場領導提了建議，可是全場上下正為完成地委下達水稻和玉米都要畝產800斤的「雙八百」任務而忙碌，建議不被理睬。他認為這是以生產任務壓政治任務，非常氣憤，於是在壁報上寫了一篇名為〈放下包袱，投入戰鬥〉的文章，署名「紅衛兵」。T說此事的動機似有兩種：正統而愚昧的革命思想和青春期走向社會自我表現的衝動。這篇文章自然受到批判，還和自己的家庭出身聯繫到一起。不久，地委農工部部長李某特地來農場召開大會，不僅嚴厲批判文章的觀點，而且記下了包括作者在內二十多人的名字。他此後的處境便如履薄冰，度日如年。進入秋季，官辦紅衛兵興起，城裏的「破四舊」、抄家、鬥黑色人群和黑色嫌疑人鬧翻了天，他因為擔心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處境而惶恐不安。農場領導也舉起「血統論」的武器，從團內到團外進行整治，黑色子女人人自危。他不知為何倖免於難，但他的入團介紹人——二分場團支部書記，卻被撤銷職務並遭到團內批判，僅僅因為她出身黑色家庭。他敢怒不敢言，就以委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和同情——寫了第二份入團申請書鄭重交到已經精神失常的介紹人手上，以示信任和慰問。T說這是人性的反應，同時也包含著對十七年來等級歧視政策的質疑。冬季剛到，城

裏的造反運動爆發。看到「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地委！」的大幅標語，他感到驚愕，同時又有一種天翻地覆的感覺。旁聽廣場和街頭的大辯論，他會不由自主站在力量弱小的造反派一方，內心同時也燃燒和衝動起來。於是1966年12月的一天上午，他貼出了農場第一張「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字報，然後帶領一百六十多名先震驚後自動停止出工的知識青年，列隊步行十公里進城到地委造反——要求退還二十多個知識青年被打成「三類」、「四類」的黑材料。他就這樣步入了造反派的行列。T說此時的動機主要是對等級歧視和政治迫害的反抗，以及青春期自我表現和自我肯定的衝動。這之後，他靠著縣安置辦公室每月繼續發放給知青的10元生活費，參加了這個地區造反運動的全過程。雖然1968年和1970年曾兩次準備退出，但終究未成。主要原因是：身為一個當時社會地位最低下的知青，退出造反隊伍就意味著恢復原來卑微的身份。而且農場已經癱瘓，自己無職無業，無處托身。加之已與一大派造反派利害相關，進退身不由己。何況造反派不僅與自己有著難得的親和性和認同感，還為自己提供了表現才能並獲得尊重的場所。T說這時的動機包括了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中的安全需要、歸屬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

在青年人的多種造反動機中，除了青春期的自我表現衝動，反抗等級歧視和政治迫害無疑是最基本的。

他們之所以要誓死忠於毛澤東，除了多年所形成對毛澤東絕對權威的個人迷信外，更因為毛澤東將他們從人生絕境中解放出來，令他們感激不盡，而毛澤東此時決定打倒劉少奇為首各級當權派的政治意圖，又正好與他們打破等級秩序改變自身處境的政治意向不謀而合。

劉少奇置他們于死地，必然激起他們內心的憤恨，劉沿襲官方歷次政治運動對付群眾的傳統思維和傳統手法來領導這場運動，更是無形中把自己擺到了現存社會等級秩序總代表的地位，必然成為他們真實或假想的敵人。

從這時起到1967年內部分裂為兩大派為止，他們的造反內容基本保持在既符合自身政治意向又與毛澤東的政治意圖同步的範圍之內。主要包括：揭批各級當權派；批判各級工作組把鬥爭矛頭指向群眾的「資產

階級反動路線」；解放被各級當權派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右派」、「三、四類」的受害群眾，並清查和燒毀所有整人的「黑材料」；深入全國各地煽風點火，鼓動受害群眾起來造當權派的反，爭取自身的政治權利；壓制、瓦解、摧毀保守派組織。

不能否認：在批鬥當權派和反對保守派時，他們也曾沿用保守紅衛兵的法西斯作法——戴高帽、掛黑牌、站高凳、遊街示眾，以及打、砸、搶。而且，為了維護自己正統造反者的形象，避免保守派找到反對自己的政治口實，他們對毛澤東支持保守紅衛兵所取得的「造反成果」，不得不做出捍衛的姿態。他們也曾在批鬥當權派時偶爾將「反動學術權威」甚至「地、富、反、壞、右」抓出來陪鬥。他們也曾採取過少數幾次影響巨大的「破四舊」行動。

但這絕非他們的本意。因為這些並非大方向中的鬥爭物件原本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的生存聯繫，因為這類行為完全有違他們的等級本性。

他們造反的主攻對象始終是：代表舊的社會等級秩序的當權派和維護舊的社會等級秩序的保守派。

注釋：

- 4 參見何蜀：〈對「文化大革命」歷史分期的思考〉，美國：《文革博物館專集》153期，2002年12月2日。
- 5 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616頁。
- 6 何蜀：〈對「文化大革命」歷史分期的思考〉，美國：《文革博物館專集》153期，2002年12月2日。
- 7 胡平：《千年沉重》，上海：東方出版社，1998年7月，第194-195頁。
- 8 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社，2002年7月，第117頁。
- 9 高泉、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30頁。
- 10 楊小凱：〈文革的政治迫害與反迫害運動〉，紐約：《中國之春》，1993年5月號，第48頁。
- 11 徐明旭：〈再談文革及造反派〉，紐約：《北京之春》，1996年9月號。

第二章 對造反紅衛兵的誤指與妖化

保守紅衛兵的鬥爭矛頭主要是向下，造反紅衛兵的鬥爭矛頭主要是向上，親歷過這段歷史的人有目共睹，難以混淆。然而，伴隨「文革」結束後官方清算運動的深入和民間反思活動的興起，一種歷史「失憶症」逐漸在人們中間漫延，其突出特點是抹殺「文革」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之間的界線，混淆兩種紅衛兵的身份。這些人既包括某些「文革」的受害者，也包括某些「文革」的參與者。

第一節 失憶與誤指

何蜀提到「不少並不可笑的『笑話』」：在一部寫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傳記中，寫到時為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於1966年6月遭到迫害時，作者寫了一個細節：一群臂戴紅袖章的造反派衝進李達家中對他進行抄家、批鬥。實際上，李達當時是被中共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打成武漢大學「三家村」頭子的。當時還是黨委領導下的批鬥「黑幫」階段，不僅造反派尚未出現，就連「造反」一詞也還未在政治生活中使用，更沒有什麼「紅袖章」。另有一位中南海幹部的回憶錄，寫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時，竟說楊尚昆是被「四人幫」揪出來了。這也是常識性的錯誤。此外，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組主政時迫害致死的人說成是被「林彪、四人幫」迫害致死，把在「工宣隊」、「軍宣隊」主政時遭受的迫害說成是受到造反派的迫害等等。¹²

我在生活中也遇到不少這類令人想哭的「笑話」：

一位朋友的母親，解放前加入中共地下黨，「文革」前任本地區某中等專業學校副校長，「四清」運動中被定為「漏劃地主」而撤職。80年代某一天她對我談起「文革」中的事，憤恨地說造反派把自己整慘了。我知道她的情況，便故意詢問她挨整的時間和具體的運動，她說是1966年6月「四清運動」；但強調當時「文革」已經開始，正與「四清」交叉進行。我告訴她：當時還沒有造反派，就算整她的不是「四清」而

是「文革」，具體整她的人也不會是造反派而只能是官方工作組。我還指出1968年該校造反組織曾替她鳴冤翻案的歷史事實。她默認並若有所失。

上山下鄉三十周年某農場知青聚會。如今已是市政府某局領導的宋君偶爾談及其父1966年9月被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示眾之事，脫口而出：造反派太壞了。事實上其父是因「地主成份」而被官辦紅衛兵抄家並揪鬥的。當我指出這一真相，他承認並解釋為：這些年說順口了。

某學院教授華XX，曾是我上大學時《現代文學》課的主講老師，時任學校中文系黨總支書記。90年代某日偶遇，不知怎麼涉及到「文革」話題。他說曾經遭受造反派迫害。我知道他戴過「右派」帽子，便指出將他打成「右派」的是1957年「反右」運動，那時不可能有造反派。他急著解釋：打成「右派」後仍然留校工作，是1966年6月19日「文革」時造反派將自己開除公職趕下農村的。我說在這個城市，1966年6月不僅沒有造反紅衛兵，就連官辦紅衛兵都還沒有產生，將他掃出校門的只能是官方工作組。他默然，隨之流露出像丟失了手中拐杖一樣難受的表情。

這類張冠李戴式的「笑話」，我從各種身份的人口中聽得太多。如果說他們都不是社會名流，其誤記不足為憑，那麼下一則故事的可信度就很強了。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毛志成，不僅是名校名教授，更以隨筆散文仗義直言點評時弊而飲譽文壇，據說在散文界曾獲「南余北毛」之美稱。對於「文革」中的受害親歷，他也會誤記嗎？

在《文學自由談》2000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中，毛志成教授記述了自己在某城鎮中學任教並於「文革」中被揪出來批鬥的一個滑稽場面。其中一段文字這樣寫道：

「記得某次批鬥我的地點是四層樓上的一個大廳。正在『左派』師生們進行吼叫式發言，發誓『為了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闖』時，發生了輕微的地震，電燈晃動。剛剛有人喊了聲『地震』，上千位『革命師生』都作鼠竄狀，你推我搡地湧下了樓。使我得以小歇，坐下來美美地吸一支煙。半個小時之後，地震平息。『造反派』們又陸續回來，繼續喊些『誓死捍衛毛主席』之類的話」。 13

這個場景的確滑稽。可惜毛先生在記述這些加害人的身份時，同樣患了不少文化人的通病：張冠李戴。

從所記場景不難推斷：既然被揪鬥的是一位恃才傲物的普通教師，加害人又是「上千位」之多的「左派」師生，時間必是「文革」之初，運動所處階段必是學校權力機構和工作組發動紅色師生揪鬥「黑五類」師生之際。即便此時該校已有紅衛兵組織，也一定是官辦紅衛兵而非「造反派」，因為這個時期造反紅衛兵還沒有出現。就算這所中學情況非常特殊，造反派提前產生，他們也不可能立即擁有「上千位」之眾，更不可能在如此人多勢眾之時不去揪鬥當權者，而熱衷於批判一名普通教師。然而毛先生硬說當年批鬥自己的上千位師生是「造反派」！

可能是筆誤，可能是誤記，可能是人云亦云式的誤言。只是不知毛先生們是否想過：在記述「文革」中的個人經歷時，文人們通過公共媒介所傳播的這類隨意性失誤，會不會誤導眾多知情者的歷史記憶和不知情者的是非判斷？

尤其有趣的是，這類誤記、誤言竟會瘟疫一般傳到海外完全自由的公共話語空間：

澳洲學者楊小凱曾在一篇文章中用兩個活證人的故事，說明1967年夏季湖南道縣發生的大屠殺是武裝部和保守派對造反派和「黑五類」的滅絕性殘害。沒想到文章在《中國之春》發表時，這段文字的標題被誤印為「造反派在道縣殺人」。 14

流亡海外的作家鄭義寫了一本關於1968年廣西人屠殺的調查文字——《廣西人吃人狂潮真相》，卻對於這場人吃人慘劇是保守派「聯指」在軍區支持下武力圍剿造反派「四二二」時野蠻施為的事實全然迴避，致使「廣西造反派吃人」的謬言傳遍海外。1993年1月6日《世界日報》還在頭版刊登了一條駭人聽聞的消息：「文革造反派教人如何食人肉」 15。

國內自由派文人自不待言：何清漣和余傑在「人吃人事件」上發表了不少引人深思的議論，卻不指明究竟是誰吃誰。蕭功秦在相信「造反派吃人」的前提下，更對為「文革」造反派辯護的人提出警告：「要防止走到另一極端，把造反派美化。如果造反派都那麼好，那麼極左思潮社會載體何在？文革極左思潮對社會的『破壞性改造』使命由誰來承

載？讀一讀《廣西吃人風潮》這種極端的觸目驚心的個案，想一想那些被異化了的造反派，不至於把對造反派的公正批評都說成是『妖魔化』。」¹⁶

令人吃驚的，除了普通人的誤記和作家的誤言，還有學者清醒的誤斷。

徐友漁是一位嚴肅的學者，他對「文革」的學理性研究掀開了國內「文革學」的第一頁。然而在其「文革」研究文章中涉及兩種紅衛兵時的個別誤斷，卻不能不令人遺憾。

令人遺憾之處在於：他分明深刻分析了保守紅衛兵和造反紅衛兵完全不同的等級構成、等級境遇、等級心態，又客觀記述了兩者截然相反的心理動機和矛頭指向，卻在涉及北京「老紅衛兵」前期行為而產生認定疑難時，硬要將其稱為「學生中最早的造反者」¹⁷，並在對紅衛兵青春期行為進行縱橫比較時，將保守紅衛兵與造反紅衛兵視為一體，判定他們都「和德國法西斯的青年納粹運動十分相似」。¹⁸

這些說法在原有語境中的語義，自然與它們被人們單獨領會時不盡相同。但它們被單獨領會時具有的誤指含義，卻有必要給予澄清。

什麼叫造反？《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詞義解釋有兩項：發動叛亂或者採取反抗行動。民間最通俗也最準確的說法是：以下犯上或犯上作亂。

在《水滸》故事中，高衙內之流「八旗子弟」的行徑算造反嗎？非也，只是對生存於其淫威之下可歸為「反動學術權威」行列的林沖們的構陷與迫害。即使宋江殺惜、李逵斬鬼、武松屠嫂、楊志宰牛，都稱不上造反，儘管對象是惡人，但他們不處高位，殺他們只算義憤除惡。

造反——必須是矛頭向上：皇帝或者官僚。皇帝罵大臣「造反」，官長罵下屬「造反」，家長罵孩子「造反」，其本意都是一樣：以下犯上，弱者反抗強者。

只有造反紅衛兵的行為才符合造反本義。

縱觀保守紅衛兵的所作所為，難道批鬥教師、學生中的「黑五類」子女也稱得上造反？難道揪鬥被官方定為「反動學術權威」的教授、專家、學者、文學家、藝術家和早被打成「右派」的知識份子，也用得著造反？難道橫掃早就成了專政物件的「地、富、反、壞、右」，也需要

造反？不，這明明是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公然迫害。它不是以下犯上，而是以強凌弱。

「法西斯」之說用來形容保守紅衛兵的惡行，倒是比較貼切。因為法西斯之所指，除了手段殘忍，還包括那些武裝到牙齒的強者對手無寸鐵的弱者任意施行殘害。比如德國軍隊屠殺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猶太人，日本軍隊屠殺南京城的中國老百姓。倘若換成兩軍對壘互相廝殺，那就屬於通常所說的戰爭行為而非法西斯暴行了。保守紅衛兵的行為確實帶有很濃的法西斯色彩。

單憑打武鬥這一事實，就將造反紅衛兵歸入法西斯之列，似難成立。且不論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造反派兩大派之間政治觀點和派別利益的對立，如何可能導致武力衝突，也不說同樣分成對立兩派的支左軍隊在武力衝突中所起的作用，僅就雙方武鬥的特徵來看，也不符合法西斯的含義。因為它是兩軍對壘式的行動，而非一方全副武裝、另一方手無寸鐵。稱之為造反派與保守派或造反派兩派之間的武力內戰，無疑更準確。

這不等於說造反派的武鬥應該肯定。不，造反派武鬥所造成的人員傷亡、經濟損失和社會動亂，遠比保守紅衛兵的暴行造成的後果嚴重百倍，理所當然應該徹底否定。這裏只是從學理層面說明：武鬥屬於造反派內部或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內戰，而非造反派對其他社會弱勢群體的法西斯暴行。

讀徐友漁研究造反紅衛兵和保守紅衛兵的文章，開闊的視野，翔實的史料，平實的文筆，清晰的論述和獨立的見解，使人一讀為快。然而，當再次細讀，感覺就變了——總覺得什麼地方還不到位。原因何在呢？細細想去，問題不難發現。

一方面，通過他對中國十七年政治弊端的分析，對「文革」初期毛澤東、劉少奇不同作法的對比，對造反紅衛兵等級構成和造反動機的描述，對保守紅衛兵的剖析和譴責，你會和作者一樣，對這些被主流話語否定的造反者表示理解和同情。

另一方面，當他將造反紅衛兵的行為與保守紅衛兵的反人道反文化暴行統稱為「造反」，不加區別地全部裝入一個理應否定的「文革」大口袋中與「青年納粹運動」相提並論，你又會傾向於作者對造反者的否定。

這究竟是讀者的誤讀呢，還是作者的矛盾？

顯然是作者的矛盾。矛盾主要發生在感性與理念之間。作者的親歷以及所掌握的大量事實，使其在客觀陳述時，不能不流露出對造反紅衛兵的理解和同情。但在對整個事件作價值評判時，作者又不能不遵從自己所信奉並在當下知識界佔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理念，將兩類紅衛兵一併裝入「文革」這個抽象概念之中加以否定。

要是不把造反派等同于「文革」作為否定的前提，憑著作者對造反紅衛兵的實際瞭解和客觀描述，是很難對其斷然否定的。事實上，作者對他們的否定，也是借助於保守紅衛兵的惡行才一併告成。

徐友漁力圖客觀反映歷史細部真實的個別論斷，只是其「文革」研究主體的小小枝蔓，想不到會成為很多學人筆下任意混同兩類紅衛兵的理论依據。

海外學者侯一謙自稱要使造反派這個概念「在使用中得到更為公認且明確的意義」，但他的第一個定義就違背了自己的許諾。他認為：「最早被稱為造反派的」，是北京一些中學 1966 年 5-6 月組織起來的紅衛兵¹⁹。這樣的結論甚至不如「文革」中人們的常識，哪裏稱得上學理「嘗試」！

學人的誤斷不像常人的誤記可以隨風飄散，而是鐵釘釘板入木三分，易成定論。因此，以誤傳誤不宜繼續下去。

如果說文人學者與普通百姓之間有什麼區別，那也僅在於：普通百姓是為了世俗的需要而篡改歷史，文人學者卻是為了觀念的需要而犧牲事實。這個區別很重要，因為它劃出了道義上的優劣。這個區別又不重要，因為他們共同遮蔽了歷史的真相。

第二節 附勢與妖化

面對中國人大面積的「失憶症」現象，我不禁想尋找「病症」的心理機制。首先想到兩個形容詞：趨利避害、趨炎附勢。二者詞義相近，但前者偏褒、後者過貶，感到都不太恰當。最後，我乾脆從中抽象出一個可以歸於社會心理學的概念：附勢心理。

見過猴王爭霸嗎？

當老猴王以優勢姿態與挑戰者展開激戰，眾猴臣毗牙咧嘴猴視眈眈旁觀其變。有的躍躍欲試，有的憂心忡忡，有的故作悠閒，但由姿態與表情構成的身勢語符號，表明它們大多站在獨佔優勢的老猴王一邊。隨著一聲慘叫，戰場形勢陡變；但見老猴王狼狽逃竄，挑戰者正乘勝追擊——新猴王產生了。眾猴一陣慌亂，但很快反應過來，不約而同地追隨新猴王而去，參加將老猴王咬死或者永遠驅逐的最後一戰。戰鬥結束後，眾猴簇擁在高高在上的新猴王身邊，為之搔癢、為之捉虱、為之舔傷、為之獻食……紛紛獻媚。好像挑戰伊始它們就知道新猴王必勝，好像新猴王剛從娘胎蹦出，它們就知道將成為它的忠誠子民。

這是猴界的附勢心理表現。

附勢，自然指眾猴立即趨附得勢的強者，並對失勢的弱者立即翻臉，追逐之撕咬之擊殺之。可形象地稱之為牆倒眾猴推、落井下石。兩種行為互相依存：因附勢而下石，以下石來附勢。淡化其在人界的貶義性，可將其合解為情理之中的行為：趨利避害。其實漢語中「勢利」一詞的本義也屬此範圍：為求利而附勢，因附勢而得利。皆為生存需要使然，無褒貶可言。

因有道德評價，人類的附勢心理更深存，附勢行為更複雜。但萬變不離其宗，心理動因與猴類並無二致：出於利害需要。二者的區別，只是表現形式不同：人類可以不動用野性化的爪子和牙齒，而只憑藉文明化的記憶和言語。言語用來向外表述自己對得勢者的忠愛和對失勢者的憎恨，記憶用來向內蒙蔽自我的良知並掩飾自身的卑下。

為什麼「文革」結束後那麼多人把自己說成造反派的受害者？這是人類附勢心理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附勢記憶使然。

所謂附勢記憶，是指受附勢心理支配的記憶，特徵通常為：順應現實形勢需要，對往事只記起于己有利者而遺忘於己無利者，有時甚至可將無利之憶偷換為有利之憶。許多人將自己受害之事的責任人誤記為造反派便源於同類需要：造反派隨同「文革」被官方宣判了死刑，在政治上已經徹底失勢，將自己記成造反派的受害者，不僅可以證明自己歷來就站在現在的強勢者一邊，還可以讓內心產生曾為現在的強勢者付出過

慘重代價的光榮感。至於外界的道德評價，只要眾人認同便無所謂。對於內心的良知審查，只要記憶掩蓋得住即無妨礙。就像 1949 年 10 月 1 日之後，人人爭說遭國民黨壓迫和受地主資本家剝削一樣。

這同樣是追殺：記憶形式的過去時追殺和言語形式的現在時追殺。與猴類的追殺方式相比，它無疑更高明：追殺層面不限於肉體更指向精神，追殺範圍不限於空間還包括時間。

更為可怕的是，這種健忘或失憶往往表現為某種下意識行為。須知現在涉及這個話題時，不僅海外的自由派人士可以放膽言說，就是國內的文人學者和普通百姓也沒有什麼強行限制。可是人們仍然不假思索地樂此不疲。和世界上其他民族比較，恐怕只有中國人才有得起這種優良秉性。

一位畫家朋友認為，行為藝術家大多有自虐傾向。這使我聯想到對造反派的追殺行為——它不也是一種心理層面的行為藝術嗎？只不過藝術家是以肉體的自虐實現藝術的追求，附勢者則是以人格的自虐滿足非藝術的需要。

因為這類無視社會道德和個人良知的自虐，隱存在附勢者雙重追殺行為背後的人格，肯定很不健全。健全的人格，不受世俗利益的誘惑，不受世俗心理的驅動，不受世俗觀念的牽制，凡事有獨立見解且客觀公正，絕不隨大流趨大勢追大潮，絕不偏離社會道德和個人良知的視線而自貶自虐自殘。附勢者人格很難獨立，因為他是在虛假地趨同，而非真實地存異。

在造反派問題上之所以有如此大面積的「失憶症」現象，便是人們習慣於附勢的結果。

生活中常有這樣的現象：一個人得勢時，人們總是傾向於留意他的優點或長處，並且少不了放大和誇張，異口同聲地從那光彩照人的肯定面對他進行抬高、吹捧和讚譽。他的缺點和短處，也會因讚譽之光的映照而異常可愛。當一個人失勢，人們的神情又會陡變，從目光所及到內心感觸，都會對他的缺點和短處最為敏感。貶低、攻擊、毀損之辭在放大的視野和誇張的情緒中肆無忌憚。這人的優點和長處，同樣被陰暗的否定面消解成含義可憎的碎片。

前者的指向是什麼？是神化。

後者的指向是什麼？是妖化。

二者的指向範圍，都大大偏離個人真實存在的中軸線——儘管神化者極度偏高，妖化者嚴重偏低，但都是對一個人真實狀態的歪曲。

這是人類的特權，伴隨評價心理而生，環繞在人際關係之中，又以飽含毀譽功能的語言作為投擲器。獸類很簡單，愛就是愛，恨就是恨，只要涉及生存利害，直接付諸行動了事。人類複雜而高級，即使與自身利害無關之事也要參預，而且是用語言，遠遠地向對方投擲鮮花或者糞便。

別小看這類看似無意的行為。它往往形成某種賦有同化作用和感染力量的評價氛圍，使被神化者也逐漸的自以為是而飄飄欲飛，使被妖化者也逐漸的自以為非而一蹶不振。所謂眾口成碑、眾口鑠金，便是這個道理。

一次朋友閒聊。無意間談到某人近來狀態很差，因為經常受到周圍人的責備和嘲笑，完全被搞「妖」了。一位朋友談起自己倒楣之時被人妖化而萎靡不振的親歷，感觸特深。一個「妖」字，生動而準確，將人處頹勢時那些畸形貶義評價的虛張性和醜化性一網打盡。

這使我想到擴大至政治範圍的妖化現象：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妖化，共產黨對帝、修、反的妖化，「文革」中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妖化，「文革」後人們對造反派的妖化。它們的用意都一樣：為了達到否定對方的目的，先從外觀上將對方形容成妖魔一般可怕、可惡、可憎的模樣。

人們的附勢心理分很多方面，例如附主流政治話語之勢，附主流社會心理之勢，附主流文化思潮之勢。在造反派問題上，人們的誤記、誤言、誤斷，都可以在這裏找到某種對應——儘管多數人並非有意為之，而且其中存在文人學者和普通百姓之間道德範疇的差異。

這些主流氛圍的強勢存在，必然會影響現實中人的記憶、思索、判斷和言說。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些不同方面的失誤性的記憶、思索、判斷、言說，一旦相互滲透互相認同，就會形成一張社會化的公共話語之網，無形中罩向人們的常識，強迫你接受。使不明真相者只能人云亦云，使明知真相者只能保持沈默，更使那些被誤指的責任人有口難辯——要麼自認倒楣，要麼也雲裏霧裏地跟著自認有罪，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只好自我隱藏，生怕一旦暴露會遭到譴責甚至懲罰。

這絕非聳人聽聞，而是實情。

中共趙紫陽時代的官方改革派知識份子陳一諮、周體仁、何維凌、翁永曦，「文革」中都是激進的造反派，他們坐在官方長椅上時不得不竭力隱藏過去的造反經歷。1989年「六四」事件後，這段歷史仍然成了他們遭受政治迫害的重要理由。

某朋友，曾是很活躍的省城某大學造反紅衛兵，1968年畢業分配後又積極介入我所在地區激進造反派的活動，「文革」結束後考上研究生，後任某研究院實驗室主任。1987年獲知我到省城開會，約以小聚。席間再三囑咐：勿將其現供職單位及個人情況告訴考研究生前工作單位的熟人朋友，以免自己的造反身份被不懷好意者捅到現單位而引起非議。

某作家，作品曾獲國家級大獎，「文革」中為所在公社造反知青頭目，現任某企業黨委副書記。一次見面，有人偶而談及造反往事，他立即噓了一聲並指指窗外，言下之意：隔牆有耳，謹防失言。

某高級工程師，曾是北京某大學造反紅衛兵領袖。有朋友打算推薦其接受「文革」研究學者徐友漁的採訪，他一口拒絕並說明理由：女兒正在北京讀碩士，準備出國留學，怕採訪內容公開後影響孩子前途。

某著名詩人，曾任我所在地區一大派中學造反紅衛兵的宣傳部長，現為某中央級刊物副主編。一次在刊物上讀到其自撰小傳，涉及「文革」經歷之處令人咋舌。其中一段文字大意为：「文革」中因父母被打成「走資派」，自己被排斥于紅衛兵組織之外，受盡了紅衛兵的欺凌和侮辱。他在「文革」中的造反表現，被隱藏得蹤影全無。

這些人為何不敢正視自己的過去？因為害怕——怕引來政治權力的報復，怕招致社會輿論的歧視，怕因此影響自己或孩子的前途。

這些年，在國內公共話語空間，文人們敦促過去的造反派大膽站出來懺悔自己罪行的聲音此起彼伏。他們不認真想一想，在當下這種由誤記、誤言、誤斷構成並充滿誤會、誤解、誤差的公共話語環境裏，能有真實的懺悔和客觀公正的評判嗎？我真不明白，他們究竟要這些被誤指的責任人站出來懺悔什麼？懺悔開初被打成「反革命」的絕望感受嗎？懺悔隨後批鬥當權派和解放「三、四類」的內心歡欣嗎？懺悔後來搞武鬥的慘痛教訓嗎？該懺悔的是要懺悔，不該懺悔的自不懺悔。據我所

知，該懺悔的他們已經懺悔，只不過不是在紙上而是在心裏，不該懺悔的他們有權保持沈默。為何一定要逼著別人用公開懺悔來證明自己改惡從善呢？何況這些該懺悔和不該懺悔的往事，原本就與這些敦促者毫無牽連，即使別人站出來懺悔，這些人也成不了正義的化身。我真想不通，為何在這些人眼中，自己就一定是光明的使者，別人就一定是黑暗的代表？這些人既然已經壟斷了陽光，把陰影投給了別人，難道還要別人將陰影拾起做成衣服穿在身上，再走到他們面前來做陪襯？

而且，造反派除了武鬥之外，還做了什麼值得眾口討伐和自我懺悔之事？

他們為何不想一想，即使有人願意站出來懺悔，哪家出版社敢開綠燈？哪家報刊敢給版面？明知公共話語權歷來只屬於少數人，憑什麼要強人所難，指責別人沈默寡言呢？

原「新北大」造反紅衛兵陳煥仁撰文述說，自己寫了一部旨在坦白和懺悔的《紅衛兵日記》，但是一直出版無望²⁰。敦促者為何不助他一臂之力？

在敦促懺悔的聲音中，要數季羨林和劉心武的音調最為懇切。我不否認二人的願望中包含的道義感，但其敦促言論同樣難免誤指。

季老在《牛棚雜記》自序中，寫明應該站出來檢討和懺悔的物件，是那些「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實際上是打砸搶分子的人」。這些人毫無疑問是指北京的「老紅衛兵」，但被季老誤稱為「造反派」。²¹

劉先生同樣如此。在〈難以懺悔〉一文中，他原本指明「應該站出來懺悔的」，是那些「『破四舊』毀壞文物、抄別人家、打人致殘致死的人」，即臭名昭著的北京「老紅衛兵」，但又稱其為「真正處於主潮中的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²²。造反派之謂已屬誤稱，「主潮」之說更缺時間限定：「老紅衛兵」處於主潮僅在「文革」第一階段的那半年，造反紅衛兵處於主潮則在「文革」第二階段的三年。被敦促的究竟是誰？

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類誤指在很多文化人涉及「文革」這段歷史的回憶文字中隨處可見。

說句重話：誤指之言看似激進，其實不然。因為它恰好掩護了那些本應受到遺責的權貴子弟。

「文革」十年，最為知識階層痛恨的是最初黨委支配運動局勢的半年，最為官僚階層痛恨的是隨後造反派支配運動局勢的三年，最為廣大民眾痛恨的是後來軍隊和幹部分別支配運動局勢的七年。由文人們發起的控訴和反思，主要依據的明明是在「文革」第一階段直接受害的半年，卻被演繹成了整個「文革」，好像十年中的鬥爭指向和實際內容都和這半年一樣是迫害知識份子。而且，這種以偏概全式的認知，還在「知識」和「文化」的名義下，獲得了社會代言的權力，讓人覺得它所表達的不是部分人的感受，而是全社會的感受，它所代表的不是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全社會的利益。

這種「半年期綜合症」逐步蔓延開來，完全彌漫了整個「文革」問題的話語空間，使得不屬半年受害者的反思，甚至站在十年之外的言說，也不得不受其牽引。

文化界對四位享有公共話語權力的作家不同懺悔態度的議論，同樣充滿誤指。四位作家分別是梁曉聲、張承志、戴厚英、余秋雨，都被認為有造反嫌疑。梁曉聲、張承志在北京，皆屬不懺悔的典型；戴厚英和余秋雨在上海，前者深深懺悔，後者默不作聲。眾多議論，自然對戴厚英大加讚揚，對另外三位義憤填膺。懺不懺悔是各人的權利，不必深論。我只想說明，他們並非都是造反派，沒有必要全部放在造反範疇中來加以追問。四人中，梁曉聲是哈爾濱某中學前期的保守紅衛兵和後期的造反紅衛兵，張承志屬北京某中學的保守派——「老紅衛兵」，余秋雨為上海某高校的保守紅衛兵，戴厚英也並非上海文化界「響噹噹的造反派」，而是隨人流捲入過造反，只因家庭出身較好和個人身份可靠而在運動初期和革委會成立後受過重用的紅色小人物。這都是他們的自我介紹，而非主觀推論。認清這個事實，便不難明白他們在懺悔問題上所持態度的不同含義。忽視四人在「文革」中的不同身份，硬要將他們歸為造反派而大加追問，豈能有真實之論！

事實上，文化人誤指的手勢，不僅無助於揭開這段歷史的內幕，反而會讓內幕中的真相更加沈默。是的，這段歷史的真相，正是被政治權力高懸的利劍、受害者虛假的記憶和文化人失誤的言說共同製造的多重陰影遮蔽起來的。明白真相者的沈默僅僅是多重陰影覆蓋的結果，而非

相反。對此，誤指者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三節 良知與真相

在國內被重重誤指迷霧籠罩的公共話語空間，偶爾也有星星點點的良知之光閃亮，使我們有時還能看到一點歷史的真相。

1989年，報告文學作家胡平寫了一部凝血的作品，是記述思想先驅者李九蓮被害經過的，名為《中國的眸子》。因為主人公曾經是江西省贛州市的造反紅衛兵領袖，作者無法回避「文革」和民眾造反這一歷史背景。他的回顧和反思雖然比較感性化，而且文筆飽含激憤之情，但是並未喪失歷史記憶和內心感受的真實。

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是整「資產階級發動學術權威」，不過幾個月的事情。接下來，「不准挑動群眾鬥群眾」，「炮打司令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矛頭仿佛是對坐小車、住深院、使電話的官兒們，在以往的運動中，他們都是鑒定和打發別人政治生命的主兒。權柄在握，清醒、正直的人有；可使個絆子讓你摔交，張條袋兒將你收進去的人也有。就是他極熱烈地動員你給提意見，而你不過是避重就輕、避實就虛、且又極委婉、謙恭地提了幾點意見，他也可以給你戴上一頂「右派」帽子，一戴便是二十年！因此對於這類官兒們的被衝擊，遭屈辱，百姓們在理性上、情感上都不覺得有什麼唐突。儘管許多人急於表白式地訴說：「我不理解」，「我很痛心」，可那是在一幕六億人皆為角色的大戲結束之後…… 23

更重要的是，他老人家雖然未在理論上提出，卻在「文化大革命」的實踐裏觸及到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權問題。在《十六條》中，他明確主持制定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炮打司令部」後，他憤怒地斥責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撤走了工作組，號召為被這條路線迫害的群眾平反。1967年夏天，又是在他的批示下，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將那些在所謂「二月逆流」裏被關進監獄的「反革命分子」接了出來，並以拿破崙凱旋法國似的歡迎……這一切，在「無產階

級專政」下的中國，何曾有過？

因此，從來只接受別人檢查的「當權派」，今天交出了極誠懇、極深刻的檢查；那些有關你卻一輩子不與你見面的秘密「黑材料」，此刻在火苗裏化為灰燼；還有幾個人也可組成一個「井岡山兵團」……的自由，還有無須再顧忌誰的權勢和臉色，即時可以表達自己想法和意見的氛圍……這一切，對於平民百姓來說，好象灰沉沉色調的梅雨季節裏，西天上久違了的一束束明麗霞光，令人新鮮，令人陶醉，令人鼓舞。 24

1994年，邵燕祥寫了〈評「紅」長簡〉一文，漫談式地論述了紅衛兵運動的內部區別和內在局限。邵老試圖上升到理性層面展開思路，但還是免不了詩人和雜文家的感性特點。關於保守派與造反派的區別，作者的論說仍然比較接近真實。我將其主要內容簡縮於下：

最早誕生的紅衛兵，主要由「革幹」子女組成。他們已從父輩議論的小道消息和其他的蛛絲馬跡中，對毛澤東的政治意圖有所察覺，為了父母和自己的政治命運、社會地位，他們義無反顧地扮演了打先鋒的角色。他們為了捍衛父輩「打江山者坐江山」的神聖執政權，同時捍衛自己作為接班人的神聖繼承權，便以工農勞動者家庭的子女為同盟軍組成「紅五類」，提出並宣揚「血統論」，以此作為參加「文革」的輿論準備和資格審查。對立面是「黑五類」子女、一般知識份子子女、歷次運動受過衝擊、受過審查、或有這樣那樣所謂問題家庭的子女。他們許多在《十六條》公佈前已經和老師一起挨了批鬥，挨鬥師生共同的罪名是在教育領域「復辟資本主義」。他們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只配當「革命的物件」，當不了「革命的動力」。不准革命，只能革自己的命——檢查自己、揭發家庭、往腦袋上扣屎盆子。有些人認命——做了逍遙派，有些人不甘心——後來也拉起了戴紅衛兵袖章的戰鬥隊。可見同樣叫紅衛兵，其群眾基礎和構成頗有不同，利益動機甚至內心情感趨向也不可能一致。那場由「破四舊」引發的紅色恐怖，主要是「紅五類」紅衛兵煽起和實施的。 25

和前兩位相比，「文革」研究學者丁東更為理性，他不僅思維冷靜，而且文字也很清晰。這裏引用的是他和邵老同時刊出的文章〈對紅衛兵、老三屆的一些反思〉。

現在，紅衛兵已經泛化為一種符號，其實紅衛兵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在最狹窄的意義上，紅衛兵指北京清華附中等校的一批中學生。他們在1966年夏成立了名為紅衛兵的小團體，得到了毛澤東本人的直接支持。他們的代表作是「三論革命造反精神」。這三篇文章當時上了中共中央辦的《紅旗》雜誌。這些紅衛兵又稱老紅衛兵。1966年夏天的「破四舊」主要是他們幹的，當時這種摧毀文明的蠢事得到了林彪代表毛澤東的支持。老紅衛兵多數是高級幹部子女。當時有一個順口溜：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成為老紅衛兵的組織綱領。……老紅衛兵的好景並不長，原因之一是他們的盲動很容易過火，為政權所不容。更主要的是他們的父母很快成為「走資派」，使他們很自然地轉向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以「西糾」、「聯動」炮打中央文革為標誌，老紅衛兵退出了政治舞臺。

繼老紅衛兵之後，出現了造反派。他們文革初期曾經受工作組壓制，有的被打成反動學生、反革命。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這些青年學生被解放。其中比較有名的是清華「井岡山」紅衛兵等組織。他們成為毛澤東利用的第二梯隊。他們的造反行為不是「破四舊」，而是指向一批犯了「路線錯誤」的領導幹部，當時所謂「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但由於造反派觀點不一，權力再分配中瓜分不勻，造反派內部很快發生分裂，以致相互間搞起武鬥。1967年，劉少奇已被打倒。這些造反派紅衛兵成為不安定因素。以「工宣隊」、「軍宣隊」進住清華、北大為標誌，這一批紅衛兵也被趕出了政治舞臺。 26

學者朱學勤沒有寫過「文革」專題論文，但他文章中有關「文革」問題的少量插敘也能接近真實。請讀他在《書齋裏的革命》一書中的一段文字：

「文革」一過，這些穿黃衣服的人，把打入醜行往一個抽象符號「造反派」一推，先出國，後經商，再不稱心，還能加入第三梯隊。而前面那些出身弄堂穿藍色運動衫者，則多半在「文革」中期的「紅色風暴」就已收入網內，或在「文革」後的「清查三種人」運動中被打入另冊，拖得再晚，也躲不過1983年夏季那場雷厲風行的「嚴打」。「文革」中的這段歷史很有意思，卻始終不見有人觸及。 27

在前三人的記述中，「文革」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以及兩種紅衛兵不同的人員構成和鬥爭物件，都清晰可見。朱學勤所記所言所指，則是幸運的保守紅衛兵與倒楣的造反紅衛兵在「文革」後的不同遭遇。

需要糾正的是：「文革」後的整肅運動叫「揭、批、查」，而非「清查三種人」，時間是1976年10月——1979年底。「清查三種人」雖然1982年中共中央就已佈置，但實際開展是在1985-1987年。1983年的「嚴打」主要針對刑事犯罪，雖然嚴重擴大化，但並非專門針對造反派。

1999年和2000年，四川省西昌市政協先後編輯出版了《西昌文史》第十五輯和第十六輯，主題都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西昌」。二十多位撰寫者中，有當年被打成「走資派」的領導幹部，有當年戴著「右派」帽子的教師，有當年的造反紅衛兵和保守紅衛兵，有當年的轉業軍人和逍遙派，也有今天的地方文化工作者。這些回憶文章雖然免不了體制話語習慣，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比較理智，能夠客觀地看待當時的人和事。當年的領導幹部，在訴說自己挨批鬥經過的文章中，有的坦率承認：運動初期把不少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三、四類」，傷害了許多群眾；有的客觀敘述：運動初期的保守紅衛兵和他們的「破四舊」行動，是由官方一手策劃、組織和指揮的；有的清楚記得：保守派興起後主要是鬥「黑五類」為標誌的「階級敵人」，造反派興起後主要是鬥「走資派」而放鬆了鬥「黑五類」，造反派分裂並發生武鬥後主要是他們兩派互相鬥，而放鬆了鬥「走資派」和「黑五類」。對於西昌的武鬥，事件的目擊證人——當年的激進造反者和穩健造反者，在回憶文字中都一致給予了譴責並深表懺悔。甚至前面提到的那位某學院中文系的華教授，在專寫自己「文革」初期被趕下農村之事的文章中，也再沒

有一個字提到所謂「受造反派迫害」。

讀了這兩本小冊子，我有一種欣慰之感。因為其中不僅隱含了社會心理的某種變化，而且還顯現了普通人士社會良知的逐漸蘇醒和歷史記憶的緩慢恢復。

當然，深層次敞亮歷史真相的，還是廣州學者劉國凱和澳洲學者楊小凱發表於海外中文刊物上的一系列鏗鏘言說。遺憾的是他們的聲音被極權主義封鎖在國內話語空間之外。

注釋：

- 12 何蜀：〈對「文化大革命」歷史分期的思考〉，美國：《文革博物館專集》153期，2002年12月2日。
- 13 毛志成：〈滑稽宮使我們進入佳境〉，天津：《文學自由談》2000年第6期，第30-31頁。
- 14 楊小凱：〈再談「文革」〉，美國：《中國之春》，1992年10月號，第77頁。
- 15 參見金山、劉國凱：〈略評文革造反派〉，美國：《北京之春》，1993年10月號，第29頁。
- 16 蕭功秦：〈痞子與紅衛兵：工廠造反派的兩種類型〉，美國：《文革博物館專集》74期，2000年8月27日。
- 17 徐友漁：《自由的言說》，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77頁。
- 18 徐友漁：《自由的言說》，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39頁。
- 19 侯一謙：〈文革與造反派〉，美國：《中國之春》，1992年7月號，第61頁。
- 20 陳煥仁：〈難以如願的懺悔〉，天津：《文學自由談》，2000年第4期，第121-124頁。
- 21 陳煥仁：〈難以如願的懺悔〉，天津：《文學自由談》，2000年第4期，第121-124頁。
- 22 陳煥仁：〈難以如願的懺悔〉，天津：《文學自由談》，2000年第4期，第121-124頁。
- 23 胡平：《中國的眼睛》，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9年9月，第22-23頁。
- 24 胡平：《中國的眼睛》，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9年9月，第33-34頁。
- 25 李輝編：《殘缺的窗櫺板》，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第74-76頁。
- 26 李輝編：《殘缺的窗櫺板》，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第120-121頁。
- 27 朱學勤：《書齋裏的革命》，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53頁。

第三章 造反與保守之間的主要界線

「文革」中造反紅衛兵與保守紅衛兵之間的區別，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一個事實陳述問題，而是一個理論認識問題。事實明擺著——客觀陳述時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它的存在。理論認識就不同了：它要求放眼更大的範圍來進行縱橫對比，而且還必須服從觀察者的價值評判。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區別問題可能因此而複雜化，甚至出現理論與事實抵牾的局面。仔細考察國內多年來「文革」話題的非歷史語境，某些理論上的誤斷起了重要的支撐作用。我希望通過與一些不同觀點的商榷，使問題的結論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需要說明三個問題：

第一，應該將造反紅衛兵與保守紅衛兵放在什麼歷史範圍來認定？

第二，兩類紅衛兵共同的青春叛逆行為有無道義評判上的差異？

第三，造反與保守的根本區別是什麼？

第一節 認定造反紅衛兵與保守紅衛兵的歷史範圍

造反與保守，在這裏特指中國「文革」時期群眾組織的兩種相對不同的政治傾向。從二者「行為的實質」看，他們都完全是體制內的，不僅保守派自認為永遠緊跟、無限忠於、誓死捍衛毛澤東，造反派更其如此。在這個意義上，雙方都是不折不扣的保皇派，並不存在什麼造反派，絕不能與中國歷史上和西方同時期那些反體制運動中本義的保守派與造反派相比。於是難免出現一種脫離特定歷史範圍並忽視二者相對區別的觀點——認為二者都是保皇派，無區別可言。很多非體制知識份子對「文革」中造反派的蔑視，大多來源於此。

20世紀90年代起改寫雜文並以理性分析見長的詩人邵燕祥，曾在一篇專論紅衛兵的文章中論及於此。他認為：「先是紅衛兵，後來加上成年人的群眾組織，在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的問題上糾纏不清，其實是忽略了彼此的共同之點。就上述的意義而言，除了個別的例外，大家都既是造反派，又都是保皇派，無分軒輊，也無分高下。大家都是跟

著偉大領袖鬧革命的嘛。」²⁸

這種看法當然非常正確，但與辨析「文革」中相對而言的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區別，完全屬於兩個層面的論題，不可混用。這裏說的兩種傾向和兩種稱謂，只是針對「文革」這段歷史中的兩種群眾組織而言，超出這個範圍便毫無意義。徐友漁深入闡明了「文革」中「造反」這個說法的名不符實之處，但也明確指出：「造反派，是文革中官方和百姓共同認定的，造『走資派』反的那部分人。」²⁹邵老在同一篇文章中曾感慨人們很少對造反紅衛兵和保守紅衛兵作哪怕稍稍細緻一點的區別和分析，並本著這一代人中罕見的良知作了簡要陳述，其前提同樣是限定歷史範圍並承認二者相對而異的歷史事實。³⁰

另一種脫離特定歷史範圍並忽視二者之間區別的觀點正好以此相反：認為二者都是造反派，並沒有多大區別。如果說前一種看法主要著眼于二者「行為的實質」，那麼這種觀點著眼的卻是二者「行為的方式」。

的確，在這方面保守派與造反派並沒有什麼區別，不僅「文革」中常見的打、砸、搶、抄、抓、殺等等野蠻行為是北京「老紅衛兵」首先發明的，而且在保守派和造反派長期並存的地方，保守派不僅同樣要鬥爭和打倒那些不支持本派的領導幹部，而且同樣要全副武裝地人搞武鬥。從這個角度看，保守派並不保守，有時甚至比造反派還要「造反」。

所以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在20世紀80年代那篇引起爭議的〈未完成的埋葬〉中，乾脆將兩派分別稱為「『保守』的『造反派』」和「『造反』的『造反派』」。³¹

如果忽略兩派人員組成的差異和鬥爭物件的不同，而只注意雙方行為方式的一致，這種觀點也未嘗不能成立。因為拿「文革」時異態社會狀況下人們的變態行為與「文革」前常態社會狀況中人們的正常行為相比，無論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都非常過激，不都屬於「造反」才怪。

問題在於：現在要考察的只是「文革」這個異態社會狀況下兩派群眾組織因人員構成和鬥爭物件的不同所表現出的政治傾向的相對差異，而不是他們與「文革」前常態社會狀況中人們行為的對比。當時約定俗成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稱謂，仍然是唯一成立的限定。

與此類似的另一種觀點，主要表現在對北京「老紅衛兵」的兩難認

定上，以「文革」研究學者徐友漁為代表。雖然「文革」中人們對北京「老紅衛兵」的保守派性質從無疑義，但進入理性認知層面時問題就變得比較複雜了。這是因為：「文革」之初那響徹中華大地的「造反有理」的口號是他們最先喊出，政治性的群眾組織——紅衛兵是他們最先創立，自下而上群眾運動的具體形式是他們最先發明，批判鬥爭「階級敵人」的基本方式以及打、砸、搶、抄、抓等暴力行為是他們最先採取，而且他們還因此在運動初期遭受過學校官方和劉少奇所派工作組的壓制。無論就他們對於「文革」中群眾性造反的首創意義而言，還是看他們那驚世駭俗的極端姿態，不承認他們是「造反派」似乎說不過去。徐友漁因此而說他們是「最早的造反派」，並將他們和後來的造反紅衛兵相提並論：

「在局外人印象中，紅衛兵的所作所為就是在1966年所謂『紅八月』中燒圖書、砸招牌、改街名、毀教堂、挖孔墳，以及抄家、鬥爭『黑幫』、『牛鬼蛇神』。其實，這只是一部分紅衛兵在運動初期幹的事，對於後起的造反派而言，還有查抄『黑材料』、揪鬥『走資派』、圍攻軍區、真槍實彈地武鬥，等等。……種種行為，毋需分類和作進一步描述，可以一言以蔽之曰『造反』。」³²

雖然按官方的說法「文革」的時間是十年，但屬於群眾組織形式和群眾運動形態的時間不足三年。就全國範圍而言，這是以「路線鬥爭」取代「階級鬥爭」的三年，這是運動的重點以整黨內「走資派」取代整黨外「階級敵人」的三年，這也是「文革」中唯一引人矚目的三年。群眾組織劃分為造反派與保守派實際只存在于這段時間。民眾之所以大分化、大對峙，只是因為這時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對待各級當權派的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劃分正是圍繞這個軸心展開。離開當時兩派群眾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的分歧來談論造反或者保守，難免會失去實際的背景。

如果說前面我把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劃分限定在「文革」這個歷史範圍，那麼這裏則要將這個歷史範圍進一步限定為「文革」第二階段中的這三年。

按照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標準，北京的「老紅衛兵」肯

定屬保守派無疑。他們那些「造反」創舉並不屬於這個時期造反的本義。雖然他們在1966年6-7月——黨委支配運動局勢階段前期，曾受過學校官方和工作組的壓制，但他們在這個階段的後期——1966年8-9月取得政治主流地位後瘋狂推行的「血統論」，又構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造反派正是在批判這條整人路線時崛起的。1966年8月「老紅衛兵」興起並獨霸天下時，全國還沒有出現紅衛兵分成兩大派的局面，所以——無論稱他們為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都還缺少「相應的對立面」這個兩大派得以成立的基本條件。稱他們為保守派，只不過是造反紅衛兵走上社會舞臺之後，根據他們在「血統論」問題上的所思所言所作所為，而給予的指認。他們退出社會舞臺中心後更加明確更加堅定的保守政治傾向，最終證明了這個稱謂的有效性。

1966年10月——北京中學造反紅衛兵興起期間，北京中學生中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劃分，主要不是取決於對工作組的不同態度，而是取決於對「血統論」是反對還是擁護。圍繞「血統論」展開的大辯論，完全暴露了「老紅衛兵」的保守派嘴臉

徐友漁明確指出：「在1966年10月之後，不論是當時社會上所有的人，還是他們自己，都不否認他們是保守派。」³³

四十年後的今天，完全沒有必要將一個名不符實的「造反派」稱謂強加給他們，而使問題更加複雜。在這個常識問題還經常出差錯的時代，尊重常識仍然十分必要。

徐友漁有一個觀點，與我的親身感受和實際瞭解頗不相同。他說：「運動剛開始時，人們出於慣性相信和擁護黨組織，保守的人居多，造反的人很少，出身非紅五類的學生大多持保守立場。」「如果運動一開始沒有血統論，非紅五類中的大多數肯定會參加保守派。」³⁴

可能我和他對「運動剛開始時」這個時間範圍的理解產生了歧義。

首先需要確定「運動剛開始時」指的哪個時段。如果是指當時和現在人們常說的「運動初期」，那麼它又具體分為三個期間。第一期間為1966年5-7月，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因為發生了北京大學聶元梓和清華大學蒯大富等向學校領導發難、清華附中等幾所中學的「高幹」子女秘密成立紅衛兵組織等事件，劉少奇派工作組進入各大中學校壓制和防

範學生鬧事。第二期間為1966年8-9月，毛澤東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寫了《炮打司令部》大字報，批判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的錯誤，宣佈撤銷工作組，並制定和公佈了《十六條》；但各級當權者仍然掌握著運動的領導權，他們積極組織官辦紅衛兵並大搞「破四舊」，同時按照《十六條》的規定成立由「紅五類」掌權的「文革委員會」，繼續壓制和迫害「黑五類」子女。第三期間為1966年10月開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各級當權者開始成為被批判被鬥爭的對象。

前兩個期間屬於黨委支配運動局勢階段，毛澤東還沒有把打倒劉少奇和各級當權派的政治意圖亮出來，學生在學校裏的具體心態是保守還是造反，不外乎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對黨組織和工作組規範運動方向和壓制少數激進分子「鬧事」的作法持什麼立場，第二是對「老紅衛兵」矛頭向下的「造反」有什麼感受，第三是對「高幹」子女所把持並堅持「血統論」原則的「文革委員會」抱什麼態度。非「紅五類」子女雖然此時不能參加紅衛兵組織——想動而不能動，但他們對這三種現象不可能沒有或讚賞擁護或抵觸反對的心理和情感傾向。他們內心會是哪一種傾向呢？從他們的利益本能來看，大多會是後一種傾向。他們的利益本能至少包括兩個層面：一是長期遭受學校領導和「紅五類」同學的壓制和歧視而產生的自卑與反抗心理，二是此時又先後被黨組織、工作組、「血統論」紅衛兵和「文革委員會」排斥於運動邊沿而產生的不滿和對抗心理。在這兩種心理有形或無形的支配下，他們對校園裏發生的這三種最觸目的政治現象作出的情感反應，最可能是抵觸和反對而不會是其他。這對於他們隨後有機會參加紅衛兵組織時的政治態度和鬥爭方向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如果說到了造反派支配運動局勢之初的第三期間——1966年10月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非「紅五類」子女還大多持保守立場或者傾向保守，那就違背歷史和人性的真實了。因為當他們終於等到擺脫受壓狀態和取得投身「文革」的平等權利的第一個機會時，他們的鬥爭矛頭已經自然地具有了造反的指向——反對學校工作組、當權派、「血統論」紅衛兵和「文革委員會」。這時候，毛澤東將運動的主要對象從黨外「階級敵人」改變為黨內「走資派」的本意才公開顯露，造反派

與保守派的劃分才有了明確界限。

照我的理解，要認可徐友漁的結論，就必須假定「文革」初期存在兩種造反：一種是1966年10月之前黨委支配運動局勢後期保守紅衛兵「階級鬥爭」模式的「造反」，一種是1966年10月之後造反派支配運動局勢前期造反紅衛兵「路線鬥爭」模式的造反。徐君所指如果是前一種「造反」，則基本成立。

在這個模式下非「紅五類」子女如能參加組織，毫無疑義只會參加「保守派」。因為對於「批判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式的「造反」，對於把鬥爭矛頭完全指向知識份子和黑色人群的「造反」，他們必然會心懷抵觸甚至抗拒——不參加與之對立的「保守派」才是怪事！問題是，當時學校裏並不存在與保守紅衛兵這種「造反派」截然對立的那種「保守派」。而非「紅五類」子女此時正普遍處於受壓狀態，他們參加組織和起來造反的機會，要等到1966年10月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才出現。

1966年8-10月，我所在城市官辦紅衛兵興起並大搞「破四舊」時，每天都有街坊鄰居被抄家並將主人拉上大街掛牌批鬥。因為家庭有歷史問題，我天天提心吊膽，擔心哪天紅衛兵闖入家門抄出點什麼，不僅體弱多病的母親會遭到慘無人道的折磨和羞辱，自己也會受牽連而陷入無地自容的境地。經我反復勸說並再三強調對於全家的利害關係，母親迫不得已將家裏1950年以前的照片全部燒了。說實話，我當時對這些紅衛兵不僅十分反感，甚至心懷憎恨。如果他們就叫「造反派」，而我當時又有條件參加群眾組織，我肯定會參加與他們對立的「保守派」。遺憾的是當時並沒有與他們對立而又叫做「保守派」的組織存在。兩個月後我確實參加了與他們完全對立的組織，但那是本來意義上的造反派，而不叫做「保守派」。

所以必須弄清楚：這裏說的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劃分，究竟是「階級鬥爭」模式下的現象呢，還是「路線鬥爭」模式下的現象？

無論存在過的歷史事實還是存在著的往昔記憶都在告訴我們：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對立是在後一種模式下發生的，只有放在這個範圍來認定

才有意義。前一種模式下的「造反」，置於這個範圍就變成了保守，而這個範圍的認定才是「文革」中造反派與保守派劃分的本義。

侯一謙說到這個時期紅衛兵的「成份問題」時認為：「最早，造反派有意無意要儘量保持成份清一色的『好』，因而『成份不好』的，多有往保皇派一邊去的，但保皇派如果成份太『複雜』，會影響自己說話的分量或『戰鬥力』，因而也刻意純化自己。」³⁵乍看之時，這種分析令人莫名其妙；仔細揣摩才發現，作者也是把「老紅衛兵」認定為「最早的造反派」才得出如此精妙之論。這當然是誤認的結果。

將「老紅衛兵」排除在造反派之外，難免會給今日已經習以為常的「文革」話語習慣造成某種紊亂。因為否定「文革」就必須否定其群氓運動特徵的造反，而「老紅衛兵」的反人道反文化暴行更屬於必須否定之列，如果把他們排除於造反派範疇，如何將其納入「文革=造反」這個等式中來加以否定？

這個問題並不難解決：每個「文革」研究者都可以有自己的價值標準，比如平等、正義，或者人道、理性。倘若以人道和理性為標準來評判「文革」中的各種派別，就應做到：無論官方的極端派還是務實派，也不管民間的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其行為只要屬於反人道、反理性的就一概給予否定。不因其在「文革」中曾經失勢就曲意袒護，也不因其在「文革」中一度得勢就嚴辭聲討。由此——既可克服因能指與所指的矛盾而導致的概念混淆，又能避免實際認知中的觀念障礙。

這樣一來，難免會給客觀評價造反派留下一塊餘地。然而這不是後人強行擠佔出的，而是歷史早已為後人的評說留出的空間。只要尊重歷史並尊重常識，就不會感到有什麼意外。

第二節 兩種紅衛兵在共同青春背景下的行為差異

在探尋紅衛兵運動的多種原因時，徐友漁特別注意到了「青春期動盪而反常的心理」。他為此寫到：

「大多數學生是在他們的青春期遇上文化大革命的。在這個時期，他們由少年走向成人，他們急於向人證明自己已經不是小孩子，不再需要

家長、教師的監護，能夠獨立承擔社會責任。他們長期生長在高度政治化和禁欲的環境中，當『文革』把加在他們身上的一切外力撤去，他們體內洋溢的青春潮水不是按其本性自由發洩，而是由堅實的政治堤岸導向既定的方向。在這個階段，他們充滿激情和想像，常常不能區分夢幻和現實，以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變世界上的一切，可以戰勝任何邪惡的東西，也可以創造各種美好事物。他們缺乏生活經驗，思想偏激，遇事好走極端，把世界看成只有黑白兩色，對人對事抱著『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的態度。他們需要偶像並崇拜偶像，樂於將自己的理想、熱情乃至一切奉獻給某個偶像。」³⁶

是的，要想理解青年學生——特別是特權等級家庭出身青年學生的「造反」，只從社會層面去找原因是行不通的，他們造反的原因更多存在于心理層面——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中。

徐友漁對紅衛兵青春心理特徵的描寫及其被強行「導向」的揭示，準確而深刻，只是未能進一步分析——在共同的青春背景下，兩類紅衛兵的具體行為是否一致。

我將在探討兩種紅衛兵共同的青春叛逆心理的同時，考察他們由不同的社會處境和等級本能所牽制的造反行為有何區別。

按我的理解，青春叛逆心理外化為青年人的非制度化個性表現。制度化與非制度化，是每個人一生中的兩種個性傾向。強烈的非制度化傾向為青春期的年輕人所共有。此時的青年人，大多有強烈的自我肯定傾向和自我表現欲望，懷疑與創造並飛，叛逆和追求共舞，個性鋒芒直指舊的權威和舊的束縛。心理學所稱「人生的反叛時期」和「青春期的叛逆」、文學史所說「狂飆時代」和「叛逆時代」，即指青年個體和青春群體特有的非制度化傾向。

人在青春期的非制度化傾向，由青春期的心理特徵所規定。這是生命里程由未成人向成人轉變的緊要時期，人生急待完成來到世間後的第二次斷乳和第二次站立。同樣是要改換食品並擺脫摻扶，但不再像第一次斷乳和站立那樣是物質性的，而是變成了精神性的。這之前，精神生活無不依傍於家庭和學校的嚴密監護，精神之乳是其灌輸的行為準則和知識譜系，人的精神個性完全不能站立。此時面臨要以成年人的身

份獨立步入社會，他們必須斷棄無選擇強加的精神煉乳而自行選擇適用的精神食糧，他們必須放棄過去的精神依傍而另尋今後的精神依傍。這是一個放棄和選擇共存的時期，這是一個斷裂和鏈結同在的時期，既反對依傍又需要依傍，既反對權威又需要權威，既反對偶像又需要偶像。人在心理層面處於從未有過的懷疑、對抗、尋覓、迷惘之中。

非制度化傾向只存現于青春期心理逆反的一面，另一面則是努力尋求新的制度化皈依。叛舊皈新——青春期的雙重指向。

個人性的青春期非制度化傾向，一般只局限於家庭範圍——以父母所代表的權威存在和制度約束為反叛物件。現代社會通過學校實施的同化教育，會將超出家庭範圍的青春期非制度化傾向稀釋殆盡。在這個範圍內，「反叛家庭」——便成為青春期最突出的口號和最顯著的現象。這很常見。

罕見的是群體性的青春期非制度化表現。因為這需要歷史機遇及其所搭建的社會舞臺。外敵入侵、政權更迭、社會轉型、高層爭鬥……都屬於這類機遇。這時社會急劇動盪，秩序全面紊亂，人心極度不安，統治權力失控或者削弱，不確定因素空前增多。廣大青年敏銳地感覺到社會性動變的訊息並迅速作出行動的抉擇。青年群體的聚集場所——城市中的校園，自然成為群體性青春期非制度化行為的主要策源地。

青春是勇敢的——他們以群體的姿態走出校園、走上大街、走向廣場，大膽地向舊的權威和舊的束縛宣戰。

青春又是膽怯的：他們在向舊的權威和束縛挑戰時，還必須同時尋求新的價值歸屬——民族的、國家的、階級的、主義的、領袖的。這不奇怪。他們正處在人生轉變期，心理定勢和行為模式尚未最終成型，在社會不信任的目光中還屬於成年人年齡圈層的邊緣人群，尋求具有最廣泛意義的價值歸屬及其抽象或具體的權威依附，正是他們克服心理不安全感的本能之舉。他們結隊行動所憑藉的具體理由也要力求能激起社會最普遍的共鳴，目的也無非是獲取自身行為最廣泛的合法性認同。

中國近代以來1919年的「五四」運動、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1966年的「紅衛兵」運動、1976年的「四五」運動、1989年的「六四」運動，都是群體性青春期非制度化表現的典型事件。

不是每一代青年都能擁有群體性表現的歷史機遇。

群體性的青春期非制度化表現，並非都是蕩滌社會污濁的革命暴風雨，它有時也充滿破壞性，對人類生活和文明進程只有否定的意義。主要取決於它的歷史境遇——那足以引發群體性青春期事變的特定環境和特定條件。

構成特定歷史境遇的因素很多，而且分不少層面，但至少包括六個具體要件：什麼樣的社會背景、什麼樣的時代要求、什麼樣的事發起因、什麼樣的行為動機、反對的舊權威和舊束縛是什麼、推崇的新價值目標和新精神偶像是什麼。

六個要件中，中間兩個是青年叛逆行為的觸發點，前兩個是其歷史座標，後兩個是其價值目標。在歷史座標俯視下的青年叛逆行為的價值目標，自然有正確與錯誤之分，目標錯了便一損俱損，目標對了便一榮俱榮。

功過對錯，雖然事發時即見端倪，但最終的評價只能是在事後作出。評價的標準早已包含在俯視著青年叛逆行為的歷史座標之中——對社會進步的作用如何？對人性要求的體現如何？這兩方面並不完全等同，有時甚至二律悖反。兩方面都能獲得肯定性評價的群體性青春期表現是一種類型，只有一方面能得到肯定性評價的群體性青春期表現是另一種類型，兩方面都遭到否定性評價的群體性青春期表現是另一種類型。

這純屬他們恰巧碰到的歷史境遇給定的，而非青年群體的自由選擇。

青春的眼睛因四處尋覓而明亮動人；但青春的眼睛同時又迷惘而盲目；只要遇到群體性表現難得的機會，他們往往來而不拒，甚至不惜飲鴆止渴——特別是為了替自己的非制度化個性表現尋求安全性保障和合法性認同之時。如果說他們還有一點清醒之處，那也只是特定的等級地位和利益指向對其行為的暗自牽引。

難怪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認為「青春是可怕的」。

在《玩笑》中他曾沉痛地寫到：

青春是一個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著高統靴和化妝服的孩子在上面

踩踏的一個舞臺。他們在舞臺上做作地說著他們記熟的話，說著他們狂熱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話。歷史也是一個可怕的东西：它經常為青春提供一個遊樂場——年輕的尼祿，拿破崙，一大群狂熱的孩子，他們假裝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態會突然真的變成一個災難的現實。

當我想到這一切時，我的一連串評價都出了差錯。我對青春產生了一種很深的仇恨，同時又夾雜著對歷史罪人的一種自相矛盾的寬容，我突然之間把他們的罪惡僅僅看成是期待著長大的煩躁不安。

這一番議論所針對的，自然是受到完全否定評價的德國青年納粹的群體性青春期非制度化行為，儘管涉及的範圍更為廣泛。青春的確有可怕的一面——當他違背了社會進步和人性潮流的時候。

中國作家巴金卻認為「青春是美麗的」。他看到的顯然又是「五四」愛國學生運動類型的群體性青春期非制度化表現，其中自然包括青春個體那昂揚向上的特質：敢於懷疑、勇於反抗、勤於探索、富於幻想、長於追求、甘於獻身。青春的確有美麗的一面——當他順應了社會進步和人性潮流的時候。

有的西方學者試圖用法蘭克福學派的「權威人格」概念來解釋中國紅衛兵的性格特徵。剔除其中包含的弗洛伊德性壓抑理論的內核，倒也有一定的參考作用。因為它至少看出了紅衛兵在現實中的態度：既有反抗權威的一面，又有接受和屈從于權威的一面。但它認為這是極權主義國家群體性青春期表現獨有的特徵，那就錯了。這其實是一切群體性青春期表現的共同特徵。中國20世紀前期的「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同樣接受和依從了一定的權威——民族和國家，只不過是抽象的至高存在者罷了；20世紀後期的「紅衛兵」運動、「四五」運動、「六四」運動，接受和依從的權威才變為具體的至高存在者——活著的毛澤東和死去的周恩來與胡耀邦。無論依附抽象權威還是具體權威，都是為了群體性青春期行為的安全性需要和合法性認同，並沒有其他需要挖掘到童年時代去的更深原因。從抽象權威到具體權威的演變，只是說明在極權主義的強力控制下，群體性青春期表現所依附的權威必須是統治者中的政治領袖，否則便難以獲得必需的安全性保障和合法性認同——「四五」

運動和「六四」運動不是因為依附了兩個具有異端意味並已死去的權威偶像而遭到殘酷鎮壓嗎？各自的功過對錯，則要由它們具體的歷史座標和實際的價值目標來最終判定。現在，「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四五」運動、「六四」運動都以光輝的形象進入了史冊，唯有「紅衛兵」運動還呲牙咧嘴地處在徹底否定的邊沿。

由此來看，徐友漁從「相同年齡段」的角度，將中國紅衛兵運動與德國青年納粹運動相比較，並沒有錯。第一，二者都屬於體制內的群體性青春期叛逆行為；第二，二者都被最高權力者鼓吹的荒謬而反動的觀念所導向；第三，二者都狂熱地追隨於一位身為至高無上者和最高統治者的精神與政治領袖。

然而，無具體限定的對比往往包含著危險，稍不留意就會忽視二者之間的區別。事實上二者的區別仍然很大。比如：青年納粹運動是對現代民主制度的全面反動，紅衛兵運動卻包含了反對封建性官僚體制的內容；青年納粹運動是對弱勢民族的滅絕性迫害，紅衛兵運動只有保守派殘酷迫害弱勢人群，造反派衝擊的卻主要是官僚階層；青年納粹運動的危害遍及整個歐洲，紅衛兵運動的衝擊面只限於國內；青年納粹運動沒有分為尖銳對立的兩大派，紅衛兵運動卻分成造反派與保守派兩大潮流——而且前者的參加人數更多、存在時間更長、政治作用更大。看不到這些具體差別，任何角度的類比都極易陷入簡單化。

我關注的重點自然不是紅衛兵運動與青年納粹運動的異同，而是在共同的青春期背境下，造反紅衛兵和保守紅衛兵的行為有什麼分別。

讓我依照前面所歸納的六個要件來進行考察。

社會背景：

整個國家在解放的歡呼聲中被暴力和強權統治了十七年。這種統治雖然自認為是比「資本主義」高出一頭的「社會主義」，其實不過是比「資本主義」還要矮半截的「半封建專制主義」和「半國家資本主義」的混合體。個人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思想權利，被一個個整治真實或假想敵人的運動剝奪殆盡；知識界和統治層有異議的人士被悉數清洗；國民經濟被折騰得餓殍遍野；幾億人的頭腦被徹底洗白然後塗成紅色。分明是一個掛著理想社會招牌的神權社會，卻被吹為「世界革命的導師」

所領導的「世界革命的根據地」。

靠著「階級鬥爭」的高壓威懾和「革命思想」的愚民教化，社會生活的水面上仿佛風平浪靜，但水面下早已波濤洶湧——至少潛伏著四種矛盾。其一是極權主義所導致的個人無權與國家專權之間的矛盾，其二是荒唐的「階級劃分」所製造黑色人群與紅色人群之間的矛盾，其三是殘酷的「階級鬥爭」所激化挨整者與整人者之間的矛盾，其四是政權高層務實傾向與極端傾向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互相交織並愈演愈烈，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紅衛兵運動總的社會背景看似相同，但在前三種矛盾關係中，保守紅衛兵成員多數處於矛盾的上方，造反紅衛兵成員卻多數處於矛盾的下方。

時代要求：

「五四」運動為中國現代變革提出了民族和民主雙重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著民族任務的完成，民主任務也同時從後位推到前位。20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掀起了民主改革的浪潮，1957年中國知識份子也以「大鳴大放」的方式作出回應。毛澤東卻倒行逆施，認為以蘇聯赫魯雪夫為首進行的民主改革是「修正主義上臺」和「資本主義復辟」。在以「反右派」之名鎮壓了「大鳴大放」的知識份子之後，他高高舉起「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兩根殺手鐮，前者用來恐嚇渴望變動的下層民眾，後者用來威脅企圖改良的高層政要。民主進程被再次阻斷，但人們與歷史暗相呼應的思變心理並未平息。

思變心理尤其為青年人所共有，但兩種紅衛兵的思變心理卻差別很大：保守紅衛兵傾向於加強現狀，造反紅衛兵傾向於打破現狀。

事發起因：

紅衛兵運動總的起因，自然是毛澤東為了阻止名為「修正主義上臺」實為民主改革進程而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兩種紅衛兵的具體起因卻大不相同。

保守紅衛兵是在批判「資產階級文藝黑線」和「資產階級教育黑線」時興起的，造反紅衛兵卻是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時興起的。雖然批判的對象都是「資」字型大小，但前者實為社會生活中殘存的現代人文資源，後者實為社會等級中一貫整人

壓人的官僚階層。

行為動機：

紅衛兵青春期的行為至少包裹著四層動機：最外層是為最高領袖提出的「反修防修」的偉大目標而戰；第二層是青春期的舊權威和舊束縛的反叛；第三層是等級利益的驅動；最裏層是改變個人無權狀態。

在第一個層面，兩種紅衛兵的行為動機大體相同。但在這層表面現象背後的另外三個層面，兩種紅衛兵的行為動機就有了明顯差異。

同是青春期的叛逆行為，保守紅衛兵心目中的舊權威和舊束縛是管束自己的「資產階級教育制度」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造反紅衛兵心目中的舊權威和舊束縛卻是迫害自己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等級地位規定的具體行為動機，二者的差別非常分明：保守紅衛兵是為了清除「階級」異己和「血統」異己，造反紅衛兵是為了改變等級地位和政治處境。

同是爭取個人權利，保守紅衛兵想爭的純粹是特權等級的壟斷權，造反紅衛兵想爭的只不過是無權等級的平等權。

反對什麼：

兩種紅衛兵都按照毛澤東的思想和政治導向，認為是在「砸碎舊世界」，但是各自反對的具體物件又不盡相同。

保守紅衛兵主要反對的，是政權系統之外所謂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黑五類」人群及其「舊文化、舊道德、舊風俗、舊習慣」。他們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破四舊」中的所作所為，全部圍繞打擊「舊社會殘餘勢力」這個目標。他們組織原則上瘋狂推行的「血統論」，僅僅是這個目標的自然延伸。甚至後來反對中央文革小組，也是為了捍衛這個目標。

造反紅衛兵主要反對的，是政權系統之中所謂妄圖復辟舊社會制度的「走資派」，及其所派遣壓制群眾的工作組和所操縱阻礙運動的保守派。他們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走資派」、「奪權」甚至「武鬥」中的全部作為，都服從於這個目標——儘管造反派內部的武鬥實際上偏離了這個目標。

推崇什麼：

看起來，兩種紅衛兵都是在忠於、緊跟、捍衛毛澤東及其思想和路線。實際上他們各自追隨的是不同時期的毛澤東及其思想和路線。

保守紅衛兵實際追隨的，是1966年10月以前的毛澤東及其「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這個毛澤東和他們的等級利益完全一致：維護他們掌權現實和特權地位的合法性，證明打擊黑色人群和知識份子的合理性。他們追求的正是偉大領袖過去宏圖中這個理想的現實。

造反紅衛兵實際追隨的，是1966年10月以後的毛澤東及其「路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思想。這個毛澤東和他們的等級利益比較吻合。因為他不僅否定了工作組壓制和打擊非「紅五類」子女的行徑，還支援這部分青年將鬥爭矛頭指向各級當權派，無形中宣佈了「權力和財產再分配」時代的到來。他們追求的無疑是偉大領袖未來藍圖中這個現實的理想。

綜合評價：

即使從群體性青春期叛逆行為的角度看，兩種紅衛兵的分別也很大。

無論在中國社會隱存的矛盾關係之中，還是在中國歷史潛在的時代要求面前，保守紅衛兵成員都屬於惰性或消極的一方，造反紅衛兵成員都屬於活性或積極的一方。

落實到具體的事發起因、行為動機、攻擊物件、追求目標，雙方的分別就更明顯：保守紅衛兵的作為，無不是為了純化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強化極權主義的統治威權，從而維護極權體制的現實統治秩序；造反紅衛兵的作為，卻客觀上淡化了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削弱了極權主義的統治威權，進而衝擊了極權體制的現實統治秩序。儘管後者所體現的還不是自覺的民主要求和民主行為，但至少是一種潛在的民主衝動。距離民主主義並不遙遠。

正因為存在這種分別，1968年以後，保守紅衛兵成員很多得到重用，造反紅衛兵成員不少遭到清洗。1976年結束「文革」後更是如此。

第三節 造反與保守的根本區別

在理論層面，造反與保守的根本區別問題是一個難點。

徐友漁基於對此問題的觀察和總結，將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區別和對立，歸納為六個方面：第一，支持還是反對工作組；第二，支持還是反對「血統論」；第三，迴避還是積極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第四，維護還是反對各級黨組織；第五，「二月鎮反」中是幫兇還是挨整；第六，主要鬥爭對象是黨外「階級敵人」還是黨內「走資派」。³⁷

當然，他所關注的已超出校園範圍而包括了各行各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

為什麼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區別特徵會有六個之多？因為全國各地的情況千差萬別，一個特徵很難概括。例如：是否反對工作組本來是一個具有廣泛意義的特徵，但是對於反對過工作組的北京「老紅衛兵」就不適用。「二月鎮反」中是受害還是幫兇這個區別特徵很重要，但當時許多地方除了保守派之外，穩健造反派也扮演過幫兇的角色。是否造「走資派」的反——這個最重要的特徵在具體對照時同樣遇到很大困難，因為在保守派與造反派長期對峙的地方和單位，保守派後來也積極參與了鬥爭「走資派」和奪權，分歧已不再是鬥不鬥「走資派」，而是具體鬥哪一個「走資派」的問題。

因為存在不少與普遍情況相異的特殊現象，徐友漁提出一個問題：「能不能把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各種區別概括為一種根本性區別呢？」他沒有立即說出自己的看法，只轉述了兩位西方學者的觀點。其一：造反派是沒有特權的人，他們極力改變現狀；而保守派與優裕的社會集團有聯繫，極力維持現狀。其二：保守派力圖捍衛中國體制化權力的基礎，即黨組織，造反派恰恰集中攻擊這個權力基礎。³⁸

這兩種觀點看似都能成立，但又覺得前者稍嫌抽象，後者略嫌空泛。

徐友漁所說的「根本性區別」，應該是指一種原生性區別，它能派生出其他區別特徵，而不能被其他區別特徵所派生。究竟哪一種區別是根本性的呢？

我認為不妨先來看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出生」，再去找它們的「命根」。

1966-1969這三年，政治氣候雖然瞬息萬變，但1967年「二月鎮反」被否定後形勢就完全明朗化——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如日中天。中國人的自由意志和獨立個性歷來就很弱，在全國形勢的裹挾下，廣大群眾對運動的認識和態度在不斷進行調整，人們理知層面的分歧漸趨模糊。因此，對造反派和保守派的認定，必須追查到它們的「出生」事件。如同一個人，群眾組織造反或保守的性質也是由它們的「出生」事件所預成的。群眾組織賴以「出生」的政治事件近似於它們的母體和相應的時空環境。這便是1966年6-12月圍繞名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政治事件所發生的群眾性衝突和分化。這是從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轉變的時期，這是從「階級鬥爭」為綱向「路線鬥爭」為綱轉變的時期，這是從整黨外「階級敵人」向整黨內「走資派」轉變的時期，這同時是社會領域和思想領域大動盪、大紊亂、大調整的非常時期。尤其在各級當權者仍然掌握著運動領導權和上層紅色子女瘋狂表演的1966年8-9月，人們對運動性質及其鬥爭物件的認知，還完全籠罩在十七年來的意識形態之下，反對什麼和維護什麼，更多從現實處境和等級利益出發，較少其他因素的牽引，真實的政治傾向暴露無遺，造反或保守的站隊也更本真。

徐友漁所歸納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六個區別特徵，除了當時尚未發生的「二月鎮反」，全都在催生兩派群眾組織的這個事件中表現出來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工作組、血統論、黨組織、階級敵人和走資派——這些抽象而又具體的物件，在群眾組織誕生之時就已尖銳地擺在它們面前。它們因為不同的態度和選擇而決定著誕生後不同的性質和走向。是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就是此時因為自己不同的站隊而領到了不同的「出生證」，同時深深打上了不同的「出生胎印」。

法國學者華林山認為：1966-1968年中國先後存在過1949-1967年1月的原政權、1967年2月後的支左軍人政權、後來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政權。凡是對這三套政權持反抗態度的群眾就稱為造反派，凡是對這三套政權持維護態度的群眾就稱為保守派。³⁹

這很像是沒有親臨過現場的人作出的主觀推斷。在中國「文革」的特定條件下，造反派和保守派其實是在三年群眾運動之初的「資產階級

反動路線」這個政治事件中一次性確定的。其後，要麼是保守組織解體，多數成員以個人名義參加造反組織——如上海、北京、四川、雲南等地，要麼是保守派一直堅持與造反派對抗——如廣東、廣西、新疆、西藏等地，從未發生過因對待後來政權的不同態度而多次分成造反派與保守派的事。「二月鎮反」時保守派對造反派的全面反擊，完全屬於此前勢不兩立格局的正常延續，並沒有出現新的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劃分，這個事件只是對於造反派劃分為激進派與穩健派起到了關鍵作用。全國大多數地方，對待革委會的不同態度主要發生在分裂為兩大派的造反派內部，也沒有形成新的造反派與保守派。就像人只能出生一次一樣，造反派和保守派組織形態的「出生」也只有一次。此後，或者夭折，或者合併，或者改頭換面，或者自成氣候，但在獨立存在時，它們「出生」時自我獲得並由「出生證」規定的性質和走向一直不曾改變。

尋找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命根」，需要對它們的各種區別特徵，進行追問式推論。

保守派為什麼要站在工作組和黨組織一邊並熱衷於鬥爭黨外「階級敵人」和宣揚「血統論」？因為這樣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態度對自己有利。他們大多家庭成份好，檔案記錄清白，政治身份可靠，親朋好友少有黑色牽連，正在受到或者希望受到領導重用，其中的上層紅色子女更處於養尊處優和頤使氣指的特權地位，在維護工作組和黨組織並整黨外「階級敵人」的「階級鬥爭」正統框架內，他們不但可以避免任何損失，而且會使自己的優越社會地位和政治處境更加鞏固。

造反派為什麼要反對工作組和黨組織並堅持批判「血統論」和黨內「走資派」？同樣因為這樣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態度對自己有利。他們要麼是黑色家庭出身，要麼檔案中有污點，要麼政治身份是雜色，要麼親朋好友有黑色牽連，在現實中被視為有嫌疑而深感壓抑。只有在反對工作組和黨組織並批判「血統論」和「走資派」的「路線鬥爭」新式框架內，他們才可能避免遭受損害，並得到改變不利政治處境和社會地位的好處。

這當然是指最初形成保守派和造反派的人群，後來懷著各種動機的加入者情況要複雜得多。

不難想像，最初形成保守派和造反派的人群，不本能地選擇這樣的

政治主張和政治態度，還能選擇什麼。

這就涉及到了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命根」——各自不同的等級地位和現實處境及其所產生的不同等級利益。

徐友漁對自己提出的命題這樣解答：「文革中，不論上層領導和下層群眾，他們在立場和觀點上的區別可以說是對於現存狀態的態度不同。劉少奇和各級被打倒的當權派，以及保守派力圖維護當時的現狀，這包括上層政治權力格局的現狀，也包括既得利益者和社會地位、經濟地位低下者的現狀。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改變現狀，他的目的只是改變『大權旁落』的現狀。但是，他不可能單靠上層權力鬥爭實現這一點。為了爭取和動員群眾，他偶爾暗示他的目的也包括改變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的現狀，以爭取廣大對現實不滿的群眾以極大的熱情支持他。」⁴⁰這已經觸及到了問題的核心。

保守派為什麼傾向於維護現狀？因為只有維護現狀，他們現在有利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處境就可以繼續保持。造反派為什麼傾向於改變現狀？因為只有改變現狀，他們現在不利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處境才可能發生變化。都是由各自的等級地位和現實處境所產生的等級利益決定的。

這就是兩派完全不同的「命根」。

他們那些表現在政治主張、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上的區別特徵，正是由這個「命根」派生出來的。

當然，從全國範圍逐層縮小到一個個具體的學校和單位，社會等級的構成和含義必不相同。例如：在全國範圍，自然是官僚人群及其子女屬於最上層，「黑五類」人群及其子女屬於最下層；在首都高校的學生中，「高幹」子女屬於上層，平民子女屬於下層；在工廠，管理幹部、黨團員、模範先進、積極分子屬於上層，黑色子女、政治嫌疑者、落後分子屬於下層。將這個立體層次概念轉換為平面層次概念，社會等級的最上層也就是社會圈層的中心，社會等級的最下層也就是社會圈層的邊緣。但是無論在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範圍——等級的構成如何不同，處於上層或中心者傾向保守和處於下層或邊緣者傾向造反，則是不爭的事實。

由保守派和造反派的這個「命根」所派生的多種區別特徵中，最集中體現其等級特性的，又要數他們的組織路線。

1966年8-10月圍繞「血統論」發生的大辯論，波及面之廣、激起的熱情之高、引起的衝突之大，在「文革」時的群眾性思想論爭中十分罕見——就是因為它尖銳地觸動了人們最為敏感的等級神經。難怪這個時期，對待「血統論」的不同態度，就成為北京中學生中造反派與保守派的主要區別特徵。同全國其他地方相比，我們曾經認為這是一個特例；其實正是這個特例反倒具有更深層面的典型意義。這個時期，遇羅克為了批判維護社會等級劃分的「血統論」和呼籲政治權利平等而寫作的《出身論》，也將造反派與保守派的政治傾向性暴露無遺。最先幫助作者辦起報紙將文章印成鉛字進入公眾視線的人，是北京的中學造反紅衛兵；將文章轉載於各種報紙、抄寫成各種大字報、翻印為各種傳單廣為傳播的人，也是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圍繞這篇文章發生大辯論時站在作者觀點一邊的人，還是各行各業的造反群眾。雖然也有少數思想正統的造反者由於對作者的真實身份和文章的真實動機不太放心而發出過異議，但這不是主流傾向。追求政治平等與維護政治不平等兩種傾向，涇渭分明。後來隨著全國形勢的明朗化，兩派原來的區別特徵，有的事過境遷，有的逐漸模糊，惟有「組織路線」的對立始終未能消除。在這個問題上，要數保守派最頑固，不僅堅持不改初衷，而且從未放棄對造反派的敵視。

例如：1967年元旦，北京「老紅衛兵」還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幹子弟，國務院、人大常委會革幹子弟，中國人民解放軍帥、將、校革幹子弟，中共中央軍委、國防部革幹子弟，十六省市部分革幹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名義發表通告，將他們的組織路線規定為：「[1]第一階段由中共中央、國務院、解放軍、省市幹部子弟組成；[2]第二階段由基層組織[地委專署與公社]幹部子弟組成；[3]第三階段吸收全國工農兵和出身他種家庭而政治表現好的。」⁴¹

血統之純正、等級之森嚴，可見一斑。這與造反派名義上以工農兵子女為主，實際上什麼子女都兼收並蓄的組織路線，大相徑庭。

再例如：1967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湖南道縣保守派在武裝部一手策動下對「黑五類」及其家屬進行大屠殺，同時下令將造反派「湘江風雷」的成員一併收拾。1968年7至10月，廣西保守派在軍隊全力

協助下對造反派「四二二」進行大屠殺，更是將成千上萬的「黑五類」混在一起一併消滅。雖然這期間也發生過造反派對保守派的武力圍剿，例如1968年四川造反派在三次「武裝支瀘」中對瀘州市保守派「紅聯站」的進攻，但造反派並沒有把「走資派」與保守派混同起來一併殺害。

這兩個實例充分暴露了保守派與造反派在各種虛假理由的掩飾下等級利益的對立和衝突。

這當然只是發生在北京「老紅衛兵」和湖南與廣西保守派身上的極端現象，其他地方的情況要溫和得多，但同時也更複雜。

明明造反派與「黑五類」並不是一回事，保守派為何要將二者混為一體呢？

美國學者宋永毅對此指出：

他們明明知道文革中「黑五類」分子都被《公安六條》嚴格禁止參加任何群眾組織，事實上他們也從不參加任何派性鬥爭，保守派殺戮「階級敵人」，只是為了表現他們無可爭辯的「正統性」。在他們「血統論」的潛意識裏，確實認為出身不太好的造反派和「黑五類」有某種「血緣關係」，因而「黑五類」是造反派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42

「造反派被階級敵人操縱」，「保守派被走資派操縱」——這是當年兩派互相攻擊時經常揮舞的鋼鞭。從被對方認定的「階級傾向」中，不難看出雙方「組織路線」的完全對立。

造反派隊伍中家庭或本人有問題的人其實並不很多，特別是在原保守派人員大量湧入之後，這批人的相對數量更為減少。為什麼保守派還是要攻擊造反派裏「壞人」多呢？嫌疑主要來自造反派的政權主張。一味強調與己無關的黨內「路線鬥爭」，一心批判歷來紅彤彤的「走資派」，對民眾中實實在在的「階級鬥爭」和「階級敵人」卻不聞不問，甚至故意回避——這不是因為自己組織中「壞人」多而蓄意為「階級敵人」張目是什麼？何況「走資派」無論怎樣壞，他們迄今還保留著黨籍，至少還是合法公民，「黑五類」卻是法律早已寫明瞭的專政對象，應該重點打擊誰還不清楚嗎？

保守派之所以敢於在屠殺造反派時將「黑五類」混在一起殺害，就因為他們心中擁有這種「無產階級專政」的法理支持。造反派在圍剿保守派時之所以沒有殺害「走資派」，就因為他們心中缺少這種「無產階級專政」的法理支持。

面對保守派的質疑，造反派也自感心虛。專講「路線鬥爭」和「走資派」的繼續革命理論，雖然是偉大領袖提出的，但它與馬克思所創立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相比，畢竟屬於異端，在大多數中國人文化心理中的根基更不牢固。而且，在自己的政治主張下面，造反派內部確有不少家庭或本人有問題的成員。他們雖然人數不多，但已足夠使造反組織產生連鎖性過敏反應，就像一個人，有時會為親朋好友的罪衍而產生被牽連似的心理感覺一樣。造反派因此而對自己的政治主張和人員成份缺少充分的自信。

事實上，造反派對組織中的黑色子女並非一律倚重，除非造反資格老、活動能力強、社會名氣大者，對一般黑色子女難免持審慎態度——因為保守組織老是攻擊「階級敵人操縱了造反組織」。加入到造反派組織中的原保守派人員一般本性難改，雖然其中的多數人因當過「老保」自慚形穢而有所收斂，但也有少數人，只有機會擔任了「武鬥司令」或革委會中的「群眾代表」之類職務而得勢，便會下意識地表現出對黑色子女的歧視。

反之，造反派對「走資派」子女卻從不歧視，甚至還把他們的「革命幹部」家庭出身視為本派「階級成份」純正的資本。我所在地區衛校學生L，其父為某地級市副市長，運動初期被作為「走資派」打倒，本人在校期間不僅一直擔任造反紅衛兵組織「炮打司令部」戰鬥團團長，而且還被推選為地區造反紅衛兵司令部二把手，直到畢業離校。前面提到的那位現任某中央級刊物副主編的著名詩人也屬此類實例：其父母均為從延安魯藝出來的「三八式」老幹部，因與文藝沾邊，運動之初被作為「黑線人物」打倒。他不僅首批參加了造反紅衛兵，而且長期擔任地區最大中學生造反紅衛兵組織「一〇一八」戰團的宣傳部長。我所在地區當時被打倒的幾位地委主要「走資派」的子女，1967年「二月鎮反」被否定後都參加了所在學校的造反紅衛兵組織。他們不僅從未受到歧視

和打擊，反而對於這些造反紅衛兵組織與其父母之間的關係，起到了某種微妙的緩衝作用。這要算造反派對自己的政治主張和人員成份缺乏自信的另一種表現。

保守派對自己組織中少量的黑色子女，卻不僅不歧視，反而非常信任和重視。我在農場時的好友Z，本人頗有文才，出身「資本家」家庭，有兩個哥哥還是「右派」，運動初期因給領導提意見被打成「三類」，平反後吸取乃兄教訓而有意識地參加了保守派。1967年「二月鎮反」時當上了全縣最大保守組織「貧下中農造反總部」的二號頭目，深得保守派群眾的信任和擁戴。看起來不可思議，其實毫不奇怪。這恰好說明保守派對自己的政治主張和人員成份非常自信。在他們看來，黑色子女既然站到他們這邊，就表明已經徹底背叛了「反動階級」而成了堅定的革命者，毫無嫌疑可言。

有趣的是，保守派對「走資派」子女卻十分忌諱，往往採取規避的態度。自然是為了避免「走資派通過子女操縱保守組織」的嫌疑。

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組織路線」——這個從各自等級利益的「命根」直接延伸出的主要區別特徵，一直到雙方退出政治舞臺之後都還陰魂不散。

注釋：

- 28 李輝編：《殘缺的窗欄板》，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第82頁。
- 29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69-70頁。
- 30 李輝編：《殘缺的窗欄板》，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第70-86頁。
- 31 劉小雁編：《關於不會說假話的中國人的故事》，西安：華嶽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77頁。
- 32 李輝編：《殘缺的窗欄板》，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第132頁。
- 33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79頁。
- 34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43頁。
- 35 侯一謙：《文革與造反派》，美國：《中國之春》，1992年7月號，第61-62頁。
- 36 徐友漁：《自由的言說》，長春：長春出版社，1998年7月，第172頁。

- 37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75-79頁。
- 38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81頁。
- 39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91頁。
- 40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21頁。
- 41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92頁。
- 42 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社，2002年7月，第20-22頁。

第二篇

三年造反與十年「文革」的區別

1966-1976年，由於總有造反派的身影時起時伏，總有造反派的名稱時隱時現，人們便以為造反派作為社會主流政治力量活躍在「文革」舞臺上的時間也有十年，這期間所發生的一切反理性反人道的惡行，都應該歸在造反派名下。

這是又一個巨大的誤解。

從全國範圍看，「文革」十年，造反派進入主流政治的時間不足三年，始點一般為1966年8月，終點為1969年8月——以中共中央1969年8月28日再次緊急發佈收繳民間武器和解散群眾組織的《八二八命令》為正式標誌。在「文革」的四個歷史階段中，這三年正好處於第二階段——造反派支配運動局勢時期。

原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在接受葉永烈採訪時，如實道出毛澤東在「文革」中依靠的社會政治力量不斷變換，並非像今人認為的那樣一直依靠造反派：「依靠小將，不行。依靠老將，不放心。依靠軍隊，又不行。依靠工人，還不行。走馬燈，惡性循環。」⁴³

十年「文革」舞臺上，各種社會政治力量你方唱罷我登臺，主角輪流當，造反派不可能一枝獨秀。不僅1966年5月——1966年10月黨委支配運動局勢時期保守紅衛兵的醜行、惡行、暴行，與造反派無關，而且1969年8月——1976年10月軍隊和幹部先後支配運動局勢時期發生的醜行、惡行、暴行，也不是造反派所為。

第四章 造反派的有形構成與無形演變

這裏所說的造反派，不限指造反紅衛兵，還包括在造反紅衛兵直接支持和間接鼓動下起來造本單位本地區當權派反的工人、職員、藝員、幹部、農民中的激進青年和激進分子。全國各地從1967年下半年起，造反紅衛兵在運動中保持了不足一年的主力軍地位，已被後者取代，昔日集先鋒與主力于一身的造反學生，此後實際上只起先鋒作用了。不知是造反學生身份單純便於避嫌，還是因為「紅衛兵」這個名稱更具時代特色，「文革」後涉及造反話題的文字，大多習慣用「紅衛兵」來指代造反中人。這當然不準確。因為「文革」中的造反者還包括中國社會各行

各業人數更多的激進民眾。

第一節 造反派的構成

在校園之外的廣闊社會空間，民眾造反派主要由工人造反派、職員造反派、藝員造反派、幹部造反派和農民造反派構成。他們多數屬於基層單位各種社會圈層受壓抑的邊緣人群：有的處於成份圈層的邊緣，有的處於政治圈層的邊緣，有的處於權力圈層的邊緣，有的處於職業圈層的邊緣，有的處於年齡圈層的邊緣……有的人身上甚至重疊著兩重或三重邊緣特性。

從家庭出身看，民眾造反組織最初的青年成員，與造反紅衛兵大體相似：多數為備受壓制的非「紅五類」子女和平民「紅五類」子女。由於「文革」特有的公眾性，個人顯在的「戶籍成份」易受認同，所以在這些率先造反者中，又以家庭或個人「檔案成份」屬黑色但「戶籍成份」為紅色或麻色者居多。

「文革」前，非「紅五類」子女身處社會下層，其中的「黑五類」子女以及父母多少有些歷史或現實問題的「麻五類」子女，在本單位無論怎樣掙「政治表現」，也總是與先進、模範、入黨、轉幹、提職無緣而低人一等，政治運動一來往往首當其衝，成為眾目睽睽之下的孤立和打擊對象。他們是校門之外成人世界中的政治邊緣人，在娘胎裏和打上的「階級烙印」，使他們稍不小心就會跌進「階級敵人」的政治深淵。他們不僅實際上被剝奪了普通人那有限的公民權、教育權、發展權，而且連最基本的人生權利——婚姻權，也因深入骨髓的社會歧視而得不到保障。

他們分散於中國社會的各行業各單位，人數原本不很多，但是隨著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掀出的「階級敵人」不斷增加，檔案記錄中有「問題」的家庭和個人也不斷增加，而使人數逐漸增多，加上三親六戚的牽連，實際形成了一個遍及全社會影響廣泛的龐大弱勢群體。

在基層企事業單位，有一批人最引人注目。他們大多個性較有鋒芒，思想較為獨立，對現實有所不滿，對領導不太順從，對官方倡導的各種時髦話題和流行現象往往有與眾不同的見解，或自知在政治上沒有

出路，或對政治攀岩缺乏興趣，轉而夢想走「成名成家」之路出人頭地，實現人生的抱負。他們理所當然成為不得志青年的崇拜對象和領導心目中「思想反動」或「資產階級名利思想嚴重」的「問題人物」。他們之中有自恃才氣的「黑五類」子女，有不服管教的「麻五類」子女，有「頭上長角」的普通「紅五類」子女。全國很多基層單位的造反，便是由他們率先發動的。

無論上海「工總司」的潘國平，還是武漢「鋼工總」的朱鴻霞，無論重慶「反到底」的鄧長春，還是湖南「湘江風雷」的葉冬初，都屬於這類個性比較突出的普通紅色子弟。

例如我所在地區：西昌縣政府幹部冼某，「紅五類」出身，但岳父岳母都是「專政對象」，人生的理想不是入黨當官而是成為一名詩人，已發表不少作品，運動初期被打成「小鄧拓」並定為「四類」，遭受上百次批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率先造反，後任縣造反激進派總部一號頭頭。地區農業局幹部郝某，「黑五類」子女，運動初期因「言論問題」聯繫到家庭出身而挨批鬥，1966年11月最早起來造反，後任地區農業系統造反組織司令和地區造反穩健派總部三號頭頭。地區電影公司放映員曾某，「麻五類」家庭，上高中時因「反動標語」問題被開除學籍，運動初期以「言論問題」批鬥，1966年11月帶頭造反，並任地區文化系統造反穩健派組織司令。西昌星火青年農場小H，「黑五類」子女，酷愛書法藝術，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運動初期被定為「陰謀集團」成員，1966年12月與其兄一起領先造反。西昌縣河西公社知青才某，「黑五類」家庭，上高中時因組織「友誼社」被定為「思想反動」，1966年12月最先造反，並成為當地知青造反組織頭領。鹽源縣國營農場知青雷某，「紅五類」出身，讀初中被定為「思想落後」，高中時被定為「思想反動」，1966年12月為首造反，1968年任農場革委會副主任。

各行各業的「文革」要比學校開始得晚，有的地方還和「四清」運動交叉進行，總體上籠罩於全國自上而下批「反動學術權威」、揪「三家村」、「破四舊」和橫掃「黑五類」的氣氛之中，鬥爭矛頭必然直指群眾。

儘管此時高層並未下達各行各業開展「文革」的具體文件，但各級當權派已經憑著政治忠誠和等級敏感，開始聞黨報黨刊之風而動，並趨首都和省城官辦紅衛兵之步而行。內容大多為依葫蘆畫瓢——層層發動群眾揪「三家村」、「四家店」，批「資產階級反動文藝黑線」；方式自然是沿襲十七年政治運動的套路，依據家庭出身和個人檔案將群眾劃分為依靠、團結、孤立、打擊四大類。這期間「血統論」猖獗一時，我那時所在知青農場的黨支部書記，竟然將首都保皇紅衛兵鼓吹「血統論」的鉛印傳單《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和《譚立夫講話》當作中央文件在大會上宣讀，壓得「黑五類」子女透不過氣來。從受害者角度看，挨整的人分兩種：一種是因給領導提意見或建議而「引火焚身」——可稱主動挨整，一種是因家庭成份或個人檔案有問題而「禍從天降」——可稱為被動挨整。被孤立和打擊的自然是「黑五類」子女和「有政治嫌疑」的青年，成為重點鬥爭對象的，則是其中那些「想成名成家」或「思想反動」而引人注目的「問題人物」。

對這類重點對象是怎樣鬥爭的呢？先發動群眾仿效黨報黨刊批判「三家村」的手法，對其發表過的作品或平時的言論，聯繫家庭出身和檔案材料來斷章摘句無限上綱，張貼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進行批判聲討；然後是抄家，將抄出的私人日記、個人書信、習作手稿如法炮製；接著是隔離審查，自我交待，伴以一次次批鬥大會「觸及靈魂」；最後是定性：或開除，或戴帽，或送捕。

「文革」初期，這種場面在各行各業基層單位很普遍。時間一般在1966年6-12月。

所幸的是這些基層單位的「三家村」、「四家店」成員，大多尚未「定性」便紛紛起來造反了。

這自然是形勢使然。1966年10月之後，造反紅衛兵在全國各地紛紛興起並很快成為社會政治舞臺上的主角。以撤銷工作組、解放「三、四類」、銷毀「黑材料」為內容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逐漸推向全國。各行各業的受害者趁勢而起，有的赴京告狀，有的找造反紅衛兵求援，有的為首成立造反組織，將鬥爭矛頭指向迫害自己的各級當權派和保守派。

他們造反，除了想證明自己比整人者更忠於毛澤東路線，更為了討回被損害的人格尊嚴和被剝奪的人生權利。

他們的勢力擴展很快，特別是經過1967年「二月鎮反」大反復而得到中央文件正式肯定後，造反人員的數量普遍佔到本單位人口的半數以上，幾乎形成一統天下的局面。

在各行各業的造反派中，街道居民造反派是個十分特殊的範疇。

那時的街道居民不像現在這樣泛指常住戶口在城鎮中的所有人員，而是特指那些居住在城鎮但無固定單位和職業、戶口與活動皆由居委會專門管理的人。他們大多解放時便是城鎮居民，經過舊社會而能在城鎮立足，階級成份自然很雜，地主、富農、高利貸者、資本家、工商業主和軍、警、憲、特人員不少；十七年歷次政治運動的深挖，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壞分子不斷從中產生；因社會關係複雜，不少人成份很好但也難免「歷史污點」，使其政治色彩更為斑駁。他們原本有自己的職業，經過「一化三改造」，多數失去工作，少數成為小館小店的監管留用人員。他們的子女走出中小學校門後，除少數有幸進入街道工廠和街道服務業外，多數只能與父母一起成為城市中無單位和無固定職業的「居民」。為了生存，他們有幸成為新中國最早的打工者，到處尋些現在進城農工所從事的那一類最重、最髒、最累但報酬又最低的零活來做。不幸的是，那時這樣的零活極少，他們又享受不到企事業職工特有的公費醫療等等福利，遇到找不到零活或有大病大痛，便只能在生死線上掙扎。每當運動來臨，他們既是政治風潮的最先目睹者，又是政治槍手的首批瞄準對象。無論政治地位還是經濟地位，他們都處於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和市民圈層的最邊緣。1979年以前，全國各地因組織「反革命集團」被槍決被判刑的成千上萬「現行反革命分子」，大多是這個階層中走投無路而又不甘屈服的青年。

所以，在各行各業造反派中，處於市民圈層最邊緣的造反居民最為激進也最具破壞性。例如「成都工人造反兵團」下屬的「街道分團」、我所在城市手工業系統的「井岡山造反兵團」。

在各地的造反派中，下鄉知識青年是一支比較活躍的力量。「文革」前1964、1965、1966年下鄉的知青，大多來自城鎮居民中的「黑五類」

及有「歷史污點」的家庭。例如新疆建設兵團、雲南軍墾農場、廣東國營農場成千上萬的知青。我所在地區新華農場、東坪農場、螺髻山農場、星火農場、鹽源農場的知青，還有上萬名插隊安置的青年，多數屬於這類家庭出身。我所在農場的知青，家庭出身屬「黑五類」和父母有「歷史問題」的就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他們本來就屬於成年人年齡圈層和社會等級圈層的雙重邊緣人群，毛澤東贈予的「知識青年」這個特殊身份又把他們變成了城市居民的邊緣人群和農村居民的邊緣人群。如此重疊於身的艱難處境及其所產生的生存壓力和心理焦慮，使他們在造反中的激進與活躍不容置疑。例如新疆、雲南、廣東的知青不僅參加造反，而且大都屬於造反派中的激進力量。四川省瀘州、自貢、宜賓等城市下到西昌地區的老知青，不僅成立組織參加了當地的造反激進派，而且其代表還進入了當地革委會。

但是在歷時三年的民眾造反運動中，他們的存在具有依附性，很難形成獨立的力量。我所在地區的十多個造反知青組織，曾經於1967年8月聯合成立了與其他地區一級行業系統造反聯合組織並列的「五七兵團」，但只存在了三個月便自行消亡。原因很簡單：知青本來就不成其為一個行業系統，獨立地位從何而來？他們沒有自己獨立的鬥爭物件和政治目標，又找不到主管部門安排掛牌辦公地點並領取活動經費和宣傳用品，其確立獨立地位的願望隨時隨地受到具體而尖銳的質疑，當然難以存活。走上社會舞臺後，只有兩種方式可以讓他們勉強存活：要麼退而列入農民系統的造反隊伍，要麼進而憑著個人才能自費為城裏的造反組織當參謀或搞宣傳。三年造反時期，成都市有一份影響頗大的套色畫報《紅濤》，就是借機回城的知青小H為「成都工人造反兵團」主辦的。我所在城市造反激進派的兩份報紙《兵團戰士》和《金沙江之聲》，主辦者也都是知青。

不能認為知青造反都很激進，其中也有例外：四川省成都市下到邊遠山區的近萬名老知青，絕大多數對爭取在當地的政治權利並不感興趣，他們造反的目的更多是為了爭取返回城市。1966年12月底，他們曾在成都錦江賓館召開大會，成立名為「解放大西南造反兵團」的組織。但目的只是為了敦促西南局當權者派車接載正在路途中艱難跋涉的

各地返城知青，目的達到後便很快解散了。其中牽涉到吃飯問題：凡是拿工資鬧革命的農場知青，既有生活保障，又有單位依託，堅持造反自然沒有顧慮。農村知青卻不然——既無工資又無單位，而且對於小小生產隊的人事糾葛與改朝換代未必感興趣，他們造反的目的當然只能是借機返回城市。

至於1968年以後大規模上山下鄉的新知青，其造反行為便不屬於這個時空範圍了。下鄉前他們都是城裏的學生，無論造反、保守還是逍遙，大都經過大風雨見過大世面，相對於所到之地運動進程慢了半拍甚至更多的造反派而言，稱得上是「過來人」。此時，他們要麼心灰意懶，要麼自動納入體制規範的正軌，除了極少數不甘寂寞或趁火打劫者，他們對當地的造反，往往採取漠不關心或者冷眼旁觀的態度，很少介入。他們的造反只寫在作為城市紅衛兵時的那一冊青春記錄裏。

上交和其他行業1965年「經濟恢復」時來自農村和城鎮的「合同工」、「輪換工」、「臨時工」，主要由下層「紅五類」子女組成。他們屬於城市職業圈層的邊緣人群，其中很多人同時還處於成年人年齡圈層的邊緣。可是單一經濟層面或年齡層面的邊緣處境，並未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造反動力。他們1966年冬季至1967年春季所發動以轉成「正式職工」為目標的造反，也是由身上承受著多重邊緣壓力從而反抗動力更強的非「紅五類」子女一手策動和組織的。1966年11月8日成立於北京並以國家勞動部大樓為掛牌辦公地址的「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聯合總團」，其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是來自貴州省長期遭受等級歧視而不滿現實並伺機反抗的黑色子弟方圓、李伯特。二人自幼相識，父輩都是國民黨軍隊將領且被中共關押，所以從小就在中共一黨專政的重壓下長大。他們及其周圍的一批青年人，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或屬平民子弟，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父母長輩和親戚被中共「關、管、殺」。這一年，方圓17歲，李伯特19歲。按理說，這個人群中非「紅五類」子女人數較少，加之長期習慣夾著尾巴做人，他們絕不敢冒然站出來做帶頭羊；何況造反的目的不是爭取受壓制受迫害群體的政治權利，而是為了來自農村和城鎮所有人員的共同經濟利益——「轉正」，根本用不著非「紅五類」子女策動。可是事情往往就是這樣出人意外：紅色子女只成為掛名的負責

人和大批的追隨者，真正的靈魂式人物還是黑色子女。這表明在中國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單純的經濟動機並不足以激起人們的造反，造反的動力除了經濟利益，還必須包括黑色子女們內心隱藏的那種反抗等級歧視和政治迫害的人性需要。只是黑色子女的這種造反還得有一個條件：必須遠離自己工作的單位和生活的地方，不讓世人知道自己的真實出身。

當我說民眾造反派的發起人、組織者和筆桿子，主要是那些「檔案成份」屬於黑色但「戶籍成份」又是紅色或麻色的子女，主要指的是青年人聚集的場所——這些地方不能不以家庭成份來劃定一個人的優劣。在各行各業更多的單位，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造反的帶頭者還來自成份圈層之外權力圈層、政治圈層、職業圈層和其他等級性社會圈層的邊緣人群。

工人造反派是市民造反運動中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其重要性首先來自兩個方面：毛澤東的「文革」理念和工人的突出地位。

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碼詞就是廣大工人所屬的「無產階級」。作為一個自詡為「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成」的政黨之領袖，黨內從基層到領導層一直是農民身份的成員佔絕對優勢這個事實，曾經是毛澤東的一個心病。無論對照馬、恩、列、斯的正統理論，還是比較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階級性質，中共及其革命都顯得很不正宗。這也是中共建政之初史達林拒絕承認其為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理由。從理論到實踐的「無產階級化」，便成為毛澤東後半生左傾思路的唯一軌跡。不僅「文革」的理念是這個走向的加速和放大，在實際看待各種社會群體時他對工人階級也特別重視。工人造反派的重要性，除了最高領袖及其政黨名義和制度名稱神聖光環的照耀，自身在市民中的特殊地位也是一個重要依據。在中國這個農民如同汪洋大海一樣的國家，他們是新興產業和現代方向的代表；不僅政治名聲是領導階級，而且人員最集中、人數最龐大、成份最純正、收入最穩定、行動最整齊。難怪體制外經濟學家何清漣認為在中國社會還沒有中產階級的時候，他們的實際地位和實際作用相當於中產階級。事實上，毛澤東在「文革」中也確實把工人造反派當作社會中堅力量來對待。

「文革」爆發前中國工人階級的成份並不是毛澤東想像的那麼純正。

雖然成千上萬工礦企業的情況千差萬別，但仍然不難認出這個群體的幾大構成部分：一是從國民黨時代過來的老工人，他們人數不多，技術較高，多少有點「歷史問題」，主要從事生產一線的技術工作；二是1950-1958年期間參加工作的城鎮居民，家庭成份較雜，此時已人到中年，主要從事供銷、後勤之類的工作；三是1958年「大躍進」和1965年「經濟恢復」時參加工作的農民子弟，人數眾多，以貧下中農子女為主，而1965年的這批人多數是「合同工」、「輪換工」、「臨時工」，主要從事生產一線的體力活；四是歷年來脫下軍裝的轉業軍人，主要從事一般保衛、保管、核算一類「以工代幹」性質的工作；五是十七年間從學校分配來的大中專畢業生，家庭出身顏色較雜，主要從事技術管理工作；六是「困難時期」精簡壓縮和關、停、並、轉從機關、學校、事業單位下來的各種人員，其中不少人犯過政治、思想、經濟、生活作風之類的「錯誤」，大多從事科室車間的一般管理工作。工廠領導層，除個別鄉土「工農幹部」外，主要由「南下北上」的老資格「革命幹部」擔任。

工廠裏的矛盾糾葛就產生於這些人群的各種組合關係中。除了表現在全廠範圍——廠部當權派與職工群眾之間這個層面的矛盾，還有表現於較小範圍的權力層面、政治層面、出身層面、職業層面、技術層面……的各種矛盾。每種關係層面都有一個社會圈層，由其特定的中心與邊緣關係構成。觸發工人造反事件的因素很多，甚至同鄉、同行、同學、師徒、親戚、上下級關係以及平時積累的個人恩怨，都可能在其中起某種作用。但主要的觸發點還是要在六種關係層面中去尋找。廠部當權派與職工之間的矛盾客觀存在，工廠保守派與造反派的劃分就是在這個層面展開；但它過於寬泛，尚未緊張到足以直接觸發造反的地步。技術圈層的矛盾更不可能觸發造反，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技術並不涉及人與人之間的利害關係。成份圈層的矛盾倒是比較緊張，但工人階級的純正之名仍然使「黑五類」子女和有「歷史問題」的人不敢在工廠領頭鬧事。儘管「文革」之初黨委領導運動時，首先挨整的往往是這些家庭出身不好、自身有「歷史問題」、平時思想言論有嫌疑的人，但他們還不具備自己解放自己的膽量。工廠裏最先起來造反的，往往是處於權力圈層、政治圈層、職業圈層的邊緣人群。他們大多是貧下中農子女中較

有個性的小魅力型人物或較有文化的小知識份子，以及一些轉業軍人。這些人，要麼長期在幹部與工人之間處於不上不下的境地而很不得志；要麼是黨員、團員、積極分子政治紅人圈子之外「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嚴重」的灰色分子；要麼身上一直打有比正式工人矮一截的臨時性質印記。在各自所處的圈層裏關係緊張之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1966年10月之後的民眾造反，正好給他們提供了發洩的機會。黨委領導運動時，他們或者偶然挨整或者並未挨整。機會一來，他們便抱著各自的目的向工廠當權者發難。非固定工性質的貧下中農子女造反，主要是為了獲得和正式工人同等的待遇。雖然其全國性造反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聯合總團」的發起人是黑色子女，但在具體的單位，其造反組織的發起人卻不能不是紅色子弟。紅色出身的灰色人員造反，是為了證明自己才是真正與出身相一致的紅色分子。其中的轉業軍人造反尤其特色——他們帶頭造反主要為了能夠進入權力中心。這批人都是紅色出身，軍旅生涯更使他們開闊了眼界增強了自信，可是工廠並沒有讓他們擔負重任，他們不僅長期徘徊在權力的邊緣，而且一直背負著非工非幹的尷尬身份。相對於工人隊伍的大多數人，他們在出身、身份、處境、閱歷、見識、文化、能力等方面都擁有優勢，一旦帶頭造反勢必有很強的號召力。湖南「工聯」的胡勇、上海「工總司」的潘國平和王洪文，都屬於這類轉業軍人。我後來工作的單位，當初帶頭造反的也是轉業軍人。

這些人帶頭造反也是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契機。他們解放被工廠當權派打成「反革命」、「右派」、「三、四類」的雜色群眾，並把這些人吸收進造反組織作為文化資源；他們發動群眾揭發批判工廠當權派壓制和迫害工人的各種罪行——尤其是「困難時期」背著廣大工人的貪污腐化行徑，以獲得群眾的支持。我後來工作的工廠有一個廠長Y，1967年造反組織揭發他「三年困難時期」大酒大肉，卻下令將一個偷吃了一包玉米的工人吊打致殘，激起工人極大的憤怒。工廠裏那些敢於造反的黑色子女和嫌疑人員則庇護在造反組織的大旗下。憑著「工人階級」的響亮名頭，這些工人造反組織的負責人進入本系統和本地區的造反派大聯盟後，不僅大多擔任了聯合總部的負責人，還作為一派造反組織主要代表跨入各級革委會擔任要職。

中共「九大」，進入中央委員會可以確認的造反派代表14人，工人佔了9個，比例達百分之六十八強。甚至在造反派退出政治舞臺多年後召開的中共「十大」上，工人造反派代表王洪文還當上副主席？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革委會成立之時，除了貴州、黑龍江、山西、北京、江蘇、浙江、甘肅、寧夏、雲南、西藏，其他十九個省份群眾組織進入革委會擔任副主任職務的首席代表幾乎都是工人；常委以上群眾代表中工人也佔了半數以上。我所在地區革委會，造反派代表8人擔任常委，其中工人6人，佔百分之七十五；4個副主任中有3個是工人，也佔百分之七十五。

各級黨政機關幹部的造反，很少是非「紅五類」子女帶頭。因為這些地方原本就很少讓非「紅五類」子女涉足，即使有個別幸運者，也是靠著當權者的特殊保護才側身進入的，他們對當權派死跟緊貼尚嫌不夠，豈敢反目造反？幹部中的率先造反者，實為因「歷史污點」而多受審查者，因恃才傲物而備受壓抑者，因個性倔強而難得重用者，因宗派糾葛而遭到排擠者、因得罪領導而自感危機者、因心懷積怨而伺機報復者……他們大多「紅五類」出身，但屬於機關權力圈層的邊緣人群。他們在機關的處境，如同普通工農子女和其他平民子女在大學裏的處境一樣：平時受歧視遭壓抑，「文革」伊始又被劃為「三、四類」，成為批判鬥爭對象。他們的造反至關重要。不僅因為具有較高文化素養和較強組織能力，還由於他們熟悉權力機關的內情——可以揭發當權派的問題。各級當權派的很多問題——無論屬於「五十天」迫害群眾的，還是屬於「十七年」享樂腐化的，大都為他們所揭發。所以不少地方革委會成立時，他們所發動的黨政機關造反派獲得了重要職位。例如：上海「市級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負責人徐景賢擔任了市革委會副主任和中共中央委員；四川省級機關造反派「省紅聯」的負責人黎光隆、韓淮登、瞿明芳擔任了省革委常委；湖南省級機關造反派「永向東」負責人尚春仁擔任了省革委常委；浙江「省級機關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負責人孫宏興也擔任了省革委常委。在有的省份他們則以一派負責人的身份進入革委會擔任職務。例如：雲南省工交政治部主任張克、省交通廳副廳長劉鑫、省民政廳處長李一鳴代表「八二三」派擔任省革委常委，省經

委副主任張思璞代表「炮轟」派擔任省革委常委；甘肅省一般幹部張裕民和共青團蘭州市委書記蕭澤民，皆以「紅三司」主要負責人的身份擔任省革委副主任。我所在城市地級機關造反組織「七一司令部」和縣級機關造反組織「魯迅精神戰鬥團」的頭頭，雖然由於對立派反對最終未能進入革委會，但也長期擔任地縣兩級各行業造反派「聯合總部」的一、二把手。

幹部造反派中有一個特別的人群，他們由「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受迫害的老幹部組成，也屬於權力圈層的邊緣人群。參加造反的時間比普通民眾稍晚——大多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平反「五十天」受迫害案子的後期。由於自己的問題涉及的政治運動屬於「十七年」範疇，比較容易犯忌，他們就把這些舊賬算在眼下正被打倒的當權派身上進行揭發，並依靠造反派來翻案。例如四川省受迫害老紅軍、老八路、老地下黨員成立名為所謂「三老會」的造反組織，我所在城市受迫害老幹部成立的造反組織「赤膽忠心聯絡站」。除了極個別例外，他們的翻案目的在「文革」中自然不可能實現，而是一次次遭到鎮壓，1971年推至高潮的「清查五一六」運動更將他們稱為「三老會」而列為鬥爭的重點之一。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後，他們有一段悲喜交替的經歷：華國鋒領導的「揭、批、查」讓他們多少受到驚嚇，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使他們獲得徹底翻案。

農村青年的造反不可能由「黑五類」子女發動。因為農村是貧下中農的汪洋大海，從解放直到「文革」，「黑五類」子女稍有異動便會墜入滅頂之災。廣大貧下中農對他們的政策歷來是：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據我所知，農村造反不少是處於生產隊權力圈層邊緣的「紅五類」子女和處於階級陣營邊緣的「麻五類」子女帶的頭，而且在絕不允許撼動的「階級路線」面前，可以納入造反範疇的實際內容很少。「文革」時的造反主要是在城市民眾中進行，除了邊遠小縣、區鄉一級和大中城市的郊區，農民造反派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不大。雖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期和「二月鎮發」時期，曾經出現過又一幅「農村包圍城市」的景象，那只是農村保守派對城市造反派僅有的兩次圍攻，而且在全國大多數省份1967年5月就基本退潮了。這之後在造反派佔優勢的

省份，不僅農民保守派完全退出了歷史舞臺，農民造反派即使在革委會佔有名額，一直也只是扮演城市造反派的配角。其中原因，除了居住分散、文化素質低，主要還是吃飯問題：市民們人都拿著工資鬧革命，農民卻必須不誤農時出工種地掙工分過日。

文藝團體的情況更為特殊。這裏是毛澤東「文革」前就指責過的「封、資、修」的重災區，又是「文革」第一階段黨委領導下整治「資產階級反動文藝黑線」的重點。裏面聚集著大批從舊社會過來的中老年藝人和陸續從專業學校畢業分配來的年輕演員。年輕人大多出身「黑五類」家庭，但家庭黑自身不黑。中老年藝人則相反：即使出身不錯，也大多有這樣那樣的「歷史問題」。運動之初，單位當權者往往依靠單純的年輕人來整複雜的中老年人。於是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形成這樣的局面：受迫害的中老年人成了造反者，而整人的年輕人成了保守派。在這裏，「家庭出身問題」明顯讓位於「個人歷史問題」。雖然年輕人很快也成了造反派，但與中老年人的對立一直沒能消除。全國多數城市文藝團體的正宗造反派大多由運動初期受迫害的人組成。我所在城市三個劇團的情況也屬此例。

軍內造反派是造反運動中最為特殊的一翼。明知軍隊已是自己打倒政敵和穩定政權的唯一組織化力量，毛澤東為何還要支持軍內造反？這要歸因於他發動這個運動時旗幟上寫著的主旨：「文化大革命」。軍隊也和地方一樣有自己的文化部門和大中專院校，地方開展文化的革命，軍隊能不開展嗎？相對於地方，軍內造反派有幾個特點：一是運動只限於在軍級以上所屬的文化單位和大中專院校開展，所以只有省會以上城市才見得著他們的身影；二是他們百分之百是紅色出身，絕無雜色相摻；三是由於軍隊與地方的界限，他們不可能參與地方的奪權；四是他們的興起雖然與地方大中學校造反紅衛兵幾乎同步，但淡出造反舞臺的時間較早——大約1967年8月毛澤東突然禁止「揪軍內一小撮」之後，就很少看見他們活躍的身影了。1968年9月2日，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工人進軍事院校及尚未聯合起來的軍事院校實行軍管的通知》，徹底宣告了軍事院校造反運動的終結。他們的造反，除了響應最高領袖的號召，也和多數人的邊緣處境有關。處於成年人年齡圈層的

邊緣為其一，處於軍內等級圈層的邊緣為其二，處於青年人社會生活圈層的邊緣為其三。像成年人一樣擔負責任和擁有權利、像自由人一樣沒有紀律約束和等級限制、像正常人一樣融入社會和享受生活，無疑是他們強烈的願望。1966年10月——1967年7月，是他們最活躍的時期，這個時期的開端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結尾是武漢「七二〇」事件。他們最著名的組織是首都「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哈軍工「紅色造反團」。鑒於他們對於民眾造反具有的特殊意義，把他們比喻為造反運動中璀璨的流星毫不為過。幾十年來，海內外關於造反派的研究文字對他們很少提及，實屬不應有的疏漏。

現在都知道造反派之所以能有三年得勢的歷史，全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否定「二月鎮反」時的兩次平反及其帶來的政治肯定，殊不知這兩件大事都是流星一樣身影的軍內造反派以火星一樣的精神引燃的。1966年10月5日，以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名義頒發的《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第一次明確指出：「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或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佈一律無效，給予平反，當眾恢復名譽」。「黑材料要當眾銷毀」。這個文件本來就是針對後來成為軍內造反派的軍隊院校受迫害者頒發的，當中共中央批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並要全國「堅決貫徹執行」之後，立即賦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涉及民眾實際利益的內涵，掀起了全國性的平反、銷毀黑材料、批判工作組和當權派的民眾造反高潮，對三年造反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數月後許多省份發生的「二月鎮反」，更是他們直接引發的。例如：1967年1月26日，福州醫學院造反組織「東方紅」、福州軍區衛生系統造反派為軍內造反派受壓之事強行求見韓先楚，在軍區大院發生衝突，從而遭到鎮壓。同年2月6-8日，廣州軍區逮捕軍內造反派，軍內「千鈞棒」等造反組織在軍區司令部舉行抗議活動，中大「紅旗」等地方造反組織為此靜坐示威並衝擊軍區，導致軍隊鎮壓。同年2月11日，成都軍區逮捕空字028、軍區機關「紅旗」和「千鈞棒」、戰旗文工團「紅色造反團」等造反派數十人，引起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包圍軍區並靜坐抗議，最

終導致中央軍委於2月17日發出《二一七公開信》而遭致鎮壓。武漢造反派與軍隊的衝突以及3月份遭受的鎮壓，也起因於軍內造反派對地方造反派的支持和軍區對他們的暴力干涉。各地「二月鎮反」時最先遭到鎮壓的幾乎都是軍內造反派。4-5月間中央逐省解決「二月鎮反」問題並確認造反派和籌建革委會時，他們的代表都出席了會議，但最終沒有進入各省革委會。仔細查看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常委以上成員名單，只有一個例外：屬於四川「八二六」派的成都軍區總醫院造反組織「紅色造反者總團」負責人王陰均曾擔任四川省革委會常委。至於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的毛遠新從黑龍江跑到遼寧當上省革委會副主任，完全是因為擁有毛澤東的親緣背景，不在此例。

不能說全國所有地方所有行業所有單位的造反行為都是置身於多重邊緣處境的「黑五類」和「麻五類」子女引發的，但全國許多地方許多行業許多單位最早的造反者，的確是隱在類型的黑色和麻色子女。而且，他們以批判「血統論」和銷毀「黑材料」為契機採取的造反行動，確實為長期處於社會等級結構壓制之下又在「文革」初期遭受政治迫害的其他邊緣人群，提供了政治解放的現實轉機，並從社會心理層面暫時打破了維持十七年之久的社會等級歧視。

當然，社會心理層面等級歧視的暫時打破不等於永久打破，更不等於極權體制推行了數十年的「階級路線」真正改變。非「紅五類」子女雖然通過造反而暫時解放了自己，但他們明白這個現實，深感底氣不足。在存在保守派之時，保守派藉以攻擊造反派的最大口實便是「階級成份不純」。在保守派被瓦解、造反派又分裂為兩大派別後，兩派互相攻擊對方的政治口實之一同樣是「階級成份不純」。面對如此形勢，非「紅五類」子女只好退而讓賢：有的從台前退到幕後，有的自願改任二、三把手，有的則退出「勤務組」，僅以一般成員的身份參與決策，有的乾脆宣佈退出造反組織，以逍遙派的名義站在造反派一邊。特別是1967年「二月鎮反」後，這更成了勢在必行的自覺行為。因為「二月鎮反」中被軍隊和公檢法抓捕的造反派成員，絕大多數是「黑五類」子女，造反派被取締的原因之一也在於此。這表明：猖獗一時的「血統論」雖然暫時銷聲匿跡，但黨的「階級路線」絕不會改變。非「紅五類」子女的

退避，既是為了派別的集體利益，也包含著免使自己成為對立派攻擊目標的個人考慮。

徐友漁在《我的造反生涯》中寫到的幾位高中生，基本屬於這種情形：

L 系學校造反紅衛兵組織「紅旗野戰兵團」的發起人之一。後來可能因為家庭出身問題不宜作負責人而辭去勤務組的職務，但仍然保持在該組織的元老地位。

C 在同學中很有威望，周圍有一大批人與他要好，但從不謀求勤務員職務，雖然對於兵團有很大的發言權，屬於組織中的「實力人物」。之所以不願「頭露面當正式頭頭」，可能因為家庭出身不允許或者性格原因。

X 家庭出身不好，因為嚴於律己和寬於待人的作風，深受同學擁戴，幾次推拒之後迫不得已當上了學校最大造反組織的頭頭。

M 也是因為家庭出身問題不願當頭頭，但後來還是在另一中學成了造反組織的負責人。⁴⁴

事實上，這個時期凡是存在兩派對立的地方，無論是出於戰友情誼還是派別利益考慮，造反派中的黑色子女實際上受到保護。當時有一種說法：「親不親，路線分」。所謂路線其實就是派性。派別利益形成的共同聯繫，的確一度淡化了十七年來推行的「階級路線」。記得 1968 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人民日報》轉載上海《文匯報》的一篇社論——〈論派性的反動性〉曾說「派性掩護階級敵人」，指的正是這種情況。

我親歷過這樣一件事：1969 年 3 月，我所在地區造反派兩大派再次爆發大規模武鬥。在造反激進派的戰前佈置會上，總頭目特別強調：別讓出身不好的人上前線，以免被對立派抓住把柄說不清楚。這種變相的保護不是個別現象。

1968 年 8 月，我所在地區造反激進派為了從政治上打擊對立派，不惜抓住對方已經辭職的原總部一把手 X 的家庭出身和歷史問題大做文章。在軍分區的支持下，他們到勞改監獄提訊 X 過去的同學，千方百計誘使其提供 X 曾經參加袍哥和參與土匪叛亂的證據。隨後在整理上報四川省革委的材料時，又將證詞中所有「大概」、「可能」、「好像」之

類的關鍵性字眼一概刪掉。終於騙得看了這份材料的成都軍區司令員兼省革委第二副主任梁興初在接見兩派時輕率表態說「X 是個歷史反革命」。儘管如此，X 所屬的造反穩健派出於派別利益考慮仍然對其實行保護，使得支持造反激進派的軍分區也無可奈何。同樣，穩健派也在大整對立派有家庭問題和歷史問題人員的「黑名單」，或張貼或廣播或上報；但激進派對所涉及的成員也是採取各種方式進行保護，從不落井下石。

這雖然說明在「階級鬥爭」觀念的鋼性律條下造反派的不地道，同時也表明在派別利益的大傘下黑色子女實際受到保護的狀況。

第二節 造反派的分裂

1967 年「二月鎮反」被否定後，全國多數地方，保守派普遍瓦解，造反派成為社會政治的主流。與此同時，造反派正式分裂為穩健和激進兩大派。

如徐友漁指出的：

北京的天派與地派、四三派與四四派；山西的「紅總」和「紅旗」；河南的「二七公社」和「造總」；河北的「大聯指」和「狂人公社」；湖南的「長沙高司」與「湘江風雷」、「省無聯」；雲南的「八二三」和「炮兵團」；成都的「紅成」和「八二六」；重慶的「八一五」和「反到底」等等。只有廣東、廣西、遼寧、江西、新疆、內蒙、西藏等幾個地方，保守派和造反派的鬥爭貫穿始終，直到雙方共進革委會。⁴⁵

一個省造反派分裂為兩大派，主要是省會城市的情況，而非全省各地的造反派都整齊劃一地分為兩大派。例如四川省造反派分裂為兩大派的地方，主要只限于成都、重慶兩個人城市和達縣、涪陵、雅安、西昌等少數地區；樂山、自貢、宜賓、內江、萬縣、綿陽、甘孜、阿壩、涼山、攀枝花等地州市，一直只有「八二六」和「反到底」一派；南充、瀘州、江津三地市屬造反派與保守派長期對立。成都「紅成」派和重慶「八一五」派因為 1967 年「二月鎮反」時扮演了尷尬的角色，在以「二月鎮反」受害者為主體的地區一級造反派中勢力很小。

造反派分裂後所進行的武鬥，無疑是造反派歷史上最黑暗最荒唐的

篇章。我所在地區造反派兩大派的武鬥，從1967年12月30日開始，到1969年5月26日正式結束，歷時一年零五個月。武鬥中，各支一派的隊伍，不僅將槍支彈藥明搶暗送給兩派群眾組織，甚至親自出面參與策劃和指揮武鬥。武鬥最瘋狂時，兩派擁有的常備持槍參戰人員竟達2000多人。據武鬥結束後的不完全統計，兩派死於非命者達1200多人，傷殘超過此數，誤死誤傷無辜者100多人。至於生產設備、生活設施的毀壞和停工、停產造成的經濟損失，那就只能用難以數計來形容了。

如果說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對立和武鬥，是不同等級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難以調和、尖銳衝突的必然結果，造反派內部分裂和衝突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造反派分裂為兩派，自然不是在「解放革命領導幹部」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造成的。

事實上在大多數地方，提出「保」哪一位領導幹部並尖銳對立，是造反派分裂為兩派後必然發生的事。例如四川的「紅成」和「八二六」在「劉、張」問題上的打與保。在造反派如日中天的時候，保哪一位領導幹部，更多是兩派出於派別利益需要採取的一種手段，領導幹部不僅不可能成為兩派分裂的導火索，反而往往成為兩派鬥爭的犧牲品。我所在地區的原地委第一書記楊新，曾是華國鋒任遊擊大隊政委時的搭擋，1965年從中央某部臨時下放到地方支援工作。他生活儉樸、作風正派，工作扎實，深受幹部群眾好評，因「文革」爆發而滯留地方。1967年底，造反派中的激進派準備「解放」他，不料穩健派搶先一步貼出了「解放」他的聲明。從此，他變成了激進派攻擊穩健派的政治口實，也變成了激進派批鬥「走資派」的頭號物件，不僅未能進入地區革委會，反而盡了迫害和凌辱，最後病死北京。政治不擇手段，造反派也學會了此道。

「支左」部隊各支一派，同樣不是造反派分裂為兩派的原因。

1967年1月軍隊介入地方「支左」，開始時大多數都是支持保守派，僅在少數地方有的支持保守派、有的支持造反派。只是在1967年4月以後，隨著「二月鎮反」被否定、保守派被瓦解、造反派成為政治主流，逐步分裂為兩派，很多地方的軍隊才轉而各自支援一派造反組織。軍隊支持造反派中的哪一派，往往基於某種情感契機。在四川，54軍支持

「紅成」和「八一五」，是因為「二月鎮反」整了「八二六」和「反到底」——與之結了怨，50軍支持「八二六」與「反到底」，是因為54軍已經支持了另一派。我所在地區的軍分區之所以支持從老造反派中分裂出來的造反激進派，是因為「二月鎮反」時整了老造反派與之交惡在先，鐵道兵之所以支持老造反派，是因為軍分區已經支持了造反激進派。不同的選擇，除了情感上的親疏，自然不排除軍隊之間在物件認知及權力關係上的對立。這種對立不是造反派分裂為兩派的原因，但對兩派由文鬥升級為武鬥，的確起到了無法否認的推動作用。

造反派內部分裂的原因，主要是下層等級中人們相對差別的社會地位所產生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的分歧。

從中共建政到「文革」時，中國社會是一種金字塔式的結構，其中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只由上層等級和下層等級兩大部分構成。如同上層等級又由若干層次構成，下層等級所包括的人群，也實際存在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的亞等級層次差別。政治方面的差別，由人們以「戶籍成份」和「檔案成份」為標準的紅色、麻色、黑色三個層次構成，又以紅色成份者地位更高而以黑色成份者地位最低。經濟方面的差別，由人們不同的職業狀況、經濟收入、福利保障等綜合狀況構成，在業與無業，政府機關、事業、企業，國營與公私合營，城內工作與野外作業，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小型企業，中央屬、省屬、地屬、縣屬單位，都成為這方面亞等級差別的依據。在這個社會等級中，造反民眾不同的亞等級政治地位和亞等級經濟地位，形成他們亞等級社會地位的差別。

「黑五類家庭」只是這個社會等級中政治方面底層人群的統稱，它所包括的黑色家庭，又因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的具體差異而有區別。政治上：地位最低的是「現行反革命」和「歷史反革命」，其次是「壞分子」和「變節分子」，然後是「地主」和「富農」，最後才是「資本家」和「右派」，其中又以有人被關押、管制、槍斃的所謂「關、管、殺」家庭處境最險惡。經濟上：其中的專家、學者、教授、藝術家、作家地位最高，其中的普通醫生、教師、幹部、藝員、職員、工人次之，地位最低的是其中無業的居民和種地的農民。這兩方面綜合形成的黑色家庭

社會地位的差別，自然會給子女對現實的心理感受和政治態度打上明顯不同的烙印。

例如：有兩位朋友，一位的父親原是中共地下黨員，後查出是「叛徒」，留在某大學教授職位上接受軟性「專政」；一位的父親原是國民黨軍官，後起義成為「革命軍人」，轉業後擔任某單位中層領導。兩位元朋友參加的造反紅衛兵組織都屬穩健派。另兩位朋友，一位父親為「歷史反革命」，一位父親為「現行反革命」，都在獄中服刑，母親又都是無職業的居民，兩人都先後加入了造反派中的激進派。

這個對比未必具有普遍性，卻十分典型。它讓我感到個人的家庭出身及其實際社會地位，與他們的現實政治態度似乎有著某種隱蔽的因果關係。

造反派內部的穩健派與激進派，往往由此形成。

造反派中的穩健派大多由下層等級中所屬社會層次更為靠上的人群組成，激進派則大多由下層等級中所屬社會層次更為靠下的人群組成。兩派的造反主張因此略有不同。從湖南「湘江風雷」與「長沙高司」、河北「狂人公社」與「大聯指」、四川「八二六」與「紅成」的主要構成來看，也是激進派成員的社會地位相對偏下，所以造反主張更為極端，穩健派成員的社會地位相對偏上，所以造反主張略為溫和。

造反派內部的分裂和對抗，除了亞等級社會利益的衝突和各種現實因素外，還包括國民劣根性中的惡性弱點——包括傳統文化心理中的「窩裏鬥」習性和十七年來所接受毛澤東「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鬥爭哲學。

造反派分裂的直接導因要複雜得多。有的地方是奪權問題上的矛盾，有的地方是幹部問題上的爭議，有的地方是具體行動方式上的分歧，有的地方是「二月鎮反」時的不同遭遇。比如四川造反派分成兩大派：開始是1966年11月13日批判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大會的分歧，後來是「二月鎮反」時軍隊抓「八二六」派的人更多，「紅成」派無意中扮演了幸災樂禍甚至趁火打劫的角色。

我所在地區造反派分裂的直接導因淺顯而深刻：1967年10月之前，造反總部的一、二把手都是地委機關最早起來造反的兩位中層領導幹部。在首都「三司」和成都「八二六」串聯紅衛兵的鼓動下，一些工

交企業的造反組織提出一、二把手必須由工人擔任，其他行業更多的造反組織卻堅持認為地委中層領導幹部也可以擔任此職。於是以此為導火線在1967年10月25日正式分裂為兩大派。後來還爆發了歷時一年多震驚全國的大規模武鬥。

造反派分裂為兩大派的直接導因，顯然是由其亞等級社會地位差異這個原因派生出的亞等級利益的衝突和分離。

關於兩派的「一系列對立」，徐友漁歸納出八種：

第一是意識形態的分歧。激進派認為共產黨內已形成一個掌權的「紅色資本家階級」，階級關係已發生大變動，應以造反派為新的依靠力量來重組階級關係，並徹底改造已經變質的政權和軍隊；穩健派則認為十七年來階級陣線基本穩定，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成員依然歸屬個人原來所在的階級，混入黨內的「走資派」並未形成一個特權階級，共產黨、政權機構和軍隊仍然是無產階級性質，「黑五類」和「資產階級」依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物件。

第二是組織成份存在差異。兩派對於「階級路線」的重視和強調不同：激進派更強調運動中的路線站隊和造反表現，穩健派比較看重家庭出身和階級成份。兩派的人員構成因此而有差異：激進派隊伍成份比較雜，穩健派隊伍成份比較純。

第三是對當權派的估計和鬥爭程度不同。激進派認為領導幹部大多數已經變質，應該打倒；穩健派卻認為領導幹部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打倒的只是少數。

第四是對軍隊的態度不同。激動派普遍衝擊當地軍區，「二月鎮反」被軍隊鎮壓，對揪「軍內一小撮」十分積極；穩健派未參與衝擊軍區，「二月鎮反」未受鎮壓，對揪「軍內一小撮」比較消極。

第五是左傾和右傾的區別。激進派喜歡「天下大亂」，鼓吹「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認為左比右好；穩健派對形勢的認識比較冷靜，傾向於穩步推進，反對極端和過左。

第六是對「毛主席戰略部署」的理解不同。激進派認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的目標一路冒進，對毛澤東不要將矛頭指向軍隊、不要對當權派一概打倒、不許搶槍和搞武鬥、要克服派性實現大聯合等階段性部署，往往採取政治實用主義而自搞一套；穩健派則對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亦步亦趨，從不敢自售私貨。

第七是對於「解放幹部」的標準不同。激進派認為文革前十七年和運動初期「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白色恐怖」時受迫害的幹部才是真正的革命者；穩健派則認為十七年受害未必都是好幹部，五十天站錯隊的也可以依靠。

第八是對周恩來的態度不同。激進派一直存在打周傾向；穩健派則和周心有靈犀。46

據我所知，在海內外的「文革」研究者中，將保守派解體後造反派兩大派的鬥爭，視為「文革中群眾運動的主線」來系統研究的，徐友漁是第一人。他對全國範圍造反激進派和造反穩健派的分佈、成因、特徵、對立因素的論述，不僅完全符合歷史真實，而且分析也非常到位。其《形形色色的造反》一書對這個問題的重點闡釋，堪稱這個方面的經典文本。是的，三年群眾運動，在全國的大多數省份和運動的大多數時候，造反派兩大派的對立和鬥爭確實是運動的主線。我們不能為了滿足「社會衝突論」的立論需要，就只看到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對立和鬥爭，而完全忽視造反派兩大派的對立和鬥爭這個更顯著的歷史事實。其實，這種對立和鬥爭並非與「社會衝突」完全無關。法國大革命不是越到後來鬥爭越是在第三等級中的激進派與穩健派之間展開嗎？只不過要認清造反派兩派的鬥爭與「社會衝突」的關係，還需要冷靜思索和深入理解。

徐友漁書中對此已有簡要論述：

與劉少奇、各級當權派和保守派力圖維護當時現狀的態度相反，整個造反派是要改變現存狀態的。但穩健派只是從「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這一角度理解文革，支持文革派改變上層權力結構的現狀，所以他們也打「走資派」，但不允許社會下層的階級陣線「大翻個兒」。激進派既要改變上層現狀，又要改變下層現狀，他們對毛澤東的某些許諾信以為真，試圖徹底實現毛澤東所暗示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文革綱領。因此，激

進派和穩健派在打「走資派」上是一致的，一旦涉及到對中國社會的徹底變革，兩派就分道揚鑣了。47

分裂與武鬥無疑是造反派由盛而衰的歷史轉折。如果說分裂曾使造反派有可能吸納廣大保守派群眾加入自己的隊伍，那麼武鬥的結局則使造反派失去人心。昔日的造反者們應該在成千上萬死者的墳墓前久久默哀並深深懺悔。這是他們真正應該承擔罪責並進行懺悔的事。

美國「文革」研究學者劉國凱認為：「六七年夏季的大武鬥，少數地方春末業已發生，有些地方則延至初秋。儘管時間先後不同，但有一樣是相同的，那就是各省市的武鬥皆由保守組織挑起，造反派猝不及防，傷亡慘重，然後倉促應戰。武鬥全面展開後，多數的武鬥『戰役』也是保守派發動的。」48 如果所指僅為保守派與造反派長期對峙的省份，則能夠成立。如果泛指全國，此說就難以立足了。因為從1967年後半年到1969年前半年，全國多數地方只存在分裂為兩大派的造反派，那曠日持久和異常慘烈的武鬥都是在造反派之間進行，武鬥的發動者無論是激進派還是穩健派，最終都是造反派，與已經不復存在的保守派並無關係。承認這個事實並不等於宣判造反派的死刑，完全沒有必要迴避甚至辯解。

造反派兩大派的武鬥還造成了一種後果：讓一些轉業軍人和生性殘忍之徒進入了造反派的領導層。這些人大多「紅五類」出身，不少是黨團員，過去曾是保守派組織的骨幹分子，倒戈加入造反派時原本無足輕重，但是武鬥給他們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機會。因為成份與身份都好，加上既懂軍事又亡命，很快就以「武鬥司令」的名義躋身造反派領導層。要是沒有這批人的作用，全國各地的武鬥大概不會那麼慘烈。造反派中的黑色和麻色子女，大多良知未泯又有後顧之憂，絕不敢如此膽大妄為。只有這批人才有得起這種膽色。

徐友漁在〈我親歷過的武鬥〉一文中寫到的某中學「武鬥司令」Y，大概就屬於這種人：Y初中時學習和其他方面很一般。快到高中畢業似乎一下子從冬眠中醒來，在政治上有一連串驚人表演。依仗家庭出身貧農，突然入了團，從此在各種活動中十分活躍。文革開始時，成為該校「血統論」紅衛兵的骨幹分子，鬥爭「黑幫」最為積極，擔任「勞改隊」隊長，每天揮舞著棍棒或皮鞭毆打進入「勞改隊」的幹部和教師，隨時

可以聽到他聲嘶力竭地喝斥所管轄的那二十幾個犯人。但好境不長，運動中查出他的貧農家庭成份是假，他只得羞愧地退出保守紅衛兵。過了不久，又拉起一支隊伍成為造反派，並且憑著敢作敢為、膽大包天的本色，在造反派兩派之間的武鬥中當上了武鬥司令。⁴⁹

我知道這樣一件頗具對比意味的事：

1969年4月，我所在地區造反激進派在一次大規模武鬥中抓了對立派一批頭目，臨時關押在地區郵電局。總部指派負責宣傳的黑色子女王某前去審訊，以便獲取反戈揭發材料。王某見武裝看守人員對俘虜大施肉刑，於心不忍，立即嚴厲禁止，並安排他們洗漱、吃喝，隨後又清還隨身物品；在寫了反戈聲明後，將他們一律釋放回家。此事被迅速告到曾為某地質隊保守組織頭目外號「李老保」的總部武鬥司令那裏。司令大怒，向王某要人。王某自恃造反資格和社會名氣，據理反駁，最後不了了之。

如果造反派由王某之類的人主持，造反派兩派的武鬥還會那麼慘烈嗎？不得而知。

在造反派和保守派始終對立的省份，武鬥同樣慘烈。保守派依仗出身好又有大批轉業軍人，其瘋狂和殘暴甚至超過造反派，例如1968年廣西保守派在軍隊支持下對「四二二」造反派的血腥大剿殺。

對於全國各地造反派的分裂，首都「三司」的造反紅衛兵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這些串聯紅衛兵對外省造反事務的插手和煽動，才導致激進派從造反派內部殺出另立山頭。而首都和全國各地的造反激進派，除了罪惡的武鬥之外，對隨後民眾的造反運動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推進。

我至今忘不了所在地區造反派發生分裂前的壯觀場景，時間是1967年5-10月。地區首府——西昌的造反派，成立了「地區聯合總部」，按地質系統、郵電系統、運輸系統、工業系統、冶金系統、地委系統、專署系統、財貿系統、農業系統、文化系統、學生系統、知青系統劃分，建立了八個司令部和四個兵團。所轄十個縣也分別成立了統屬於「地區聯合總部」的「縣聯合總部」。造反派編制之規範、秩序之井然、行動之整齊、勢力之強盛，令人震懾。從基層單位到地區一級，軍隊和幹部

都爭著表態支持聯合起來的造反派，各級「支左」部隊和臨時負責維持正常生產的領導幹部要作任何重大決定，都必須經過造反組織同意才能暢行無阻。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萬象更新的風貌，連小偷都幾乎絕跡。「文革」十年，小偷絕跡這類現象只在三個時候出現過：1966年冬季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1967年夏季否定「二月鎮反」時，1976年春季「四五運動」時。與其說是革命的鐵拳嚇破了小偷的賊膽，不如說是革命的氣氛感動了小偷的良知。

可是好景不長。1967年9月，首都「三司」所屬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北京鋼鐵學院「紅旗」和四川大學「八二六」的紅衛兵來西昌串聯。他們憑著顯微鏡一樣的觀察力，很快發現「地區總部」領導班子不是工人階級掌權、思想和行動都過於右傾等問題。在他們的積極煽動下，地質系統、郵電系統、專署系統、知青系統的全部和學生系統、文化系統、財貿系統的一部分，終於從「地區總部」中分裂出來自成一派。西昌地區造反派從此陷入兩大派嚴重對立甚至殺聲震天的自殘局面。兩派武鬥持續到1969年5月，兩派對立甚至延續至1976年。這期間，為了尋求軍隊和幹部的支持，造反派不得不讓出分裂前曾經掌握的主動權；而水火不容的對立和槍炮相見的武鬥，更造成社會秩序的嚴重破壞和人民生活的巨大災難，逐漸將造反派推到了民眾利益的對立面。

從激進思想看，湖南「省無聯」楊曦光寫的《中國向何處去》，除了觀點偏激，毫無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可言。從激進行為看，成都「八二六」1966年11月13日在人民南路廣場批鬥李井泉大會上的造反，1966年12月大動干戈對《四川日報》和四川人民廣播電臺的查封，1967年1月與重慶、內江造反派對四川省輕工廳轉存於球溪河糖廠四十三箱文書檔案的搶奪，無一不是以極端化方式演出的無意義鬧劇。

我雖然隨同組織集體歸屬造反激進派，但對其誇大其辭的思想作風和華而不實的行為特徵，自來心存疑義。1967年1月我親身參與的「西南局四十三箱黑材料事件」，更加深了我的這種懷疑。這個事件因為牽涉到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的妻子肖裏，在成都造反激進派中一度影響頗大，隨後又成為四川「二月鎮反」時查處川大「八二六」的要案之一。李井泉的妻子肖裏後來因此命喪黃泉，80年代中共四川省委在為肖裏平

反的大幅公告中也重點說到這個事件。作為當事人之一，我想以這件事為例，來揭示造反激進派思想上行為上的兩大否定性特徵。

1966年12月，家住成都的H兄弟帶領我們十多個造反知青赴省城串聯，並集體加入了川大「八二六」。此行的目的本來是去北京，可恰逢中央發出停止全國串聯的緊急通知，我們便按自願原則，半數人跟小H去了北京，半數人隨大H留在成都。留下的人住在省科委招待所接待站。有一天，同住這個接待站的球溪河糖廠工人造反團的赴蓉告狀人員找到大H，請我們前去該廠幫助嚴重受壓的工人造反派。他們介紹：該廠是四川省輕工業廳的重點企業。輕工廳廳長肖裏是李井泉的老婆，不久前她將西南局的幾十箱黑材料轉轉移到該廠隱藏，極可能是李井泉的指使。廠裏保守派勢力太大，他們只得來省上揭發這個陰謀。作為知青，我們自知既沒有資格參加大串聯，更沒有資格到工廠煽風點火。可是他們揭發的問題牽涉到西南最大的走資派，吸引力實在太大，何況這些工人造反者已把我們誤認為串聯學生——於是大H決定，不如將錯就錯去聲援他們。

這個糖廠位於內江專區資中縣球溪河區。進廠第二天，我們就向還在職位上的廠領導提出要清查輕工廳隱藏的黑材料，立即遭到多為行政管理人員的保守派圍攻。球溪河中學的造反紅衛兵聞訊起來聲援我們，廠裏一時積聚了上千人。雙方人員進行了一天一夜的辯論。保守派堅持認為這是國家機密，任何人不得查看。造反派堅持認為必須經過查看才能判定是什麼材料。最後雙方達成兩項協定：第一，各派五個政治可靠的代表開箱查閱這些材料，保守派一方在旁監督，造反派一方負責查閱。第二，按照中央關於處理黑材料的標準，凡屬將群眾定成「反革命」、「右派」、「三類」、「四類」的材料，一律清理出來，雙方辦理交接手續後由我們帶回省上；如果箱子裏沒有黑材料，便原地保存。這批材料碼放在一間密封的屋子裏，共有四十二箱，十個人用了整整三天時間才查閱完畢。原來這只是省輕工廳機關的普通文書檔案，除了我僥倖查出一頁某處某科把七個幹部列為「三類」和「四類」的名單，根本沒有什麼黑材料！雙方似乎都無話可說：保守派認為除了一張名單之外並沒有其他黑材料，造反派認為憑著這張黑名單自己的行動就沒有

錯。我為名不副實的說法和徒勞無益的舉動感到沮喪，向大H提議立即返回成都。

事情如果到此為止也還說得過去。因為按照今日的個人最大化原則，我們畢竟查出了七個人的政治冤情，而且大體上還有條不紊和實事求是。

然而事情突然發生了超出我個人意願的變化。原來這件事已傳遍資中和內江一線，而且渲染成了「在球溪河糖廠查出李井泉通過老婆轉移出來的西南局四十三箱黑材料」。這時還處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清查黑材料」的高潮，人們都被這個全國罕見的「陰謀」所激憤。於是這些地方的造反派紛紛趕來，不顧我和另外幾個現場查閱者的再三解釋，硬要把所有材料運到資中進一步清查。大H頭腦發熱，不僅積極贊成運走材料，還提出我們一同前往。我對這件事已無熱情，便藉口頭痛留在糖廠。他們到了資中，遭到勢力強大的農村保守派的圍搶，只好運往內江。誰知剛到內江便聽說重慶「八一五」已經派人前來搶奪，他們又決定改運成都交給川大「八二六」總團。

沒想到我們乘坐幾輛大卡車深夜行至資陽縣，又被當地造反派攔住。幸虧「八二六」總團收到大H提前發去的加急電報後立即派人派車前來接應——幾個小時後他們到達資陽才給我們解了圍。凌晨三點我們正要開車，又從資中方向開來幾卡車造反派，緊急告知重慶「八一五」的人馬已經抵達資中城外，他們前來護送我們儘快離開。

返回成都的路上，我才想明白所謂重慶「八一五」來搶材料的真相：當初在球溪河糖廠招待所登記住宿時，為了不暴露知青的真實身份，我臨時用了一個「大渡河野戰軍」的虛假名稱。登記人沒聽清楚，誤寫成了重慶「大渡口冶金學校」。這之後我們乾脆將錯就錯，一直默認這個莫須有的身份。想必「八一五」聽說這個名稱後以為我們是重慶造反紅衛兵，所以前來增援。

回成都後，與這批所謂「黑材料」有關的事都由大H一手辦理，我和其他幾個小青年樂得脫身其外。隨後得知：川大校園和整個成都一時沸沸揚揚，省輕工廳系統造反派更是以此大做文章——不僅在人民南路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批判肖裏，還使這個看起來面目和善的女人被逼身

亡。「二月鎮反」時，內江、資中、球溪河區和糖廠造反派近百人因此被捕，大H也未能倖免；川大「八二六」的罪名中駭然有此一條。作為一個瞭解真實內情的人，我只有在心頭暗自苦笑。

造反激進派의思想和行為莫不如此。

第三節 造反派的成份演變

造反派分裂成兩派後隊伍急劇擴大，等級成份也相應發生了變化。擴大和變化主要來自保守組織瓦解後作壁上觀的原保守派群眾的相機加入。

「文革」中，中國社會持保守立場的人群，除了上層紅色子弟外，主要是產業工人、貧下中農和軍隊官兵。他們的保守態度，自然來自既與的純正血統、既得的政治利益、既有的階級覺悟——以及由此而來在各自社會圈層的中心地位。當他們看到造反派不少是下層黑色和麻色子女，造反物件又是各級黨政領導，於是理所當然地認為，所謂造反實質上是地主資產階級在向工人貧下中農的革命政權發動進攻。他們當然要堅決反對前者而保衛後者。

具體落實到各行各業各個單位，保守派大多由先進分子、勞動模範、黨團員和普通紅色子弟構成。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一些被徐友漁稱為「政治打手」的人。

這類人，各個單位均不罕見，歷次政治運動中更常見其活躍的身影。他們一般沒什麼本事，要在常態社會靠真才實學確立自身價值，肯定難有出息。然而，他們好像專為變態社會而生，而且專以整人為業。十七年來人與人之間以血統為基礎的社會等級關係和以整人為動力的社會政治生活，恰好給他們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機會。他們喜歡巴結領導，積極追求「政治進步」。為達個人目的，他們總將目光盯死「黑五類」出身和有「歷史問題」的人，平時經常打小報告反映「階級鬥爭新動向」，運動一來便赤膊上陣，將平時瞄準的鬥爭物件揪出來示眾。慣用手法不外乎以「深挖階級根源」來斷章取義並上綱上線置人死地。結果自然是成為運動的積極分子，入團、入黨、轉幹、提職。這其實是一些

人性扭曲、人格畸變、人品低劣的壞人。「文革」一來，造反開始，他們以為機會又到了，於是為首成立保守組織，試圖再次通過「整階級敵人」和「保黨的領導」來實現個人私欲。沒想到這一次意外失算——造反派竟會一時得勢。這些人「二月鎮反」否定後大多懷著投機心理反戈一擊參加了造反派，1968年底開始整飭造反派後又調頭站到官方一邊，「文革」結束後更積極主動地變成了揭發批判造反派的英雄，紛紛受到官方的重用。

劉賓雁在報告文學作品《未完成的埋葬》中所說上海海運學院的Z，便是那個特殊年代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典型。此人「文革」前擔任班主任和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員。當時就是一個主動製造階級鬥爭的好手，1964-1965年，曾積極組織將一些有獨立見解的學生打成「反動學生」。「文革」初期，他成為「鐵杆老保」，曾把同教研室一個對其不滿的同事的檔案拋出來當眾宣讀，然後進行批鬥。1968年又主持審訊這個同事，鼓動他人將其打倒在地口吐鮮血。後來他還不許這個同事回該教研室工作。林彪得勢時，他常到支持保守派而壓制造反派的學院「工宣隊」面前表示對林的忠誠，還在將兩位講過林壞話的教師實行審查和監禁的事情中立過大功。林彪倒臺後他又成了「批林批孔」的先鋒，大會小會爭著發言，還到外單位作報告。「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他批判學院受壓制的造反派「否定工宣隊的成績」。「四人幫」一倒，他又成了批判學院「工宣隊」的先鋒，反誣長期遭受「工宣隊」迫害的學院造反派「效忠『四人幫』」。「文革」前他是學院黨委的紅人，「文革」後仍然是紅人——從一個普通教師提升為黨委學生工作部部長。難怪「文革」中受過他迫害的一位教授說：「Z這人最不是東西。他是海院頭號棍子，大風派，整人專家！……品質太惡劣了。」難怪「文革」前被他打成「反動學生」的一位昔日學生說：「……可惜，Z這個壞蛋現今仍在得勢！此人根據他過去的野心，他還要害人的，因為凡有野心的人既想往上爬，必須就得犧牲別人，就得踩著別人的體。……」⁵⁰

保守人群對造反派的敵視，在最深的心理層面一直沒變，但較淺的思想層面和行為層面卻因勢而變了。這個勢便是1967年「二月鎮反」被否定後中央對造反派的正式肯定和造反派取得社會主流政治地位的大形勢。

各種保守人群對造反派淺表層面的行為認同，大多被切身利益和政治形勢所推動，因而頗具戲劇性。

凡是存在保守派和造反派對立的地方，兩支「支左」部隊一方支持了保守派，另一方為了執行最高統帥的命令必須有所支持——於是只能支持造反派。一旦支持了造反派，必然利害相關，只得支持下去——這又使利害關係加深。當保守派瓦解，造反派又分裂成兩大派後，原先支持保守派的部隊，為了執行命令，也出於化解不了的恩怨關係，必定轉而支援從原先反對自己的老造反派中殺出的新造反派，無形中使自己也與這一派造反派具有了共同的利害關係。

持保守立場的產業工人和貧下中農的轉變也是一樣：當造反派分裂成兩大派，他們必定將支持票投給剛殺出的新造反派，以此作為反對老造反派的延續形式和補充方式。在具體單位，他們大多重新成立組織，加入到反對老造反派的新造反派中去，以此為靠山繼續與本單位造反派對峙。如果本單位造反派屬於新造反派的下屬組織，他們便會重新考慮加入老造反派行列，目的同樣是繼續與本單位造反派對抗。無論本意如何，他們這樣做，使無形中將自己與所加入的造反派聯繫在一起，而與這一派造反派具有共同的利害關係了。

造反派的隊伍因此而擴大。這就產生了一種頗具諷刺意味的後果：自命激進的新造反派，基層組織中原保守派成員最多。

與此同時，造反派領導層的等級成份也逐漸演化。「成份不純」問題一直是造反派的一塊心病。為了不給對立派提供攻擊的口實，也為了今後提出的人選能夠順利進入各級革委會，提高領導層的純度已刻不容緩。大批原保守派人員的加入恰好提供了這個條件。這些人大多成份好身份紅，現在又轉變立場站到造反派一邊，自然是最佳人選。他們果然有不少當上了造反組織的一、二把手，並在後來順利進入各級革委會任職。由於無形中將自己的命運與造反派中這派或那派的派別利益聯在了一起，無論在野還是在朝，他們大多忠於自己所依賴的造反派別，不自覺地成了造反中人，始受其惠，終受其累。

這便是為什麼甚至在青年人聚集的場所由各種顯在和隱在的非「紅五類」子女最先發起並體現其政治等級利益和政治等級要求的造反運

動，後來頭面人物大多是純粹「紅五類」子女的真實原因。

造反運動的排頭浪——青年群體的造反，由各種顯在和隱在的非「紅五類」子女最先發起並體現其等級利益和等級要求，是歷史的真相，不容否認。

不能用宋彬彬是「高幹」子女來否認這個真相。因為她所代表的「老紅衛兵」從來就不是真正的造反者，而是強勢對弱勢的公開迫害，野蠻對文明的肆意踐踏。

不能用毛遠新是毛澤東的侄子來否認這個真相。因為他本來就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保守組織「八一派」的總頭目，後來奉旨造反也完全是為了配合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權力之爭。

不能用北京五人造反紅衛兵領袖的「戶籍成份」和「檔案成份」都是紅色來否認這個真相。因為只要將「家庭成份圈層」這個特殊範疇轉換成一般的「學生等級圈層」範疇來看，在絕少非「紅五類」子女的首都高校，五大造反領袖的家庭出身與上層紅色子弟相比都十分低下，他們的造反同樣體現了對不合理社會等級秩序的反抗。在北京高校處於學生等級圈層邊緣的，是他們及其所代表的平民學子；在全國大中學校和各行各業各單位處於各種成份等級圈層邊緣的，當然是從顯在和隱在的「麻五類」子女到「黑五類」子女的亞等級人群。北京高校只是全國造反運動的先鋒而非全國造反運動的主流，主流在全國各地——由千百萬各種類型的黑色和麻色子女發起並推動。

不能用全國各地造反組織的頭面人物大多是普通紅色子弟來否認這個真相。因為原因已經說明：原保守派群眾大量加入所帶來的造反派及其領導層家庭成份構成的演變。

「文革」中，基層單位、行業系統以及區、縣、地、省各級被官方和民間一致公認的造反派頭頭，並非都是一次性敲定的，不少是經過多次政治篩選才最終確立。當時官方宣稱他們是「在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中自然湧現出來」的，其實這種「自然湧現」嚴格遵循著「階級路線」牢不可破的潛規則——通過家庭成份、個人歷史和政治身份三方面的考察而決定去留。

據我所知，北京大學最初為首策劃寫造反大字報的人並非聶元梓，

清華大學第一個造反紅衛兵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負責人是唐偉而不是蒯大富，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最初的頭頭不是王大賓而是朱成昭，上海「工總司」最初的頭目不是王洪文而是潘國平，甚至四川「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和川大「八·二六」的首領最初也不是鄧興國和江海雲。

全國性造反組織「全紅總」的例子很有代表性：1966年12月27日，「全紅總」召開總部會議。由唐靜等四十人聯合提出動議，要求改組總部領導成員。大家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重新選舉了「五人領導小組」。按得票多少，方圓、王振海、李晉暄、金展雲、郝維奇五人當選。大家要求方圓擔任「五人領導小組」組長，被方堅拒。公開的理由是年齡太小而且知識和經驗不足；真正的原因他沒有說出——怕家庭出身不好，成為被攻擊的把柄，造成對組織的損害。在他的堅決拒絕和推薦下，「紅五類」出身的王振海擔任了第一把手，方圓擔任副手。方圓回到貴陽和李伯特、葉文築策劃成立貴陽分部時，都認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不適合站在第一線，應找一些出身好的人擔任領導職務。於是找了毛澤東的一位落魄的遠親——毛勝年出面負責。

例如我所在城市：地區造反總部一把手開始為地委中層領導幹部肖某，據說歷史上參加過「袍哥」而被撤換；新換上來的地區電機廠工人劉某，又因歷史上參加過「三青團」不久再被撤掉；第三次換為地區百貨站貧農成份和共產黨員身份的吳某而最終確立。縣造反激進派總部一把手冼某雖為貧農家庭，但因岳父為「勞改分子」、岳母為「管制分子」，籌建縣革委推薦本派擔任副主任職務的群眾代表時，不得不讓位給縣武裝部指定的人選——已加入本派的原縣團委幹部和保守派頭頭李某。地區物資局造反組織一號頭頭唐某，父親為已被槍斃的原國民黨軍隊師長，推舉本單位革委會副主任和地革委委員人選時，只得讓位給工人成份的曾某。這些更換無不是遵循著「階級路線」潛規則的三項內容而進行的。

嚴格講，造反派的現實合法性是在1967年「二月鎮反」被否定後才獲得的。這之前，無論造反組織還是保守組織，各種群眾組織都宣稱自己是造反派；而各地造反派的身份也沒有得到過來自高層的確認。這之

後就不同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逐省解決「二月鎮反」問題，並在下發的紅頭文件中正式確認了各省的造反組織。而這些造反組織的突出標誌便是在「二月鎮反」中挨過整。從此，各省的群眾組織不僅以此來劃分造反與保守，而且造反派中的激進派與穩健派也由此劃定。一時間，「二月鎮反」坐過牢成了造反派的一種光榮的政治資本，坐過牢的造反者也被稱為「老造反派」，其自豪感不亞於革命年代的「老紅軍」、「老八路」。1967年夏季，四川成都還成立了一個西南三省入獄造反者的統一組織——「紅囚徒」。造反派中黑色子女的處境因此發生重大改變。例如「二月鎮反」前夕，青海造反派「八一八」和武漢造反派「鋼工總」，迫於軍隊和保守派的巨大壓力，曾經自我清理「階級隊伍」——主動將組織中顏色較黑的成員抓送公安局；「二月鎮反」被徹底否定後，造反派中的「黑五類」子女因為大多被抓被鬥過，自然成了受人尊重的「老造反派」。這使他們既因黑色家庭成份而成為造反派保持造反合法性的政治包袱，更因光榮坐牢而成為造反派爭取造反合法性的政治資本。可以說，正是「二月鎮反」這個歷史契機將「黑五類」子女與造反組織緊緊粘合在一起，使其能繼續留在造反組織中——既受到尊重又發揮作用。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1969年8月群眾性的造反運動結束。是的，無論主動還是被動，「黑五類」子女反抗等級歧視和政治迫害而爭取平等權利的生存衝動，都是民眾造反運動的內在動因和最大亮點之一。

黑色子女在造反派中的實際作用究竟是什麼呢？如果形象的比喻，他們便如生命體的活力部位，或湯中之鹽、詩中之眼、畫中之魂。是的，他們不是造反隊伍的全部或者大多數，但他們是造反隊伍最緊要的部分。這不僅因為沒有他們，民眾的造反運動就會失去反等級壓迫的最深層意義，而且造反行動也的確離不開他們的策動。造反組織五花八門的名稱和文本，讓人覺得造反派頗多象徵式文化偏好。事實上在那個視文化為罪惡的年代，造反派不能不是最無文化的群體。黑色子女的優勢恰好就在這裏。他們多少有才，大多擅文，於是造反組織的綱領、宣言、口號、各類文章，大多出自他們之手。別小看這些文字的作用，造反組織的多數行動都是踏著它的節奏進行的。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

團核心組織「——三戰鬥隊」的成員，多為黑色和麻色子弟。湖南「省無聯」的楊曦光和四川「中紅成」的徐友漁，也是黑色子弟。我所在地區造反派兩大派的思想領頭人兼主要筆桿子，都是黑色子弟。他們實際上是所屬造反組織的靈魂。在一個反文化的時代，造反組織偏偏如此倚重黑色子女的文化資源，不能不算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奇跡。

1967-1968年，在保守派徹底瓦解的省份，造反派的隊伍擴展到什麼程度？幾乎包容了每個城市、每個鄉鎮的絕大多數人口。我所在地區當時有二百多萬人口，大約百分之八十參加了造反派兩大派。支持兩派的軍隊和帶有兩派傾向的當權派不算，再除去無權參加組織的「黑五類」、在押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和不願參加組織的「逍遙派」，從城市到農村，幾乎很少有人沒有參加兩派造反組織和不帶派性傾向。

至少可以說，在只有造反派兩大派的地方，凡是1950年以前出生的城市中人，半數以上都或早或遲加入過造反派，都或深或淺參與過造反行動。這在當時並不奇怪，因為造反派處於主流地位的大勢使然。奇怪的是事隔多年後人們普遍的忘性和謊言！

造反派得勢的時間並不長。最遲在1969年7-8月中共中央《七二三佈告》和《八二八命令》下達後，他們便「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作鳥獸散了。我說散，是指從省到地市到縣區公社各級造反組織常設機構的自行解散。曾經時常聚集的造反隊伍也因此而永久散去——回到本單位的正常秩序中和固定位置上去認領自己平凡的角色。過去時常由造反派所發起並具有群體性威懾作用和社會性壓力效用的大規模集會、遊行、示威，從此絕跡。

三年造反，造反派之所以能夠成為一股強大的群眾性力量，首先是因為它建立了從基層單位到行業系統再到區、縣、地、省的統一組織。這使得他們不僅能使官僚勢力頃刻間土崩瓦解，也讓軍人勢力不得不禮讓三分。毛澤東自然明白：對於極權統治而言，這種截然有別於官方的黨、團、工、青、婦的群眾組織究竟意味著什麼。他為了營造打倒高層政敵的群眾運動場面而支持他們，當他們不服從駕禦並嚴重妨礙自己對全國局勢的控制時，就一定要堅決解散——只有服從命令聽指揮的上海「工總司」有幸例外。

第四節 三年造反不等於「三年文革」

民眾造反運動從開始到結束的時間究竟有幾年？實際有三種觀點。三者所認定開始與結束的時間標誌略有差異。第一種認為是從1966年8月到1968年8月，存續時間只有兩年，以楊小凱為代表；第二種認為是從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存續時間有三年，以劉國凱為代表；第三種認為是從1966年8月到1969年8月，存續時間也有三年，我希望給予證明。

第二種觀點將開始時間定在1966年5月，肯定是把造反運動運動的開端與「文化革命」的開端混為一體產生的錯覺，顯然不能成立。將造反運動的開始時間定在1966年8月應該沒有異議。剩下的問題主要存在於三者標出的結束時間。認為1968年8月結束者，注意到了這一年這一月「工宣隊」進入學校和《七二三佈告》、《七二四佈告》第一次宣佈解散群眾組織這個標誌；而認為1969年4月結束者，卻忽視了這種標誌的確，關鍵是看群眾組織的解散。

1968年7-8月確實發生了第一次解散群眾組織的重大事件，然而要解散他們並不那麼容易。從1968年7月到1969年8月，分為先後兩次，整整用了一年的時間，官方對群眾組織的解散才告完成。

關於第一次大解散，何蜀作了十分詳盡的綜述：

1968年7月，中央先後發佈了制止群眾組織間大規模武鬥的《七三佈告》和《七二四佈告》，嚴令解散群眾組織。同年7月27日，「工宣隊」強行進駐清華大學，宣告了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運動的終結。幾天後的8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的社論，批判「多中心論」和「以我為中心」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宣佈不再允許造反派群眾組織另立中心。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同時《紅旗》雜誌發表經毛澤東審定的姚文元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各大中學校和文化單位從此被稱為「知識份子成堆的在方」、「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

「先鋒」、「闖將」作用的造反派紅衛兵地位一落千丈。9月2日，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工人進軍事院校及尚未聯合起來的軍事院校實行軍管的通知〉，宣告了軍事院校造反運動的終結。從8月15日開始，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國防工業部分工廠和一機部、化工部部分協作工廠抓革命促生產會議」——簡稱「八一五會議」，歷時5個月零11天，全國十九個省、市、自治區數百家重點企業以造反組織代表佔絕大多數的3000餘人參加。同時又召開了冶金工業抓革命促生產會議，並稱國防、冶金系統抓革命促生產會議。兩個會議以各地在造反和武鬥中影響較大的大型企業為整治重點，強行促成「大聯合」、「三結合」，宣告了工礦企業造反運動的終結。9月5日新疆和西藏兩個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標誌大陸各省、市、自治區全部建立起了「新生紅色政權」，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結束了各地長達近兩年的半無政府狀態。

在此前後，各地群眾組織紛紛宣告「完成歷史使命」，撤銷總部，解散組織。此舉各地先後不一，除較早的湖南造反派組織「工聯」、「湘江風雷」於1968年2月21日就宣佈撤銷總部外，大多解散於1968年下半年：河南省於8月10日宣佈解散「河南二七公社」、「開封八二四」、「河南造總」三個全省性跨行業群眾組織；北京大學兩大派「新北大公社」與「井岡山兵團」分別於8月28日和29日宣佈「解散各級組織」和「撤銷兵團總部」；湖北省革委會於9月6日作出決定，規定所有群眾組織立即鏟平山頭，其總部、分部立即撤銷，停止活動，所屬人員立即回原單位生產或上課；重慶兩大派「八一五」和「反到底」於10月15日隆重集會宣告撤銷各大總部、解散組織……總之，自此之後，大多數地區不復存在造反派群眾組織。10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柳河五七幹校的報導和毛澤東有關幹部到五七幹校的批示，宣告了各地黨政機關及事業單位造反運動的終結，機關幹部無論造反派還是保守派被「一鍋端」下放到五七幹校進行變相勞改。到1968年底，隨著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最新指示的發佈，各地中學生造反派紅衛兵更是徹底退出了「文化大革命」歷史舞臺。 51

其實，1968年中央出臺兩個佈告解決廣西和陝西兩派武鬥問題時，對全國群眾組織的解散還比較有限，因為全國多數省級以下地方的革委會還沒有成立，不僅兩派嚴重對立而且武鬥不停，群眾組織很難說散就散。例如1968-1969年，四川省半數以上的地區都還處在兩派對立和武鬥之中，群眾組織仍在繼續發揮作用；甚至1969年7月針對山西省兩派武鬥問題而轉發全國遵照執行的《七二三佈告》也表明，這時不少地方群眾組織仍在派性的掩體後面頑強存在。據我所知，直至1970年，中央權力還在北京舉辦了新疆、四川等八個省、市、自治區兩大派代表數千人參加的「中央學習班」，歷時半年，目的也是削平山頭、消除派性、轉向正軌。所以，除了得到特許的上海「工總司」之外，全國各地群眾組織的徹底解散，要等到1969年中共中央《七二三佈告》和《八二八命令》下達之後才大功告成。或許他們的氣數要在這時才走到盡頭。

造反派群眾組織形式和群眾運動形態的歷史剛好三年：1966年8月——1969年8月。1966年8月到1967年5月，是對抗工作組、成立群眾組織、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解放「三、四類」、瓦解保守派、鬥爭「走資派」、反擊「二月逆流」；1967年6月至1969年8月，是建立造反總部、分裂為兩大派、打武鬥、強行實現大聯合並建立革委會、最後解散組織。

所以，僅僅著眼於民眾造反運動，其興起時間應標為1966年8月周恩來到清華大學給蒯大富平反，終結時間應標在1969年8月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下達。這樣標示，並非為了使三年的期限顯得充足，而是為了尊重歷史事實。

這段歷史已遠遠留在身後，那些發生過的事實沈默不語且錯綜複雜。從中找出禁止民眾造反繼續通行的最後標牌十分必要。1969年7-8月的《七二三佈告》和《八二八命令》，便是造反之路的最後標牌。從這裏望去，不僅可看清民眾造反運動的全過程，而且有助於辨析某些學者在「文革」期限問題上的分歧。

「文化大革命」的時間跨度究竟有多長？有兩種觀點：十年說與三年說。

十年說自然是官方的提法。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把「文革」的期限確定為十年並具體劃分為三段：

- ① 從 1966 年 5 月「文革」發動到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
- ② 從中共「九大」到 1973 年 8 月中共「十大」；
- ③ 從中共「十大」到 1976 年 10 月。

這是最為通行的「文革」十年說及其分期。

最早提出三年說的學者首推著名美國漢學家費正清。他在《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一書中，認為「『文化大革命』持續了三年半，即從 1965 年末到 1969 年 4 月」，並將這三年半劃分為四個階段：

- ① 1965 年末到 1966 年夏——準備階段；
- ② 1966 年 8 月到 1966 年底——紅衛兵公開發動時期；
- ③ 1967 年 1 月到 1968 年中期——奪權與武鬥；
- ④ 1968 年夏到 1969 年 4 月——重新建立黨和政府的權力機構。⁵²

陳佩華、楊小凱、王希哲、劉國凱都持這種觀點。劉國凱甚至倡議寫一部集中體現這種觀點的《三年文革史》。

在我看來，環繞「文革」所發生十年說與三年說的分歧，純粹出自一個不能成立的偽問題。其偽之處來自三年說——它把三年造反誤稱為「三年文革」，並在這個自設的迷宮中繞來繞去，硬要以推倒「十年文革」說作為奪路之門。

「文革」的期限自然是十年。首先，「文化大革命」這個稱謂是官方的命名，指稱的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特殊政治運動。它雖然有三年時間與民間的造反運動糾纏在一起，但它的動機、目的、步驟以及現實牽制帶來的變化，仍然受毛氏所主導，並非某個研究者可以任意規定或強行切斷。其次從毛澤東的最初動機和最終目的來看，「文革」的期限也不可能只有三年。毛氏的動機和目的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打倒劉少奇，使自己重返權力中心；二是確立政權接班人，防止自己百年後中國變色。1966-1969 這三年，他實際上只解決了第一方面的問題，第二方面的問題——從全力指定林彪，到改而試著推出王洪文，再到改而勉強啟用華國鋒，卻至死也沒有圓滿解決。不難推斷：如果 1976 年他不曾逝世，為了最終確立一個理想的接班人，他一定還會折騰下去。那時，

「文革」的期限完全可能超出今日所說的十年。因此，「十年文革」之說既非陰謀，也非編造。官方行為的非正義性，不是杜撰了一個「十年文革」的期限，而是對「十年文革」前三年民眾造反運動的仇視和清算。雖然在將造反派等同於「文革」的現實語境中，「十年文革」說難免會使某些趨附強勢之徒和認知偏誤之士將許多不屬於造反派的罪責強加在造反派頭上，但這並非「十年文革」這個提法的過錯。不能僅僅為了洗清造反派的冤屈就去改變這個運動延伸出的本來長度，硬要製造出一個仿佛只屬於造反派的「三年文革」來。「文革」——從名稱到裏面的內容，都是官方性質的，造反派只是利用了它一度提供的機會而已。怎麼能將從名稱到內容都必須否定的官方「文革」分割出一段來給予肯定呢？它在這個階段包含了一層應該肯定的民眾造反行為，並不等於它的這個階段就值得肯定。

因為將三年造反誤稱為「三年文革」，其中的糾纏註定會使「三年文革」論遇到許多言說障礙。

其一是怎樣確定這三年的起訖時間。比如：西方學者一般把「三年文革」的時間界定為 1966 年 5 月到 1968 年底紅衛兵退出政治舞臺，或者 1966 年 5 月到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召開⁵³。力主「三年文革」說的楊小凱和劉國凱分別承接西方學者的兩種提法：前者說是「1966 年 8 月至 1968 年中」⁵⁴；後者說是「1966 年春末到 1969 年 3 月中共九大召開」⁵⁵。兩種說法劃出的時段都前後不一甚至自相矛盾。其間的分歧，表面看只是小小起訖時間的差異，其實是各自的著眼點並不一樣。一種仿佛半模糊半明確地著眼於三年造反運動，所以將結束時間標在 1968 年，只是開始時間有所不同。另一種好像明確地著眼於三年「文化大革命」，所以開始時間是 1966 年 5 月，結束時間是 1969 年 3-4 月中共「九大」召開。

其二是怎樣將這個觀點貫穿始終。例如：費正清提出「文革」「持續了三年半」，但自己也猶豫不定。他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一書第十七章「毛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論述了「三年半文革」之後，接著又寫了「繼承權的鬥爭」、「文化大革命回顧」、「結局」等篇目，著重記述從 1969 年中共「九大」後到「批林批孔」再到 1976 年「四人幫」倒

臺的過程，並寫下這樣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現代發展中失落的十年」⁵⁶。至此他又認為「文革」的全過程是十年，最後收尾於1976年10月「四人幫」倒臺。徐友漁認為「就研究紅衛兵而言，似乎取三年分期說較好」⁵⁷，但在自己研究紅衛兵的專著中實際採用的卻是「十年文革」說。內蒙造反派領袖高樹華感到「三年說或許更有說服力」，但在自己的口述史《內蒙古文革反思》中仍然「沿用官方十年說」⁵⁸。可見，只要不是專門論述三年造反運動的言說，很難知行如一地採用「三年文革」說。他們都沒有錯。因為「文革」本來就存續了十年時間。

其三是怎樣正面評價這三年。是正面評價三年「文革」，還是正面評價三年造反？「三年文革」說的本意雖然是為了正面評價三年造反，但是由於錯用了概念，難免會在正面評價造反時偏到「文革」上去。例如楊小凱在同一篇文章中就出現了這樣的混亂：他先是主張「對文革的正面評價」，緊接著又將這個主張轉換成了「對文革中造反運動給予相當正面的評價」⁵⁹。「三年文革」與三年造反並不是相同的概念，怎麼能在二者之間劃等號？楊小凱和劉國凱所有文章中正面評價的對象分明是三年造反運動，卻被他們錯誤地歸到「三年文革」的名下了。他們言論中遭人非議之處，大多來自這種概念錯用，其中包括對這一時期的毛澤東情不由衷的贊許。其實，值得正面評價的只是三年造反運動而非「三年文革」。十年「文革」在這三年雖然包容了民眾造反，但是更以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和抬出林彪為主要內容，沒有任何可作正面評價之處。

「三年文革」說遇到的這些障礙，都來自將三年造反誤稱為「三年文革」所發生的概念糾纏。「三年文革」雖然包括了民間邊緣人群反等級歧視和反政治迫害的造反，但主體仍然是毛澤東集團；三年造反雖然以毛澤東的動機、目的、步驟為契機，但主體仍然是民間邊緣人群。採用前一個概念作正面評價，難免會牽涉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採用後一個概念作正面評價，便可劃清毛澤東集團與造反民眾在利益層面的界線。劉國凱所倡導的《三年文革史》，實為《三年造反史》之誤。

正確的命題應是「三年造反」與「十年文革」，而非「三年文革」與「十年文革」。

注釋：

- 43 葉永烈：《文革名人風雲錄》，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278頁。
- 44 徐友漁：《自由的言說》，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28-46頁。
- 45 徐友漁：《精神生成語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08頁。
- 46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09-120頁。
- 47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21頁。
- 48 劉國凱：〈略評文革造反派〉，紐約：《北京之春》，1993年10月號，第29頁。
- 49 徐友漁：《自由的言說》，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53-54頁。
- 50 劉小雁編：《關於不會說謊話的中國人的故事》，西安：華嶽文藝出版社，1988年10月，第303-307頁。
- 51 何蜀：〈對「文化大革命」歷史分期的思考〉，美國：《文革博物館專集》153期，2002年12月2日。
- 52 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5月，第378-379頁。
- 53 參見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5頁。
- 54 楊小凱：〈六四省悟：為文革造反派翻案〉，紐約：《中國之春》，1990年8月號，第43頁。
- 55 劉國凱：〈化革命中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民眾鬥爭〉，紐約：《北京之春》，2001年11月號，第39頁。
- 56 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5月，第400頁。
- 57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頁。
- 58 高樹華、程鐵軍：《內蒙古文革反思》，澳門：環球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版，2005年，第4頁。
- 59 楊小凱：〈六四省悟：為文革造反派翻案〉，紐約：《中國之春》，1990年8月號，第42頁。

第五章 有名無實的造反派掌權

1976年10月以後，造反派頭上最大的罪名是「篡黨奪權」。至今不少人還認為，「文革」中造反派不僅奪了全國各級黨政大權，而且還奪了公檢法的鎮壓之權，「文革」中成千上萬的冤、假、錯案都是造反派一手製造的。

為了澄清這類誤解，必須回答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第一，造反派掌過權嗎？第二，「文革」十年，特別是1969年造反派退出政治舞臺後，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成千上萬冤、假、錯案，究竟應該由誰承擔責任？

「文革」中的臨時政權機構，省、地、縣、區、公社一級稱「革命委員會」，大隊、小隊一級稱「革命領導小組」。從1967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報》第一個宣佈奪權為開端，到1968年9月5日西藏和新疆成立革委會收尾，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相繼建立起革委會，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但省級以下的各級革委會——從地、縣、區到公社、大隊、小隊，要延至1969年才建立完畢。

革委會的成立，的確是造反派的盛大節日。因為這是1966年以來歷經反復的造反運動最終得到肯定的根本標誌，也是1949年10月1日以來中國政治領域中的第一次權力再分配——中國社會等級結構中的下層平民以造反者的身份進入各級政權機構。各種社會邊緣人群打破中心秩序改善自身處境的行動看似有了制度性成果。造反派中的「黑五類」子女一律被擋在各級革委會大門之外，自然有某種失落感。但他們大多能認命，不敢懷份外之想，只望進入各級革委會的造反派代表能代表自己的利益，所以也樂於擠在歡呼的人群中分享揚眉吐氣的感受。

從代表的構成來看，革委會首先分為兩種形態：「兩結合」與「三結合」。「兩結合」指革委會的成員由群眾代表和幹部代表構成，主要限於奪權之初的上海、山東、貴州、黑龍江、山西五省市。在「三結合」革委會中，除了群眾代表和幹部代表，還增加了軍隊代表，這是1967年3月2日毛澤東提出「三結合」方針以後，全國除上海等五省市之外各級革委會的普遍形態。

在這兩種形態的革委會中，群眾代表的構成可分為三類：由一派造

反派代表單獨構成，由造反派兩大派代表共同構成，由造反派與保守派代表共同構成。

革委會建立後的歷史與我所劃分「文革」四階段中的後三個階段相對應，可分為：造反派掌權時期、軍人掌權時期、幹部掌權時期。

第一節 造反派掌權時期

當時全國的政權建構分為緊密交連的兩個系統：一個是立面的中央、省、地、縣、區、公社六級政府權力系統，另一個是環面的事業、企業兩類單位權力系統。

具有造反派掌權意味的政權機構，是在六級政府權力系統之外的兩類單位權力系統。主要有四種情形：

第一是奪權初期實行「兩結合」革委會而群眾代表又由單一造反派構成的地方，例如上海和北京的一些基層單位。這段時期的上海和北京，軍隊代表尚未進入革委會，很多單位革委會的一把手職務可以由造反派代表擔任，幹部代表主要由造反派保舉並擔任副職。

第二是在1968年8月「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之前全國的許多高等院校。例如北京、成都、武漢、西安等大城市的幾乎所有高等院校，即使在1967年3月2日毛澤東提出「三結合」方針之後，學校革委會主任的職務仍由造反紅衛兵領袖擔任，幹部代表和軍隊代表只擔任副職。

第三是實行「三結合」後造反派代表仍然可以擔任革委會主任的少數單位。例如：內蒙工人造反派負責人霍道余在擔任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的同時，還是所在單位——國務院建築工程部第八工程局第一建築公司革委會主任；江西「大聯籌」負責人塗烈，既是省革委常委又是所在單位——江西拖拉機廠革委會主任；浙江「省聯總」負責人翁森鶴除了擔任省革委會常委，還是所在單位——杭州絲綢印染廠革委會主任；還有杭州通用機器製造廠、杭州新華絲廠、武漢國棉一廠的革委會主任也是造反派代表。

第四是實行「三結合」但軍隊代表和幹部代表支援一派造反派的單位。這些單位造反派的權力，除了來自軍隊代表和幹部代表的傾向性，

還主要來自所擁有的群眾力量。全國各地這種情形較為多見。

這個時期的權力高層，實際由毛澤東親自主政。

然而就是在這個最像是造反派掌權的時期，從省革委會到公社革委會的五級政府權力系統中，造反派代表所佔比例儘管高於軍隊代表或幹部代表，但手中並無實權。有兩個客觀制約因素：

第一是很少有人進入革委會決策層。中央權力機構不必說：以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的權力再分配來看，在 170 人的中央委員中，我能認定的造反派代表只有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賢、劉錫昌、申茂功、唐岐山、唐忠富、夏邦銀、尉鳳英 9 人；候補中央委員 109 人中，我能認定的造反派代表只有聶元梓、陳敢峰、金祖敏、隆光前、蔣寶娣 5 人；在 279 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裏，造反派代表所佔比例僅為百分之五強，而且沒有一人進入權力決策層——政治局。席宣、金春明在所著《「文化大革命」簡史》中，稱「九大」為「『造反派』勝利的中共九大」⁶⁰。不知這個肆意歪曲事實的果敢說法從何而來。作為國內官方專治「文革史」的學者，你們可以唯唯諾諾尾隨官方話語，但不能大大咧咧篡改歷史事實。不僅中央權力分配如此，就是在低一級的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革委會裏，也只有兩個省市的三個造反派代表短時進入權力決策層——核心小組。這三人分別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原黨支部書記和現學部造反組織「紅衛兵聯隊」成員周景方——進入北京市革委會核心小組任副組長；中國科學院貴陽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及歸國留學生孫昌德、中國科學院貴陽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生徐英年——二人都以「貴州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總指揮和負責人名義進入貴州省革委會核心小組任組員。

第二是多數人在革委會裏沒有具體的職權。他們大多在革委會常設機關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和分管部門，經常性的職責只是開會——定期或不定期的全體委員會和常委會，內容大多是學習中央文件或者研究部署各種運動，會上自然免不了兩派爭執不休的插曲。會後便回到各自的單位，本來是什麼還幹什麼。即使少數人被安排了政府職務，也是遠離要害部門的。最典型的例子出在武漢：「鋼工總」頭頭朱鴻霞雖然擔任省革委會副主任，實際職務卻是湖北省防訊抗洪指揮部總指揮。「鋼九一三」

頭頭李湘玉雖然擔任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實際職務卻是武漢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工造司」頭頭吳焱金擔任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實際職務卻是武漢市修舊利廢辦公室主任。有的人同時在本單位革委會擔任著職務，回到單位還有一定的職權，有的人在單位沒有兼職，回單位後便只有一個上級革委會副主任或常委的空頭銜。我所在地區造反派兩派排名最前的兩位地革委會副主任，一個在單位只是技術員，一個在單位只是工人，回到單位後也只能享受技術員和工人的待遇。這種狀況到 1976 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貫徹毛澤東「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政策時才有所改變——不少仍然在革委會供職而且是黨員身份的造反派代表終於獲得實權。例如內蒙古造反派頭頭高樹華當上了呼和浩特市市委書記，我所在地區造反派兩派的另外兩個頭頭，也分別兼任了縣委副書記。然而此時他們早已走上官僚化的道路，只是還假借著原來所代表造反派的名義而已。

現在說到造反派掌權，人們總要提到上海，好像上海就是造反派掌權的典型。這其實是個誤會。

從運動發展和局勢走向是否完全處於毛澤東掌控之中這個角度看，「文革」中全國的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都嚴重違背毛的本意，只有上海市是唯一的例外。在這裏，不僅市革委會負責人從 1967 年 2 月革委會正式成立到 1976 年 9 月毛澤東逝世從來沒有犯過任何「路線錯誤」，而且造反派也完全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走好了每一步。對比全國絕大多數省份革委會負責人走馬燈似的換將和造反派無休止的搗亂，上海市的局面簡直是個奇跡。儘管毛氏曾花費不少精力安排身邊可靠的親信對自己置身的北京市造反派進行控制，但以「五大紅衛兵領袖」為首的造反派並不十分聽話。在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可以說只有上海以「工總司」為主力的群眾組織，才是毛澤東意圖中的那種既絕對聽命又堪大任的造反派。上海的造反派及其所營造的形勢能成為毛澤東心目中的「樣板」，自然不會憑空而來。具體的打造者無疑是張春橋和姚文元二人。這是兩個因一貫左傾而步步高升但還處於權力圈層邊緣的人物。他們在「文革」中能夠屹立不倒，而且能夠悉心將上海打造成符合毛澤東心意的典範，除了個人特定的稟賦秉性和上海特殊的民情民風，

主要取決於他們對上的四層關係和對下的兩大措施。

四層關係：一是1957年「反右」和1958年討論「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時，二人皆以甚合朕意的左傾文章在毛澤東心目中嶄露頭角，自此緊跟不輟。二是1965年二人在製造毛澤東向劉少奇發難的第一顆炮彈——〈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時冒了大風險立了大功勞。三是二人被毛澤東重用為中央文革小組核心成員，能夠隨時瞭解最高領袖的戰略意圖和戰術思路。四是二人通過支持江青到上海搞「戲劇改革」和策劃寫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及後來同在中央文革小組共事，與江青建立了密切的關係，更能瞭解到毛澤東心頭真實的想法和打算。在全國二十九個省級革委會負責人中，這四層關係惟有他們二人具備。在「文革」這場億萬人參加的政治運動中，除了毛澤東這個裁判，幾乎沒有一個運動員不犯規。張、姚卻因為這四層關係而奇跡般的成了例外。

對下的兩大措施，目的是將上海市的民眾造反運動完全納入毛澤東期望中的正常軌道，它們同時是對上四層關係互動的結果。

其一是將敢於犯上作亂要打倒張春橋的上海造反派先鋒——造反紅衛兵組織「紅革會」、「紅三司」、「炮司」、「反到底」徹底打掉，以此為突破口把毛澤東都感到頭痛的造反紅衛兵強行納入制度化軌道。此事發生於1967年1月28日上海《解放日報》奪權不久之後，得到了毛澤東的完全支持。

其二是將桀驁不馴的「工總司」第一號負責人潘國平拿掉，換上思想正統、智力平平、個性軟弱、遵命聽教的王洪文，把上海造反派主力的龍頭控制在手。

對於這件事的內幕，1996年潘國平在美國接受採訪時曾介紹：

張春橋曾經對王洪文講，從處理安亭事件的第一天起，他就決定要用王洪文而不是潘國平，張說潘國平很難駕馭。王洪文後來把這個話講給王秀珍聽，王洪文的司機原來是潘的司機，就把這個話傳到了潘那裏。

安亭事件確定了張春橋與潘的關係。一些紅衛兵後來對潘說，張春橋像佛一樣敬潘，像賊一樣防潘。「敬」是因為潘在安亭事件中逼他下注，結果使他大贏了一把。「防」是因為潘不大聽話。張後來要潘出面

處理復旦大學三派紅衛兵的大聯合時，也對徐景賢說過，上海不光「工總司」聽潘國平的，紅衛兵也聽他的。實際上潘與許多紅衛兵組織的關係確實很好，像「紅三司」的安文江，「紅革會」的李功佐，交大「反到底」的嚴步東，「炮司」的邱勵鷗、周毅聲等等。所以張一直想利用潘，不願意得罪，同時又想用他人來取代潘。正因為這樣，張春橋與很多人發過脾氣，對潘從來沒有發過脾氣。張與潘的這種關係連得王洪文也一直沒有弄懂。王洪文幾次要把潘整下去，在他當了中央副主席之後，又把潘隔離起來，寫報告要把潘當做反革命逮捕。張春橋為此事向他大發脾氣。他對王洪文說，「洪文同志，我現在要叫你王副主席，你知道不知道你把潘國平打成反革命，把我放在什麼位子？主席肯定處理安亭事件的談判，難道我是跟一個反革命談判，簽訂協定？」這話是在毛澤東批評王張江姚時，許世友的儿子許建軍告訴潘的。因為張春橋的態度，王洪文整潘就不了了之。

張春橋這個人搞政治，不管正面還是反面，是很有能力的，也有點學問。他的特點是老謀深算，老奸巨猾。他對王洪文這些人說過，為什麼老是要把潘國平整下去？不是說要重用潘國平，而是不能把他推到對立面去，他後面有一大批人，他的能力不一定在你們之下，讓他在市革委擔任一個職務，沒有實權，把他掛起來，使他有力用不上，因為本身是市革委領導，就不能反對市革委。從這一番話可以看出張春橋這個人的權術。

潘國平在工總司成立之前，就與王洪文認識，因為他所在的工廠與王所在的上棉十七廠同在楊浦區，相距不遠。王也是復員軍人，文革前在廠裏當保衛科的幹事。從「工總司」成立到「安亭事件」，王洪文基本上沒有起什麼作用。也因為這樣，他始終沒有把王洪文放在眼裏。一九六七年聶元梓到上海來，對他說王洪文有野心，背後搞小動作，要他設法清除王，他也沒有在意。即使王洪文當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後，他還是這個態度。六七年二月造反派全面奪權，「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後，他是領導成員、常委，還是「工總司」的負責人。六八年初張春橋提出在市革會和「工總司」裏成立黨的核心小組之後，因為王洪文是黨員，才由王擔任了主要負責人。六九年他與王洪文在「工總司」會議上

發生一些爭執，一氣之下回工廠勞動，三個月沒有到「工總司」上班。由於自己年輕，在權力鬥爭中沒有經驗，正是這樣一走，就把權讓了出來。王洪文就著手精簡機構，把自己的親信安排到各個崗位。又與張春橋一起以市革委黨的核心小組名義決定他下廠勞動，但是保留在市革會和「工總司」的職務。王洪文陸續把當初一起造反的夥伴整下去，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基礎。

王洪文有一種保衛幹部的小計謀，但是沒有宏觀上的雄才大略，文化水平一般，理論素養也比較差。但他比較成熟，在抓權、整人上有些辦法。不過，儘管他後來的地位比江青、張春橋高，但是他還是要聽命于江和張的。 61

正是由於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上可以直接洞悉毛澤東的真實意圖、在下可以直接操縱王洪文等人，上海的造反從1967年初起便已演變成奉旨造反。從1967年1月28日上海不服駕禦的造反派「紅二司」、「紅革會」、「炮司」、「反到底」被張、姚一夥鎮壓後，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總司」實際上已經演變成御用造反派。這並非今日的反思，而是「文革」中很多造反者的共識。奉旨與御用的性質，決定了以張、姚為首的上海市革委會及其各種行政舉措，純粹是直接遵從毛澤東政治意圖的官方政治行為，完全喪失了下層民眾奪權行動所具有的打破官僚秩序改善政治處境的深層含義——儘管在極權制度下這只是一個政治空想。

從這時起的整個「文革」期間，上海果然按照毛澤東的政治意圖事事都走在全國前頭：最早走上制度化新秩序的正軌，最早走上大聯合大穩定的正軌，最早走上「抓革命促生產」的正軌，最早走上恢復「階級路線」的正軌，最早走上「整黨建黨」的正軌，最早走上「無產階級新文化」的正軌。甚至很多專門針對全國造反派的行政舉措也是由上海首先發起：最先反對「經濟主義」，最先批判「資產階級派性」，最先抨擊「極左思潮」，最先純潔「階級隊伍」。對於最高統治者來說，當時的上海未必不是全國混亂局面中的一個理想境地。班子團結，政權有力，局勢穩定，秩序井然，經濟平穩，供應良好，文化嶄新。這正是毛澤東開展「文革」發動造反所希望出現的局面，他能不特別滿意嗎？難

怪張、姚二人不僅中共「九大」進了政治局，中共「十大」和四屆「人大」前者還成了政治局常委和國務院第二副總理。難怪毛澤東要特別看重上海造反派代表——不僅中共「九大」讓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陳啟峰、金祖敏進入中央委員會，中共「十大」還讓王洪文當上副主席，準備培養為自己的接班人。在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只有上海造反派有此殊榮。是的，上海市大奪權後的政治狀況和社會狀況以及造反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正是毛澤東理想預圖中的新型現實。他在近處的北京沒能實現的理想卻在遠處的上海得到了實現。

不僅「文革」中不少人問過，現在也還有人疑惑：除了打倒劉少奇奪回失去的中央權力，毛澤東發動「文革」鼓動造反——究竟還有什麼目的？其實，看看當時上海的局面這個問題就會有答案。不錯，毛澤東對全國似乎有過一個上海式的政治藍圖：以造反派代表取代「高幹」子女成為各級政權的接班人。

不妨設想：如果另外二十八個省份的革委會也是由張、姚式的人物主持，這些省份的造反派也像上海一樣順從地走上毛澤東指引的正常化軌道，全國的政局會是什麼樣子？肯定和上海一樣：一切都早早走上正軌，沒有造反派的分裂和武鬥造成的嚴重社會混亂、財產損失、生命傷害，造反派可以繼續保留群眾組織，一批家庭成份和政治身份都合格的造反派代表順利進入各級政權掌握權柄。除了改換一批新面孔、新名稱、新口號，整個社會生活又回復到「文革」前的模樣。造反派至少不會遭受1968年至1976年之間的那些打擊。而且，假如全國都這樣，說不定1976年10月的高層政變和隨後的全面清算也不會發生，中國社會將會在新型專制狀態下繼續運行。

想不到全國大多數地方的造反派，內心深處會認同「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這類伯恩斯坦式的觀點，就是拒不聽從毛澤東的統一部署和統一號令，拒不走上正常化軌道，不僅鬧分裂、搞武鬥、拒絕大聯合、抗拒解散組織，還要「揪軍內一小撮」、「打倒周恩來」、「反對革委會」……把毛澤東預定的運動期限一次又一次往後拖延。說他們非理性、非制度化、破壞成癮也好，說他們個性膨脹、派性衝昏頭腦、不爭氣也罷，總之這些難改的本性和其他更為複雜的因素，使他們硬要

脫離偉大領袖政治韁繩的駕馭。這不僅給他們帶來一連串的打擊，並最終將他們推向毀滅性的結局。這究竟是他們的幸運還是不幸？

倘若讓當今那些關心社會整體利益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來作道義選擇：在「文革」那個特殊的年代，他們會傾向上海這種馴服的造反派呢，還是會傾向另外二十八個省份那些不太馴服的造反派？不論怎樣，在我的眼裏它們之間有一個重大的區別：前者完全受控於毛澤東之手，後者沒有完全受控於毛澤東之手。這正是那些把上海造反派當作全國造反派典範來看待的「文革」研究者所忽視的關鍵！

站在民間的立場，我更同情後者。

在我看來，上海是「文革」中造反派偽掌權的典型。

余傑在追究余秋雨的「文革」歷史時，對大余從運動初期的「保守派」紅衛兵轉變為運動後期的官方「大批判」高手之事，疑惑不解⁶²。我以為，只要小余多一點歷史洞察力，能夠看透上海奉旨造反的性質，能夠看清上海對本地市民的「階級政策」很早就回到了以家庭成份為標準的舊軌道，能夠看懂那些家庭出身可靠又自負文才的青年希望通過官方道路出人頭地的正常心理和現實可能，大余的「轉變」就會合情合理，一點也不突兀。這也是戴厚英在上海文化界的政治紅人形象一直沒有調換的真實背景。例如在上海海運學院：1968年「工宣隊」進校後，就一直依靠保守派，排擠和打擊造反派，直到「文革」結束⁶³。上海所有高等院校的情況幾乎都是這樣。

我有一個記憶：對「文革」後期包括上海在內官方名為「鬥、批、改」的正軌言辭和正軌舉措，原保守人群本能地擁護，原造反人群則本能地反感。大餘無疑屬於前者。

這種正軌舉措，至少包括五大類：一是重建各級中共黨委和工、青、婦組織。二是恢復「階級路線」和批「極左思潮」、批「資產階級派性」。三是中央和省級那些引導政治方向、左右輿論主流寫作組的官面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寫作組「梁效」，文化部寫作組「初瀾」、「江天」，中央黨校寫作組「唐曉文」，北京市委寫作組「洪廣思」，上海市委寫作組「羅思鼎」，上海市委文藝組寫作組「石歌天」等。現在時有文字將這些寫作組稱為「造反派」，可能

是實在找不到其他的貶義命名辭彙了。其實，這些寫作組不僅直接由官方組織和領導，其成員也基本上沒有原造反派，大多是長期習慣於作「馴服工具」的中共黨內知識份子，其中相當部分人屬於「文革」前兩個階段中的「保守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四是「工農兵上大學」之類「上層建築領域的改革」。五是當時官方新聞媒體大肆炒作而名噪一時的「先進典型」，例如在高校招收工農兵學員文化考查中「交白卷」而意外出名的張鐵生，反對所謂「師道尊嚴」的小學生黃帥等。其中，為廣大苦難知青「告禦狀」的李慶霖，反對「走後門」的柴春澤，受到廣泛讚揚。因為他們的行為表現了民意。現在有人把他們稱為「造反派」，純屬混淆官方正軌行為與民間越軌行為的區別。他們不是原造反派組織成員，更沒有像原造反派成員那樣在對各級當權派的造反和奪權中出名。恰恰相反，他們都是官方特別樹立的典型。

大余顯然屬於這時自覺融入官方正軌體系的保守傾向知識份子。其正統而保守的傾向，甚至一直延續到十多年後的散文創作中。

北京市革委的性質與上海相似，但造反派代表擔當的角色與上海不同。市革委主任謝富治由毛澤東欽定，「五人紅衛兵領袖」等造反派代表有職無權——而且1968年8月便遭到驅逐，市革委實際變成了謝富治同時掌管的第二個公安部，成為毛澤東進行高層政治鬥爭的直接工具。

對北大聶元梓的造反也需具體分析。

聶元梓學生身份和紅衛兵名義的造反我歷來心存疑議。論年齡她當時已四十五歲，不再是青年，並不屬於成年人年齡圈層的邊緣人；論地位她是校黨委委員和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行政十二級——屬中共的高級幹部級別，也不屬於學生成份圈層或教師等級圈層中的邊緣人；雖然「四清」中因左傾表現而受過衝擊，但「文革」之初並未遭到迫害。她造反之理何在？從同她一起寫那張造反大字報的七人都是哲學系的共產黨員這點看，她的造反動機可以歸為前面所指黨政機關幹部造反的最後兩種情形，明顯屬於學校權力圈層邊緣人士的反叛。其中不排除懷有政治投機心理。

「文革」前不少青年文人都懷有這種心理。特點是隨時觀察高層政治鬥爭動向，揣摸領袖的政治意圖，然後把握時機孤注一擲，先聲奪人，

以期驚動天子引起重視，青雲直上。投機必有風險，有些人的確猜錯聖意倒了大霉。但也有個別幸運兒一鳴驚天下，獲得豐厚回報，例如姚文元1957年6月10日「反右」之初對上海《文匯報》「資產階級方向」的批判。政治投機，不只涉及個人品質，更是病態社會的必然產物。投機者大多心懷政治抱負，只因難捱長途跋涉和艱難攀升之苦，始有投機之舉。聶元梓的造反行為與此很相似。她為首貼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時間是1966年5月25日，6月2日《人民日報》即秉承毛澤東的旨意刊登其大字報並寫評論員文章支持，其間並未像蒯大富那樣遭受迫害。她所投者，毛澤東欲以北京市委作為「倒劉」突破口之機是也。果然，6月4日毛澤東就趁聶大字報所造之勢，撤銷了北大陸平、彭佩雲的職務，並公佈了北京市委的改組。

聶元梓雖然冒領著「大學生造反紅衛兵領袖」的名義，但她屬於學校權力圈層邊緣人物的真實身份，還是使她的造反動機、造反物件、造反目的很難跳出這個歷來傾向於正統甚至保守的藩籬。難怪毛澤東戲稱她「老佛爺」。難怪她領導的北大造反者一直顯得「老右」。難怪她領導的北大造反者整「反動學術權威」最凶。難怪她領導的北大造反紅衛兵在全國各地慣于支持保守派和造反穩健派。難怪「新北大」內部有人殺出，另立名為「井冈山」的山頭。據我所知，當年許多造反派皆持此議，只因聶元梓是毛澤東親手樹立的造反旗杆，才不敢將其砍倒。

只有在五級政府權力系統之外某些具有造反派掌權意味的基層單位，情況稍有不同。這些單位，有的屬於革委會主任的首要職位由造反派代表擔任，進入革委會的幹部代表也由造反派選定，造反派代表有職有權，可以自行處置職權範圍內的一切事情；有的革委會正職雖然由軍隊代表或幹部代表擔任，但他們要麼顧及和造反派的利益聯繫，要麼懾于造反派代表的群眾力量，所以只有通過依靠造反派代表來行使權力。

遺憾的是這樣的單位不多，這樣的局面維持時間也很短暫，在全國不具普遍性。

不具普遍性是必然，因為造反派即使有機會掌權也無能力用權。

這也難怪。十七年來，中國的政治管理資源一直被官僚階層所壟斷，平民階層早已養成唯令是從的習慣，突然間由奴僕變為主人，豈能

不手足失措？雖然一年來的造反經歷多少喚醒了一點當家作主人的意識，但坐在辦公室裏處理繁雜事務的刻板生活，畢竟不能與大哄大鬧的群眾運動場面相比，他們很難適應自己從社會邊緣到社會中心的角色大轉換。於是人們看到，這些單位手握權柄的造反派代表，要麼板起新官僚面孔，以整治舊的「黑五類」和「文革」中新揪出的「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反革命分子」為權力支點，按部就班地行使管理職權；要麼恢復造反派本色，經常從人群中發現「階級鬥爭新動向」，在人與人之間製造「路線鬥爭新矛盾」，使自己不斷地處於各種矛盾和鬥爭的漩流之中而不能自拔。多數掌權造反派代表趨於後一種走向。當時有位「右派」中的有識之士曾在我面前痛惜地評價他們：只能破壞而不能建設。

2001年11月，國內一位第三代詩人為拍一部回顧大陸80年代民間詩歌運動的專題片專程來訪。他發現西方後現代主義的反人、反文化和解構思想，可以在中國的紅衛兵運動中找到源頭。我告訴他：後現代主義的反人、反文化與官辦紅衛兵的反人、反文化看似相同，但後現代主義的反人、反文化是一種觀念，要義是反人的文化性和反文化的神聖性，官辦紅衛兵的反人、反文化則是一種行動，表現為對弱勢人群的野蠻迫害和對優秀文化的瘋狂破壞，二者不可同語而論。後現代主義與造反派看似有相同的解構衝動，但後現代主義的解構物件是藝術文本，造反派的解構物件是政治權力，二者絕不同源。造反派只有一點和後現代主義相同：只能解構，不能建構。

不能建構也就是不能建設。所以造反派即使掌權也難以普遍更難以持久。

1968年7月27日，首都「工宣隊」在軍隊配合下開進清華大學，制止造反派之間的武鬥。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派工宣隊進學校的通知》。從此，「工宣隊」進入全國各地大中學校，小學則由「貧宣隊」進駐，任務是領導學校的「鬥、批、修」。那些曾由造反紅衛兵頭頭擔任革委會主任的人中學校，實際領導權逐漸轉移到「工宣隊」手中，造反紅衛兵掌權的歷史宣告結束，自己的政治處境也從中心再次退至邊緣。

直接原因是毛澤東認為他們不聽話，已經走向反面。

「工宣隊」、「貧宣隊」和「軍宣隊」，多數由家庭成份好的原保守派或持保守心態的人員組成。他們進校後對依靠物件、團結物件、孤立物件、打擊物件的認定，不再以「路線站隊」為標準，而是實際恢復了「文革」前的階級政策——以家庭成份和政治身份為標準。

從這時起直到「文革」結束，北京及全國所有大專院校發生的迫害知識份子事件和製造的冤、假、錯案，主要責任人不再是造反紅衛兵，而是「工宣隊」和「軍宣隊」。

以清華大學為例：1969年有教職工6000多人，被審查1228人，被定為敵我矛盾178人，100多名教授被定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批判，「清隊」運動頭兩個月就有10餘人被迫害致死。這都是掌權的「工宣隊」和「軍宣隊」一手製造的。⁶⁴

鄧小平之子——北京大學核子物理系學生鄧樸方，1968年8月遭受迫害，最後導致高位截癱，也發生在「工宣隊」進駐北大後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並非純粹北大造反派之所為。

迄今世人皆以為「臭老九」是造反派對知識份子的蔑稱。其實「臭老九」這個稱呼，也是這時由蔑視文化的「工宣隊」和「軍宣隊」發明的，而且所針對的知識份子，首先就是此前掌權的造反派大學生。

在那些本來就不存在掌權條件的五級政府系統革委會和更多基層單位革委會裏，造反派的掌權更是一種虛幻。不只因為自身的局限，更因為毛澤東已將依靠力量改換為軍隊。

第二節 軍人掌權時期

1967年3月2日，山東省「三結合」革委會成立，毛澤東指示軍隊代表必須參加到此前只有群眾代表和幹部代表的各級權力機構中去。軍人掌權此時初露端倪，並在一年半以後整治造反派時得以確立。

此前所成立黑龍江、上海、貴州、山西、山東五個省級革委會，軍隊代表總共只有四人，而且都擔任副職。此後，除這五個省市和多數大城市的高等院校之外，不僅全國各地各級革委會的一把手職務普遍由軍隊代表擔任，而且省、地、縣三級革委會內設的六大職能機構——政工

組、組織組、宣傳組、辦事組、人保組、生產組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也大多為軍人。革委會的權力核心，名義上是包括造反派代表和幹部代表在內的常委會，但常委會內部還有一個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組長都由軍人擔任。這就使得幹部代表的實際作用只相當於參謀，造反派代表的實際作用純粹是陪襯。1949年10月1日以來一直處在政府權力圈層之外的軍人，從此進入行政權力的中心。

我手中有一份國內「文革」研究學者何蜀提供的資料——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初常委以上成員名單。從中可以看出：在總數956個常委中，軍隊代表191人，約佔百分之二十；幹部代表369人，約佔百分之三十九；群眾代表396人，約佔百分之四十一。看起來軍隊代表並不佔絕對多數。可是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除了上海、山東、黑龍江、山西、陝西、天津、河南、河北這八個地方是幹部擔任革委會主任和核心小組組長，其他二十一個革委會的主任和核心小組組長都是軍隊代表擔任——這個比例佔到了省級革委會的接近百分之七十三。

例如我所在地區：地革委由25人組成。兩派造反派共佔16個代表席位，每派8人（其中副主任2人、常委2人、委員4人）。兩派共推薦幹部代表6人，每派推薦3人（其中副主任2人、常委1人）。軍隊代表3人：軍分區1人擔任主任，鐵道兵八八一五部隊1人擔任第一副主任，鐵道兵八七八五部隊1人擔任第二副主任。如果只看名額，軍隊代表不僅在委員中佔絕對少數，就是在常委和副主任中也只能分別佔到接近六分之一和略高於四分之一。然而在黨的核心小組——這個由5人組成的決策圈裏，軍隊代表就佔3人——還是組長和副組長，幹部代表佔2人——僅為一般組員，沒有一個造反派代表。而且按照當時的不成文規定，軍隊代表擔任革委會主任，六大職能機構的負責人和主要工作人員也由部隊派人組成。

這是毛澤東依靠林彪掌握的槍桿子整倒劉少奇之後又要控制全國政局的時期，這是林彪被中共《黨章》確定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時期，這是大批高層軍人進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的時期，這是「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的時期，軍人掌權天經地義無人不服。

軍隊代表一般來自擔負當地「支左」任務的地方部隊、野戰部隊、工程部隊。因為各地的駐軍情況不同，軍隊代表的構成也很不一致：有的地方只有單一的地方部隊代表，有的地方既有地方部隊代表又有野戰部隊代表，有的地方三種部隊代表俱全。

從省級革委會的情況看，軍人掌權的始初形態有多種類型：一種是單獨支持造反派類型，例如北京、上海、貴州。一種是單獨支持保守派類型，例如廣西、西藏、新疆。一種是分別支持造反派兩大派類型，例如雲南和四川。一種是分別支持造反派和保守派類型，例如天津和寧夏。在很多造反派與保守派或造反派兩大派並存的省份，也有不少地方和單位一直是一派力量佔絕對優勢，軍人掌權也就屬於單獨支持一派類型，例如四川省的多數高校和宜賓、白貢、內江、樂山等少數地市。

凡是存在兩支以上觀點對立的「支左」部隊的省份，省級及其以下各級革委會中哪一支部隊佔優勢，主要取決於哪一支部隊的代表擔任革委會主任職務。而這些地方的群眾組織在革委會中和在社會上究竟哪一派佔優勢，也完全取決於擔任革委會主任職務的軍隊代表具體支持誰。由於軍人掌權時期高層政局多變，這類軍隊代表難免上掛下連地犯「路線錯誤」。於是擔任革委會主任的軍隊代表就會換人，而六大職能機構——從負責人到主要工作人員就會同時大換班，導致政權易主，曾經居於優勢的部隊和群眾組織也就變為劣勢，曾經處於劣勢的部隊和群眾組織也就變為優勢。此一時矣彼一時矣。在省會城市為大軍區首腦機關所在地的地方情況略為特殊：省革委主任一職一般由大軍區政委或司令員擔任。他對轄下幾支觀點不同的部隊及其分別支持的兩派群眾組織，雖然主要起調停和權衡作用，但也難免有傾向性。當高層「路線鬥爭」的風向發生改變時，他的站隊是正確還是錯誤，同樣決定著兩支部隊和兩派群眾組織處境的變化。大軍區首腦調動或部隊換防，有時也會帶來這樣的後果。

軍人掌權初期的各級革委會，單獨支持一派的與分別支持兩派的，權力運作力度必然不同。一般而言，在前一種情況下，權力內部無抗衡因素，權力容易集中，權力運作更容易走上正軌。例如軍隊單獨支持一派造反派的貴州省，很早就轉向了恢復社會秩序、進行革命大批判、發

展生產的軌道，甚至一度給外省造成「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印象，1968年6月我和幾個青年朋友曾準備前去考察。在後一種情況下，權力內部充滿對抗，權力容易抵消，權力運作不易轉向正軌。例如雲南和四川兩派造反派長期對立，社會生活難以恢復正常，甚至讓外省人聞之色變。

對於下層民眾而言，走上正軌未必就是好事，因為這同時意味著以整黨外民眾為重心的「階級鬥爭」路線的恢復。

可以說，「文革」中的第二批冤、假、錯案，大多是在這個時期軍隊單獨支持一派造反派或保守派的地方製造出來的。

因為這時正值全國範圍相繼開展轟轟烈烈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中國1950年以來的權力威信，一直是以整人為支點建立起來的，「文革」中的最高權力及各級革委會，仍然處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大框架之內，整人特性有增無減。這兩個運動開展于「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大背景下，政治含義自然是整肅——通過「殺雞嚇猴」強行將全國依然混亂的局面扭向正軌。清理和打擊的對象自然是下層民眾。這是「文革」初期由官方發動並有官辦紅衛兵參預其中的整群眾運動收場數年之後，中共中央通過各級革委會，第一次在全國範圍將鬥爭矛頭轉向下層民眾。

「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對象是：「混進革命隊伍內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隱藏在陰暗角落裏從事搗亂和破壞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等國民黨殘渣餘孽。」為了明確整治範圍，中共1956年3月10日制定的《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被重新起用。重點打擊對象是民眾中新生的「反革命分」、「壞分子」和歷史上漏劃的「地、富、反、壞、右」。那些早成定案的「黑五類」和「反動學術權威」，自然逃脫不了再揭發再批判再鬥爭之苦。雖然中共中央在劃定這個運動的清理和打擊物件時不得不列上「頑固不化的走資派」，但在運動實踐中「走資派」很少包括在內，造反派卻未獲特赦。「一打三反」的內容名義上是「打擊反革命、反貪污、反浪費、反盜竊」，但其中的重點是「打擊反革命」。實踐中被重點打擊的人，往往又是那些對現實多有不滿言論的原造反派頭目和骨幹分子。有些省份簡

直把這兩個運動變成了對造反派的清算。例如在湖南省的「一打三反」運動中，湖南省和長沙市的所有原造反派頭頭和骨幹人員——從中共中央委員唐忠富和省革委副主任胡勇，到街區小廠和街道居委會的原造反派負責人，全部被整肅，無一倖免。其中少數人被槍決，部分人被捕入獄，大部分從各級革委會中開除同時進行批鬥，再關進所謂「學習班」實行隔離，短者數月，長者近一年。

僅僅兩年時間，毛澤東的注意力就轉了一個圈：從鬥爭黨內「走資派」的高弧線重新回到鬥爭黨外「階級敵人」的低起點。起點即是原點，它同時是中共極權統治不可動搖的基點。

在軍隊單獨支持一派造反派或保守派的地方，這兩個運動一般都搞得轟轟烈烈和卓有成效。掌權軍人大多有三個特點：鬥爭覺悟高，權力欲望強，行政能力差。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他們原本處於行政權力之外；有幸進入權力中心後，對革委會職權範圍內日常生產與生活方面的小事本能地缺少熱情，內心真正渴望的，是與自身「紅五類」的等級本能和「武裝工作隊」的身份特徵相一致的大事——整治下層民眾中的「階級敵人」。兩個運動正好給他們提供了施展特長的大好機會。此前，軍人當權者的行為大多受派性傾向驅使並被群眾代表和幹部代表的抗衡作用所制約，其掌權還限於形式。這之後，隨著毛澤東「文革」方針的轉向和群眾組織的解散，造反派代表失去了組織依託和群眾基礎，軍人也逐漸找到了主政的利益基點和角色感覺，掌權狀態開始進入實質。從實行「三結合」方針時起便開始起步的軍人掌權，自此完全確立。

這些地方革委會中倖存的造反派代表則處於一種迫不得已的境地。自「文革」開展以來，造反派便逐漸形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過敏心理：每當看到查祖宗三代和矛頭向下整「階級敵人」，就會無法抑制地感到心緊並惶惶不可終日。這是十七年的政治運動和「文革」以來的多次政治反復，在心理上造成的慣性反應。因為造反派中「黑五類」子女和檔案中有「問題」的人較多，因為「文革」之初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隨後的「二月鎮反」整的就是這些人，因為一直成為保守派和「支左」部隊攻擊造反派頭號政治口實的就是這個問題。一旦矛頭指向這些人，必然會牽連到整個造反組織，影響到對造反大方向的肯定，他們能不緊

張嗎？正是懷著這種心理，「文革」中多數造反派對已成「死老虎」的「地、富、反、壞、右」一類人，深懷兔死狐悲之感而暗自同情。然而，高層的偉大部署誰也不敢怠慢，作為新生紅色政權的代表，也該在打擊「走資派」的「社會基礎」方面拿出魄力，才能證明自己的正統和清白，並震懾世人的非議。他們只能跟著行動起來。

於是在這些地方，一大批新生的「階級敵人」被揪出，輕則定性戴帽，重則轉由公檢法機關定案處理。老的「黑五類」及「反動學術權威」沒能倖免於難，除了遭受又一次的交待、批判、陪鬥，不少人還因為「老賬新賬一起算」而獲升級待遇——抓捕判刑。一些造反中人也沒能躲過，有的因武鬥問題，有的因「惡毒攻擊」問題，有的因「漏劃」問題，紛紛被新生紅色政權揪出，少數戴帽監管，多數鋸鐐入獄。他們大多是下層黑色人群。

支持造反派的軍隊為何會轉而大整造反者呢？道理其實很簡單：軍隊對「文革」中的造反運動，在心理層面歷來持保守立場，全國範圍的「二月鎮反」足以證明，即使對後來所支持的造反派的認同，也僅限於共同利害關係基礎上的淺表認知層面。一旦政治形勢使他們產生更高、更大的利益需要，他們便難免回復到既有的保守立場，借機對造反派進行清算。

軍人中也有少數內心真正傾向造反派的官兵。他們要麼畢業於軍事院校並走上領導崗位，視野比較開闊；要麼講人性重感情，對造反派中那些個性張揚才能突出的人非常羨慕和推崇，絕不計較其家庭出身，為人十分可愛。有的人甚至因支持造反派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有的人「文革」後仍然以昔日造反者為友。

四川省某市「文革」初期的軍分區司令員L，畢業於軍事院校並領大校軍銜，民眾造反運動興起後便態度鮮明地支持造反派。1967年2月，四川省因中央軍委《二·七公開信》下達而開始全省範圍的「二月鎮反」時，他仍然在軍分區黨委會議上不同意對本市造反組織採取鎮壓措施。後因孤掌難鳴被迫通過鎮壓決定，他便藉口有病——避開參與鎮壓行動。同年4月初，《人民日報》發表〈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的社論，他主動提出由自己承擔全部責任，立即改正鎮壓錯誤，但被軍分區黨委

堅持保守立場的多數人否決。萬般無奈之下，他選擇了開槍自殺來結束左右為難的痛苦。

L的警衛員N，1967年底與本市造反激進派黑色子弟Z建立了真摯的友誼。不僅1970-1972年造反派挨整Z入獄時這份友情依然繼續，甚至1976年「文革」結束N升調省軍區工作後這份友情仍然保持。

遺憾的是軍隊裏即使有這樣的人，也難以改變極權制度賦予直接暴力組織的保守性質和鎮壓功能。

這不等於說軍隊分別支持兩派群眾組織的地方就敢按兵不動。還得動。只是因為兩派軍隊、幹部、群眾代表的對立存在和不斷糾紛，多少渙散了革委會的權力，加之矛頭下指必涉及兩派中人，難免引起派性衝突，這才使得兩個運動的力度有所減弱。這些地方同樣深挖出了不少新、老「階級敵人」，儘管數量較少。

我參加過所在地區革委會在廣場召開的兩次萬人大會，內容是對「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中揪出的「階級敵人」進行公捕、公判。雙手反綁、胸掛黑牌、弓身勾頭排列於台前的新、老「階級敵人」達數百人之多，其中不少是造反派一派掌權單位中熟識的造反派成員。數百人大多被逮捕、判刑，只有少數宣佈戴帽後押回單位監管。

1999年有朋自遠方來。朋友肖玲，是妻子白小的好友，與丈夫一起留學美國，後移居香港，此次回國探親，轉道來訪。一日閒聊，她談到自己的公公曾于1968年被造反派抓捕並判刑十二年的事。我告訴她：1968年社會政治生活已開始納入了各級革委會的制度化軌道，而且是軍人掌權。雖然「紅五類」出身的造反派代表進入了各級權力機構，但他們要麼徒有虛名，要麼被體制同化，不可能代表造反派行使權力。而且，造反派從誕生之日起直到「文革」結束，包括其鼎盛時期的1967-1969年，從未掌握過公、檢、法的專政權力，不僅無權抓捕和判處任何人，反倒是他們一次次被公檢法抓捕和判決。她很驚訝，感到聞所未聞。這也難怪：「文革」爆發之年她剛出生，對造反派的瞭解，僅限於1976年以來的官方宣傳、文人誤言和民間傳聞。

據參加過審訊「四人幫」的一位法官提供的一份關於「文革」中重大冤案的資料：內蒙古「內人黨冤案」，受迫害人數達34.6萬，迫害致

死16222人。雲南「趙健民特務冤案」，受迫害而死者14000人。河北「冀東冤案」，受迫害84000人。含冤屈死2955人⁶⁵。據我所知，這些冤案都發生在官方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中，受害者不少是造反派群眾和傾向造反派的幹部，直接責任人則是掌權軍人。

這是發生在1968年底至1970年底的事，正值軍人掌權的高峰時期。「文革」中的第二批冤、假、錯案，便是這個時期的這兩個運動集中制造出來的。此類事件的主要責任人不是造反派而是軍隊。

相反，1968年內蒙古軍人政權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瘋狂「挖掘『內人黨』」的時候，最先站出來反對的正是內蒙造反派：1968年1月，內蒙工會造反組織「東方紅聯隊」負責人王見喜等七人去「挖肅」運動成績最顯著的地區搞調查，寫回了堪稱內蒙古最早的反「挖肅」宣言書的報告。受到官方壓制後，王見喜等七人又在黨委大院貼出矛頭直指自治區當權者的大字報。直至同年6月22日他們被打成「七人反黨集團」，遭到批鬥和逮捕。⁶⁶

軍人掌權的局面，直到林彪集團倒臺後的1972年秋才開始改變，在全國範圍徹底結束，則要延至毛澤東提出「兵回營，權歸政」兩年後的1974年底。

將軍人掌權時期製造的大批冤、假、錯案，一概歸咎於造反派，無疑于將軍人及其所控制的公、檢、法機關歸入了造反派範疇。這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很欠公正。事實上，從進入實質性的軍人掌權時期起，造反派就開始成為挨整對象了。

令人驚訝的是，一些貨真價實的刑事犯罪分子，卻在這個時期得到了優待。

1966年8月參與屠殺北京大興縣黑色民眾及子女的一個綽號「屠戶」的村幹部，1969年左右被無故釋放⁶⁷。我所在城市第二中學的教師敗類張文藩，強姦所管班級近十名剛進初中的女學生，于1966年初「四清」運動後期逮捕關押，卻在1971年下半年監獄裏造反派爆滿之時，被釋放回原單位。這樣的例子全國很多。真可謂愛恨分明！

我想起一件往事，時間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一年多之後的1980年。我碰見一位元老熟人——地區公安處直屬看守所的老所長。前

幾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剛公佈了一條消息，大意是已為「四人幫」假手全國公檢法機關製造的四百三十多萬件冤、假、錯案平了反。老所長的談話內容自然是圍繞這個話題。他先是咒罵「四人幫」，接著便轉向造反派——指責造反派如何砸爛公檢法、整人害人、製造冤假錯案……憤慨之情溢於言表。我問他被造反派整過沒有，他哈哈笑答：只有自己整造反派的份兒，輪不到他們整自己。我相信他說的是真話，因為他任所長的看守所，從「二月鎮反」起一次次關押過的造反派不下千人，很多人都享受過慘無人道的虐待。我又問在他管轄的看守所「文革」期間關押過的犯人，哪一個是由造反派批准拘捕後送進去關押的？哪一個又是經造反派判決後押走執行的？他一時語塞。我接著告訴他：「文革」中造反派從來沒有奪過公、檢、法的權，公、檢、法歷來由「軍管會」和隨後的「革委會」控制。即使公、檢、法人員有派性傾向，也從不敢聽命於某一派造反派而自行其是，他只能聽從「軍管會」或「革委會」的指令。他的傾向性最多表現為抓捕同觀點的人時客氣點、抓捕對立觀點的人時兇狠些。全國四百三十多萬件冤、假、錯案，大都是積極聽命于掌權軍人的公檢法人員一手製造的，與造反派毫無關係。反之，造反派在「文革」中倒是多次被大批抓捕，而且每次的抓捕和釋放都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式，也沒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續。抓捕和判處他們的人，正是聽命於「軍管會」和「革委會」的公、檢、法人員。老所長承認這是事實，然後快快而去。

第三節 幹部掌權時期

幹部掌權時期的開始正好與軍人掌權時期的結束相銜接，從局部開始到全面確立的時間跨度是1972-1976年。這是林彪倒臺後改由周恩來主政和鄧小平復出輔政的時期。

這時革委會中的領導幹部大體分為四種：

第一種是由於特殊關係和特別需要中央直接指定進入革委會的，例如黑龍江省的潘復生、山東省的王效禹、河南省的劉建勳、四川省的劉結挺和張西挺。他們過去有的人處在權力圈的中心，有的人處在權力圈

的邊緣，有的人被逐出了權力圈，現在大都進入省級革委會。因為高層「路線鬥爭」的牽涉，他們的好景都不長。

第二種是十七年中受過壓制挨過整，「文革」中造反派發現他們當年導致受壓挨整的主張和行為，其實是忠於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於是堅決支援他們揭批「走資派」的迫害罪行，積極為他們翻案，並力保他們作為「革命領導幹部」進入各級革委會；但是除了極少數一派造反派佔優勢的地方和單位外，他們很少能進入各級革委會——因為對立派的反對。他們過去實際上已離開權力圈，現在重返權力中心的努力很少如願。

第三種是分別由兩派群眾組織保舉並得到雙方認同而進入各級革委會任職的幹部，在軍人掌權時期他們大多擔任副職。他們過去大都處於權力圈層的邊緣與中心之間的過渡地帶，現在進到接近中心的位置，可以說比過去進了一大步。

第四種是在此期間陸續由上級權力機構宣佈「解放」進入各級革委會的。他們大多是「文革」前各級黨政權力機構的一二把手，自然處於權力圈層的中心，後被造反派炮轟打倒而退出權力圈，現在又東山再起返回權力中心——重新擔任各級政權機構的一二把手。

從何蜀提供的上述資料推論：在全國二十九個省級革委會中，前三種領導幹部佔到常委總數的約百分之三十九；第四種領導幹部則至少佔據軍隊代表所讓出的約百分之二十的空位——這還不算1967年成立省級革委會以來，因前三種領導幹部逐漸淘汰和造反派代表逐漸落馬所發生的比例變化。

其中，自然要數第四種領導幹部的權力生涯最長，他們多數維持到極不情願地光榮退休。

「權歸政」主要是歸於第四種幹部。全國範圍的「大歸政」與1973年鄧小平復出大致同步。「兵回營」給各級革委會留下的權力空位大多由他們填補，不僅革委會、核心小組一二把手職務都由他們接任，而且一大批「文革」前的機關幹部，也在他們的關照下，紛紛走上各級革委會六大職能機構的領導崗位。造反派原先保舉進革委會的領導幹部依然只能處於附屬地位。在全國範圍，無論五級政府權力機構還是兩類單位

權力機構，政權構成基本上恢復到了「文革」前的格局。造反派在此時期指責的「回潮」、「復舊」、「復辟」，就是針對他們。

十七年來，作為中國官僚階層的主體，各級政權機構中的領導幹部原本就最保守，即使那些被造反派保進各級革委會而暫時與造反派有著共同利害關係的「革命領導幹部」，在心理層面對「文革」中下層民眾的造反，也暗藏敵意。要想讓這些填補軍人權力真空的東山再起者改變既有的保守立場，無疑癡人說夢。「復舊」之勢在所難免。

然而客觀地看，在幹部掌權的1972-1976年，他們並沒有變本加厲地整更多的人。不是他們本性已經改變，而是所面臨的形勢不允許他們故態復萌，而「文革」中受到的衝擊也使他們多少變得審慎。

掌權期間，他們主要做了三方面的事。第一是收拾軍人掌權留下的爛攤子，同時為軍人掌權時期受迫害的群眾和造反派落實政策。第二是開展1972年的「批林整風」和1975年的「全面整頓」運動，雖然整了一些造反派，但沒有涉及更多民眾。第三是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和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遭受輕度驚嚇，忙於為造反派落實「平反」和「高抬貴手」政策。

儘管他們內心對下層民眾的造反懷有敵意，但在掌權期間的確比較收斂，較少整人。有的人反而為了替受害造反者和其他群眾落實政策，而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10月以後

我所在地區1976年10月之前的最後一任地革委主任和地委書記辛易之，就是這樣一個無辜受害者。他曾任重慶市「文革」前的市委副書記，一介知識份子，「文革」中被打倒，在1967年4月中央解決四川省問題的專門會議上，遭到過江青點名指責。1972年調西昌地區擔任黨政一把手。上任之後，他頂住尚未回營的軍人政要們的巨大壓力，積極為此前被軍人政權錯捕、錯判、錯戴帽的造反派和其他幹部、知識份子及普通群眾落實政策，並解決各種涉及他們工作和生活的具體問題。幾年中，由也親自督促而落實政策的受害者不下百人。1976年遭到造反派衝擊時，仍不計個人恩怨，盡力為各種受害者解決多年遺留的問題。這麼一位「文革」中罕見的正派幹部，卻在1976年10月以後的「揭、批、查」運動中，被他的副手——地委副書記L以「支持造反派篡黨奪權」的

罪名加以陷害，受到省上「公開點名批判」並撤職的處理，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幹部掌權時期沒有大規模整人，不等於沒有整人。這個時期仍然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主要責任者是撤銷「軍管會」後同樣繼承「階級鬥爭」傳統的公、檢、法機關。

1976-1979年對造反派的總報復和總清算，倒是由掌權幹部實行的，但那是結束十年「文革」之後的事了。

我手中有一套書，書名《春風化雨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1979年9月所成立中央機關處理上訪問題領導小組辦的《上訪通訊》編輯室主編，群眾出版社1981年出版，內部發行。全書由1979年9月至1980年2月全國各地所受理和處理的數百萬起上訪案件中精選的120起案件彙編而成，共838千字。時間跨度為1950-1977年，這120起冤、假、錯案涉及的政治運動包括「鎮反」、「反右」、「反右傾」、「四清」和「文革」——後者又具體包括1966年5-10月的「批判『三家村』」和「破四舊」運動、1968-1970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1968-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運動、1976年的「追查反革命」運動。書中文章都為省委及以下各級黨委直接組織專職部門和專職人員撰寫，一般都有案件的責任人。遺憾的是，我反復翻閱發生在「文革」中的近百起案件的記述，除了在一起案件的責任人中有一個官方的縣革委常委兼紅代會主任，勉強可算造反紅衛兵之外，竟然再也找不到一個案件的直接責任人是造反組織或者造反成員。要知道處理這數百萬起案件和出版這部書的1979-1981年，正是全國上下對造反派進行大揭發、大批判、大查處的時候，凡是他們幹過的破事，無不被極度誇張地公佈出來大肆渲染，絕無掩蓋的餘地。造反派在這些案件的被告席上的缺席，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他們確實製造了成千上萬的冤、假、錯案，但被《上訪通訊》編輯室有意或無意地漏選了；二是由於他們從未掌握公、檢、法和革委會大權，加之人員成份比較複雜，做事底氣不足，所以確實沒有製造什麼針對普通民眾的冤、假、錯案。

注釋：

- 60 參見何蜀：〈對「文化大革命」歷史分期的思考〉，美國：《文革博物館專集》153期，2002年12月2日。
- 61 亞衣：〈工人造反派與中國人權運動——訪原上海「工總司」負責人潘國平〉，美國：《北京之春》，1996年9月號。
- 62 余傑：《在困惑中掙扎》，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年5月，第246頁。
- 63 劉小雁編：《關於不會說假話的中國人的故事》，西安：華嶽文藝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78頁。
- 64 劉魯風、何流、唐玉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第380頁。
- 65 葉永烈：《文革名人風雲錄》，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438頁。
- 66 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社，2002年7月，第72-76頁。
- 67 邁羅文：《我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5月，第153頁。

第六章 受迫害的造反派

「文革」十年以及「文革」結束後的十多年，除了1967年5月至1968年8月這段時間之外，造反派都在多次遭受政治迫害，受迫害時間比成為主流社會政治力量的時間多出好多倍。對於今天以捍衛人權的名義極力否定造反派的人來說，這近乎天方夜譚，但卻是事實。

第一節 「文革」中的三次政治迫害

1966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迫害：

第一次大迫害是在1966年5-10月。各級黨政當權派和工作組將無數「黑五類」和其他下層民眾子女打成「反革命」、「右派」、「小黑幫」、「小三家村」，包括被劃成「三、四類」的，全國受害群眾不計其數。受害範圍遍及學生、教師、幹部、職員、藝員、工人、農民、知青、居民。方法極端，手段殘忍，很多地方還整死了人。

仔細區分，這次迫害可分四種形式：一是按劉少奇指示派到各大中學校的工作組，將鬧事學生和教師打成「反革命」、「右派」，最著名的要數「清華大學事件」和「西安交大事件」。二是學校黨組織和保守紅衛兵批判、鬥爭、甚至殘害教師中提意見或沒提意見的黑色出身者，最著名的是北京五十二中學「鄭兆南事件」。三是文藝系統黨組織仿照毛澤東在北京揪「三家村」的做法，紛紛揪鬥小「三家村」、「四家店」。四是文化教育系統之外各種基層單位黨組織仿效以上三種做法，將黑色子女、政治嫌疑人員、成名成家思想嚴重者、提意見反領導者，打成「反革命」、「反動分子」、「右派」、「三、四類」。

某些省份對此還有創造性的發展。例如中共湖南省委就於1966年9-10月搞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抓黑鬼運動」，將很多此前支持造反紅衛兵的工人、幹部、教師、職員和其他市民打成「黑鬼」，實行關押和批鬥。

北京市僅二十四所高校就有上萬名學生被打成「右派」、數千名教

師被打成「反革命」，一個北京林學院被打成「反革命集團」的學生就有100多人。西安交通大學有1000多人被鬥爭，多人被逼自殺。⁶⁸

我所在地區的西昌縣縣級機關有幹部543人，劃為「三類」的51人，佔百分之九點三，劃為「四類」的33人，佔百分之六，打擊面達百分之十五點三；副縣級領導幹部5人中2人劃為「四類」；對劃為「三、四類」的人進行殘酷的批判鬥爭。我所在的西昌縣星火青年農場有知識青年163人，定為「三、四類」30多人，打成「陰謀集團」10多人，兩個分場的團支部書記都姓蔣，又都是農場最漂亮的姑娘，僅僅因為是「黑五類」子女，便被定為「篡權」，都被批鬥致瘋。

當時中國的城市人口超過一億。只以五千萬作為基數，而且將打擊面降為百分之五的最小比例，受迫害群眾也達二百五十萬。

這成千上萬的受迫害者即是造反派的前身。

1967年「二月鎮反」的迫害：

第二次大迫害是在1967年2-3月。主要由中央軍委批准或各大軍區和省軍區自作主張，「支左」部隊在全國範圍大搞「二月鎮反」，各級公、檢、法積極配合，全國監獄人滿為患。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除了北京、上海等少數省市，都抓了大批造反派。這次迫害來勢之洶猛令人終生難忘：先是發出通告公佈被取締的「反革命組織」名單，勒令所屬成員主動自首，伴之以固定廣播站和移動宣傳車的晝夜吼叫，「鎮壓反革命」傳單漫天飛撒，大字報和大標語更是貼滿每個角落。成都軍區還出動直升飛機從四川省各主要城市上空散發中央軍委《二一七公開信》，創下1949年以來「鎮反」的先例。同時實行全城戒嚴，一輛輛裝滿荷槍實彈上兵的軍車開始抓人，或白天或深夜，嚇得小孩都不敢啼哭。接著便將所抓造反派人員五花大綁掛上黑牌人會批判小會鬥爭然後遊街示眾。真正是一次聞所未聞的「紅色恐怖」！軍隊在實施這次鎮壓時，採取了中共劃分依靠、團結、打擊對象的一貫策略。例如：在廣州，扶植和依靠保守派「工人赤衛隊」、「紅色工人」、「紅衛兵第一司令部」，壓制和團結造反穩健派「工聯」、「紅旗工人」、「中大紅

旗」、「華工紅旗」，孤立和打擊造反激進派「八一戰鬥兵團」。在武漢，扶植和依靠保守派「百萬雄師」，壓制和團結造反穩健派「紅衛兵第二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團」，孤立和打擊造反激進派「鋼工總」。在成都，扶植和依靠保守派「產業工人戰鬥軍」，壓制和團結造反穩健派「紅衛兵成都部隊」，孤立和打擊造反激進派「川大八二六戰鬥團」、「成都工人造反兵團」。使得保守派全部死灰復燃並趁勢報復，也使得造反穩健派為了派別利益而趁火打劫。由於有這些群眾組織的參與，這次鎮壓的聲勢和規模超過中共建政以來的任何一次整人運動。

例如：廣州市抓了2467人，登記116000人；湖北省武漢市抓了3000多人，天門縣就抓了1365人；四川成都市抓了20000多人，自貢市抓了13000多人⁶⁹。湖南省就抓捕了約10萬人；青海抓了10157人，西寧市還開槍打死169人，打傷178人⁷⁰。我所在地區也抓了1000多人，每座監獄都人滿為患。僅以一個大城市平均抓捕10000人、一個中等城市平均抓捕1000人、一個小城市平均抓捕100人計算，全國被抓人數最少也不下百萬。受害者百分之百是造反派，其中「黑五類」子女佔多數。

這近百萬受害者，大多剛在數月前的第一次整人運動中被打成過「反革命」、「右派」。

徐友漁認為：「『二月鎮反』軍隊鎮壓造反派的原因，並不是發現其中混入大量成份不好的人，而是因為造反派對軍區採取了遊行示威、靜坐、衝擊等行動。在相當多的情況下，這又是由於軍隊鎮壓了處於少數地位的軍內造反派所致。」⁷¹

我認為作者似乎忽視了事件的「原因」與「導因」之間的聯繫。作者所否定的論點和所認定的事實，其實正是「二月鎮反」的原因與導因。軍隊歷來是中共階級鬥爭理論的堅定信奉者和主要實踐工具，「文革」中自然成為保守心態最頑固的群體，對家庭成份複雜的造反派及其揪鬥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的行為，在心理層面一直充滿敵視，與造反派之間的衝突勢所難免。造反派衝擊軍事機關之所以招致鎮壓，就是因為軍隊早已從「人員不純」這一階級底線上，認定造反派屬於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所說的「右派」——右派衝擊軍事機關當然必須鎮壓。1967年

武漢軍區陳再道、青海軍區趙永夫對造反派的鎮壓，甚至1968年廣西軍區章國清對造反派的屠殺，儘管導因不同，但共同之點不都是認定造反派「階級成份不純」、屬於「反革命右派」嗎？而且，1967年初，全國省會以下中小城市的造反派很多並沒有衝擊軍事機關，他們大批被抓又是因為什麼？不看到導因之後的原因便無法解釋清楚。

從邏輯上推論，造反派與軍隊的衝突也難以避免。從中共建政時起，為了黨指揮槍，中共省、地、縣三級黨委的第一書記，歷來都兼任大軍區或省軍區、軍分區、武裝部的第一政委，地方幹部與軍隊的關係十分密切。現在看到自己的第一政委被定為「走資派」遭到殘酷批判鬥爭，軍隊官兵自然很難接受。他們介入地方「支左」時，就按「階級路線」的標準對兩派群眾組織進行過調查，並發現保守派老工人多、貧下中農多、黨團員多、勞模先進多、基層幹部多，造反派不僅缺少這「五多」，還混雜著不少家庭出身不好和有歷史問題的人，應該依靠誰打擊誰他們早已胸有成竹。中央軍委《八條命令》這把尚方寶劍只是把他們較為隱蔽的本能傾向變為有恃無恐的行動罷了。而在造反派心目中，既然兼任軍隊第一政委的地方黨委第一書記是「走資派」，那麼與他緊密搭檔的軍隊司令員之類人物也一定脫不了關係，這些第一書記兼第一政委的「走資派」在地方上有同黨和爪牙，在軍隊裏也必定如此。軍隊對地方造反派的敵視態度，及其對揭露他們與「走資派」黑幕關係的軍內造反派採取的鎮壓措施，更讓造反派認定：「走資派」在地方權力機構中的同黨可以打倒，他在軍隊權力機構中的同黨也照樣可以攻擊。這場從1967年1月至7月歷時半年並圍繞所謂「二月鎮反」爆發的衝突，便由此而來。

高舉和嚴家其在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寫到「二月逆流」時，筆墨盡落於高層政治鬥爭，對軍隊在全國各地抓捕成千上萬造反民眾之事隻字不提⁷²。這絕非對歷史的客觀記述，而是對歷史的主觀迴避。

1968-1971年「批清」運動的迫害：

第三次大迫害是在1968至1971年軍人掌權時期。中共中央在全國

開展「批判極左思潮、清查五一六」運動，鬥爭矛頭直指造反派。特別是在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兩大派嚴重對立的省份，此時得勢的一派軍隊將運動的主動權抓在自己手中，借機大整對立派——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並存的省份整造反派，在造反派兩派對立的省份主要整造反激進派，使「批清」的規模和氣勢甚至超過了「二月鎮反」。

「批清」運動的起因直接涉及到周恩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之後，北京造反大學生一直在尋找新的鬥爭目標。由於1967年2月向中央文革發難的幾位老師和副總理都與周恩來關係比較密切，便有輿論認為周恩來是「二月逆流」的總後台。1967年3月，這幾位老師和副總理的叫板行為被毛澤東定為「二月逆流」後，首都「二司」在農業口、財貿口、外交口、八機部所鼓動對譚震林、李先念、陳毅、余秋里的批判，就已經隱隱露出指向周恩來的矛頭。這一行為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及時制止。但一些思想激進並自以為政治嗅覺特別靈敏的造反大學生，仍然認定毛澤東要打倒的下一個目標必是周恩來。誰敢為天下先誰就最革命——這是1966-1968年期間造反者的經驗，這些激進大學生也這樣堅信自己的政治敏感。1967年夏季，北京農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商學院、北京鋼鐵學院部分造反大學生，聯合成立「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四處張貼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1967年冬季，湖南省存在時間很短的造反激進派——「省無聯」，也在其長文〈中國向何處去〉中，誤解毛澤東的政治意圖，將鬥爭矛頭指向周恩來。於是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全國出現一股小小的「打周」熱流。毛不能容忍對自己政治意圖的誤解和對全國政治大局的干擾，親自於1967年8月下令開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這段時間的清查地域主要限於北京、湖南、上海、廣西等處，而且除了北京和湖南抓了張建旗、楊曦光等一批人，全國主要是批判「極左思潮」。1970年2月8日和3月27日，中共中央又下發《二八決定》和《三二七通知》，再次部署在全國範圍深入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在四川等省市除了繼續批判「極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分子」外，還增加了清查由十七年受迫害老紅軍、老八路、老地下黨員成立的所謂「三老會」的新內容。從發端到收尾，這個運動歷時五年，穿越十年「文革」一半的時

間。1972年，與此事並無直接關係的林彪事件公佈後，受害群眾的結局竟然各不相同。凡是主要負責人上了「林彪賊船」的省份，受害者都陸續得到了平反，整人的責任也完全推給「林彪路線」。如果運動的領導者與「林彪路線」無關，這些地方的受害者也就找不到理由翻案。至於首都「五一六兵團」和湖南「省無聯」的一大批公開反對周恩來的激進造反青年，從抓捕判刑到刑滿釋放，長期遭受嚴厲的懲罰，一直沒能得到赦免。

以湖南「省無聯」為例：1968年1月24日，在中央解決湖南問題的專門會議上，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要人，幾乎一致以「反革命大雜燴」的定性，宣判了「省無聯」的死刑。陳伯達和康生這兩個中共「理論權威」，甚至搬來馬列著作，逐條批判楊曦光等青年學生的文章，並上綱上線進行斥責。隨後，「省無聯」被解散，總部與下屬聯合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和骨幹被抓捕判刑：「湘江風雷金猴戰團」負責人陳本望，因為家庭出身是「黑五類」，便以對一件武鬥中的糊塗命案負有責任為由，被處極刑立即執行；1957年著名的《湖南日報》「右派」案成員劉鳳祥，作為「省無聯」的「黑手」被判刑15年，後於1970年被槍斃；「湘江風雷接管委員會」主要負責人張家政，出身國民黨軍官家庭，被判刑20年；撰寫〈中國向何處去〉的長沙一中學生楊曦光時年19歲，被判刑10年；「紅旗軍」司令畢健被判刑10年；「高校風雷」負責人、湖南大學學生周國輝被判刑7年；「礦冶井岡山公社」負責人、中南礦冶學院大學生張玉綱被判刑3年。

時至今日，許多人都不明白這個時期的毛澤東為何會對周恩來如此厚愛——為了保護此人竟然不惜發動一個歷時五年更在1970-1971年達到高潮致使千百萬無辜者遭受迫害的整人運動？這不僅與他的「繼續革命」理念背道而馳，而且也與1972-1976年毛周之間的權力衝突銜接不上。我認為，只要瞭解毛澤東一貫的馭人之術，其中的奧秘便不難破解。其權術的要訣不外乎八個字：為君之道，居中權衡。從林彪被確立為接班人之後直到垮臺之前這個時期，周恩來其實是毛澤東在黨內權力格局中抑制林彪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制衡因素。極左派打倒周恩來必將破壞毛澤東同時要制衡林彪的黨內權力格局，他自然不能容忍；何況他們

還要徹底砸碎舊的國家機器和實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選舉，明顯危及中共的統治，更是不能縱容。於是統治集團內部兩派，繼1967年2月首次聯手鎮壓了第一批異類造反者——以「全紅總」為首的全國性組織之後，再次聯手對「文革」中的第二批異類造反者進行鎮壓了。為何1970-1971年這次鎮壓會掀起高潮？因為這正是毛澤東聯合周恩來整垮陳伯達進而整垮林彪的特殊時期，加強對「五一六」的鎮壓自然成了毛澤東送給周恩來的一份謝禮。按理說林彪勢力剪除後，周恩來在毛澤東黨內權力格局中的制衡作用已經喪失，為何北京「五一六兵團」和湖南「省無聯」被捕人員還是未獲平反？原因在於他們同時還和「全紅總」一樣屬於被認為危及中共統治的異類造反者。

這次鎮壓，因為有些地方與「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相交叉，各省所用的名稱也就不同。如江西為「三查」，廣西為「貫徹七三佈告、清查『反共救國團』」，四川先為「貫徹『一二二五批示』」，後為「一批雙清」。時間也不一致，如江西、廣西是在1968年，四川是在1969-1972年。雖然各省的具體內容不同，但「清查五一六」皆貫穿其中。

全國各地大小監獄再次爆滿。四川省被鬥、被捕、被判刑的造反派人數大概接近「二月鎮反」，僅我所在的西昌地區十個縣就抓了1000多人。廣西被殺被捕的人數更超過十萬⁷³。全國受迫害人數恐怕不下百萬。「二月鎮反」被抓人員大多只關押了兩個多月，只有青海省開槍打死打傷三百多人，這次被抓人員的關押時間大多在兩年以上，而且在廣西還殘殺了十多萬人！

這期間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這之後的「批林整風」、「全面整頓」等一系列運動，打擊對象也都包括造反派。

「文革」中各種人群受迫害的比較：

可以說「文革」中造反派的造反史，同時就是不斷遭受迫害的歷史。

「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很多，但是稍作比較就不難看出，造反派受害人數之多、受害時間之長、受害手段之酷，受害程度之重，都遠遠超過其他人群。

「反動學術權威」受害時間最早，但除中共中央直接點名者外，大多沒有反復入獄，而且隨著局勢變化，揭發、批鬥之類也逐漸減弱。

「走資派」挨整很重，但除了劉少奇等一批高層要人，很少有人坐牢，而且大多在1972年之後逐步官復原職。

「地、富、反、壞、右」處境最慘，但其慘況「文革」前即已形成而且一步到位，「文革」中只不過加重程度而已。他們中也有不少入獄，有的甚至慘死獄中，但他們沒有三番五次大批入獄的遭遇。

只有造反派的受害，動輒就坐牢，而且是多次，每次的人數都是幾十上百萬，甚至有不少人被逼自殺，更有不少人被公判槍決或集體屠殺。

我不否認被鬥、被抓、被判刑、被槍決、被屠殺的造反中人，確有極少數武鬥中的命案在身者，但他們之中絕大多數都是無辜的受害者。而且這些數以百萬計的無辜受害者，絕大多數又是下層黑色和麻色子女。

中國的監獄歷來就是為「黑五類」們準備的，十七年來成千上萬座監獄的大門一直就向他們敞開。「文革」開始後，他們的子女試圖通過造反來打破這個反人道的社會慣例，改變自己的命運，但只有短暫的成功。最終，子女們還是背負父輩作為專政物件的等級印記，一次又一次成為中國監獄的常客。遺憾的是，眾多希望通過「文革」研究來倡導人道和捍衛人權的文人學者，恰好在自己的研究中忽視了造反派造反和受害原因中的這類關鍵。

1967年夏，劉少奇為自己被首次批鬥大感冤屈，認為自己這個經全國人民選出的國家主席未經全國人民同意就被打倒，是踐踏法律。他完全忘了，就在此前不久，正是自己親自下令揪學生、教師和社會各界下層民眾中的「反革命」、「右派」，殃及成千上萬的人，當時同樣沒有依據任何法律條文、通過任何法律程式、履行任何法律手續。這正是十七年來「刑不上大夫」式政治等級心態的典型反映。

1967年2月26日，高層老干部大鬧懷仁堂。僅僅因為中央幾個「高幹」子弟為首組織「聯動」反對中央文革並大搞打、砸、搶而被抓捕，李先念就痛心疾首：「聯動怎麼是反動組織哩，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⁷⁴幾位老師也憤憤不平。高層政壇由此掀起「二月逆流」，激發全國範圍的「二月鎮反」。一方面為幾個上層紅色娃娃被打成「反

革命」遭到抓捕而憤憤不平，另一方面又支持軍隊將成千上萬黑色娃娃打成「反革命」抓進監獄而毫不動容。這正是十七年來的社會等級邏輯在「文革」初期的惡性延伸。

1976年10月之後，劉少奇平反了。然而，因他的指令而不知有多少萬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這一歷史大案，至今未見正式平反，甚至不見哪份紅頭文件提及一詞。相反，有的文字還把這些不知超過被平反者多少萬倍的人挨整，視為各級黨政領導自覺抵制「文革」的集中表現。

同樣，「聯動」和「二月逆流」事件也在1976年10月以後相繼得到平反。但是「二月鎮反」抓捕不知多少萬造反民眾這一大案，至今未見正式平反，也未見哪份紅頭文件提及一詞。相反，倒有文字將這些不知超過被平反者多少萬倍的人被抓進監獄，視為人民解放軍自覺抵制「文革」的集中表現。

這是什麼？正是建立在社會等級對立基礎上的政治不公正。體現這種不公正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是上層統治者，你是下層造反者，所以你反我就是犯法犯罪，我整你則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可以平反，你不能伸冤。

再看一組鮮明的對比：

「文革」時，湖南長沙有一個在武鬥中著名的保守組織「紅色怒火」，成員以武裝民兵和基幹民兵為主。其主要負責人曾有根因武鬥中槍殺人被拘押數年，於1979年初病死於市公安局看守所。「文革」結束後，其成員居然在長沙市中心廣場和市公安局大院內，為曾有根舉行了數萬人參加的追悼大會。一連數日，全市很多單位的黨政工團組織，都紛紛派人送花圈和參加追悼會。對這一切，有關當局絲毫沒有出面干預或給予處罰。似乎這類准暴力保守組織，這時仍能得到省委和軍區當權者的同情與關照。

1982年，上海有一個造反派的小頭頭刑滿釋放。他的一批朋友到監獄去接他出獄，點了幾個鞭炮「消消晦氣」。結果被認為是「反攻倒算」，「向人民示威」，又被重新抓起來，加判了10年刑期。而且當時的社會輿論和民意似乎也擁護司法機關的這種處置。

這個社會還有良知與公正可言嗎？

美國「文革」研究學者宋永毅寄給我一份湖北工人造反派領袖胡厚民在法庭上的陳述狀。1982年7月24日，胡厚民曾經站在判決他20年刑期的法庭上義正詞嚴地質問：

「文化大革命」初期，成千上萬工農兵群眾、幹部、學生、知識份子，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小鄧拓」。如果這些人確實犯有上述罪行，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沒有，就應該給這些人一個實事求是和公正合理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1967年3月17日，湖北全省一個晚上以「反革命」罪名抓了成千上萬的人。關押時間不等，有的致傷致殘致死。如果上述人員確系反革命，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是，就應該給這些人一個實事求是和公正合理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1968年底「清理階級隊伍」時，曾思玉在總理面前彙報時說：湖北全省清理出了幾多萬階級敵人。如果這幾多萬確系階級敵人，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是，就應該給這些人一個實事求是和公正合理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1969年中共中央發出《九二七指示》，曾思玉、劉豐在湖北大抓「北決揚」和「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決揚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數以萬計，被批被鬥被抓致傷致殘致死者空前之多。假如上述情況屬實，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是，就該給上述人員作出實事求是和公正合理的結論。到底誰是「北決揚」？到底湖北有沒有「五一六」？應向全省人民講清楚。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1976年底以後，全省上下許多人被打成「四人幫」的黑幹將、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鬥被關致傷致殘致死者無法統計。如果上述情況屬實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實就該給上述人員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這樣的質問不僅法院無法回答，就連被稱為社會良知的知識界也難以面對。他那悲愴而無畏的聲音，至今仍然在因缺少社會正義而異常空

茫的公共話語空間無力地迴響。

以上主要是造反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概況。對造反派最嚴酷的打擊，是在「文革」及其所包含的造反運動被徹底否定之後。

第二節 試探「二月鎮反」的內幕

同「文革」中發生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一樣，「二月鎮反」的高層內幕也異常複雜，很難一言以蔽之。只從現象上看，其複雜性已足以令人左顧右盼難下判斷。例如：在軍隊對造反派的大規模鎮壓正式鋪開之前，全國已出現某些鎮壓行動和鎮壓氣氛；在軍隊大規模鎮壓造反派的過程中，中央文革小組也曾積極參與。中央文革參與鎮壓的證據至少有兩個：一是在福建軍區鎮壓造反派之時，中央文革控制的《人民日報》不僅於1967年2月17日給予報導，而且將福建造反派衝擊軍區的行動定性為「無產階級的敵人的瘋狂反撲」。二是1967年2月4日中央文革直接下達《二四批示》，將湖南造反組織「湘江風雷」和「紅旗軍」定為「反革命」，致使全省約十萬人入獄。雖然同年8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解決湖南問題的《八十決定》中批評中央文革「何必匆匆忙忙根據一面之辭，作出批示？」仍難抹去中央文革參與鎮壓造反派的事實。認為這次大鎮壓純屬中央軍委個別敵視造反派的老派人物背著毛澤東指令軍隊所為，或者屬於各地敵視造反派的軍隊利用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擅自行動，都顯得比較偏頗，很難令人信服。

徐友漁曾談到對其中內幕的猜測和疑惑：「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中激進的一派，幾乎無例外地在1967年1月底2月初攻擊當地軍區並引起極為嚴厲的反擊，使我認為這不是偶發事件，而是與中央層文革派與軍方爭權有關，雖然，我至今仍無法對這個推想提出直接證據。」⁷⁵

楊小凱卻認為其中內幕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聯手推行鎮壓」⁷⁶。「在毛澤東的默許下，周恩來1967年2月發動了一個全國性鎮反運動。所有全國性組織，不分青紅皂白全被打成反革命組織。各省的造反派政黨型組織全部被打成反革命組織。」⁷⁷

這兩種觀點，雖然前者不失穩慎，後者有失武斷，但都窺見了這次

大鎮壓所暴露分屬於兩個層面的矛盾衝突。是的，從針對「聯動」等保守組織，到針對「全紅總」等全國性造反組織，再到針對各地造反激進派組織，這次鎮壓有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整個事件表現了兩種矛盾衝突：一種存在於統治集團與造反民眾之間，另一種存在於統治集團內部兩種政治勢力之間。

第一種矛盾衝突由於被當時瀰漫全國的「兩條路線鬥爭」的煙幕所掩蓋而遭到遮蔽，長期處在人們的視線之外。這種掩蓋和遮蔽，來自「二月鎮反」很快否定後，人們忙於歡呼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和批判從中央軍委到各地軍區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將整個事件的癥結完全轉移到所謂的「兩條路線鬥爭」上去了。今日的研究者也大多是從這個角度去分析問題和尋找答案。然而，只要注意到當時所出現「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很像要失去控制的全國性局勢，並仔細分辨官方採取的各種應急舉措及其連帶後果，這種矛盾衝突仍然可以發現。

1966年10月以後的全國形勢，真正可以用「波瀾壯闊」來形容：「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如火如荼；全國除軍隊之外，各行各業各單位紛紛成立起自行其是的造反群眾組織；各級當權派普遍受到攻擊，軍隊之外的中共黨組織完全停止活動，所有政權機構全部處於癱瘓狀態；受迫害人群要求翻案平反的浪潮越過「五十天」的界限漫向「十七年」甚至更遠。可以說，除了毛澤東所控制的中央權力中樞和軍隊以及各種特殊保密機構和各地的監獄，當時幾乎很少有什麼地方沒有遭到造反民眾的衝擊。進入1967年1月，形勢變得更加嚴峻：雖然停止赴京串聯的中共中央緊急通知早已發出，但北京仍然彙聚著一百多萬不願離去的外地告狀人員。以合同工、臨時工、輪換工為主體的「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等全國性群眾組織，相繼在京成立並掛牌辦公。一些由復員、退伍、轉業軍人組成具有准軍事力量性質的群眾組織，也在北京和各地陸續成立。這時旨在奪權的上海「一月風暴」正席卷全國，按邏輯推論，在京成立的全國性組織也可以奪中央相關部門的權力。「全紅總」能夠輕而易舉召開30萬人大會的力量，不能不使中共諸公感到威脅。而此時，頑固保守的「聯動」公然炮打中央文革和衝擊公安部的行為，各地造反派對實際支持保守派的軍區的衝擊，更使形勢變得異常複雜。

如果說保守派的瘋狂行動只構成對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某種威脅，那麼全國性組織的出現和各地造反派的反軍活動，就使整個中共統治集團感到了某種危險。其實，即使十八年後的1989年4-5月，中南海猶如漂浮在數百萬民眾抗議海洋中的孤舟，都還沒有人想到要推翻中共的統治；何況1967年1-2月，中共政權高山一般巍然屹立在造神浪潮中，更不會有人想要推翻它。可是極權主義的權力崇拜所包含的虛弱本質，總是讓他們神經過敏，時時防著有人會乘機顛覆自己的寶座。楊小凱依據海外披露的材料認為：「1967年2月，周恩來再三提醒毛澤東，全國性組織像政黨一樣出現了，如不及時鎮壓，共產黨江山會危險。他特別用『風起於清萍之末』來警告毛澤東。」⁷⁸周恩來雖然可能對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和發動造反派攻擊各級當權派心存異議，但對毛澤東的忠心和對中共政權的忠誠卻無可置疑。這番憂慮和這番言論完全可能屬實。

毛澤東雖然絕對自信對於全國人民的感召力和對於全國局勢的控制力，但也不得不採取應急措施。最大的組織措施自然是1967年1月20日突然宣佈軍隊介入地方「支左」。最重要的政策措舉也在此時緊急出臺——1月13日出臺了嚴禁「黑五類」分子參加群眾組織和借機翻案的《公安六條》；1月28日出臺了嚴禁衝擊軍事機關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2月17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出了《關於確保機要文件和檔案材料安全的幾項規定》，嚴禁衝擊各種檔案室和檔案庫。與此同時，各種行動措舉也在採取：1月16日，《紅旗》雜誌在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中正式將湖南保守組織「紅色政權保衛軍」定為「黨內走資派的御用工具」。1月17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將頑固保守並大搞打、砸、搶的首都「聯合行動委員會」和西安「紅色恐怖隊」定為「反動組織」，頭頭定為「反革命」，同時北京市公安局抓捕了「聯動」骨幹分子。1月20日中央軍委發出指示，將湖南由轉業軍人組成的造反組織「紅旗軍」定為「反動組織」勒令解散並抓捕了負責人。1月22日，周恩來在一次接見外地來京群眾的講話中，宣佈「中國工農紅旗軍」、「戰備軍」、「北京聯動」、「西安紅色恐怖隊」、「湖南紅旗軍」，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動組織」。1月25日，哈爾濱駐軍將保守組織「榮復軍」定為「反革命組織」給予鎮壓。1月31日出版的《紅旗》雜

誌在第三期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中，將「聯動」和「榮復軍」定性為「反革命組織」，並首次提出：「對於反革命組織，要堅決消滅。對於反革命分子，要毫不遲疑地實行法律制裁。」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於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告》，取締了「全紅總」等全國性群眾組織，相繼逮捕了這些組織的領導成員。2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貼出佈告，將「全紅總」等數十個群眾組織定為「反動組織」，勒令相關人員主動自首。一時間，「反革命組織」的帽子，從起初專門戴在保守派的頭上，再慢慢戴到造反派頭上，其中的變化幾乎把人弄糊塗了。甚至直至今日我們也才大體看出：如果說當時對保守派的鎮壓還限於維護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權威，那麼對「全紅總」等全國性造反組織和湖南「紅旗軍」的鎮壓，就完全屬於維護整個中共統治的範疇了。

1967年4月以後，被鎮壓的造反派全部得到平反，就連被抓捕的「聯動」分子也全部釋放；只有被逮捕的「全紅總」等組織的領導成員不僅不予釋放，反而都關押至1968年又被判刑，直到1976年10月以後才走出「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牆。遭到逮捕的「全紅總」負責人，方圓被判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20年，王振海被判5年，貴州分部的毛勝年被判15年，石應寬被判15年，李伯特被判10年，歐陽林被判7年。其中，毛勝年於1969年提前「教育釋放」，歐陽林坐滿刑期7年，其他人都坐了10年以上的大半。「四人幫」被捕後才獲平反。

「二月鎮反」時的這項鎮壓內容，既證明了毛澤東所謂「大民主」的虛偽，更說明民眾造反一旦威脅到中共的統治，統治集團內部的兩派政治勢力就會齊心協力團結對敵——就連素有「愛民」美譽的周恩來也會露出猙獰的一面。

各地針對造反派的鎮壓便由此演變而來。可以說這是持保守立場的軍人深受這段鎮壓序曲感召和深受這種鎮壓氣氛感染的必然結果。軍人的本意自然也包含了對中共統治秩序的維護，但無意中成了統治集團內部「兩條路線鬥爭」的工具。

第二種矛盾衝突就發生在統治集團內部兩派之間。兩派——自然是中央權力坐席中坐在左邊席位的中央文革成員和坐在右邊席位的老師老

幹部。「文革」中造反派挨整，大多來自他們所謂的「形勢反復」，也就是保守勢力自上而下對造反派的伺機反撲或反攻倒算。實質上，它是毛澤東在統領全局時對高層極端派和務實派的左右權衡一時失控的必然表現。這在「二月鎮反」事件上表現最充分。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這次會議是「文革」中高層的第一次權力再分配。當時人們就懷有一個疑問：為何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等老干部的地位一落千丈之時，同樣坐在主席臺右排的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三位老師卻進升為政治局委員？其實這是權謀大家毛澤東的有意安排。這時毛已確定以林彪代替劉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但一生信奉「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毛澤東，並不完全放心讓林獨攬軍事大權。徐、聶、葉三人的反常進升，以及被安排負責軍委日常工作，就是毛為了在軍內制約林所採取的同步措施。

1967年1月14日，山西省繼上海之後宣佈奪權。毛澤東首先發現山西省軍區政委張日清率先支持造反派奪權的典型，指示軍隊要介入地方支持革命左派。於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於1月20日聯合發佈了《關於人民解放軍支持革命左派的決定》。

葉劍英和聶榮臻聞訊後，立即趕來與時任軍委文革組長的徐向前商議，提出搞一個軍委文件具體授權。這時，各地的軍隊因大多實際支持保守派而受到造反派的衝擊，三位老師認為這純屬右派造反。他們要求授權的意圖，自然是為了便於對造反派進行鎮壓，完全與毛澤東關於軍隊支左的意圖相反。1月24日，徐向前向林彪陳述了這個意見，林不明老師們的真實用意，當即口授了八條，交由中央文革討論通過。1月28日，林與徐將中央軍委《八條命令》面呈毛澤東審批。毛同樣不明其中真意，當場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

《八條命令》明確規定：「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只從字面看，毛澤東與老師們並沒有任何分歧，但雙方對字義的理

解卻完全不同：毛所說的左派，老師們認為是右派，毛所說的右派，老師們則認為是左派。所以在毛放心地批示照發之後，葉劍英高興地認為：現在有了尚方寶劍，可以決不手軟地鎮壓那些敢於向無產階級專政宣戰的反革命分子了。

與此同時，老師們積極準備利用毛澤東急欲依靠軍隊進行全國大奪權並穩定社會局勢的機會，對高層極端派文人實行反擊。徐向前、葉劍英、陳毅三人商議後，決定以1月4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在接見湖北省「專揪王任重聯絡站」造反派代表時，未經組織程式就宣佈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之事作為突破口向毛反映，附帶報告穩定軍隊的重要性問題。三人寫了一封聯名信，由葉劍英面呈毛澤東。

毛澤東因中央文革打倒陶鑄未向自己報告而非常氣憤，加之為了穩住老師以制約林彪對軍隊的控制權，便於2月10日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陳伯達進行了嚴厲批評，逼得陳差點自殺。2月11日的政治局碰頭會本來是討論生產形勢，但老師們趁熱打鐵，將其變成了對陳伯達的批判會。2月24日，中央文革按照毛的指示召開整風會，專門批評陳伯達和江青的錯誤。反擊氣氛愈演愈烈，直至2月26日爆發了政治局中的老師和老幹部大鬧懷仁堂的所謂「二月抗爭」事件。

全國各地軍隊大批抓捕造反派的「二月鎮反」，便是在全國鎮壓「反革命」的大背景和高層「老派」反擊「新派」的小背景下發生的。有的地方是負責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和徐向前在「鎮壓反革命」和反擊中央文革小組的氣氛中，巧妙利用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批准執行的，例如拉開四川「二月鎮反」大幕的中央軍委《二一七公開信》。有的地方是軍隊利用中央軍委《八條命令》自己先動手，然後得到葉、徐的支持，例如葉劍英對青海「二二三事件」軍區屠殺並抓捕造反派行為的讚揚，徐向前對內蒙軍區槍殺和抓捕造反派行為的支持。有的地方是軍區利用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主動採取的行動。例如武漢3月實行的「鎮反」：3月17日，武漢軍區和武漢公安機關利用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抓捕了造反派頭頭和骨幹3000多人，3月21日武漢軍區又發表《通告》，將武漢造反的「工人總部」及其所屬組織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勒令解散。全國更多的地方則屬於上行下效或互相仿效，例如我所

在地區的軍分區和鐵道兵八八一五部隊，在中央軍委給四川省發出《二一七公開信》的第二天，就立即發佈了鎮壓造反派的《二一八通告》，其格式、措辭、內容幾乎和中央軍委公開信如出一轍。而此時，毛澤東和中央文革也一度被「鎮壓反革命」的氛圍所左右，這才有了《人民日報》對福建「鎮反」的正面報導和中央文革對湖南「鎮反」的直接批示，毛澤東才會對全國範圍的「鎮反」不置一辭。

誰知居中掌舵權衡左右的毛澤東忽然意識到大鬧懷仁堂之事的矛頭是指向自己，立即於2月28日連夜召開會議怒斥老師老幹部們，將其定為「二月逆流」。中央文革也著手扭轉社會輿論。3月8日，首都「三司」為首的造反派召開「徹底擊退資本主義復辟逆流誓師大會」，聯合發表關於全國局勢和反擊「二月逆流」的《嚴正聲明》，但中央的報紙和廣播沒有轉發，對全國影響並不很大。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的社論，但提法還比較謹慎——要求軍隊正確對待的還只限于紅衛兵小將，沒有包括學生之外的廣大造反派群眾。4月6日，中央軍委緊急發佈幾乎與《八條命令》針鋒相對同樣由毛澤東批示「此件很好」的《十條命令》，實際否定了軍隊大批抓捕造反派的行為，才使「二月鎮反」的漫天陰霾為之散開。但這時，全國各地的「二月鎮反」本已成舟。而且，由於從中央到地方在風向轉變上存在時間差，不少地方三月底還在抓人，全國否定「二月鎮反」並釋放被抓造反派之事，也延至五月才完成。其中，兩湖地區算是例外：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一再對抗中央對湖北「三月鎮反」的定性和否定，仍然堅決支持保守派「百萬雄師」和鎮壓造反派「鋼工總」，直至發生了綁架中央全權代表王力和謝富治並差點危及毛澤東生命安全的「七二〇事件」後，才被擺平。湖南省的「二月鎮反」問題，直到1967年8月中共中央〈八十決定〉下達才徹底解決。1967年圍繞「二月鎮反」，歷來令行禁止的中共軍隊發生了兩起以下抗上的駭人事件。第一起是青海「二二三事件」前，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竟然奪了支持「八一八」造反派的司令員兼黨委書記劉賢權的權力，而且公然抗拒自己的直接上級——蘭州軍區意在保護「八一八」造反派的「三條指示」。第二起便是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在「七二〇事件」中對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悍然挑釁。可見下層民眾

造反對軍隊等級神經刺激之深，以及強硬派軍人等級心理反應之強烈。

「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清」、「批林整風」、「全面整頓」運動中出現的反復，內幕關係與「二月鎮反」大體相同——無不是出於中共統治的全局需要和高層兩派的互相爭鬥。當毛澤東從理論上將其總結為「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時，他當然不會說出其中的真相。

這類「反復」的發生，離不開四個條件：一是無論「文革」中政局怎樣演變，權力高層始終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政治勢力。二是每次導致「反復」的運動，都是毛澤東為了這個時期的全局需要而批准開展的。三是這些運動的矛頭指向或概念含義，至少存在不利於造反派的一面，才會被從中央到地方敵視造反派的政治勢力所利用。四是這些運動貫徹起來總是雷厲風行，糾正起來總是再三拖延，表明「文革」中的各個不同時期，各級地方政權的當權者都是傾向於打擊造反派的。

中共統治的全局需要和高層權力的拉鋸戰，無疑是造反派反復挨整的最深根源。他們被拉來鋸去，如同希臘神話中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樣受盡折磨。毛澤東卻輕鬆地認為這是「鍛煉群眾」，造反派則一直認為迫害自己的只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第三節 「文革」後的政治迫害

1976-1979年「揭、批、查」運動的迫害：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抓捕，毛澤東時代宣告結束。結束毛時代，順應國情民心，無疑是中國政治領域歷史性的轉折。然而，因前期將矛頭直指各級當權派的造反行動和後期為落實政策少數人一直鬧騰到1976年的造反行為，造反派理所當然地被綁在「四人幫」的戰車上，遭受粉身碎骨的最後打擊。

最後打擊，不只是從政治上宣判造反派的死刑，而且包括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方式並採取各種極端的手段和措施，對無數造反責任人進行的嚴酷整治。

1976年底至1979年底全國範圍的「揭、批、查」運動，在「英明

領袖」華國鋒的親自主持下對造反派進行大批判、大清查、大逮捕。全國各地各行各業各單位，凡與「造反」有牽連的人和事，一律新帳老帳一起算，嚴懲不貸。雖然紅頭文件寫明清查的重點是「四人幫」組織系統的幫派骨幹和在組織上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但由於真正屬於這個範疇的人當時大多還是省級及以下各級政權的掌權者，清查的重點自然就變成了群眾中與「四人幫」毫無組織聯繫的造反派殘餘人員。很多省份，甚至將省、地、縣、區、公社各級凡是「文革」時當過造反組織頭頭的人一律列為打擊對象。大批人被批鬥、遊街，大批人被抓捕、判刑。造反派過去幾次所受迫害相加也不如這一次。查祖宗三代、挖階級根源、無限上綱的傳統作法不僅少不了，而且登峰造極。手段之暴烈、方式之極端、觸及皮肉與靈魂之深刻、打擊面之大，集中共建政以來包括「文革」中所有整人運動之大成。

最後是對不夠抓捕條件的人，進行政治定性記入個人檔案永不重用。政治定性分四類：幫派骨幹為一類，嚴重政治錯誤為二類，一般政治錯誤為三類，說錯話做錯事為四類。

我所在地區抓捕、判刑500多人，批鬥1000多人，政治定性1000多人。

全國挨整人數有多少？

這次對造反派的大迫害雖然發生在十年「文革」後，但具體執行者仍然是「文革」中的各級政權班子，具體執行的仍然是以整人為宗旨的「文革」路線，從手段、程式到定性，都完全違反法制原則。只因它掛著「正確路線」的幌子，造反者又自認歷史的罪人，所以即使在提倡實事求是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受害人群中也無人敢於提出申訴，更不可能有誰主動給予「平反」。

沿襲「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整人術，大範圍、大規模、長時間地清算已成弱勢群體的造反派，勢必引起社會心理的反感。作家蔣子龍發表于《人民文學》1979年7月號的問題小說《喬廠長上任記》，便是這個時期這種社會心理的藝術反映。小說立即引起巨大反響並獲獎，更證明這種社會心理的真實存在。這種心理也影響到政權高層。傳聞這期間陳雲有一個講話，大意是造反派中有不少能人，要敢於使用，要學曹

操大膽用降將。中心精神與〈喬廠長上任記〉的主題基本一致。不料這期間河南省某市被捕造反派的親屬上街遊行，要求放人，《人民日報》給予爆光並上綱上線嚴加痛斥。傳聞中的陳雲講話不得不束之高閣，只有蔣子龍的小說成了這個時期這種社會心理的歷史記錄。這篇小說值得「文革」研究者認真一讀，因為它至少會告訴你：即使在舉國上下共同討伐造反派的年代，在熟悉「文革」實情的正直作家筆下和廣大民眾心目中，造反派仍然是人而不是鬼。

1985-1987年清查「三種人」專項鬥爭的迫害：

接著是1985-1987年全國範圍的清查「三種人」專項鬥爭。中共中央本來早在1982年12月30日就發出了《關於清查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向各級權力機關部署了這次清查，可能因為當時全國性的「揭、批、查」運動和「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剛結束，政治氛圍和社會心理不適宜緊接著搞整人鬥爭，使實際的清查活動拖延至1985年才開始進行。這次沒有再搞群眾性的大揭發、大批判，打擊重點也轉為造反派中「混入」共產黨內的新老隱蔽分子，基本方式也改為組織審查、個人交待、黨內定性、行政處理。全國省、地、縣三級都成立了專門的清查辦公室，由組織、人事、紀律檢查、公安政法部門抽調專人組成。重點清查領域為各級黨政機構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班子和組織、人事、機要、公安、政法等要害部門。清查對象一旦被定性為「三種人」，一律開除黨籍和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受到懷疑和審查但又不足以定為「三種人」的，一律給予降職或調換工作部門的處理；而且這些人都不得選派為出國人員。

所謂「三種人」，文件規定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並具體指明：「造反起家的人」——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緊跟林彪、江青一夥拉幫結派，造反奪權，升了官，幹了壞事，情節嚴重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極力宣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動思想，拉幫結派幹壞事，粉碎「四人幫」以後，立場觀點沒

有轉變，明裏暗裏繼續進行幫派活動的人；「打砸搶分子」——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誣陷迫害幹部、群眾，刑訊逼供，摧殘人身，情節嚴重的人；砸機關、搶檔案、破壞公私財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後策劃者；策劃、組織、指揮武鬥造成嚴重後果的分子。

這些人本來在歷時三年的「揭、批、查」運動中已被超額清洗。可是中共卻認為還只是進行了初步清理，在少數地方和部門，仍有一些「三種人」留在領導班子中或要害崗位上，有的被逐級下放，但仍在各級領導崗位上繼續受到重用，有的還被作為接班人已經提拔或準備提拔；斷定這些人雖然數量不多，但活動能力很強，活動範圍很廣，是一種不安定的因素和不可忽視的潛在危險，如有適宜的機會，他們就會出來興風作浪，再次為害其黨其政；因此號召必須堅決把他們從領導班子中清理出去，必須防止把他們作為接班人選進領導班子。由於這種自驚驚人的思維習性，使得這次清查不能不細網打魚——小魚也不漏過。

為期兩年的清查鬥爭，事實上並沒有網住什麼大魚。涉及對象主要是四類人：一是「文革」後期入黨在「揭、批、查」運動中已被撤職但暫未開除黨籍的各級革委會造反派代表；二是「文革」前入黨在「揭、批、查」運動中已被撤職而保留黨籍的各級革委會造反派代表；三是「文革」前入黨並在1969年就已退出造反而自動納入體制系統陸續被提拔至各級領導崗位的造反大學生；四是「文革」中造反派保舉入革委會或者上級解放進革委會而支持過造反派的領導幹部。如果說對前兩類人的清理還多少挨點邊，對後兩類人的清理就完全屬於殃及無辜了。因為他們「文革」時的行為大多並非自願，而且現在早已完全體制化，對鄧小平體制沒有任何危害。

對前兩類人除了開除黨籍、留黨察看、黨內警告之類再次處理，其實已經再無可供清查的內容。

對1969年前大學生造反組織的重要頭頭和所謂有嚴重問題的人，都由原所在院校將材料通知這些人現所在單位的黨組織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門記錄在案，進行查處。對於一些機關、企事業單位和軍隊轉業到地方工作，也在「文革」中犯有所謂嚴重錯誤但本人的工作已經調動出去的幹部，也採取同樣的辦法處理。

對所謂犯有「三種人」的錯誤或罪行的幹部，有的從領導班子中清除，有的從要害部門和要害崗位調離，有的分配做一般工作，有的回原生產崗位，有的降職使用，有的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我所在地區有 100 多人被定為「三種人」。全國遭到清洗的人數不知多少。他們大多為普通「紅五類」子女。

如果只從「三種人」的給定罪名看，清洗他們似乎毫無疑義。然而，許多被清洗者的真實情況與這類罪名絕非相符。僅舉一個屬於第三類清洗物件的實例：

田某，老紅軍之子，1964-1968 年就讀于某重點大學，在校期間入黨並任系學生會主席和團總支副書記。「文革」初期為系保守組織頭目；後反戈造反，因家庭成份純和個人身份紅，被推任學校造反團在該系的分團長；建立革委會時任校革委會委員和系革委會副主任。1969 年，分配到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距離縣城近百里的一個小化工廠工作。歷任技術員、車間主任、廠黨支部書記。1979 年該廠搬遷至地區首府附近與另一工廠合併，任副廠長。1983 年升任廠長。田某作風正派，工作任勞任怨，任職期間成績卓著，深得上級信任和職工好評。沒想到 1985-1987 年在工作崗位上經受了長達兩年「組織審查」的精神折磨後，被定性為「打砸搶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定性的具體依據卻是：1968 年，他擔任過校革委會委員和系革委會副主任，屬於造反派頭目；他任分團長的系造反派在武鬥期間打死過一名對立派的教師，應負領導責任。

田某被清洗，就連企業上級主管機關的領導也為之不平，認為田某來企業工作近二十年，不僅政治表現堪稱知識份子幹部的楷模，在經濟效益上也為國家創造了上千萬元的利稅貢獻，這樣的人在現實中發揮的全是積極作用，不可能是危險人物。這完全是實話。撇開田某的個人品德和現實表現不談，僅就其家庭出身和造反前已有的政治身份看，他也應該是值得紅色政權完全信賴的人。但他僅僅因為青春年代一段未必自覺自願的經歷，就被清洗了。

四川省某重點高校 1969 年和田某一起分配到西昌地區工作並相繼走上領導崗位的三個原造反大學生，1985-1987 年都遭到了清洗。

我所在單位清查了三個人。其中一個是下面分廠已退休的老書記，

據說曾在原工作單位幫助造反派指揮過武鬥，檢查了兩年後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另外兩個是像田某一樣的大學生，一個畢業于重慶大學，現為廠級領導，一個畢業於南充師範學院，現為中層幹部。兩人都是貧農出身，都是「文革」前入黨，都是「文革」前大學裏的學生幹部，都是運動初期的保守派，都是後來參加造反紅衛兵組織並且擔任過校革委會委員，都是 1969 年離開學校分配到邊遠山區工廠工作，都是憑著出身好身份紅能力強於 1971 年走上管理崗位。不同的是處理結果：前者被撤職並調離工作單位，後者繼續在原崗位工作但留黨察看兩年。

在全國，像田某這樣的人不少。他們的冤屈永遠無處申訴。

我所在城市地縣兩級「文革」中造反派結合或上級解放進革委會的領導幹部，這個時期幾乎全部消失了身影。後來得知，他們大多被「提拔」到省上的統戰、政協、工商、供銷、農業機關任職去了。

中共中央 1982 年發出的清查「三種人」文件，只有一項內容在當時得到執行。因為其中規定對於「犯有錯誤但當時是未成年的學生，不要再去追究」，而使一批因武鬥問題入獄服刑的造反中學生獲得赦免提前釋放。

非法的制度性迫害：

1985 年，權力高層下發內部文件，明確規定：凡是「三種人」、「四類人」以及昔日造反派頭目，一律不得擔任各類私有企業和經濟實體的法人代表。當時，成都市有一家頗有名氣的「銀河貿易公司」，總經理蔡文彬曾為四川造反紅衛兵組織「紅成」派的一號負責人和省革委會副主任。1985 年，因為這個規定，他不得不自己辭去總經理職務，聘請自己母校——原成都地質學院的青年教師梁某擔任名義上的總經理。繼剝奪這些人在政治領域擔任各種社會公職的資格之後，再次剝奪了他們在經濟領域擔任各種社會公職的資格。真是霸道之極。

1987 年以後，公開整治和清洗昔日造反者的運動和鬥爭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暗地監控。這絕非聳人聽聞，而是嚴酷的事實。就像「勞教所」是中國的獄外之獄一樣，中國還有法外之法——法律之外的各種內部規定。自 1977 年以來，造反派中被抓了又以各種名目釋放的人、被判

了又刑滿釋放的人、被鬥了又歸屬「四類政治定性」的人，被審查了又定為「三種人」的人，一律被視為「政治動亂因素」，全部成為各級政權專門機構的內部監控對象，長期遭受按「內部規定」實行的內部監控。特別在發生全國性政治風波——「八·九學生運動」之際，對他們的監控就更加嚴密了。

依照憲法規定，這些昔日造反中人，除了在法定時期剝奪政治權利者外，都是享有全部人身和社會權利的公民，他們可以不參加共產黨，甚至可以不擔任黨外任何公職，但他們仍然擁有憲法所賦予的言論和行動的自由權。內部監控之舉，卻將他們置為法外之人。關心中國人權問題的「文革」研究者，不應該關心一下這個人權橫遭踐踏的突出問題嗎？

法外之法的實質，就是凌駕於法。它必然導致無法的心態和非法的行徑，其中包括偷偷摸摸之類特務舉動和無中生有之類惡徒手法。按「內部規定」對昔日造反派進行內部監控的違法之舉，難免如此。

1989年6月發生過這麼一件真實的事：一日，某市技術監督局穀某到某公司檢測產品質量。午休時穀某去看望在該公司工作的高中同學陳某，因陳公務外出而沒見著。事情就這麼簡單。沒想到數日後，公司黨委書記收到市委下發的一份《敵情通報》，上面寫明：「四人幫」殘餘分子谷某竄到該公司找同學陳某搞黑串連，惡毒攻擊黨中央，「六四」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偉大舉措，瘋狂叫囂中國的天要變了。書記驚駭，急傳陳某前來詢問。陳某如實陳述：當日公務外出，未曾見過穀某。書記不相信市委會無中生有。幸好身為公司技術科長的書記夫人前來證明：當日中午是她陪穀某去找的陳某，陳的確不在公司，穀某下午檢測完畢後就乘車走了。書記頓時釋然，轉而憤然：八十年代還在捏造事實陷害人，簡直太荒唐！

這只是特殊時期內部監控行為及其成果的一個例證。此類離奇事全國不知發生過多少，而且當事人從來只能默默忍受，既無法辯誣，更不可能向權力機關討回公道。只因為他們是昔日的造反派和今日的內控對象。

如果以為1976年10月至今，對昔日造反派的打擊、整治、清洗、監控和敵視，僅僅限於直到1976年10月還在造反的人，那就錯了。實際上，有些早就退出造反行列甚至反叛了「文革」的人，在現實生活中

也一直遭受嚴重的不公正待遇。

上海「工總司」原負責人潘國平，1970年被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下令隔離審查後，就與王洪文他們分道揚鑣了。1976年10月8日許世友的兒子告知「四人幫」被捕的消息時他很高興，很快通知了周圍要好的人。他那時名義上的職務還是上海市革委會委員、市總工會常委。有人告訴他上海市委的一些人正在準備武裝暴動，他馬上打電話到中央辦公廳找汪東興，汪不在，他請辦公廳副主任周啟才作了電話記錄，說上海市委要武裝叛亂，自己堅決支持中央對王、張、江、姚採取的措施。上海市委原來的一些老幹部——如王一平，韓哲一，和他的關係都還不錯，也知道他與「四人幫」的關係究竟如何。蘇振華到上海市委當第一書記時，許世友也給他打了招呼，還叫田普來上海找他。那時中央工作組已經明確宣佈不處理他了。抓捕「四人幫」之後的頭兩個月，他們在上海的餘黨差不多全被抓了進去。而他卻是將近三年之後的1979年9月才被抓的。主要原因是鄧小平視察上海，彭沖向鄧彙報決定對潘不作處理，鄧說「潘國平怎麼可以不處理？王洪文原來還是他的手下！」於是他被判了八年徒刑。

湖南長沙一中教師葉冬初，曾擔任造反組織「湘江風雷」負責人和省革委會副主任，從未搞過任何打、砸、搶，1970年以來一直被當權者關押在監獄中，江青等人也一直迫害他。沒想到「四人幫」垮臺後他卻成了「四人幫分子」，被判重刑長期關押。

雷某，某國營農場1967-1971年的造反知青首領和革委會副主任。1971年，因替劉少奇喊冤叫屈並說了一些攻擊毛澤東的言論，被判處十年勞動改造。1980年刑滿釋放回單位，經三次申訴，歷時一年多，終獲平反。儘管他能力出眾、號召力強，又很快考上成人大學並取得文憑，但在單位一直得不到重用。他與現任黨委書記兼場長私交頗深，也很受看重。老場長多次想重用他，但考慮到他當過造反派頭頭的歷史身份，便不敢輕舉妄動。後來實在不忍埋沒人才，只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他安排了一個不倫不類的農場職教辦副主任的職位，直到他2002年退休，再沒有挪動過。

吳某，省城大學造反紅衛兵早期領袖。1967年4月作為一省穩健造

反派首席代表赴京參加由周恩來主持的解決該省問題專門會議。在會上曾與江青發生爭執並受到嚴厲批評。回來後即退出造反組織，再沒有參加任何活動。1969年，分配到一個遠離省城一千多公里的地質隊工作。因人品正直、業務能力強、又是工人家庭出身和共產黨員身份，80年代單位搞民主選舉時，職工一致推舉他為隊長人選。但選舉結果上報後未獲批准，只因他曾經當過紅衛兵頭頭。

梁某，北京某高校1966-1969年造反紅衛兵領袖，1970年分配到西南某省偏遠山區一個小型科研單位工作。因作風正派、為人謙和、業務水平高超，80年代搞民主選舉時，單位職工全票推選他擔任所長職務。但地區組織部不予批准並回復行政主管部門：這種人只能使用，不能重用。

不難得出結論：在「地、富、反、壞、右」摘帽之後，中國又形成了一個遭迫害、受壓制、被歧視的「法外人」群體，他們由所有被抓捕、判刑、定性、清洗、內控的昔日造反中人構成，人數雖然比過去的「黑五類」少，但也相當可觀。與過去的「黑五類」唯一不同的是，他們身上的政治烙印不會遺傳給子女，將隨著他們的逐個死亡而自然消失。

在他們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群體，正是驚懼於他們的「法外人」境遇而形成的。這個群體屬於隱性存在，雖然論公開身份，他們正在步入當今中國的主流社會，但在精神層面，他們長期經受著追殺式社會心理和社會輿論的迫害、壓制和歧視。為了不致於跌入「法外人」群體，他們隱蔽著自己的過去，在領導、同事甚至兒女面前從不敢談及自己的造反經歷，實際過著兩面人生活。因為造反已被宣佈為無理，他們的過去被置於公理之外，我暫且稱之為「理外人」。他們人數更多，由「法外人」之外的所有昔日造反派骨幹分子構成。

注釋：

68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49頁。

69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24頁。

70 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社，2002年7月，第47-54頁。

- 71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15頁。
- 72 高舉、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26-145頁。
- 73 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社，2002年7月，第227-254頁。
- 74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45頁。
- 75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15頁。
- 76 楊小凱：〈六四省悟：為文革造反派翻案〉，美國：《中國之春》，1990年8月號，第44頁。
- 77 楊小凱：〈再談「文革」〉，美國：《中國之春》，1992年10月號，第79頁。
- 78 楊小凱：〈再談「文革」〉，美國：《中國之春》，1992年10月號，第79頁。

第三篇

造反派同毛澤東的合與分

1971年，四川省鹽源縣一位原造反知青組織負責人因為替劉少奇鳴冤叫屈並說了一句「毛大爺過河拆橋」，就被判刑十年。他至今堅持認為，毛澤東在發動廣大造反派打倒自己的政治狡兔之後，便開始反過來烹狗——向造反派開刀，造反派被毛澤東利用了。

至今，不少昔日的造反者和同情造反派不幸遭遇的人同樣堅持認為：在1966-1969年這段時間，因為青春期的年輕、幼稚、狂熱以及對最高領袖的盲目崇拜，造反派實際成了毛澤東用來打倒自己政治敵人的可悲工具，造反派以後的不幸遭遇，完全是失去利用價值之後的必然結果。

於是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在「文革」中，只是毛澤東利用了造反派呢，還是造反派同時也利用了毛澤東？

這直接觸及到民眾造反行為與毛澤東個性行為和政治意圖的真實關係問題。

認識當代中國的歷史事件，目光必須穿過政治意識形態及其官樣文章所描繪的虛假表像，深入到參予者真實的心理動機層面，才能看到它那超離人們淺層判斷範圍的更深內涵。

人類歷史上任何群眾性運動，都由不同階層和不同個人的不同利益要求，在某個時空點上恰巧交合而成。雖然總是強勢階層和個人的利益要求在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但其他階層和個人的利益要求，仍然在各種觀念和口號的偽裝之下頑強存現著。它們總是力圖實現自身的目的，並或多或少地對主導勢力起著補充、修正甚至牽制的作用。於是必然出現這樣的局面：每個運動都要超出主導勢力的預期目的很遠，然後再逐漸反彈回來。超出一——非主導勢力為滿足自身利益要求向前推進的結果，反彈——主導勢力為捍衛自身利益成果強行遏制的必然。運動高潮的結束，總是發生在各個階層和個人按各自利益要求，朝著不同方向繼續向前邁進而錯過共同交合點的時候。這時，主導勢力與非主導勢力之間，同向變異向，同路變陌路，同盟關係無形解體，於是分歧、對立甚至激烈衝突勢所難免。已達目的的主導勢力必然會對未達目的的非主導勢力進行阻止、遏制甚至強行干預。在群眾性運動中，各個階層和個人的利益和力量之所以能夠暫時交合在一起，是因為在這個時期有著共同的敵人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利害關係。當敵對勢力被打倒，主導勢力為

使既得利益免遭非主導勢力繼續推進行為的破壞性衝擊，有時會向不再構成威脅的敵對勢力妥協，並結成暫時的聯盟，共同反對雙方此時的共同敵人——非主導勢力。這時，非主導勢力必然會指責主導勢力捍衛既得利益的行為是「復辟」，必然會痛感自己被利用或被出賣。

利用的確存在，但只是在各種利益要求及其行為力量的交合時期，而且是互相利用。單方面的利用，對於抱著不同目的參予運動的各個階層和個人來說，幾乎不可能。

對一般群眾性運動心理動機層面真相的概述，不僅適用於各國的宗教運動和革命運動，同樣適用於中國的「文革」。

造反派與毛澤東的利益契合點究竟是什麼呢？

第七章 毛澤東的個性特徵與理想實質

首先要搞懂毛澤東。

在世人眼中，毛澤東始終是個謎。

這個謎主要產生于他成為一代開國帝王之後的所做所為。

他那謎一般的作為，在他人生的最後十年達到登峰造極。

的確，他晚年的作為充滿了矛盾性，太多離奇、太多歧義。

李澤厚這樣論說晚年毛澤東的複雜性：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義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權力的政治鬥爭一面；既有憎惡和希望粉碎官僚機器的一面，又有懷疑「大權旁落」被人篡權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熱情和奮鬥精神的一面，又有渴望做世界革命的導師和領袖一面。二者是混在一起的。 79

其實，人們親眼看到和親自感受到的毛澤東的複雜性，比這還要多。例如：他是知識份子和古體詩人，同時又對一切近現代性的人文知識份子和人文知識深懷敵意；他是農民出身而且時常為農民的疾苦落淚，同時又不惜採取一系列強制措施無情剝奪農民的衣食條件，直到餓死幾千萬父老鄉親後，還要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而固執己見嫁禍於人；他是性情中人，憎惡官僚作風、厭惡等級劃分，對身邊的戰士和遠方的老俵親如家人，同時又發動一個個諸如「反右派」、「反右傾」之類的

整人運動，置千百萬無辜者於死命；他生活簡樸，寧肯白家孩子無肉吃也不肯享受特殊，同時又金口大張，慷慨免去日本應付給中國的巨額戰爭賠款；他提倡說真話反對弄虛作假，同時又支援官方文字和新聞媒體，在國內外一切重大事件的宣傳上歪曲真相愚弄百姓；他強調個性、主張自由，同時又親手建立起古往今來空前絕後的極權體制；他發動「文革」，鼓勵廣大青年造反，將矛頭指向各級官僚和各種權威，為青年人提供了表現個性、揮發激情、肯定自我的機會，同時又建立起一種更加專制獨裁的社會秩序，完全抹殺個人地位和個人價值，徹底取消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

看起來毛澤東的確是個令人費解的矛盾人物。難怪有那麼多研究者的思緒在他身上繞來繞去也理不出個頭緒，難怪有那麼多探索者的目光在他面前高山仰止望而卻步。

毛澤東真的複雜得無法深究和矛盾得不可思議嗎？

不。毛澤東自1950年以來特別是「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其實並不矛盾，其個性行為與社會理想歷來渾然一體。人們之所以被他的矛盾性和複雜性所迷惑，只是因為沒能認清其個性行為的特徵和社會理想的實質，並將二者結合起來統一看待。

第一節 毛澤東的非制度化個性行為

國外研究者已有人通過對毛澤東與劉少奇性格、氣質的對比，觸及到了毛澤東的個性特徵問題。他們認為：毛澤東感情衝動，性格奔放；劉少奇謹小慎微，一絲不苟。毛澤東的行為方式是個人性、最高元首式的，他善於啟發和鼓動群眾，直接與群眾溝通；劉少奇善於組織操縱，依靠龐大的體制化機器。 80

所觸及毛澤東的個性特徵十分粗淺，倒是對劉少奇的概括比較準確而且頗具啟發性。與劉少奇相反的毛澤東的主要個性特徵，不就是非組織化、非體制化嗎？是的，這正是毛澤東個性的主要特徵，不過我寧肯稱之為非制度化個性。

制度化與非制度化，既是人一生中的兩種個性傾向，又是人群中的

兩種個性類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人群中個體的性格特性千差萬別，社會心理學和個性心理學做了各自的分類，但我認為還可從社會學角度劃分出兩大類型：制度化個性與非制度化個性。前者為遵從型，後者為反遵從型。

制度化個性：習慣于對群體組織及其行為準則的依附、認同、服從。

非制度化個性則相反：喜歡支配人而非遵令行事，喜歡建立團體而非隸屬其下，喜歡制定行為規則而非受其束縛。

非制度化個性在普通人中並不罕見，例如歷朝歷代的那些反叛者首領，現實生活中那些反社會行為的帶頭人，以及古往今來的異端思想者和先鋒藝術家。罕見的是政治人物當中的領袖——如果他在推翻了舊制度之後本性難移，勢必回過頭來反對自己親手建立起的新制度，造成自己事業的斷裂和形象的分裂。毛澤東恰好就是這樣一位政治領袖。

一個人個性的形成，首先與心理素質、家庭出身和少年經歷有關，其次取決於青年時期所接受的社會環境刺激和人文知識影響。後者同樣重要：因為這是一個人確立人生觀從而實現精神上站立的關鍵時期，他一旦形成自己特有的站立姿態，就會邁動相應步伐走下去，直到人生的終點。

毛澤東自小便具有極強的反遵從秉性，內心充滿超凡的自信。下層家庭出身和貧困環境磨勵，只會激發起他對現實的反叛傾向和對權威的逆反心理。在長期的鬥爭生涯中，一次次與共產國際反道而行並與留學回國的洋秀才們大唱反調卻無往不勝的經歷，更加強了他對自己反權威心理和逆向行事秉性的自信。「文革」中他提倡的「反潮流」精神，其實就是對自己個性特徵的總結性注解。這使得他在確立人生觀時期，更傾向於攝取與自己個性特徵相適應的知識要素。

李澤厚認為，成為青年毛澤東人生觀構成要素的人文知識，主要有四個方面：主張自我實現、意志自由的個體主義，主張英勇無畏、舍生成仁的英雄主義，主張反對一切權威、反對一切束縛的無政府主義，主張經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實踐主義。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原理、法學理論、教育體制、政治制度和文學藝術，似乎對毛澤東沒有任何影響。馬克思主義也只是在他確立了自己的人生觀之後所接受的一種實用社會理

想，對他人生觀的形成並無太大意義⁸¹。這大體成立。

毛澤東留存於世的幾十首藝術水準參差不齊的古體詩詞，無不閃現著作者的非制度化個性特徵。從青年時代一介布衣時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到中年時代成為共產黨領袖後的「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兩首詞之間相隔著漫長的歲月，但其中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反權威主義一脈相承，沒有因為作者身份和地位的改變而中斷。

1971年，毛澤東曾向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形容自己的個性特徵是「無法無天」。「無法」即是非制度，「無天」即是反權威，將毛氏的非制度化個性特徵概括無遺。

在政治領袖範疇，非制度化個性與制度化個性的對比異常分明。

前者在認識上依賴個人直覺，在管理上相信人治，在行為上傾向於非組織化手段；

後者在認識上依賴集體決議，在管理上相信法治，在行為上傾向於組織化程式。

中國近代史上幾個重要政治領袖的個性特徵，可以劃歸制度化類型的有孫中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可以劃歸非制度化類型的是蔣介石和毛澤東。

在考察他們確立人生觀時代所接受的政治文化影響時，有一個現象令人稱奇：孫中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在西方留學多年，多少受過西方政治文化的薰陶；蔣介石、毛澤東一直呆在國內，接受的主要是東方政治文化的影響。雖然劉少奇留學是在蘇聯，但蘇聯處於西方政治文化傳統範圍。蔣介石雖然到過日本留學，但東方政治文化傳統範圍包括了日本。

這絕非偶然。西方政治文化傳統的平等主義、分權主義，更適合制度化個性者的天性；東方政治文化傳統的等級主義、集權主義，更宜於非制度化個性者的操作。這兩種人對政治思想資源的選擇必然不同。

西方社會心理學為我們打開同樣的視野：我們這個熙熙攘攘的世界，上活動著的人類群體，可以分為集中化群體和非集中化群體兩種類型，

並從中產生出個性迥異的專制型領袖和民主型領袖。集中化群體信奉為了少數人自由而限制大多數人自由的等級主義，所以容易接納絕對自信而絕少遵從性的專制型領袖；非集中化群體信奉為了大多數人自由而限制少數人自由的平等主義，所以容易接納不很自信而具有遵從性的民主型領袖。對應于中華民族這個集中化群體及其所信奉的等級主義傳統，蔣介石和毛澤東無疑是兩個絕對自信而絕少遵從性的專制型領袖。

難怪蔣介石繼承了孫中山所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體，但在大陸和臺灣仍然習慣於實行東方個人獨裁式的專制統治。

難怪毛澤東喜歡以內行的身份抓管文學藝術，但他的文藝愛好其實只限於中國古典小說、古典戲曲和古典詩詞，對近代以來東西方人本主義向度的文學藝術一概排斥。

東方政治文化傳統從夏朝始，就重個人直覺、重人治、重非組織化手段；西方政治文化傳統從古希臘始，就重集體決議、重法治、重組織化程式。在古羅馬，早在西元前四十四年，就有了元老院集體決議處死凱撒大帝的制度化先例，在中國，人們從來看到的只是皇權至高無上的非制度化慣例。這正是東西方政治文化傳統的本質差異。

專制——東方政治文化傳統的本質特徵。

民主——西方政治文化傳統的本質特徵。

非制度化個性類型的政治領袖，天然親近於東方式的政治文化，因為獨裁理念可以讓他不受任何約束地獨斷專行、自行其是又不擔責任。對制度化個性類型的政治領袖來說，西方式的政治文化更具吸引力，他更傾向於在組織程式的約束下，依靠集體的智慧和力量來謹慎行事並分擔責任。

當非制度化個性的領袖執掌民主政體時，民主也會變得非常專橫，比如蔣介石之於大陸和臺灣。當制度化個性的領袖執掌專制政體時，專制也會變得比較溫和，比如鄧小平之於大陸。

但是兩種政體所屬政治文化傳統的本質特徵，不會因領袖的個性特徵而改變。政治文化傳統的本質大於政治領袖的個性，改變的只是局部和暫時，本質難以改變。

毛澤東對於大陸的嚴重性在於：他接受的政治文化影響、建立的政

體都是專制類型，又與本人的非制度化個性結為一體。

將毛澤東的非制度化個性作風定性為「封建專制主義」，完全是囿於馬克思社會歷史「五形態說」得出的膚淺結論。事實上，獨裁和專制並非封建政治的專利，而是東方政治文化傳統的特產；實行獨裁和專制統治的也並非只有封建君主，而是包括封建君主在內一切具有非制度化個性特徵的政治領袖。

有的西方學者試圖用韋伯的概念將毛澤東歸為「超凡魅力型領袖」。其實這種超凡的魅力，只是毛澤東個性的魅力而非思想的魅力。這種魅力，凡屬非制度化個性類型的政治領袖、反叛首領、異端思想者和先鋒藝術家皆有，並非政治領袖的專利。只是各自的煥發範圍和輻射強度不同罷了。

第二節 毛澤東的反歷史社會理想

再來看毛澤東社會理想的實質。

毛澤東的確是個理想主義者，這沒錯。但是我們不能不剖析其理想的實質，僅僅憑著「理想」一詞的褒義性，就賦予他詩意化和浪漫式的評價色彩。

毛澤東的社會理想是什麼呢？是在中國建立一個純「無產階級化」的美好社會。無須多思索，人們很容易從他 1957 年至 1976 年發表過的講話、制定過的路線和政策、實際開展過的各種運動中，找到這個無可置疑的結論。

這個社會理想來自馬克思主義。

沒有剝削和壓迫，沒有私有財產和私有觀念；沒有分工和差別，沒有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沒有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爾虞我詐、私心私欲；個人全面發展，人人五業精通；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這幅展現在平等主義畫板上的社會圖景確實美好。

從毛澤東非制度化個性的行為邏輯推論，他之所以在 1957 年突然推倒《新民主主義論》的全部設計，轉而要實現純粹「無產階級化」的理想，顯然與史達林斷然否認新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共產黨是無產

階級政黨的傲慢態度有關。心理逆反，意志逆行，你越是否認，我越要做給你看，看我創造出令你嘆服的人間奇跡來。

毛澤東是如何把中國向這個理想社會推進的呢？

我們看到一組抽象而又具體的歷史鏡頭：

剛邁入「新民主主義」，完成工業、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一化三改造」，就立即憑空躍向「社會主義」。

在政治、文藝、教育、科技領域，開展「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掃除五十多萬擋道知識份子。

農村經濟組織實行「三級跳」——「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剛分到農民手中的土地很快又全部收歸「國有」。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高高飄揚——全民大煉鋼鐵、大墾荒、大放高產衛星、大辦公共食堂。十五年超過英國趕上美國，共產主義早實現。客觀規律被主觀願望代替，個體生產方式被集體生產方式代替，小家庭被大家庭代替，現實被夢想代替。

在黨內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清除一大批黨內反對者。

經濟大崩潰，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六億中國人在奔向理想王國的道路餓得奄奄一息。

面對1960-1962年的大悲劇結局，編造了「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兩個理由就輕輕搪塞過去。總導演毛澤東退居二線，把劉少奇推到一線收拾殘局。

經濟剛復蘇，肚子剛填飽，神經剛放鬆，另一組仍由毛澤東導演的鏡頭早已切入歷史的畫面：

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使全國上下的神經再度繃緊。

開展對文藝界「寫真實論」、「寫中間人物論」等所謂「資產階級『黑八論』」的批判，範圍涉及文、史、哲、經的「文化批判」，初具模型。

經濟領域剛剛萌發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遭到扼殺。

推出「大公無私」的新人典型雷鋒，旨在塑造新人樣板的「樣板戲」在緊鑼密鼓聲中拉開序幕。

矛頭指向基層「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四清運動」全面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爆發。

這些用緊縮式的政治名詞來指稱的歷史事件，無不包含著一個共同的内容指向：使中國全面「無產階級化」。毛澤東用以實行這種不變指向的非制度化個性行為也愈演愈烈，直到一手遮天發動「文革」——這場全面「無產階級化」的大進軍。

關於毛澤東社會理想的實質，人們習慣將其定位於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農平均主義」，並定義為脫離客觀現實的主觀空想。

不錯，毛澤東在頑強推行其社會理想的進程中，始終伴隨著與社會現實的嚴重脫離和激烈衝突：明明是一個農民領袖領導的農民政黨領導的農民國家，硬要使之完全同化於比重極小的大工業和僅有一百多萬人口的產業工人，能不脫離並衝突嗎？明明全國的基本生產工具還是鋤頭、鋤頭加犁頭，硬要搞社會化大生產式的組織形式，能不脫離並衝突嗎？明明經濟實力、技術水平、管理素質只有那麼一丁點，硬要一日千里大躍進，能不脫離並衝突嗎？明明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差別那麼大，硬要消滅分工、取消商品交換、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能不脫離並衝突嗎？明明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還是文盲和半文盲，硬要消除思想差異讓億萬人都成為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新人」，能不脫離並衝突嗎？

如果毛澤東社會理想的實質可以據此定義為脫離社會現實的空想，問題就十分簡單了。因為即使這個空想破滅，也是毛澤東的精神世界太超前的結果，他仍然是一代偉人而且充滿善意，就算失敗了也是英雄式的失敗，他依然是個思想超前而魅力無窮的英雄。硬要責怪的話，只能說他脫離了眼前的現實，他的主觀願望和客觀努力畢竟是想帶領中國人民推動中國社會向前躍進。

毛澤東社會理想的實質真的屬於充滿良好願望的超前空想嗎？不。

要想真正認清其本質，就不能囿於其話語系統設定的理論範疇，而必須放眼於在其話語之外真實存在著的現實需要和歷史趨勢。

毛澤東的社會理想，是一個由正向肯定面和反向否定面相互依存而形成的理念結構：正向肯定面——指明肯定什麼、堅持什麼、追求什麼；反向否定面——指明否定什麼、反對什麼、防止什麼。在這個維度上，其社會理想的雙面指向非常明確。借用其話語系統中人人熟知的專

用政治名詞來代指，我們會看得非常清楚：他在理想的正向所肯定、堅持和追求的，是「公」、「無產階級化」、「社會主義」；他在理想的反向所否定、反對、防止的，是「私」、「資產階級化」、「資本主義」。可以簡縮為四個字：「興無滅資」。

如果不顧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抗議，仍然按照其話語系統中關於進步與倒退、先進與落後、革命與反動的價值座標，來看待其社會理想的實質，我們定會作出同樣的評價：無論它怎樣不切實際和如何空想，它還是進步的先進的革命的。

當我們走出其話語系統，傾聽歷史和現實在人民心中提出的要求，便不能不得出相反的結論。

自由派的底色

從封建社會掙扎而出的現代社會的基本要義是什麼？是確立個人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自主權利。即使毛澤東站在剛從封建社會走出的中國大地上搬用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社會高度發展狀態中得出的社會主義結論，個人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自主權利仍然是其中不可抽去的核心。

就算中國這樣的後發展國家，在開始現代變革之時，因面臨西方列強的威脅，不能不將確立個體權利的進程移後而先行解決民族救亡問題。如今中華民族已經站起來，確立個體權利，能不再度呈現為歷史的首要任務嗎？

由此不難看清毛澤東後半生社會理想及其政治實踐的實指。

從「一化三改造」、農業合作化「三級跳」、「三面紅旗」，到「文革」中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和「割資本主義尾巴」、「拆資產階級土圍子」，毛澤東在經濟領域的雙面作為究竟指向什麼？一言以蔽之：在「一大二公」的名義下，剝奪人民經濟上的一切私有權利。剝奪行為逐漸加劇，直到「文革」中達到極致，不僅個人財產私有權、個人生產要素使用權、個人生產經營自主權喪失殆盡，就連個人最原始最起碼的家庭權和果腹權都難以保障。

在文化領域，伴隨無休止的「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所進行的「破私立公」，完全消解個人思想自由的權利以及對自身權利的意識和知覺。剝奪式干預甚至深入到了個人書信、日記甚至夢境中的隱私權領地，將數億中國人強塑成一大群因喪失主體意識和自主覺悟而人格扭曲

的畸形人。

「批判資產階級文化」是其反向否定面的主要內容。所批「資產階級文化」究竟是什麼？是西方16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以來所創立以肯定、喚醒和解放人為主題的近現代文化，除了政治意識形態部分勉強可以貼上「資產階級」的可笑政治標籤外，其他內容都是屬於全人類的先進文化成果。可以說，「文革」前十七年中國人精神生活中僅存的一小點人性照明和人道關懷，就是來自這些以各種符號形式存現於世界經典和「五四」名著中的近現代文化。「文革」的大火焚燒和全面禁讀，完全暴露了十七年來「批判資產階級文化」的險惡意圖：防止人們從這些書籍中獲得任何關於自主地位和自主權利的激發式資訊。

毛澤東在其正向肯定面所建立的「無產階級文化」又是什麼內容呢？核心自然是「大公無私」。典型的現實體現者之一當屬雷鋒。如今說起這個人，人們最敬佩的還是他那助人為樂的崇高品德。可毛澤東感興趣的恐怕更是他的無私無欲。說來可笑，在當初風靡全國的《雷鋒日記》中，雷鋒完全是一個全心全意忠於領袖、徹頭徹尾服從領導、絕無一點私欲的「新人」；「文革」中卻發現《日記》中被刪除了反對「走資派」的內容；「文革」後更報導他也有七情六欲而且戀愛過。在上個世紀60年代，毛澤東理想中的「新人」究竟是哪一個雷鋒呢？顯然是第一個。

大公無私型新人的藝術體現者自然是「樣板戲」人物。別相信「樣板戲」是江青一手製造的，與毛澤東無關。毛澤東要抓全國大局，不會親自抓戲劇改革，這可能。但江青憑著對丈夫戲劇愛好和新人理想的瞭解而抓出「樣板戲」成果並得到毛的高度讚賞，也是可以肯定的。這是一些什麼樣的新人樣板呢？只有革命熱忱和獻身精神而絕無屬於個人的七情六欲。女的沒有丈夫，男的沒有妻子，雙方更不可能有兒女。《紅燈記》中有個三代人的家庭，但也必須不同姓：階級親高於血緣親，階級組合大於親情組合。

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毛澤東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自己根除不了七情六欲，硬要中國老百姓根除，還美其名曰：大公無私。要人民大眾用無私來成全一己之私，奉一己之私為公而讓天下認同，這才是

文化領域和人心深處「破私立公」的實質。

伴隨著經濟權利和文化權利的剝奪，個人政治權利遭受的剝奪更為徹底。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和「加強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雙向口號下，「人民當家作主」成為一句空話。個人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早被當事人視為下流的把戲。結社自由、集會自由、遊行自由、示威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的憲法條文，更成了一把把令人望而生畏的利劍，誰敢自觸鋒刃血濺三尺？人道、人性、人權、博愛、平等、民主、自由、真、善、美這類光輝的人文價值詞，變成了叫人害怕的黑字。獲罪的機會太多：說錯一句話，做錯一件事，唱錯一首歌，認錯一行字，甚至心裏所想和夢中所為……更不用說什麼不同政見和反對主張了。當劉少奇認為自己這個經全國人民選舉出來的國家主席未經全國人民批准就被打倒是違反憲法時，他完全忘記了全國人民從未選舉過他，選舉他的只有毛澤東一人而已。毛既然有權選舉你，自然就有權罷免你。一人之下的劉少奇尚且如此，廣大百姓夫復何言？所謂「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實質是加強一個人的專制；所謂「加強對資產階級專政」，實質是加強對廣大民眾自主意識和不滿情緒的鎮壓。在這裏，「無產階級」純粹是一個虛指性的假借名詞，它的真實所指，並非那個在中國從來就沒有執政能力也沒有任何政治權力的工人群體，而是毛澤東所領導擁有中國全部資產的政治集團。假借「無產階級」之名加強個人威權的合法性，不正是雙向專政的實質嗎？

毛澤東社會理想在經濟、文化、政治上的雙面指向，儘管打著「公與私」、「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樣三對話語幌子，但徹底剝奪個人一切權利的根本性質，仍然是至少八億中國人親身經歷的鐵證事實。

為了讓毛澤東社會理想的實質更加通俗易懂，我們再來看他「批判修正主義」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真實含義。

這裏所說的「修正」、「復辟」，是指上世紀50年代中和60年代末發生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事件。它們包括1956年2月蘇聯「非史達林運動」，1956年6月波蘭「波茲南事件」，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這些事

件有兩個共同的特點：第一，都主張改變史達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體制，以民主代替專制；第二，都有執政黨內持改革態度的高層人士參予。毛澤東密切注視著這些事件的發生，並且感受到了到巨大的衝擊。自此，在其社會理想結構的否定物件中重點加進了「修正主義」，防止來自黨內的「資本主義復辟」和「防修反修」，成了他重點思考的新課題。國內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1962-1965年對文藝問題的一系列批示和「文化批判」運動，1964-1966年的「四清」運動，都是在這個思路展開的。1966-1976年以「鬥私批修」為基本內容、被稱為「防修反修大演習」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更是這個思路完全成熟的最高標誌。

現在談論「反右」運動的起因，大多認為是毛澤東先有預謀然後引蛇出洞一網打盡。原中央文革小組重要成員戚本禹，以知情人的身份談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認為「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鬥爭的原因」，是「擔心在中國發生匈牙利事件」⁸²。他的看法比較客觀。可以說，毛澤東「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和「防修反修」的思想種子，就是這時播下的。

現在談到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關於文藝問題的批示時，人們很少注意兩個警告性提法的核心意指。一是「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二是「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是「匈牙利事件」中該國民主知識份子的聚會中心；「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顯然指逼近「復辟」地帶。這表明：即使對小小文藝問題，毛澤東也是懷著擔心發生「匈牙利事件」和「非史達林運動」的高度警覺來看待的。

聯想到毛澤東在「文革」中打倒了劉少奇等一大批黨內「修正主義頭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後，仍然憂心忡忡地再三告誡「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並未消除，聯想到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後，《人民日報》4月18日那篇名為〈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的社論將鄧小平比喻為「匈牙利事件」中黨內改革派領袖「納吉」之事，我們不禁要追問：在「防止修正主義復辟」的虛假言詞背後，毛澤東真正要防止的究竟是什麼？

答案非常明確：毛澤東所要防止的，正是1979年後中國發生的歷史巨變。這個變化的歷史指向，同「非史達林運動」、「匈牙利事件」

和「布拉格之春」一脈相承：對史達林模式的官僚壟斷體制和個人獨裁統治進行改革，在「社會主義」框架內，還人民以一定的民主，給個人以一定的自由。這個天翻地覆的歷史大轉變，在當年的蘇聯、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只有開始而無結局，在1979年以後的中國，卻實實在在的有了結果。

我相信毛澤東臨終前在葉劍英耳邊說的那句讓人不知所云的話，應該是他生前的最後一件心事：防止……修正……復辟……。

十分慶幸，毛澤東傾數十年之力想要防止的事變終於沒能防住，他的社會理想終於被全面修正，人民被剝奪的權利終於開始復辟。

站在今天望昨天。只要捫心承認毛澤東沒能防止住的社會體制改革更符合國情、民心 and 人性，我們就得承認：毛澤東社會理想結構的正向所堅持和追求的，其實是蒙上「無產階級」言詞假像的封建專制主義；其反向所防止和反對的，恰好是隱藏在「資本主義」言詞假像之下的民主社會主義？以及由此進一步轉向現代民主社會的歷史可能性。

對於中國人民和中國歷史來說，毛澤東社會理想的實質，絕非進步而是倒退，絕非先進而是落後，絕非革命而是反動！

遺憾的是，偏偏有那麼一些不乏真知灼見的學者把毛澤東的社會理想奉為神聖。

程世平在其力作《靈魂的需求》中，認為毛澤東社會理想的實質和魯迅一樣，是包括人心改造和文化批判在內的國民劣根性改造。作者認為：人心改造問題，在毛澤東那裏不是認識上的困難，而是表述上的困難。因為改造物件是他的戰友和人民，這使他陷入了兩難境地，他真實的動機只好隱藏在為人們所接受的革命的、階級的語詞系統中，給人們理解他的思想設下了深深的陷阱。他的地位不容他自由發表一個思想家的見解，他思想家的本性不得不隱藏在政治家面貌背後。他的政治地位使他不得不艱難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他不得不為活躍的思想付出驚人的代價，甚至闖下彌天大禍。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思想的內在價值。從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雙百方針，教育改革直到文化大革命，無不與國民性問題息息相關。然而，政治家的地位限制了他，使他很難把他文化批判的思想轉化為文化批判的語言。他只好借助於政治語言。毛澤東的

錯誤，不在他的思想而在他的政治集團領袖地位。作者還引用英國歷史哲學家湯因比的話說：「毛澤東比我們時代先進五十年。」⁸³

其中謬誤不必細論。我只想指明兩點：

第一，毛澤東與魯迅毫無共同之處。魯迅的人心改造，針對的是中國人意識中的保守、奴性、愚昧、麻木和萎靡；魯迅文化批判的物件是愚人、蒙人和吃人的舊傳統、舊禮教、舊道學。在進行人心與文化的批判中，魯迅使用的武器是西方近代以來的個體主義、民主思想和自由精神。與魯迅相反，毛澤東在人心改造中所批判的，正好是人們在西方近現代文化影響下對自身人格、個性、地位和權利的意識與要求；毛澤東在文化方面所批判的，恰好是世界和中國近代以來以人為主題的優秀文化，對法家之類的專制權謀，秦始皇之流的暴君典型，反而大肆宣揚。而且，毛澤東藉以實行人心改造和文化批判的武器，也是完全否定個體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政治文化。毛澤東與魯迅大相徑庭。

第二，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通讀毛澤東著作，除了那些存現於政治性階級性語詞系統的思想，他還有得起只存乎於心的其他什麼屬於思想家的獨立見解嗎？他一生就思索和言說在這麼一個話語空間，所有的思索和言說都超不出這個話語系統。何隱藏之有？

20世紀90年代，國內外一些持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的學者，在否定的前提下，認為「文革」所主張的文化觀念和價值，明顯地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觀念價值有繼承性。真是大錯特錯。「文革」中存現於官方和民間理知層面的文化價值觀念，集中包含在毛澤東反歷史社會理想的話語系統之中。特點是要求全面犧牲個人的一切，來服從最高領袖假借國家之名的個人利益和個人意志。它完全反「五四」的個體權利主題。如果所指的是「文革」中毛澤東與廣大青年學生非制度化個性行為的極端傾向，這就不屬於文化價值觀念範疇了。如果所指只是「文革」中期以後廣大青年的不滿、懷疑和探索，就更不能成立。因為青年的覺悟雖然接近「五四」，但卻是反對「文革」文化價值觀念的。

無論從主觀意圖還是客觀效果看，或者只看對社會道德和歷史進程所起的客觀作用，我們都可以認為：毛澤東的社會理想及其政治實踐，完全是消極和負性的。他與所處時代的關係，不是先進了五十年，而是

落後了五十年——完全退回到「五四」運動之前了。

毛澤東作為一個思想家之所以顯得高大，只是因為我們沒有看清他。仔細觀察吧！沒有必要把毛澤東看得太高。不是故意貶低他，而是作為一個思想家，他本來就不高大。

由此不難看出，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其實並不矛盾，其非制度化的個性行為與逆歷史潮流而行的社會理想完全是統一的。這種統一性在於：由於中央決策層制度化組織程式的制約，他只有以非制度化行為才能推行其反歷史社會理想。其「矛盾性」中為人稱道的一面，僅僅是其非制度化個性的魅力體現，令人憎惡的一面恰好是其反歷史社會理想的荒唐實踐。

注釋：

- 79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1月，第194-195頁。
80 徐友漁：《精神生成語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28-329頁。
81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1月，第125-145頁。
82 葉永烈：《文革名人風雲錄》，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220頁。
83 程世平：《靈魂的需求》，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156-181頁。

第八章 造反派與毛澤東的利益契合點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以非制度化個性行為推行其反歷史社會理想的全面實踐和集中表現。

從毛澤東社會理想的實質看，造反派的利益要求根本不可能與之契合，能契合的，只是毛極端的非制度化行為，以及毛在社會理想結構的反向否定面將黨內反對派列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打倒的理論與實踐。

第一節 毛澤東的政治假想敵與「文革」的爆發

1958-1960年首次大規模推行其社會理想遭致失敗後，毛澤東被迫暫時退居幕後，但內心並未服輸，反而將責任歸咎於全國上下只敢隱約表示異議的「反對者」。毛的假想敵包括三部分人：體制內上層知識份子，官僚階層，劉少奇系統的高層掌權者。

毛澤東是個學歷較低、學養頗高的知識份子，但從「延安整風」、「反右」運動直到「文革」，他對黨內外知識份子的敵視一直有增無減。一方面自然是受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影響，認為知識份子總體屬「小資產階級」範疇，其傾向資產階級的一面必然與無產階級政權對立，而這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大多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又是舊學校培養出來的，必然與剝削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另一方面，認為建政十七年來，對他推行社會理想所開展的一系列經濟、政治、文化運動意見最多者，莫過於知識份子階層：他們在教育界堅持傳播「資產階級思想」，在文藝界頑固宣揚「資產階級觀點」，而且公然配合劉少奇為首的黨內反對派，以文藝形式借古諷今，將矛頭直指自己。「文革」爆發前，毛澤東關於文藝問題一系列批示中逐年加重的語氣表明，他實際已將這部分知識份子視為類似「匈牙利事件」中試圖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的「裴多菲俱樂部」。這部分知識份子，其實大多為「反右」急先鋒和文化界當權派，完全體制化之後又在官僚化的道路上匆匆行進，頭上根本有不起反骨，例如周揚和吳晗。

官僚階層是毛澤東政權的各級操作者。毛澤東對他們的反感和憎惡，只能來自對自己社會理想受挫原因的錯估。他不會忘記 1958-1960 年「大躍進」中那些「高產衛星」騙局的具體製造者們，自然會認為第一次社會理想大實驗失敗的原因，不是自己決策失誤，而是各級執行者壞事。不僅大實驗因此被迫中斷，還直接導致自己在舉國上下無聲的埋怨中退居二線。這批人就算不是故意，至少也是做官當老爺之後再也領會不了自己的意圖，不堪信任了。更為嚴重的是，劉少奇進居一線之後所採取的旨在「修正」自己路線的一系列舉措，這批人不僅心領神會，而且聞風而動忠實貫徹，表明他們與劉深深默契，而和自己離心離德。這雖然是以相關歷史事件為背景從心理角度進行的分析，卻更接近真實。

關於毛澤東在「文革」中聽任造反民眾打倒各級當權者的原因，有學者認為，是毛出於對延安時代的懷念和對官僚階層暮氣風貌與拖泥帶水的憎惡；還有學者認為，主要是毛看到了廣大群眾對封建性官僚主義的不快、不滿和憤怒，「群眾有氣要發洩」，所以順勢聽之任之。鑒於毛澤東的非制度化個性，不排除這些因素的作用，但是它們太表面化，不可能成為毛澤東親手粉碎自己建立的龐大黨政組織這個驚世之舉的深層原因。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主要不是政見分歧而是權力失衡。自 1935 年遵義會議起開始共事，直到 1966 年「文革」爆發，劉對毛始終小心遵命，不敢越雷池半步。1959-1966 任國家主席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劉為緩解三年大饑荒造成的經濟頹勢所採取的務實政策，即使與毛的極端傾向有些抵牾，但初衷還是為了維護毛及其政權，根本說不上水火不容式的政見分歧。要害在於劉的務實政策偏偏與毛最為敏感的權力問題糾纏在一起，使問題變得複雜化。毛本來就是個權術大家，在他眼裏，權力問題不僅是革命的根本，而且是政治的要害。小心翼翼的劉偏偏在這個問題上犯了禁忌，儘管有可能不是蓄意。

中國共產黨內原本沒有西方式的派系，但黨內幹部因歷史上不同的工作環境和直屬關係，無形中還是在人際之間存在某種影子式的派系。其中最重要也最易分辨的，是「中央根據地」派系、「白區地下黨」派系、「法國勤工儉學」派系。原紅四方面軍系統的李先念、徐向前、許

世友等因群龍無首而依附於毛澤東麾下，原紅二方面軍系統的賀龍等則游離於三派之間。三系的最高代表分別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建政後，革命的重心從武裝鬥爭轉為經濟建設，原白區地下黨的領導幹部，因文化素養較高又熟悉城市工作，在黨政領導機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1954 年「高、饒事件」的導火線，便是靠槍桿子起家而依附於「中央根據地」派系的要員對「白區地下黨」派系成員攬權行為的強烈不滿。只不過當年的毛澤東毅然站在劉少奇一邊，將反對劉及「白區地下黨」派系的高、饒等人逐入陰曹地府。自此直至「文革」開始前，再無反對者出現。但黨中央、國務院及其所在地北京市的高層職位，的確很多為原「白區地下黨」的人所佔據。例如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彭真不僅是中央機關所在地——北京市的黨政軍一把手，而且實際主持中央書記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中央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辦公廳也基本為劉的親信或傾向劉的人所把持。甚至形成了毛澤東嚴厲斥責過的局面：大事不請示，小事天天報。1964 年 12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毛理應參加也不讓出席，毛自己出席後又不安排講話。以致給人造成這樣的印象：毛澤東除了還掌握著槍桿子之外，實際已被劉少奇架空。從 1965 年 11 月彭真敢於嚴禁北京市轉載毛澤東授意姚文元所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事來看，這應該不是幻相。毛澤東自然心知肚明。1966 年 10 月 24 日與陶鑄談話時，他也承認「大權旁落」，儘管強調是自己「故意」的。毛澤東有一種無形中被置於中央權力圈層邊緣的強烈感覺。對於一個視權力如生命的最高領袖來說，大權旁落式的心理失衡，能不引起高度的警覺和極度的憤怒嗎？他能不設法重返權力中心嗎？加之毛澤東已認定各級地方當權者大多與劉少奇有默契——中央加上地方，問題就更嚴重了。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毛澤東已將劉少奇的權力僭越與其務實政策聯繫在一起，列入自己社會理想結構的反向來進行審視，認定劉屬有組織有計劃的「篡權」，目的是逐步從黨內改變無產階級政權的性質，以便最終在全國實現資本主義復辟。劉的形象，自然變成了黨內赫魯雪夫式的資產階級總代表、修正主義總頭目和睡在毛身邊的野心家、陰謀家，其政治命運由此註定。毛澤東暗自產生這個可怕念頭的最初時間不

得而知，但最終作出剷除昔日第一戰友果斷決定的時間，不會晚於1965年1月——因為在此時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提出了「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把它寫進了1月14日通過的《二十三條》中。這件事提供了毛在虛假政治言詞下以個人私欲冒充天下大義的又一範例。

據王力提供的「文革」內景資料介紹：作為「文革」正式開始標誌的中共中央1966年《五一六通知》，毛澤東關於鬥爭物件特地加上的一段話的原文是：「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藝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裏面提到的是「一批」，而不是後來公佈時改成的「一小撮」⁸⁴。足見在毛澤東最初的認知中，假想敵情是何等嚴重。

在三種假想敵中，毛澤東要整的重點自然是第三種人：掌握黨和國家高層權力的劉少奇及其黨羽，其餘兩種人則被視為劉的政治基礎和文化附庸而在劫難逃。在推翻舊制度、建立新制度——大破大立的革命生涯中，毛歷來倡行先破後立，相信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開展這場捍衛自己領袖地位和社會理想的政治大決戰，毛同樣照辦不誤：先在反向否定面打倒代表資產階級的劉及其各種附屬勢力，而正向肯定面無產階級化的新制度、新人物和新風貌自然就立起來了。

為了實現這個特異的大破大立式構想，毛澤東不僅需要割捨與劉少奇及其附屬勢力政治上、情感上數十年形成的緊密聯繫，還必須拿出理論上的膽識——突破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的限制。把「資產階級」從黨外移到黨內，把「階級敵人」由底層「黑五類」賤民變為高層「紅五類」權貴，把政治主戰場由黨外「階級鬥爭」改為黨內「路線鬥爭」，無疑是十七年來權刃指向的重大改變。無論稱之為「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還是說它屬於「實用理性」的機變表現，這個改變都足以使壓在中國下層民眾頭上的專制巨石為之鬆動，也讓全中國和全世界為之震驚。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在毛澤東的這種心理背景下發生。它由歷史的、現實的、觀念的、權力的多種動機重疊而成，看似複雜矛盾，很難猜透，但是只要把握住毛非制度化個性行為與反歷史社會理想統一構成的主題色調，便不難一目了然。

「文革」爆發，並不像通常想像的那樣簡單——毛澤東在中南海突然點燃導火線，全國各地便「轟」地一聲引爆了。開始的過程複雜而艱難。

最初，毛澤東也試圖按組織化程式通過自己關於運動的決議，但在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的意見一次次被否定，劉曲解毛意圖的主張卻一次次獲通過並成為中央決議下發。無論毛權勢多重、威信多高，高層政要卻多數站在劉一邊，按組織化程式形成集體決議，在全國有序開展運動，已經行不通。

毛澤東從不服輸的秉性憤然發作，不惜採取非制度化的極端行為——「搬石頭、挖牆腳、摻沙子」，為拉開這場政治決戰的序幕而特立獨行，以戰術家的權謀大搞出其不意突然襲擊。為贏得新「土儲」林彪槍桿子的全力支持，毛澤東不惜將自己忠實愛將羅瑞卿悲憤的淚水當作交杯酒與林共飲。為爭取地方實力派的擁戴，南巡途中毛不惜向許世友抒發「重上井岡山打遊擊」的悲壯情懷。為使中樞復控，毛不惜重用一批同樣處於權力圈層邊緣的極端文人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取代書記處。為突破劉少奇的防線，毛不惜在自己的腳下動土——一舉端掉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班子。為得到人民群眾的聲援，毛不惜以中央主席的身份「炮打司令部」，帶頭造中央的反。為營造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場面給反對派施加民意壓力，毛澤東不惜八次檢閱1300萬紅衛兵，並支持全國免費大串聯和自己未必滿意的「破四舊」行動。通過這些行為，毛終於擺脫了1962年以來令其透不過氣來的「少數服從多數」的制度化束縛，確立了非制度化的個人權威。

這段「文革」發端史，眾多文獻皆有記載，其中尤以師東兵的《文革檔案》最為翔實。

「文革」序幕由此拉開。

由青年學生首先發難的民眾造反運動，由此興起。

第二節 毛澤東與青年學生和下層民眾的利益契合

現在論及當年人們的造反動機，大多首推十七年的「革命思想教育」所培養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盲目崇拜、狂熱忠誠和絕對服從。

「革命思想教育」內容很多，主要包括：革命理論教育、歷史傳統教育、英雄事蹟教育、憶苦思甜教育、揭發批判教育、心得體會教育……它是毛澤東反歷史社會理想結構的人文教育層面，目的是讓人自小就只能聽見「無產階級」的正音，排除父母授之于耳和書刊傳之於目的形形色色「封、資、修」邪音對年輕一代思想的反動影響，培養永不變質的「社會主義新人」。其實質顯而易見：對人實行「洗腦」和「塑心」，讓人在接受同化的過程中，逐漸忘掉自身存在的豐富多樣性，自願成為單一的模型人，自動放棄自身的主體地位和權利要求，變成領袖所操縱的政治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結果是使一代又一代青年，自我被抽空，良知被蒙蔽，人性被扭曲，從神聖的自我存在物異化為卑微的政治存在物。由此產生的效忠領袖的衝動和獻身革命的熱情，自然是青年造反動機中的一個因素，「黑五類」子女也不例外。

但是，這只屬於人的「顯意識」或「理知意識」層面的淺表動機，它不足以構成數億人瘋狂投入並持續三年之久造反運動的心理內驅力。

更深更大的內驅力有兩個：一是年輕人青春特有的非制度化傾向，二是下層民眾反抗政治迫害和等級歧視的衝動。這正是「文革」中民間造反行動與毛澤東政治行為之間的兩大契合點。

第一個契合點存現於毛澤東非制度化個性行為與青年人非制度化個性傾向之間。

上世紀90年代，一盒《紅太陽》唱紅大江南北，關於毛澤東的紀實文學作品銷量年年列居榜首。我詢問過許多愛用「向毛主席保證」代替誓言的年輕人：喜歡毛澤東什麼？他們大多回答：喜歡毛「走下神壇」後的性格魅力和土土人情味。我想起從50年代末至整個60年代，很多年輕人對毛心心相印式的感覺。這期間毛發表了一系列自由言論，鼓勵青年人膽造反，稱讚青年首創精神，宣揚青年獨立個性和勃勃朝氣。其中尤以在成都會議和杭州會議上的講話最為精彩也最激奮人心。所有講話，皆以青年的無畏、創新和激進作為對比，對老朽守舊的官僚主義進行抨擊。其中諸如「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之類名句，成為經典語錄廣為傳播。在當年的中國，只有毛澤東一人敢於毫無禁忌地發表此類離經叛道的言論。青年們聞之無不歡欣鼓舞，直把毛當成了自己的

代言者和知音。

「文革」初期，毛的這批講話紛紛被紅衛兵印成傳單廣為散發，在廣大青年中引起的反響不亞於當年。

毛澤東的這類講話何以能在青年中得到強烈呼應？

因為15-25歲年齡段的青年人，恰好處於人生的非制度化個性傾向時期。

毛澤東講話所體現的非制度化精神，自然會在廣大青年心中引起共鳴。

只不過「文革」前的青年生不逢時，與毛澤東的共鳴只能局限在心裏。他們不像億人之上的毛一樣，可以非制度化地任意言說和行動而百無禁忌。他們長年生活在重重禁忌的包圍之中，非制度化傾向只表現為內心的衝動，所有外顯行為都被巨大的政治恐懼嚇退，並在目光中異變為失望和呆滯。

適逢「文革」的青年人則不然：毛澤東不僅向他們發出非制度化的言說，而且公然號召他們將內心的非制度化衝動外化為實際行動——造反。十七年來年輕人青春期的特權第一次被宣佈為合法，自我肯定與自我表現、懷疑與追求、叛逆與創造，盡可按照偉大領袖指明的反權威、反束縛方向放膽而行。「文革」中毛澤東與廣大青年的第一次契合由此實現。

在《自由的言說》一書中，徐友漁如實記下了幾位當年的紅衛兵在個性問題上的切身感受。

電影導演田壯壯認為：「文革」開始時停課，很適合他這種個性特別散漫的人，所以覺得最愉快。

作家王朔說：文化革命再不好，但它打亂了生活秩序，給個性發展提供了機會。

武漢作家H的感受更加全面。他認為：中國的教育制度對青年學生非常壓抑，使他們生理、心理、情感方面形成了張力，又沒有渠道宣洩。一旦有機會表現自己，無論是建設性的還是破壞性的，無論是正確還是錯誤，他們都歡欣若狂。以前被老師管，現在可以管老師；以前規規矩矩，現在可以自由活動；以前足不出戶，現在可以坐上火車到處跑。這都是青春期欲望的表現。這是一種個人主義、個性至上，所以他

們表現出特別的欣喜、熱情。「文革」還給許多人提供了舞臺，讓他們施展以前無法施展的才能。如出身不好的，被老師認為有思想問題或被抓到什麼把柄的人，他們以前缺乏大大方方表現自己的機會，這時天下大亂，過去的家庭問題、思想問題等等此時不再成為大問題。他們這時有了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這是以前絕對無法做到的。85

這些感受，除了H所述內容的最後一段之外，都可以歸結為廣大青年的非制度化個性傾向與毛澤東非制度化個性行為的契合。

作為一個「老紅衛兵」，作家張承志至今對毛澤東推崇有加，並且拒絕為自己的青春行為懺悔。他自然遭到了人們的譴責。我認為，張承志拒絕懺悔的真實原因，並非他太留戀自己發明的「紅衛兵」這個名稱，也不是為了掩蓋「老紅衛兵」的惡行，他堅持肯定的，其實只是毛澤東的非制度化個性行為與青年人的非制度化個性傾向聯合上演反權威反束縛的歷史戲劇。正如他所說：「為紅衛兵運動中的青春叛逆性質，堅決地進行讚揚。」86 只不過，他把毛澤東和「老紅衛兵」可以理解的非制度化個性行為與必須否定的行為內容，不加區別地攪混了。

不過這次契合很不普遍。毛澤東此時指引青年反對的權威，還只是其假想敵中的第一種人——「反動學術權威」，加上各級當權者和工作組誤解毛的真實意圖，仍然沿用歷次整人運動的套路，將下層民眾中的「黑五類」和「小右派」、「小三家村」列為鬥爭物件，使得有政治條件參予「造反」的青年，僅限於以「高幹」子女為首的「紅五類」——官辦紅衛兵。出於等級本能和歷史慣性，他們滿以為這次運動最多只是「反右」的升級，打擊對象超不出文人範疇——諸如老師、專家、名流之類壓在自己頭上的「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所以熱情特別高漲，行為尤其瘋狂。

非「紅五類」出身的青年同樣有響應毛澤東號召的衝動，但因運動採用「反右」一類的階級鬥爭模式，不少人不僅照舊處於「准法外人」之境，而且很快就和父母一起隨同文人權威們一道挨整。他們尚無條件和機會實際參與。

第二次更為廣泛的契合，是在毛澤東決定公開打倒劉少奇和各級當權派並批判劉所派工作組的時候。

這時，官辦紅衛兵見毛澤東將矛頭轉向自己的父輩，因利益衝突，

紛紛掉頭站到毛的對立面，從此退出與毛的契合點。青春期權利的合法性同時失去。

非「紅五類」青年學生的機會同時到來。隨著毛澤東將鬥爭矛頭轉向劉少奇及其工作組和各級當權派，「階級鬥爭」模式被「路線鬥爭」模式取代，他們不僅直接從受壓制的困境中解放出來，而且多年來深入骨髓的「准法外人」身份也間接得到平反。政治身份合法了，青春期權利合法了，反抗等級歧視並改變政治處境的強烈本能衝動也突然變為合法。這些合法權利都是偉大領袖給的。於是，他們懷著十倍的忠誠百倍的熱情起來造反。造迫害自己的劉少奇工作組的反，造以劉為代稱長期壓迫自己的各級官僚政治權威的反。一時的解放並未完全消除自小受壓形成的政治恐懼，他們在造反中隨時自我提醒不能偏離偉大領袖指定的鬥爭大方向，生怕因此失去來之不易的合法權利。因為政治自卑心理，為了強化自己身份和行為的合法性，他們在「顯意識」層面對毛的忠誠，遠勝於自恃出身優越的官辦紅衛兵。他們當然意識不到，毛對自己的認同和自己合法性的獲得，只是毛非制度化個性行為和打倒劉為首「黨內走資派」的政治指向，與自己的報恩衝動、青春期衝動和反官僚衝動，暫時契合的結果。

以專整上層的「路線鬥爭」模式取代專整下層的「階級鬥爭」模式，同時也打破了長期加在校園之外廣大下層民眾身上的政治桎梏。為了獲得「文革」氣氛中的革命式合法性認同，更為了改善自身的處境，他們也起來造反了。由非「紅五類」出身的青年學生最先發起矛頭直指官僚階層的造反運動，因此而隊伍猛增聲勢宏大起來。校園外民眾與毛澤東契合的因素，除了青年群體與非「紅五類」學生大體相同外，其他年齡段的人群大多只限於改變個人處境和反對官僚階層。他們的加入，既壯大了造反派的陣營，又使造反派的成份構成變得複雜起來。

看似由毛澤東一手發動，實為毛與下層民眾暫時共同行為特徵和共同利益要求巧然契合而成的造反運動，一時震撼全國驚呆世界。在世人的眾說紛紜中，記得那位曾在「文革」中被毛澤東邀請到北京一同檢閱造反大軍的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多少看出了其中的奧妙——他認為「文革」中毛的非組織化異舉和民眾的反官僚行動，是存在主義的偉大

實踐。薩特目光所及，顯然是毛與廣大青年造反者共有的非制度化行為，他自然沒有看到毛與造反者性質不同的利益要求及其具體的契合點。

我對「毛澤東利用造反派」的說法一直不敢苟同。

那些歷來只能忍氣吞聲任人宰割的卑賤者，如今可以理直氣壯地逼著整人專家公開平反並認錯道歉，使挨整之事變成光榮的經歷——難道僅僅是被利用？

那些長期被邪惡的檔案制度壓得出不了氣的嫌疑人，如今可以將領導背著當事人製造的「黑材料」清查出來當眾付之一火炬——難道僅僅是被利用？

在那樣一個人生被限定於狹小生活空間而且不允許任何動彈的絕對固定型社會，廣大青年可以在廣受歡迎和深受尊敬的氛圍中免費周遊全國而大開眼界大壯情懷——難道僅僅是被利用？

在那樣一個絕不允許個人為實現自我價值而有所奮鬥的極權主義社會，無數飽受壓抑的下層青年打破等級歧視，從默默無聞的賤民一下成為世人矚目的著名人物——難道僅僅是被利用？

在那樣一個政治權力被高度壟斷的官僚主義社會，民眾代表通過直接選舉或半直接選舉，進入各級「三結合」的政權當中嘗到掌權的滋味——難道僅僅是被利用？

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個人短暫的一生，對於一個民族及其世世代代來說只不過是滄海一粟，但對於自己來說卻是他的全部。誰能說被大眾淹沒而默默無聞是人最應該過的生活？誰能說成為社會機器的螺絲釘是人最應該認領的角色？誰能說沒有震撼沒有激情沒有回憶的經歷是人生最應該的選擇？至少，那罕見的人生經歷及其所內化的心理體驗和精神嬗變，極大地豐富了一代人的生命內涵——更不是憑一個被利用的浮淺理由概括得了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個文革」與「兩個文革」的爭論，答案自會不同。

「文革」只有一個，不存在「官方文革」與「民間文革」的分野。但作為「文革」內驅力的群體利益動機構成，卻至少有三個：毛澤東及其極端派的行為動機，上層紅色子弟的行為動機，下層雜色人群的行為動

機。站在普遍人性立場看，前二者屬於過剩式貪欲，該當否定，後者屬於匱乏式要求，值得同情。

無論「一個文革」論還是「兩個文革」論，都未能深入到人的利益層面而只看到現象表面，由此展開爭論，自然難有結果。

「兩個文革」論者只要深入到人的利益層面，放棄將「四大自由」之類假像作為立論的依據，其立論便基本成立。

「一個文革」論者，只要深入到人的利益層面，不限於對「四大自由」虛假性質的識破，即會糾正自己的反駁。

利益動機的存在是人的最大心理真實。任何貌似為「公」或以「公」名進行的活動，背後都隱存著私利的動機。無論個人或階層的行為都是如此。

只不過人的利益動機又分為兩類：一類是意識到的，一類是沒有意識到的。很多時候兩類動機重疊交織。第二類不僅同樣真實，而且往往表現為盲目的潛意識動機而驅動力更強。

造反派由自身等級地位決定的利益動機，除了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二月鎮反」和「清查五一六」的迫害而要求「落實平反政策」這部分是意識到的，多數屬於沒有意識到的潛意識衝動？例如反等級歧視和反官僚壓迫。由於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受了兩千多年儒學倫理思想的導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類的說教深入骨髓，所以中國人的利益動機——無論意識到的還是沒有意識到的，都免不了要用符合倫理人義的「神聖」理由做掩飾，使得中國人的利益動機很難辨識。然而，在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和造反派「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口號的背後，他們意識到的和沒有意識到的利益動機仍然存在。

人的利益動機，從潛意識變為顯意識，再變為明確的訴求，有待理性的照明和提升。「文革」中的造反派還不具備這種人文條件——他們深層的利益動機盲目而隱蔽。

斷然否認私利動機者不外乎三種人：弱智兒、偽君子和聖賢。聖賢其實也有私欲，於是只剩下兩種人。

這兩種人的言說自然不可信。

至於朱學勤式的「兩個文革」論⁸⁷，那只是一種提法而已。因為他所說另一個「地下的『文革』」，雖由「文革」催發，但青年們的不滿、懷疑和探索，完全是反「文革」的，屬於與「文革」對立的另一個範疇。朱學勤的本意不過是說明，「文革」內部包含著官方與民間的緊張對立內涵，不可一概而論。這與想從「文革」官方話語中找到「可利用資源」的企圖，截然不同。

受中國「文革」影響，1968年歐洲和北美爆發了被稱為「五月風暴」的青年學生反權威、反官僚、反資本的造反運動。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解構主義為核心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在中國興起，很多第三代詩人把毛澤東和「文革」當作自己的精神太陽和歷史家園。於是有人認為西方造反青年和中國先鋒詩人與毛澤東思想相通。這當然是巨大的誤會。看起來，「文革」中毛澤東的作法，與德里達消除中心和瓦解等級的解構思想頗為相似，但對於毛澤東，這只是個性行為的特徵而非思想觀念的實質。真正對西方造反青年和中國先鋒詩人產生影響的，只是「文革」中毛澤東的非制度化個性行為。非制度化，本是西方個體主義的外顯特徵和中國先鋒藝術的內在傾向，他們自然很容易與「文革」中毛澤東的非制度化個性行為產生共鳴。其實，他們與「文革」中造反青年相通的地方更多一些，比如青春反權威、反束縛的非制度化傾向，比如下層人群反等級歧視、反政治迫害、反官僚壓迫的抗爭本能衝動。至於說到思想觀念，他們與毛澤東簡直是南轅北轍：一方是張揚現代個體主義，另一方則是絞殺現代個體主義。而且毛澤東的非制度化個性行為最終所要導向的，恰好是建立以自己為絕對權威中心和等級更加森嚴的極權制度。這難道是他們所嚮往的嗎？

我從一些新生代文化人的文章中，看到對昔日造反者的幾點隱隱約約的義憤譴責：一曰造反無理，二曰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三曰對毛澤東愚忠。

對於沒能身臨其境從而不可能感同身受的人來說，發出這類聲音絕不奇怪。因為隨著社會體制的轉型、政治環境的改善和人文主體的進步，昔日造反者的行為會在後人反顧的目光中，越來越顯得愚蠢，越來越不可思議。然而我們不應該忘記特定的歷史環境，不應該忘記在這特

定的環境中同樣存在的情理。我們不妨設身處地想一想：

如果自己十七年來一直遭受等級歧視和政治迫害，「文革」之初又因家庭出身或不慎言論被打成「反革命」，受盡圍攻、批鬥、禁閉之辱，隨時可能淪為永久的專政物件，在出現既合法又光榮的政治機會時，自己能不造反嗎？能說自己造反無理嗎？

如果這個有理的造反者就是當時的你，你造反的物件會是一直壓制你現在又直接整你的當權者呢，還是此時將你解放出來又給你造反權利的毛澤東？既然國內當代最激進的批判型文人，大多也只敢以古人為依託或以貪官為借代來發起他們的造反，他們有權要求彼時彼地的你很早就兼具他們現有的認知和沒有的勇氣，去既反貪官更反皇帝嗎？

如果你就是那個有理去造具體當權派反的人，長期生活在政治鐵屋裏，唯一的洞孔除了用來呼吸生存所需的自然空氣，就是灌輸以無限忠於偉大領袖為主調的革命思想之音，你能有其他思想資源作參照而對偉大領袖萌生疑義嗎？而且毛澤東剛把你從政治絕境中解放出來又給你合法造反的權利，你能對他有所不忠嗎？

其實，後人的譴責和我對譴責的質疑，同樣可以用在「延安整風」和「反右」運動時的造反者身上。被時代局限的豈只一代人。他們都是同一個極權體制內的造反者，只能在合法的造反中尋求被認同的意義。

我想起1971年「批清」運動中，關在隔壁牢房裏的一個死囚。他姓陳，是個貧農出身、共產黨員和轉業軍人身份的激進造反派武鬥連長，因武鬥案被判死刑。從接到死刑判決書之日起直到七天後被押赴刑場，他白天黑夜一直高呼「毛主席萬歲」，連續呼了七天七夜，到後來嗓子已經沙啞得發不出人聲，他仍然在呼著只有自己才能聽懂的「萬歲」口號。

造反知青Z，在地區激進造反派總部負責宣傳。1969年5月的一天到武鬥前線採訪，被流彈擊中頭部。在從死亡邊緣轉回——意念歸附的瞬間，他連呼「毛主席萬歲」，直到再度昏迷。當時在其身邊的摯友H，知道他早在1968年5月就開始對「文革」和毛澤東產生了懷疑，早就打算退出造反，去認真鑽研學問，不可理喻的口號聲讓H迷惑不解。經過十多天的搶救他活了過來。當H後來問及這事，他如實相告：在意念歸附的瞬間，自己最先想到的並不是毛澤東而是母親、弟弟和女友，覺得

自己白白死去太有愧於他們。但想到死得如此不值，總該在最後的時刻給他們留下點什麼，絕望之中便只有學電影裏英雄臨死時的樣子呼起口號。

按我今日的理解，這兩個故事體現的都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因無可奈何的絕望，力圖通過主觀的合法性趨同獲得客觀的合法性意義。而且，這意義首先是為了告慰自己的親人。

這使我想起中國民主政體的創立者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還有「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許德珩：身為1949年後「民主黨派」的領袖人物，他們臨終前的最後願望和最大安慰，竟然是希望成為共產黨員！不少「文革」初期自殺身亡的前輩高人，遺書中往往要留下顫抖的一筆：「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還有美國女作家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在《史達林時代》一書中寫到的情節：不少被史達林無辜殺害的革命者，高呼著「史達林萬歲」的口號走向刑場。

其真實的心理含義，與兩位高呼口號的造反派大同小異：臨死時因無可奈何的絕望，為了能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給親人留下點什麼，不得不以明知虛假的合法性趨同獲取現實認可的合法性意義。

被時代局限的不只是造反派。後人有權哀其不幸，但無權怒其不爭。

注釋：

- 84 葉永烈：《文革名人風雲錄》，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267頁。
85 徐友漁：《自由的言說》，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73-176頁。
86 徐友漁：《精神生成語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83頁。
87 朱學勤：《書齋裏的革命》，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82-83頁。

第九章 歷史的誤會

與保守紅衛兵的半年風光相比，造反派與毛澤東的利益契合持續了將近三年。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開，毛澤東反歷史社會理想結構中的兩大目標——打倒劉少奇為首的政治勢力及官僚機構和起用新生力量並建立各級新政權，初步達成。造反派與毛澤東之間從此失去共同的利益動力，過去的利益契合點上逐漸顯現深深的裂痕。甜蜜歲月宣告結束，嚴冬即將來臨。

從這時起，「文革」第二階段已經走完，全國開始步入軍隊支配運動局勢的第三階段和幹部支配運動局勢的第四階段。

第一節 造反派與毛澤東的利益分離

十年「文革」，並非每一步行程都是按毛澤東的預先規劃進行，某些步驟毛澤東其實是被迫就範。高層權力格局的牽制和下層群眾動勢的掣肘，使任何政治家都難以將這樣一個運動完全控制於掌中。

從1966年5月制定《五一六通知》中，看得出他最初的意圖只是有組織地從文化領域入手製造聲勢來解決劉少奇的問題。到了8月制定《十六條》時，雖然已有發動群眾的主意，但範圍只劃定在學校和縣級以上文化單位，而且這些地方由運動積極分子組成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也還置於黨委領導之下。甚至1966年11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進入高潮，還沒有打算在工廠企業開展運動。至少這個時期，毛澤東並沒有想要全國各地普遍成立群眾組織，並把各級當權派統統「炮打」一通或「火燒」一遍。他所預定的運動期限，只是從半年延長為一年。

這之後的群眾動勢，既出乎毛澤東意外又要歸功於毛澤東：《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標明的運動性質和指出的運動方向與1957年「反右」並無多少差別的特徵，使各級當權者傷害了太多的群眾，而得到毛澤東肯定的保守紅衛兵組織又為反迫害群眾提供了合法的結社形式，於是各行各業群眾組織突破中央文件的限制普遍成立起來，並在「批判資

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名義下將各級當權派作為鬥爭對象。對此，毛澤東顯然屬於被動接受。只不過此時的他還樂於接受，因為這與他骨子裏的非制度化個性特徵不謀而合。其高超之處僅在於運用手中至高無上的權力指揮棍因勢利導罷了。1967年1月開始的大奪權雖然並非他的預謀，但也是所接受群眾動勢的順理成章之事：各級黨組織和政權機構已經癱瘓，立即讓威風掃地的官僚們重歸權位恢復管理職能已不現實；为了不使局面失控，再因勢利導重組各級政權勢在必行。應該說，三年造反運動中發生的這幾件大事，毛澤東幾乎都屬於被動接受而又因勢利導。他在「文革」中最令西方世界震驚和嘆服的所謂親手打碎自己所建立龐大而嚴密的黨組織和官僚機構之壯舉，其實是群眾性造反運動逼使的。「文革」的期限從一年延長為三年，完全是在造反運動自發傾向裹挾下的迫不得已。

以1969年4月中共「九大」為界，這之後「文革」延長至十年，就要完全歸因於高層圍繞接班人問題所發生權力鬥爭的反復折騰了。

由於舉世無雙的神聖地位和從不受制於人的強型個性，毛澤東當然不會一直被動接受造反運動的逼使。如果說三年中被動接受的事實還能與自己的個性特徵和理想實質相契合，那麼在需要重建正常化秩序之時，他就絕不願再遷就造反派了。

這時，毛澤東面前那幅全國地圖上畫出的箭頭指向，已從此前的大破壞，轉變為鞏固所取得的兩大成果——有組織地批臭劉少奇和加強新生政權建設。為此，恢復社會秩序和開始各級政權的正常運轉勢在必行。可是處於破壞亢奮中的造反派卻未能領會到毛的意圖，一方面為失去造反目標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又陷入將同是造反派的對立派視為政治假想敵的無休止衝突之中。

對造反派的不爭氣，毛澤東看在眼裏怒在心上。在指示舉辦各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逐省強行解決兩派對立問題的同時，毫不猶豫地在全國展開了鞏固勝利成果和恢復正常化秩序的運動。這類運動的性質和方式不再是造反，而是整飭。

於是造反派怨氣四起，認為毛澤東「過河拆橋」、「忘恩負義」、「兔死狗烹」。從利益的分離導致情緒的對立，往日的契合漸成記憶。

所有的怨言都是對毛澤東的誤解。

毛澤東似乎有過讓造反派代表取代官僚子女成為各級政權接班人的意向，特別是在造反派的成份因大批普通「紅五類」子女的湧入而趨於純化的時候。比如大奪權之初曾將新生政權建構為半直接選舉式的「兩結合」模式，讓造反派代表佔居新生政權的第一職位；中共「九大」進行權力再分配時，還讓聶元梓、陳敢峰、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夏邦銀等十幾個造反派代表象徵性地進入中央委員會；直至造反派普遍不合朕意而遭驅逐後，還對碩果僅存的造反「樣板」上海另眼看待——不僅保留工人造反派在該市政權機構中的主導地位，甚至在中共「十大」更把王洪文提拔為坐在接班人位置上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但毛澤東很快就失望了。在造反派掌權的地方，他們不能完成從邊緣處境到中心地位的角色轉換，致使矛盾叢生局勢混亂；在全國更多的地方，他們偏離毛澤東指明的運動大方向，紛紛分裂為尖銳對立的兩派，你死我活地鬥個不停，導致社會癱瘓、局勢失控，致使毛澤東結束「文革」的時程表一再更改。毛澤東深感「小將不行」，不得不改變初衷。於是才有了「三結合」革委會的新舉措，讓軍隊出任各級新政權的主角，使全國由此逐漸轉入軍人掌權時期；於是才有了強行解散群眾組織的硬措施，在聽任軍人對造反派進行大整飭的同時，只讓那些倖免於難的造反派代表在各級革委會保留虛職。

革委會的構成由「兩結合」變為「三結合」並逐漸驅逐造反派，是否屬於毛澤東向高層保守勢力妥協的結果呢？非也。事實上，在劉少奇從權力中心消失後，被人們視為保守派的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此時對毛並沒有多少決策影響力。要說妥協，也是毛的自我妥協：不得不放棄對造反派的厚望，轉而依靠軍隊。對於視天下為己有並自信有能力主其沉浮的毛澤東來說，改變初衷的主觀動機絕非讓權於持「不理解也要執行」心態的軍人群體，而是為了自己的大局：穩定局勢，鞏固成果，轉入正軌。

為了實現這個轉變，這期間，毛澤東在高層加重了對軍人的依靠，並將支持「揪軍內一小撮」的王力、關鋒、戚本禹逐出政壇；在全國相繼開展了旨在恢復社會秩序和整飭造反派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

三反」和「批判極左思潮、清查五一六」運動。

在舉辦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將造反派頭頭集中起來「鬥私批修」的同時，三大整飭運動相繼在全國各地轟轟烈烈展開。時間是1968-1971年。

當此整飭大任者自然是各級革委會的掌權軍人。軍人們因其完全的體制化身份和保守立場，矛頭向下得心應手，即使對所支持的造反派也絕不手軟——造反中人在三大運動中紛紛落入無法之法網。這個時期對群眾組織的兩次大解散，更使造反派在喪失政治合法性的同時失去組織合法性。造反派從此被逐出主流政治中心。

從這時起，劃分社會成員政治優劣的標準，重新由「路線站隊」完全恢復為「階級成份」。這期間，不僅大批造反派被鬥、被抓、被判刑都牽涉到家庭出身問題，而且很多像遇羅克一樣的非造反派青年，也是首先從家庭出身推論到階級立場而慘遭逮捕和殺害的。僅從三大整飭運動的名稱就可看出，此次的目標是對造反期間民眾中的階級成份、異端舉動和過激行為進行清理、清查和打擊，家庭出身自然成為確定鬥爭對象的第一標準。經過整飭，社會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文革」前的軌道，但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階級成份論」卻比過去瘋狂百倍。不僅招工、轉正、入團、入黨、提職、參軍和推薦上大學，要以家庭出身決取捨，就連說錯話、寫錯字、唱錯歌、讀錯書，也要以家庭出身定生死。社會等級比過去更加森嚴，政治專制比過去更加暴虐。除了夢裏，在公開的社會場合已經聞不到一絲自由的空氣。記得這個時期我曾給自己和幾位朋友出過一道兩難選擇題：「如果必須在麻風病人和勞改犯人間作一選擇，你會選擇什麼？」當時除了我經過一番猶豫後選擇了勞改犯人，其他朋友都選擇了麻瘋病人。理由不外乎：麻瘋病人不僅可以醫治，尤其政治清白；一旦成為勞改犯人，不僅終生完蛋，還要連累親人。可見制度化的政治壓迫造成的精神恐怖何等深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76年以後。

造反派雖然歷經反復，但這次反復實在太大。打破等級歧視、改變政治處境的願望，被眼前的現實反彈成失望；砸碎舊官僚機構的喜悅，被新生官僚機構的鐵面所冷卻；三年造反所建立「親不親路線分」的人

際局面陡然恢復為以「階級成份」為政治支撐的尖銳歧視。他們因失望而懷疑，因懷疑而對立，大多從此退出造反、撤離「文革」。

造反派與毛澤東的利益分離完全展露。

道理很明白：毛澤東在大破時需要非制度化行為，在大立時必然強調制度化規矩。毛大破時的主要對象劉少奇集團和舊官僚機構現已打倒，大立時的政治主題已變為鞏固新的中央權力及其組織系統。造反派與毛澤東之間因共同的行為傾向和鬥爭物件所產生的利益契合，因此頃刻崩潰。

這種分離，對於毛澤東非常自然，對於造反派卻異常痛苦。他們大多以為是沒有利用價值之後被拋棄，內心的失望、懷疑、對立皆由此生。他們忘了：造反派與毛的契合原本十分脆弱，既有的契合也必須服從毛的政治需要，一旦超出允許範圍就會發出破裂之聲。造反之初的1967年1月底，上海不服駕馭的造反紅衛兵「紅三司」、「紅革會」等，就因超出毛允許的打「走資派」範圍而要打倒張春橋，被毛怒斥後遭到取締。如今的分離純屬自然??因為二者的根本利益本來就不可能契合。

造反派與毛澤東根本利益的對立，從毛澤東反歷史社會理想的基本鬥爭指向就能看出。

解放後，本來國民黨早打跑，地主資產階級已推翻，小商小販皆改造，新生政權廣得人心如日中天，毛澤東早年的社會理想完全實現。然而穩坐江山的毛澤東卻因無人可鬥而其樂不再，於是浮想聯翩，以「無產階級化」為正向追求目標又以「非無產階級化」為反向鬥爭物件的反歷史社會理想，欣然構成，還美其名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第三個里程碑」。在具體實踐中，被列入孤立和打擊範圍的自然是紅色之外所有黑色、麻色以及雜色人群，又以身處社會最底層連基本生活都難以保障的黑色人群為首選敵人。今日明眼人一看即知，那只不過是一種殺雞儆猴式的「禦人術」：通過殺黑色人群之「雞」，來嚇唬其他顏色——甚至包括紅色人群和高層當權者之「猴」，以達震懾人、加強一己威權之目的。可是毛不這樣承認，硬要以虛假言詞「剝削階級及其殘餘勢力」來指稱所禦之大眾，並用「無產階級」來代稱自己。從1957年「反右」起便愈演愈烈的「階級鬥爭」，及其對黑色人群的殘酷打擊，便由此而來。

「文革」中，毛澤東為了打倒自己的政敵，暫時以「路線鬥爭」代換「階級鬥爭」，重點「階級敵人」也從社會底層轉到了黨內高層，但「路線鬥爭」的發生前提仍被視為「階級鬥爭」，「黨內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仍被視為「黨外階級敵人」。黑色子弟和雜色人群，因反官僚的造反行為與毛的利益暫時契合而獲得特赦，但他們忘了即使在這個特殊時期，毛的「階級成份論」也從未實際放棄。為何黑色子弟要自動退出造反派領導層並被阻隔於各級革委會之外？為何官辦紅衛兵破「四舊」、鬥爭「反動權威」、橫掃「牛鬼蛇神」的反文化反人道「成就」，一直被視為「偉大成果」而受到肯定？為何1967年4月22日，大搞打、砸、搶、抄、抓、殺的北京「聯動」頭目全部無罪釋放，並受到周恩來以下全體高層政要的「親切接見」？為何下層黑色子弟遇羅克反對「血統論」追求政治平等的言論短時肯定後又遭否定，本人也於1970年慘遭殺害？這都是毛體制鋒芒直指底層民眾的「階級鬥爭」永遠不可能取消的明證。

打倒劉少奇和舊官僚機構後，雖然輿論宣傳仍在高唱「路線鬥爭」高調，但三大整飭運動的性質和各級新政權的運作方向，以及全國政治生活的總趨勢都進一步表明：「階級鬥爭」仍將是中國政治的主旋律，而且聲音會愈加響亮，黑色人群仍屬於中共政權的首選敵，而且命運會更加悲慘。這不奇怪。虛構式的「階級鬥爭」理論不僅是毛的立國之本，更是治國之道。毛通過「文革」所實現的反歷史社會理想，只會沿著這條道路走至極端，而非相反。黑色人群想在毛的社會理想建構中以人的名義獲得平等地位、平等權利和平等尊重，純屬白日做夢。因為毛澤東反歷史社會理想的人文本性，原本就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權。

保守派紅衛兵和造反派都與毛澤東發生了巨大的誤會。

保守紅衛兵與毛澤東的契合，是在整知識份子、破壞優秀文化和鬥爭黑色人群上。這原本屬於符合雙方根本利益的永久性契合，但因毛澤東為打倒主要政敵暫時將「高幹」子弟們的父輩添列其中而一時破裂。其實，毛澤東的社會理想及其在1969-1976年逐漸成型的現實建構，高度體現了「高幹」子弟們的根本願望。一時的破裂純屬雙方囿於眼前利益所導致的誤會。「文革」後期造反派中黑色子弟紛紛挨整之際，「高幹」子弟們不是全部重振往日雄風了嗎？只是想不到他們至今還在因一

時的誤會而大喊「受害」，真是歷史的作弄連事實也難以消解。

造反派與毛澤東的契合，僅僅是在將劉少奇及各級當權派視為共同敵人這一點上。當共同敵人消失之後，雙方根本利益的對立便展露出來。這就是：黑色子女反抗等級歧視、追求平等權利的願望，在毛澤東社會理想及其現實建構更血統、更等級、更專制的傾向中，根本不能實現。當初的契合純屬一時的誤會。真正能多少體現黑色子女根本願望的，反倒可能是被合力打倒的劉少奇等人的務實主張。如果說上層紅色子弟與毛澤東的一時破裂，是囿於眼前利益發生的表面誤會，那麼下層黑色子弟與毛澤東的一時契合，便是囿於眼前利益所產生的根本誤會。

道理很明白：毛澤東發動「文革」鼓勵造反的本意，是為了阻止名為「修正主義上臺」實為體制內民主改革的發生。而在當時，最可能與這種改革產生利益契合的人群，正是對現實心懷不滿並渴望改變現狀隨後成為造反派的黑色子女和雜色人員。可是僅僅因為暫時的利益契合，最可能支持這種民主改革的造反派人群卻追隨了反對這種民主改革的毛澤東。這確實是個根本的誤會。

然而對於黑色子弟來說，本能的力量畢竟更強大。在「文革」後期，他們大多從歷史的誤會中脫身而出。此後，在「替劉少奇鳴冤叫屈」、「惡毒攻擊毛主席」等罪名下銀鑰入獄者的名單上，有他們的姓名；在四處尋覓苦苦追求人生真理的崎嶇道路上，有他們的足印；在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鬥爭行列中，有他們的身影。可是，僅僅因為他們當初一時的誤會和隨後少數人的繼續誤會，至今眾多不成定論的定論仍將他們牢牢綁在毛澤東反歷史社會理想的戰車上，將他們的根本利益與這輛戰車所裝載特權等級的根本利益混在一起。真是天大的誤會。

第二節 1972-1974：為落實政策被動造反

1972-1974年期間，從人員規模、成份構成、行動方式到造反內容，造反派隊伍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1966年8月至1969年8月三年本義造反時期，造反派的民間主流政治地位全賴四個條件支撐：造反組織的合法性、造反內容的有理性、造

反行為的正當性、造反規模的群眾性。

武鬥的大範圍自相殘殺和社會破壞，使造反派失去人心而跌斷了群眾性支持這條腿；隨後，中央明令解散群眾組織和軍隊掌權者所執行重新回到「階級路線」的清算與打擊，又斬斷了造反派的組織合法性和行為正當性兩條腿；造反派似乎只剩下了最後一條殘缺不全的獨腿：造反有理。

但此時，這最後一點支撐所包含的內容，已不再是主動地打倒什麼「走資派」，而是被動地要求為三大整飭運動所施迫害「落實政策」——好像又回到了運動初期找黨委和工作組要求「平反」時的情形，只是此時已成了一條腿歪歪欲倒的舞蹈。

這時，大學生早已發配式分配工作而全部離校，中學生早已「上山下鄉」奔赴廣闊天地然後逐漸返城工作，機關幹部大多進了「五七幹校」，造反派範疇所指只限於城鎮企事業單位的相關人員了。就是在這些單位，「抓革命，促生產」式的正常秩序早已恢復，群眾組織早已全部解散，參加過造反組織的大多數群眾各自都有了新的利益取向，造反派的存在，僅限於脆弱的歷史性延續、習慣性認同和利害性聯繫。

利害性聯繫實際只存在於三大整飭運動的受害者之間。所謂受害分兩種類型：一種是被批鬥、戴帽、抓捕、判刑者，大多屬黑色子女和雜色人群；另一種是被撤銷在革委會中的職位並挨過批判或坐過監獄者，皆為下層紅色人群。他們因此而互相聯絡，時聚時散，常無定所，為了前者的「平反」和後者的「復職」而擁有共同的現實利益要求。他們人數不多，雖然多為造反派中的知名人士，但群眾基礎已很薄弱。因與繼續在革委會任職並受到官方信任的造反派代表利益分離，而形成造反派的在野派。

有個現象值得注意：這個時期走上工作崗位的原大學和中學的造反紅衛兵，大多自覺納入體制秩序以實現人生的現實目標。他們不再參與單位中和社會上這類與己無關的所謂造反活動，其中少數人還積極靠攏當權者投身針對造反派的整人運動。我後來工作的工廠，1971年「批清」運動時的打手型積極分子，就有來自省城的造反大學生H和來自本市的造反中學生F等。其積極表現不亞這個工廠原來的保守派骨幹。他

們的這種表現在1976年後的「揭、批、查」運動中還有過最後一次。其行為動機，無非是以整這些過去與自己毫無直接利害聯繫的工廠造反者來掙入黨之類政治表現。他們有兩個共同的特點：都是「紅五類」出身；都屬於原來造反穩健派紅衛兵中的活躍分子。這批人在群眾中間不太受歡迎，但較能取得當權者的信任。其中一些人陸續提拔到領導職位，區級、市級、地級、省級都有。這個現象遍及全國各地。所以參與當時在野派活動的學生，只有原來造反紅衛兵組織進入省、地、縣革委會而被撤職的少數頭頭。

在朝派與在野派——是造反派的又一次分裂。它的發生離不開三個必須條件：一是時間都在1968-1971年三大整飭運動之後——只有這個時候，造反派中繼續當官者與失去官職或挨整者之間的利益取向，才可能產生分歧甚至衝突。二是兩派造反群眾都在這三個整飭運動中程度不同地挨整——只有這種形勢，相互間的對立退居次要位置，造反派的注意力才可能轉向內部的利益之爭。三是各級造反組織已經撤銷——只有這種狀況，才能使繼續在革委會任職的造反派代表可以不顧受害群眾的利益而自奔仕途。海外學者楊小凱根據自己當年在湖南的造反經歷，認為1967年夏季之後，造反派進一步分化為支持革委會的在朝派和反對革委會的在野派⁸⁸。這當然不能成立。它不僅大大提前了全國各地造反派分裂為在朝派與在野派的時間，而且也明顯違反當時湖南造反派分裂的實際。湖南省革委成立於1968年4月8日，「省無聯」與「湘江風雷」的分裂發生在1967年8月。當時，即使支持省革籌的「湘江風雷」也還沒有正式入朝，哪裏來的「在朝派」？又何來的「在野派」？因此不如把湖南造反派這時分裂成的兩大派稱為造反激進派和造反極左派為妥。這時所謂造反派的進一步分化，並不是統一的一派再次公開分裂成兩派，而是暗自出現於名義上的兩大派內部，顯然只能在具備三個條件的情況下才會發生。事實上全國各地造反派最後的演化史也是如此。只是因為中央早已明令解散群眾組織，加之廣人民眾已經十分反感大哄大鬧式的「造反」，這次分裂只發生在殘存的少數造反者中間，既沒有繼續發展的組織條件，也沒有廣泛的社會意義。

但在另一個層面，在野派的出現又具有特殊的意義。此時，不少地

方在野派的核心人物已有較清醒的民主意識和較明確的個人目的。他們之所以積極為受害群眾落實政策而奔忙，除了與這些人同病相憐和自身不甘寂寞外，還包括有意識利用在朝派日益脫離所代表的造反派別後，自己逐漸形成的社會影響和群眾基礎，在合法外衣的掩護下伺機做一些抨擊專制現實和啟迪民眾心智的事。例如1974年江西贛州市朱毅領導的「調委會」，在為李九蓮翻案過程中掀起的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所包含的民主意向 89。我所在地區以周氏兄弟為首的造反激進派在野派的行為也與此類似。1971年1月，在抗議當地軍人政權借貫徹中央《一二二五批示》之機大肆迫害造反激進派的活動中，他們貼出了將矛頭直接指向林彪系統軍人政權的大字報《疑問》和《燈塔》，在整座城市引起轟動。一時間，街頭巷尾議論紛紛，機關單位群情激動，甚至地委大院和縣委大院也貼滿了幹部們積極表態的大字報——對掌權軍人十分反感的廣大幹部多數站在作者一邊，人們仿佛又回到了群眾運動尚未結束的兩年之前。雖然掌權軍人慌忙召開全地區30萬人參加的廣播大會進行批判並將作者抓捕，但是這個事件還是對在軍人政權專橫暴戾下萬馬齊喑的社會政治生活造成了巨大的震動，而且在當地的社會政治生活中橫亘了整整四年。大字報提出的質疑和主張，竟與一年半以後中發（1972）14號文件對「一批雙清」運動的否定和對四川「林彪路線代理人」的批判，幾乎完全一致，更令世人稱奇。1974年和1976年，他們又在要求為「批清」受害群眾徹底落實政策的兩次活動中，先後貼出名為《論二次革命》、《再論二次革命》的長篇大字報。文中指出：中國與蘇聯並不是走在兩條道路上的對立，而是屬於同一條道路上的先後兩個階段因處在同一個時期而表現出來的對立。在這條道路的起點，俄羅斯的經濟發展比中國高——所以走在前頭。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文章暗示中國正處在與蘇聯史達林逝世前夕相同的政權交接時期，赫魯雪夫式的民主改革——「二次革命」，將不可避免。雖然很多人沒有領悟到其中的暗指，但少數讀懂的人至今沒有忘記當年從中得到的思想啟發和精神鼓舞。遺憾的是，因為這一類行動當時打著「造反」的幌子，迄今很少有人願意提起，更沒有人想到要去發掘並給予積極的評價。

他們要求「落實政策」的造反行動，是在林彪爆炸之事被逐級保密

了一年之久後終於公開的1972年底開始的。由於「批清」運動的省級主持者很多直接或間接屬於林彪軍內派系賊船上的人，造反派便將否定「批清」運動作為要求落實政策的現成突破口。「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從名稱到內涵的純「階級鬥爭」指向，與反對林彪的「路線鬥爭」掛不上鉤，使其成為與上層紅色子弟1966年8-9月的「造反成果」一樣不許涉及的禁區。膽怯而機智的造反者便以這兩個運動與「批清」有交叉和關聯為由，將其受害者也納入要求落實政策的範圍。

行動大體分兩種：一種是分散式地去找當地最高權力機關遞申訴、談要求，少數有預謀，多數屬自發；另一種是集中式地貼大字報、刷大標語，給當權者施加輿論壓力，大多夜裏進行，落名一律為「受害者」。「四大自由」雖然名義上仍受法律保護，但實際已被取消，造反者大多為單位中人，很怕當局指令所在單位進行追究。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所籲請以法制形式給予保護的自由，主要就是當時全國範圍已被實際取消的「四大自由」。

大潮早已退去，海灘低窪處留下的積水再也掀不起大浪。此時的造反派已名存實亡，此時的造反行動已從公開的主動「打倒」變成半隱蔽的被動「要求」，造反者本身已喪失其本義而只剩下一點別義。

就這麼一點要求落實政策的別義行為也很不順利。因為直到1974年底，雖然「文革」已走出軍隊支配運動局勢時期而進入了幹部支配運動局勢時期，但全國各地革委會還是在三大整飭運動中整了大批無辜者的軍人當權，他們自然不情願因為落實政策而證明自己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這個時期周恩來所佈置以批判「極左」為中心的「批林整風」運動，也為造反派要求落實政策的行動設置了新的障礙。

1969年4月中共「九人」後林彪集團勢力坐大，不僅在政治局佔據了七個席位，而且控制了軍隊三總部中的兩個總部和陸、海、空三軍的指揮權。毛澤東神經質地感覺自己的中心權威再次受到威脅。於是從1970年8-9月九屆二中全會開始，他轉而與一直被當作制衡力量的周恩來聯手，先以莫須有的罪名打倒陳伯達，再借此威勢震懾和鉗制林彪，逼得林彪1971年9月13日莫名其妙地被兒子挾持出逃而機毀人亡。林

彪退出權力角逐後，高層權力格局發生了並非毛澤東所情願的重大改組——權力中樞的黨政軍全面工作改由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等務實派主持，毛澤東曾經用以在黨內和軍內制衡林彪的力量，現在變成了抗衡自己的力量。毛氏反歷史社會理想現實建構的運行方向，因此遇到阻礙。毛氏馭人之心，歷來是既重用又防備。林彪未倒之前，毛除了用周制衡于林，同時也在用林制衡于周，自己居中權衡。林既倒，「新派」實力銳減——明顯不能與「老派」抗衡，逼得毛本人不得不直接站在「新派」一邊。自此，毛失去居中權衡而能翻手為雲復手為雨的主動性，高層政局陷入了不是向左倒就是向右倒的失衡狀態。

周恩來雖然自「反右」以來便半違心地投票支持毛澤東開展的所有運動和打倒所有的運動物件，在「文革」中又身處夾壁四方權衡左右為難，但他本質上是個制度化並持務實態度的人，即使不得已贊成打倒劉少奇，對劉的制度化個性和務實態度，他其實是心有靈犀。毛沒有打倒他，只因他對毛尚未構成最大權力威脅，而且制衡林彪的需要和政務之事也不可或缺。自從陳伯達、林彪相繼垮臺，自己被政局演變推到一人之下的中樞要位，從黨內權力格局中側面制衡林彪的人物變為正面抗衡毛澤東的人物。他自然想借機將中國這艘大船正在駛向礁叢的航道盡力撥轉。他採取的第一個舉措，便是在自己實際主持的「批林整風」運動中，加入一些既有利於撥轉航道又能讓毛澤東無話可說的內涵。這就是批判「極左思潮」和公開《五七一工程紀要》。

「文革」中所謂的「極左思潮」有特定含義，專指造反派過激的鬥爭指向和行為方式。它成為造反派頭上僅次於家庭成份和檔案問題的第三道緊箍咒。周恩來將林彪路線的實質歸為「極左」，既基本切合實情，又包括了否定「文革」偏激傾向的含義。但因包括了「批判極左思潮」這項內容的「批清」運動被轉嫁于林彪路線而正遭否定，周又提出要繼續批判「極左思潮」——使得被否定的「批清」中的這項內容重新得到肯定，給造反派造成了極大的不利。這成為造反派對周生怨的主要癥結。

由林立果一夥少壯派軍人聯手泡制而與林彪並無直接關係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對毛澤東及其專制統治的攻擊用語刻毒，涉及廣泛，例如「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社會法西斯主義」、「中國最大的專

制暴君」、「絞肉機」、「懷疑狂」、「虐待狂」等等，將毛澤東天神一般的光輝形象擊得粉碎。周恩來在毛態度不明僅批「圈閱」的情況下，貿然於1971年11月14日將其作為「批林」附件印發全國，真實用意自然不只是揭露林彪集團的反毛罪惡。王力曾介紹說：「文革」中，他和周總理討論過毛主席在中央文件上所作不同批示的含義。周總理也認為主席只是畫圈的，說明還在考慮之中，值得他們再考慮⁹⁰。由此可見，周此舉一反慣常的審慎和忠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確是冒天下之大不諱。研究周毛此後的衝突，除了周從林的制衡者變為毛的抗衡者這一角色轉換外，也不應該忽視這個關鍵點！事實上，人們在得知這份附件的內容後，大多不認為是對毛澤東的惡毒攻擊，反認為是來自宮庭深處的真實刻畫。毛澤東在廣大群眾心目中牢不可破的偉大形象，頃刻倒塌。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忽然蒼老下去，導致忽然蒼老的重大精神打擊，應該還包括周對《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公開及其預期社會效果的發生。

這些年否定「文革」中民眾造反具有民主性質的眾多理由，首推造反派沒有完整的理論綱領和明確的政治訴求。照此推論，《五七一工程紀要》明確包含的反專制內容和民主改革目標，應該使林立果們成為極權體制內部民主改革的先驅。人們之所以不願這樣去評價它，除了對當時林彪集團所扮演角色的反感，更因為高層的權力陰謀從來只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幌子。

研究「文革」後期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係，禁忌重重，無處涉筆。大多囿於官方話語，皆言二人親密無間，只是「四人幫」屢欲加害于周。這完全有違歷史和心理的真實。二人交惡的現實原因，便是周成為毛的正面抗衡力量後，為撥轉「文革」航向而在「批林整風」中加進的兩點良苦用心。後一點屬於敲山震虎的手法：借林之手揭毛之短，逼毛收斂。

林彪事件加上周恩來的「批林」指向，使得高層政壇的權力大勢和心理優勢盡傾于周。毛澤東自然不會遲鈍到比老百姓還不如的程度，他肯定會將高深的目光從林彪事件中撤回迅速轉向于周。他不會不知道批林的「極左」實際是在批自己親手發動並將林湧上「接班人」高位的「文

革」運動，不會不知道以林之手揭己之短，實際是在攻擊自己的絕對權威。所以1972年12月5日他在一次談話中忿然斥責：什麼「極左」？林路線的實質分明是極右！並指出：不能像林一樣從極右的角度借批「極左」來否定「文革」。至於自己之「短」，他自然不便辯誣，只能隱恨於心。

1973年8月下旬中共「十大」召開。務實派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佔居三個副主席職位，極端派除毛澤東職位不變，康生、王洪文首任副主席，張春橋任常委。表面看，林彪集團退出權力中心後的這次權力再分配，基本是均衡局面，但軍政實權和心理優勢仍在務實派一邊。此次會議上王洪文脫穎而出，不鳴驚人。

王洪文的突然飛升，象徵著毛澤東對造反派態度的又一次重大轉變。雖然王並非本義造反派，雖然本義造反派早已名存實亡，但王的飛升還是給造反派範疇所指稱下層激進民眾的歷史形象，抹上了一層金色的夕暉，也給現實中造反派的殘存力量帶來了巨大的安慰——相信今後不會再挨整。只是高高在上並過份自信的毛沒有想到：造反派早已失去群眾基礎，重用王不僅不能爭取到民心，反而會使自己殘存的民心加速喪失。

所謂「批林批孔」，便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正式開始時間雖然為1974年1月18日，但作為重大組織措施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早在73年12月12日就已採取，主要目的顯然是以調動為名擠走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總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削弱周恩來對軍隊的控制力。

「批林批孔」的實質是批周公，江青將其列為「黨內第十一次路線鬥爭」，自非虛言。官方話語一致稱，此事屬「四人幫」矇騙毛澤東所為，不足為信。矛頭指向周恩來應是毛澤東的本意。這是林彪倒臺後周毛之間難以避免的權力衝突。但毛的本意還不是打倒周，只是炮轟一下壓倒其氣焰而已。至於為何要再次發動民眾聲援，而且要以「借古喻今」的方式進行，答案只能是：周的政治親和力的確很大，而且周與毛的關係尚未達到公開決裂的惡性程度。

客觀看，周恩來與毛澤東的交惡和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反擊，周的確

公心大於私欲，毛的確私欲大於公心。

可是，為眼前利益所囿的造反派看不到這個是非分界。他們只感到「極左」的緊箍咒被毛澤東解除了，自己與毛又有了共同的鬥爭物件和共同的鬥爭利益。除了公開聯絡起更多的人參預要求落實政策外，他們也不忘貼出大字報，隱約地將周恩來視為「第十一次錯誤路線」的最高代表進行批判。有些省份，造反派代表在由「工代會」改成的工會中還有一定的勢力，他們便利用這種身份要求翻案平反。例如湖南長沙的原造反派頭目與骨幹成員就再次聚集起來，以省、市總工會和各單位工會的名義，展開以平反、銷毀被整被批鬥黑材料、恢復原有革委會職務為目的的鬥爭，並試圖再度公開結社——成立各級各種「運動辦」機構，作為與省、市委和各級黨委進行談判和施壓的合法組織。

這時，掌權軍人大多回營。由於運動來勢兇猛，加上造反派名聲尚存，各級掌權幹部深感壓力，落實政策比較順利。除各級革委會的「群眾代表」恢復職務後仍然形同虛設外，其他該平反的人大多平了反。造反派暫時獲得行為正當性這一條半截腿，但同時失去了造反有理這條完整的腿，很快不解而散。

1974年「批林批孔」時全國各地造反派要求落實政策的活動，因為缺少組織形式的凝聚，人員仍然分散、方式仍然被動、規模仍然很小。其中只有兩個例外：一是武漢工人造反派頭頭要求為受迫害造反者平反的活動得到廣大造反群眾的擁護，一下動員起幾十萬人威逼湖北省委，迫使其落實政策。然而當這一行動涉及到這些頭頭的「當官」和「要權」要求時，廣大群眾頓時散去。二是江西贛州朱毅所領導為李九蓮翻案的群眾運動，參加人數達十多萬，規模宏大，場面壯烈，堅持了一個多月，寧死不屈的對抗精神更是感人至深。雖然很多參與者屬於路見不平的市民，但事件的當事人、領導者和基本骨幹仍然是造反派。

這期間，鄧小平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默契下第一次復出。鄧既是周的留法同學，又是毛的井岡山戰友。周想讓鄧代行自己之職，加強與毛抗衡；毛欲以重用之舉令鄧感恩報德，使其在新的權力格局中成為制衡周的人物。不同的用意達成鄧復出的共同結果。鄧非劉少奇影子派系中人，50年代初毛將其調任中共黨務總理——總書記之職，本意即為以鄧

制衡于劉。不料鄧不願居中受夾，經常躲去玩橋牌，將書記處人權拱手讓給鄧坦認實際起到「副總書記」作用的彭真之手，使毛事與願違，也使自己在「文革」初背負「第二號最大走資派」之名遭驅逐。此次復出，毛再次寄以厚望，但鄧本性難移，毛心機白費。

鄧小平復出後入主權力中樞的時間，以1975年1月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為正式標誌。在李德生「自請」辭去中央副主席職務的同時，毛澤東推舉鄧為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軍隊總參謀長、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鄧1973年3月10日復出後，毛分別於1973年底和1974年底，一反常態地將一連串「人才難得」之類籠絡式讚語傾贈于鄧。對於鄧在「批林批孔」嚴峻背景下召開的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上正式成為黨、政、軍工作的實際主持人，不少研究者因認定鄧屬「毛派」人物而疑惑不解。實際上這是毛的一步險棋。

1972年以來周恩來敢於與毛澤東抗衡的障地之一，就是解放二十多年來毛一直不曾涉足的國務院及其行政管理系統和行政管理權力。周毛對峙之後，毛未必不想涉足，但極端派偏偏無此人才，即使毛所看重的張春橋也無能將周取而代之。四屆「人大」之所以一度成為極端派權力追逐的焦點，就因為這是二十多年來對周一手把持的行政權力的第一次改組。這時，周因「批林批孔」的打擊而身心交瘁，經常臥病醫院。新的國務院組成，不僅在副總理一級形成了張春橋以下七名極端派對鄧小平以下四名務實派的格局，而且毛更寄希望于代行總理職權者鄧的皈依，以實現周主宰國務院時代的結束。

鄧小平看似不負厚望，在歷時一年的「全面整頓」中，拿出了一份頗符毛澤東大立意圖的赫赫政績。但政績中所包含與周恩來一脈相承批判「極左」的鋒芒和否定「文革」的隱意，卻不能不令毛澤東大失所望並怒由心生。鄧實際成了臥病醫院的周在權力中心的真實代言人。毛搭建新的權力均衡格局的構想落空。於是慣例中的明爭暗鬥再度開始，並日趨白熱化。

第三節 1976：造反派對毛澤東最後召喚的微弱回應

1975年底，周恩來病危，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務實派重量驟減，權力優勢陡然傾斜於毛澤東及其極端派一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乘勢而生。毛關於「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一系列最新講話，目的絕對是打倒周恩來逝世後以鄧小平為首的務實派勢力，以便將船向最終撥到毛的航線。此次，毛破天荒發出了「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的指示，似乎希望造反派心領神會，趁機再次崛起。

毛澤東臥病在床，不理會「四五」悼念周恩來活動所體現的國情、民意和人心，仍以為報刊、廣播上的「三忠於」、「四無限」是廣大民眾對自己絕對權威的絕對忠誠，決然下令對悼念群眾進行鎮壓，並撤銷鄧小平一切職務，以准極端派華國鋒代之。毛完全看不到，「文革」以來自己反歷史社會理想實踐的所作所為及其帶來的反復折騰，已經把社會各階層的人都得罪完了。黨委支配運動局勢階段得罪了知識份子階層，造反派支配運動局勢階段得罪了官僚階層，軍人支配運動局勢階段得罪了造反派，幹部支配運動局勢階段得罪了軍人階層。這時，各階層的不同利益要求已經不約而同地交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與毛及其極端派漸漸遠離，而與劉、周、鄧政治傾向日益親近的大趨向。人們實現自身利益的現實取向會隨著具體處境的改變而發生變化。造反派中的大多數人眼見1969年革委會建立後的社會狀況甚至不如自己所反對的「文革」前十七年，早已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失去信任，轉而傾向於鄧小平恢復秩序和發展生產的路線。這和法國大革命後期廣大民眾因對動亂和殺戮產生厭惡而不惜歡迎拿破崙以武力和帝制恢復秩序的心理幾乎一樣。毛自然想不到，自己再次寄以厚望的造反派，絕大多數已經成為首都和全國各地「悼周擁鄧批毛」浩浩人潮中的排頭浪，正高呼著「打倒封建法西斯專制」的口號，將矛頭轉向自己。

看不到人心轉變大勢的，不只是毛澤東為首的極端派，還有原造反派中的少數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所公佈毛關於「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的講話，還是給他們殘缺的造反行為似乎又增加了一條造反有理之腿。

毛澤東「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的講話，本是這之前為維護王洪文一下人的權位而發，但高層極端派卻從中發現了加強自身權力基礎的機

會。從 1969 年至今，他們曾經擁有的造反派群眾力量早已遭到解散，即使各級革委會中倖存的部分造反派代表，也因多數不是黨員和手中沒有實權而名存實亡，致使他們的權力基礎十分薄弱。於是他們便利用周恩來逝世和鄧小平已倒的人好機會，將毛澤東的這個講話轉換成了以解決造反派代表「入黨」、「當官」為中心內容的「政策」。

各地的造反派殘餘力量自 1969 年失去大勢後首次半公開聚集起來，人數儘管很少，但氣勢不謂不壯。方式仍以大字報和大標語為主，個別地方還臨時辦起固定或移動廣播站。內容主要限於要求落實「高抬貴手」政策，解決造反派代表「入黨」、「當官」問題。各級掌權幹部驚惶失措，紛紛召集造反派代表開座談會聽取意見，專門制定落實「高抬貴手」政策的文件，著手解決其中符合政治條件者入黨和增補為革委會「群眾代表」事宜，以示緊跟部署迅速「轉彎」。1976 年夏，就在剛入主權力中樞的華國鋒前來視察工作離開後，趙紫陽任書記的四川省委緊急發文，指示各級權力機關認真落實「高抬貴手」政策，對全省解決造反派政治權利問題推動極大。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期，除增補革委會「群眾代表」之事久拖未決，這些人中的紅色出身者多數加入了共產黨，各級革委會中過去是黨員的造反派代表，不少獲得了獨當一面的實權。例如：我所在地區革委會 1968 年 12 月成立時，擔任常委以上職務的兩派造反派代表共 8 人，其中只有 2 人是黨員。1969 年底——1972 年初，有 3 個非黨員常委被撤職，其中 2 人被捕、1 人被批鬥，其餘 5 人也是有名無實。1976 年 4-10 月，黨員身份的 2 人擔任了縣委副書記，撤職的 3 人全部恢復職務，6 個非黨員中有 5 人被批准入黨。

1976 年 4-10 月，造反派殘餘對自身政治權利的爭取，在造反派的歷史上畫出了一條界限。這之前他們要求落實平反政策的被動造反行為，至少還屬於反對政治迫害和恢復奪權之初政治權利的範圍；這之後的「入黨」和「當官」要求，就完全超離這個範圍而屬於謀取個人私利了。他們定然不會想到，自己看似正當的政治權利要求，會被歷史變局賦以完全相反的意義。或許命中註定他們不能在組織層面融入極權體制，所以只能在反抗政治迫害的範圍內造反，一旦超出這個範圍就會走向正義的反面。此時，他們再次囿於眼前利益而忽視了人心所向，為貪一時之

利將自己與毛極端傾向無形中連在一起，而與社會各階層交合為一體的共同利益指向截然對立。他們與毛極端派一樣，事過境遷，仍刻舟求劍，豈能不空忙一場？

高舉和嚴家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完全根據官方宣傳文字，將這個時期的造反派描寫得張牙舞爪氣勢洶洶不可一世⁹¹。殊不知這純屬官方輿論為「英明領袖」的「英明決策」在宮廷之外尋找客觀理由的主觀臆造。

鄧小平既倒，務實派紛紛失勢，准極端派華國鋒入主中樞，天下大勢看似盡歸於毛澤東。孰不知天不使反歷史違人心之勢得逞，毛突然逝世。如同周恩來逝世於與大眾利益最接近之時，毛澤東卻逝世於與大眾利益最疏遠之際。國中哀嚎之聲大多虛情假意，遠不能與哀周之心相比。少數真悲傷者，也屬恐天柱傾而天下亂之輩。人們普遍的預感是天下將要大變。

果然，1976 年 10 月 6 日，天下不亂而變。出於各自利益考慮而暫時結為政治同盟的華國鋒、汪東興與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策劃于密室，訴諸武力，聯手抓捕了「四人幫」。沒想到毛澤東傾注人生最後十年的全部精力所開展防止想像中反對派政變的大演習，反而最終催生了一場真實的反對派政變；而且他關於人民群眾會立即起來推翻這種政變的預言，也被萬眾歡呼的場景踩得粉碎。假如他能從水晶棺材裏突然坐起來看到這一現實，心中會是什麼感想！

這個政治事件被官方稱為「十月革命」，其實只是一次通常意義上的宮廷政變。說它進步甚至偉大，是就其客觀效果和歷史意義而言——因為它畢竟為鄧小平復出和隨後的「改革開放」除掉了一大障礙，而且迎和了廣大民眾對毛澤東及其嫡系權貴的強烈不滿。但在主觀意圖和道德心理上，它又是卑劣而陰暗的。因為發動者的動機純粹是個人私欲，而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使用的手段更是陰謀和武力式的，在中共高層政治鬥爭史上開創了惡劣的先例。從 1976-1979 三年的政治實踐看，華、葉等人並無改變毛澤東路線的本意，他們當初的政變舉措不過是為了完全奪取和牢固掌控最高權力而已。這是十年「文革」之後「不明不白的三年」：既大張旗鼓地撻伐「四人幫」，又堅定不移地推行「文革」

路線；既熱火朝天地批判「極左思潮」，又不遺餘力地捍衛「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既毫不手軟地將綁在「文革」戰車上的造反派殘餘一網打盡，又絕不留情地將反「文革」的異端思想者李九蓮、石紅霞、史雲峰、王申酉殘酷殺害。除了用毛澤東的餘威鞏固自身的權位和以階級鬥爭的血刃清洗真實或假想的政敵之外，人們看不到任何指向革新的舉動。

再次復出並主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鄧小平，與華、葉截然不同：雖然免不了個人權位的謀算，但確實在真心關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他與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在嶄新的深度和廣度上相互契合，借批「四人幫」之名將毛澤東反歷史社會理想及其政治實踐逐出現實，扳開了中國社會延遲了近三十年的正向轉變之軌。

當原造反派中絕大多數人，以非造反派的身份與廣大群眾一起歡慶自己往日反等級歧視和政治迫害的願望真正可以實現時，直到1976年還在跳獨腳舞的原造反派少數人，卻註定成了廣大歡慶者的對立面，還要以整個「造反派」的名義獨擔全部罪名，承受官方的打擊和民間和歧視。

第四節 最不應該發生的誤會

他們是否都屬於歷史的誤會者呢？嚴格講都是。按常理，既有的下層地位和等級本性，應該使他們更傾向鄧體制而非毛體制。特別是其中的黑色子弟，其根本利益，應該集中體現在「黑五類」摘帽、高考取消「政審」、書籍開禁、思想和言論相對放開……一系列政策以及後來更為寬鬆的政治環境中，可是不少入偏偏變成了與自身敵對的毛體制的殉葬品。如果說「文革」初期造反，是為了反抗政治迫害和等級歧視，那麼到了1976年，明知自己與「入黨」、「當官」無緣，他們究竟圖的是什麼？

這裏面具體原因很多，很難用官方話語概括。且看兩個特殊的事例。

Y，「黑五類」家庭出身。1968年初，因在鐵道兵某部領導街道民工團罷工而被迫離開，回城後參加了造反激進派。1969年，從地革委廣

播站自願招工到新成立的縣制藥廠工作。他自小頗有詩才，1969年後暗自創作了很多表現個人苦悶和民間疾苦、隱含反專制鋒芒的詩篇，並在民間青年中流傳，被朋友們譽為「真正的人民詩人」。1974年，時任某中等專業學校革委會副主任的朋友B激賞其才，設法將他從制藥廠調到該校工作。1976年4月在毛澤東及其極端派明令鎮壓悼念周恩來活動的嚴峻背景下，他寫出了《民主死了，民主萬歲》一詩，將周視為民意和民主的代表，並預言民主不會就此死亡。原文如下：

民主死了，民主萬歲

——悼周恩來總理

一顆明星隕落了，熄滅了他最後的光輝。
慶倖吧權貴們！快撐起你們節月的窗帷。
他去了，在噪耳的鑼鼓聲中進入了永恆的沉思，
靜靜地躺在那裏，仿佛剛進入夢寐。
沒有留下兒女，也不想往永垂，
一任寒風吹散那聖潔的骨灰。
沒有隆重的儀式，也沒有權力集會，
我們悼念他：用八億顆心，八億掬淚水。
——哦，民主，民主死了，民主萬歲！

有誰的逝去引起過我們這樣深切的悲痛？
還有誰，能贏得人民這樣多的眼淚？
我們哀悼他，就是哀悼那多難的民主啊，
他死了，倒塌了民主的最後一座堡壘！
多少年來，他用高大的身軀庇護著人民的利益，
今天他死了，再沒有人為我們舉起正義的手臂……
沒有水晶棺，也沒有雄偉的陵墓，
在千萬人心裏卻矗立著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哦，民主，民主死了，民主萬歲！

啊，誰能歷史地評價，評價他一生的功罪？
我們——人民心中的天平最能衡量是非。
他死了，是因為疾病、操心、勞累？
不！深切的悲痛還沒有使我們麻醉：
鬼影幢幢，從背後向他射出一支支毒箭，
墨寫的謊言絕掩蓋不了血腥的行為！
自古來，戴王冠的頭是不能安於枕上的，
今天啊，在動地的哭聲中他們怎能安睡？！
——哦，民主，民主死了，民主萬歲！

啊，我們悼念他，但也並不過度讚美，
身居高位，他卻有別於那幫權力之輩。
勤奮地工作，雖然沒給我們帶來特殊的恩惠，
我們敬重他，只因為他廉潔的品德坦蕩磊落。
啊，哭泣吧！人民啊，去哀歎你們的命運。
啊，發狂吧！屠夫們，快施展你們的淫威！
他死了嗎？我問江河，我問大地，
不！從八億人的沈默中我已聽到滾滾的驚雷。
哦，民主，民主死了，民主萬歲！

無論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這首詩都遠遠高於同一時期天安門廣場所張貼的詩篇。我敢說，所有自稱在「文革」中非常正確的人，當時沒有一個人敢於寫出這樣的詩篇，更不會相信這首詩的作者竟然是曾經的造反青年。Y將詩作抄成大字報，準備與其女友帶到北京去張貼，後因清查太緊而未成行。

事隔一月，本為原中等學校造反紅衛兵領袖的朋友B，被地區激進造反派在野派議定為地革委常委增補人選。B約Y相助。Y基於朋友情義和報答心理，加之內心也對現實不滿，便慨然應諾。「四人幫」垮臺後，Y與B一起被隔離審查，雖幸獲「犯有一般錯誤，不給行政處分」

的最輕定性，但也因此喪失了報考大學的政治條件。他以這首詩為見證對「文革」的徹底反叛，卻很少有人相信。多年後Y成了國內著名的先鋒詩人，1989年夏季因「主編非法刊物」被捕判刑三年，那最輕的定性仍成了定罪的歷史依據之一。

前面提到頭部中彈後高呼毛萬歲的Z後來的故事，同樣令人難以置信。1969年底傷癒後經醫院建議和「知青辦」批准，他返城等候安排工作。1971年初「批清」運動中，不滿掌權軍人借機大整激進造反派的行徑，他為首將兩篇大字報帖上街頭。掌權者召開全地區廣播大會進行批判，同時將他抓捕。他被關押了兩年，直至林彪事件正式傳達、「批清」運動被正式否定而獲釋。他出身「舊官吏」家庭，造反不敢存私心。因替本派仗義執言而坐牢，加上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要求落實平反政策時，多為受害者出謀劃策和四處呼籲，深得受害者的擁戴，威望甚至超過本派進入地革委擔任副主任的兩個頭頭。他喜讀書愛思考，落實政策結束，自己的平反問題也得到解決，便安心到所分配的單位上班。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原地區造反派頭頭請他出面號召群眾，他以不想入黨當官為由堅決回絕，並直言造反派早已失去群眾支持，不宜以歷史之名做現實之夢。不久，幾位好友又約著其弟一起前來動員，他講了一通毛澤東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道理後同樣拒絕。誰知其弟居然以一句話打動了他，這句話大意为：無論毛怎樣倒行逆施，官僚們一旦獲勝，現在還能在大巷口「民主牆」貼大字報這點自由都會徹底喪失。於是他同意出面，但又當眾寫下自己對大局的五點認識，交其弟存以備忘，以示自己有先見之明。這張字條保留至今，內容仍然與字跡一樣清晰：

1. 中國正處於與蘇聯史達林逝世前一樣的政權交接時期，民主改革將是其主導趨勢。
2. 新派代表法統，老派代表民意。
3. 民意包括：官僚階層的管理權益要求，知識階層的思想權益要求，勞動階層的經濟權益要求。
4. 新派雖有毛澤東支持，老派卻有民意背景。

5. 造反派當前之舉違背民意，只會曇花一現。

想不到持有這般遠見的他，最終會被一句話打動而捲入 1976 年造反派殘餘最後的獨腳舞。「四人幫」倒臺後，結局不難推想：點名批判，隔離審查，逮捕法辦。好在他最終還是沾了鄧體制的光——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按「實事求是」原則被「免於起訴」釋放回原單位。至今他仍然堅持當初的清醒認識：鄧順應歷史潮流，毛逆歷史潮流而動。儘管被官方列為「內控物件」並嚴禁重用，他依然只怨自己一時衝動導致誤會，從不怨天怨地怨別人。

這樣的人絕不只兩個。像成千上萬黑色子弟一樣，他們的根本利益原本體現于鄧體制，自己在期待已久的最後時刻，卻莫名其妙地變成了毛體制的最後陪葬物。這無疑要算造反派與毛的所有誤會中，在最後的時刻最不應該發生的最大誤會。

關於這一代人當時的真實處境和真實心境，報告文學作家胡平曾在《中國的眸子》一書中寫道：

當他們在大幕降下之後，這樣回顧自己——光榮與恥辱嫁接。神聖與卑鄙的嫁接。莊嚴與滑稽嫁接。動機與效果的分裂。起點與終點的分裂……

他們心頭的創傷，便和他們當年稚嫩肩頭上渾然不覺地承擔的風險一樣深重了……

於是，1976 年 10 月，無論是處境，還是心境，這都是中國土地上——

一邊為祖國和民族的新生唱著讚歌，一邊為自己作了那個時代陪葬的青春唱起挽歌；一邊是歷史的高壓水龍頭沖洗著成山的冤屈，一邊是他們「衝鋒隊」一樣出現在小說裏，「還鄉團」一般出現在銀幕上。

多少人在轟轟烈烈、聲淚俱下地控訴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的迫害，他們卻「茶壺裏煮餃子」，像一頭負傷的老狼蹣跚地走進大森林裏，以舌頭舔自己的傷口。

他們幾乎什麼都失去了，卻無論如何也不會有退回的房子、票子、位子、車子在等著他們，他們找不到一條政策可以落實。將近而立之

年，或者已經而立之年，為了在生活中能獲得一席之地，來不及喘口氣，他們又開始了艱難的跋涉。

回憶噩夢般的過去，他們得比別人多雙份的勇氣；走向曙色中的未來，他們得比別人多幾倍的辛勞…… 92

注釋：

- 88 楊小凱：〈革命首先死了，才能萬歲〉，美國：《中國之春》，1990年11月號第55頁。
- 89 胡平：《中國的眸子》，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9年9月，第65-99頁。
- 90 葉永烈：《文革名人風雲錄》，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276頁。
- 91 高崧、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678-688頁。
- 92 胡平：《中國的眸子》，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9年9月，第139-140頁。

第四篇

造反派在現代性進程中的特殊站位元

對「歷史」，人們通常持不信任態度，寧願將它比喻為任人打扮的小女孩，或者乾脆認為歷史是由勝利者譜寫的，無任何規律和真相可言。人們所指，其實只是教科書上人為編織的所謂「歷史」。

真實的歷史在雜亂無章的現象後面隱蔽地存在著。它是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無序經歷的有序組合，體現為由群體與個體、官方與民間、文人與武夫、高貴與卑賤、公心與私欲、政治與經濟、文明與戰爭……多種對立互動因素構成的不自覺進程。歷史是否有規律可循，可不深論，至少對於被稱為「現代變革」的這段歷史，全世界的決定論者與非決定論者都一致公認，它具有三項相同的內容和共同的指向。這就是：

經濟上——從傳統農業文明轉變為現代工業文明；

政治上——由封建專制制度轉變為現代民主制度；

文化上——由蒙昧群體主義轉變為自覺個體主義。

中國的**經濟大轉變** 19世紀80年代「洋務運動」就已開始，經過20世紀前50年的掙扎和20世紀後50年的折騰，現已基本完成。經過一百多年的艱難跋涉，它所指向的工業化、市場化這兩塊曾經十分遙遠的里程碑，現在已經站立在國人眼前。雖然屬於非常態的工業化進程——由英國式的第一代工業化運動、蘇聯式的第三代工業化運動、美國式的第四代工業化運動疊加而成，而且聳立在小農耕作的巨大基礎之上，內層的新型技術配備也很薄弱，但它的現代性標牌依然十分鮮明。雖然市場化進程在1949-1979曾全面中斷，20世紀80年代緩慢啟動後延至世紀之交才算完成，但供需之間那只「無形的巨手」已在市場上空發揮它的操縱作用。中國社會已在經濟層面步入現代之城。

但是整個國家政治層面和文化層面的現代性轉變，卻步伐艱難遠未完成。

「文革」中包括黑色子女和雜色人群在內的邊緣人群造反，絕不是孤立的歷史事件。如果把它比喻為大海中的孤島，它那深藏水下的根部也一定與延伸的陸架相連。如果把它比喻為長江中的灘頭激浪，其流體也一定來自身後水流的彙聚，又與前方新的支流融為一體奔騰向前。

要理解「文革」中的造反運動與中國此前和此後歷史事件的聯繫，就必須從政治和文化兩個角度把它分別置入兩個歷史段落來考察。兩段

歷史同時又是兩種參照層面。

第十章 極權體制下變態的民主運動

第一個歷史段落的時間範圍，是1942-1969年，著眼於人們所熟知的政治層面。

中國的**政治大轉變**1898年「戊戌變法」就拉開了序幕，但在1911年推翻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後一直被拖延。1912年，具有民主憲政外形的中華民國之車開始上路，很快就遭到北洋軍閥的攔路搶奪，這輛空車差點被刺刀押回封建帝制的舊道。1927年蔣介石執掌權柄，出於現實的原因和心中的理由，推行「憲政」的許諾還是被實行「訓政」的無定期限所吞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隆重登場，乾脆將「憲政民主」視為「資產階級」的破舊徹底拋棄。時至今日，除了一個保持百年的轉變姿勢，中國大地上矗立的仍然是與封建專制如出一轍的超級極權體制，實質性的變革一步也邁不出去。

中國政治現代性一再拖延的因素不外三個：民族救亡運動的轉移，群體主義文化心理的牽制，專制主義政治傳統的阻礙。孫中山三民主義式的民主政體成為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掩護，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與中國專制主義政治傳統相結合產生了集古今中外之人成的極權政體，都是這三個因素整合作用的結果。中國社會在政治層面至今沒有進入現代之城。

這不等於說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極權體制從無疑議。民主主題既然是中國現代政治變革中與民族主題並列的雙重主題之一，當民族主題完成之後，它就不會不凸顯出來，並在可能的時機體現于知識份子的異舉異動之中。這就涉及到極權體制下的三個政治整飭運動。

毛澤東登上權力高位後，開展了三個與知識份子有關的政治運動：「延安整風」、「反右」、「文革」。

從「整風」到「反右」中距15年，從「反右」到「文革」中距10年，各自的歷史背景和發生原因大不相同，似乎並無什麼聯繫貫穿其

中，更無什麼可比性峭立其間。

然而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三個運動之間的確有兩條相對的線索穿行其中。我說的兩條線索自然是指：官方的意圖和作法，民間的指向和結局。

第一節 民主要求與專制威權的對立

讓我從近到遠來進行比較。

「文革」初期與「反右」的一致性有目共睹：

在官方，皆為清洗知識份子和知識青年中的「異議分子」，先動員人們敞開胸懷大鳴大放，給黨組織提意見和建議，隨之發動紅色人群進行融檢舉揭發和批判鬥爭為一體的大反擊，最後再以家庭階級成份和個人政治身份為標準對落網者作出整治結論。

在民間，向黨交心式大鳴大放的核心指向，都是反對極權體制下必然最大化的等級設置、官僚獨斷、特權支配，結局也都是被定為「反革命」、「右派」，全部逐入「敵對階級」的行列。

「延安整風」雖然時隔久遠，但相當於極權體制下此類運動的序曲——開此類運動的先河。不僅「文革」初期和「反右」中官方一貫的意圖和作法在這裏開始成形，而且這兩個運動中民間的指向和結局也從這裏正式發端。儘管其中真相至今語焉不詳，但從西安女作家冷夢專寫詩人胡征受害經歷的長篇記實小說《滄海風流》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兩條線索的最初引出及其所編織官方和民間的相反畫面。例如在魯迅藝術學院：開始也是鼓勵給黨組織提意見，群眾分成激進、溫和、保守三派。待提意見者大膽亮相後再發動群眾反擊，最後以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為標準進行處理。特別是「整風」進入到名為「搶救運動」的大反擊階段，官方的耀武揚威、「政治打手」們的上竄下跳和「落網者」的悲慘境遇，更是令人目不忍睹，比起「文革」初期和「反右」中的情形有過之而無不及。

冷夢這樣記述魯藝「整風運動」開始時的情形：

魯藝所在地橋兒溝沸沸揚揚起來了。

圍繞「辦學方針、方向」的大是大非問題，全校性的大辯論開始了。大辯論帶來大分化，「派」這個字眼一時成為時髦名詞。魯藝連教職員工在內的三百多人很快分化為三個派別：激進派、溫和派、保守派，其情形如「文革」初期群眾分裂為「保皇派」和「造反派」。

「激進派」批判「關門辦學」、「關門提高」，認為魯藝一切皆非；「保守派」相反，認為魯藝一切皆好；「溫和派」居於二者之間，既肯定「魯藝大方向正確」，又指出「措施上有些不合適的地方」。

仿佛被一柄無形的巨大魔棒驅使著一樣，那些慣於形象思維的大腦，此時都頭脹腦熱地捲進了一場連他們自己也不甚明瞭的舌戰中。他們真誠的相信，他們在進行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偉大革命。於是，他們虔誠的、毫不吝惜地將自己的青春、熱血、大腦和唾液耗進了無休無止的辯論中。

……

魯藝「激進派」逐漸佔據上風，「保守派」、「溫和派」愈來愈勢孤力單。最後，「溫和派」只剩下兩個為首的——江風和胡征。

兩人一看大勢所趨，也凳子一搬，坐進「激進派」陣營。

魯藝實現了「革命大聯合」。 93

運動後期，「激進派」和後來加入進去的人，大多數成了清洗對象。

至今官方話語仍將責任歸咎于「文革」中成為毛澤東左右重師之一的康生。毛澤東近在咫尺卻對親自發起的運動不聞不問，鬼才相信。

三個運動中官方傾向和民間傾向兩方面的一脈相承性，包含了一組共同的關係：專制威權與民主要求的對立。

三個運動最後都是以專制威權戰勝民主要求作為戛然而止的結局。

為什麼這三個運動的整治物件都是知識份子和知識青年？從官方話語看，是這些人「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嚴重，與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離心離德。深入透視，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類事實：在「五四」運動早已提出「人的解放」這個歷史任務的大背景下，知識份子和青年人無疑是個人地位、個人價值、個人權利最可能的自覺者，他們對極權體制必然會有一種抵觸和離心的傾向，一有機會就要頑強地表現出來。

這種表現，因為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時機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義：「整風」中持異議者的行為發生於國內民族主義主題高漲之時，屬於少數自由個性和民主意識尚未完全泯沒的知識份子對極權體制的最後抗拒。「反右」和「文革」中持異議者的行為，卻發生於國內民族主義主題已經完成之後，屬於極權體制下湮沒的民主主義主題在部分知識份子和知識青年身上的重新蘇醒和再度訴求。

只不過他們都是體制內表現，不能不具有可悲的變態性。

從1942年至1966年，這些提意見並挨整的人，有一種從黨內到黨外並從上層到下層擴展的趨勢：「整風」時只限于黨內知識份子，「反右」時擴大到黨外知識份子，「文革」初期更擴大到了黨外廣大的知識青年。

今日公共話語談論「文革」初期官方整人之事，大多關注于文化名流們的悲慘遭遇，而無視全國大中學校和各行各業黑色和麻色子女被打成「反革命」、「小右派」、「小三家村」的客觀事實，甚至對北京高校近20000師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和西安交大1000多學生挨批鬥並有多人自殺這類尖銳事實，多數言說者也寧肯假裝鴛鴦一視而不見不願正視。這不僅有違自命「社會良知」者的個人良知，而且無意中掩蓋了專制威權與民主要求對立關係所涉及的民間範圍，在「文革」初期已擴大到下層民眾的客觀趨勢。

事實上，「文革」前夕官方按照「整風」和「反右」的一貫思路所預定的打擊對象，早已不限於知識份子。

1964年9月，劉少奇在其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四清」運動《後十條》中，指明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富子女為「出身反動的青年」，認為他們中的少數人對黨和人民有刻骨仇恨，要進行階級報復，是「新的階級敵人」。在1966年8月「文革」開始後的一次講話中，劉仍認為「黑五類」子女對黨和人民「有殺父之仇，兒子不報孫子還得報」。 94

當時全國人口約八億，百分之十的「黑五類」子女人數達8000萬；將農村人口限制為六億，地富子女也達6000萬。劉少奇所指雖為「他們中的少數人」，但在實際貫徹中卻包括了他們全部。打擊數量超過文化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上百倍。同一個文件，對本屬「四清」運動鬥爭物件、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五的「蛻化變質」基層幹部，卻因出身好，

主張對他們「採取批評、教育的方針」。愛憎非常分明。

別以為這是劉少奇對抗毛澤東路線的個人發明，其實「整風」和「反右」就是出自這一模式。這個模式是屬於整個毛體制的，只是劉不知毛為了整倒自己已經悄然改變了傳統思路。「文革」初期劉主持的運動就是按這個模式開展的。

緊接著轉變發生了，發生在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向劉少奇攤牌，並對其派工作組鎮壓提意見學生和民眾的傳統作法進行徹底否定之後——這就是1966年10月開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這不只是對「文革」初期整知識份子和黑色人群及其子女政治傾向的否定，更是對與「反右」和「整風」同屬一脈的整群眾傳統傾向的改變。於是，「文革」中將習慣于整人的各級當權者作為鬥爭重點的新傾向由此確立。

鬥爭對象的這一方向性轉變，自然來自毛澤東圍繞與劉少奇的權力鬥爭而對「階級鬥爭」理論的發展。本來，早在1965年1月制定「四清」運動《二十二條》時，毛澤東就明確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試圖實現這個轉變。但由於「四清」主要在農村開展，本應挨整的基層當權派一直控制著運動領導權，實際挨整的黑色子女始終敢怒不敢言，致使鬥爭物件的大轉變難以實現。「文革」初期的條件變了：運動在城市開展，又集中在大中學校這類社會風潮的策源地和社會問題的敏感帶，在下涉及到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往上牽連到各級位高權重的當權派——直至劉少奇。毛抓住時機，在批判整人者的同時號召挨整者造反。只是毛沒有想到，此時敢於起來造反的只是上層紅色子女，他們出於等級本能和歷史慣性，仍然將鬥爭矛頭指向黨外「階級敵人」，加上各級當權者仍然掌握著運動的領導權，使鬥爭物件的轉變沒能立即實現。直到兩個月後發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批挨整的下層黑色和麻色青年知識者紛紛起來造各級當權派和工作組的反，才實現了鬥爭物件的方向性大轉變。

正如北京大學教授印紅標從親歷者角度所說的那樣：

以往政治運動都是自上而下進行，各級黨政領導掌握運動領導權，鬥爭矛頭通常指向黨外。

「文革」則是自下而上方式，毛發動群眾造反，衝擊黨內「當權派」，削弱甚至剝奪其領導權，使他們陷入被動挨整地位。⁹⁵

遺憾的是，當年的造反者們只知道運動模式的轉變，是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結果，進而將劉少奇和各級當權派所沿用毛體制以往運動模式歸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將毛澤東現行運動模式看作「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們沒有看到，「繼續革命理論」只是毛為推行反歷史社會理想、掃除劉為首的制度化權力障礙所作的政治話語包裝，更不可能意識到，自己從被動挨整者到主動造反者的角色轉換，純粹是青春非制度化傾向和反官僚現實指向，與毛此時的個性表現和政治意圖互相契合的結果。

然而，轉變畢竟發生了。非法而被動的下層挨整者可以合法而主動地造上層整人者的反，無疑是1942年以來政治運動史上破天荒的事。對於「整風」和「反右」中的受害者來說，這簡直難以想像。假如他們也遇到同樣的機會，會有當年的結局嗎？無論站在人道立場看，還是對於歷來只能處於挨整地位的下層黑色子女和雜色人群來說，這都是一件大好事。

現北大教授錢理群「文革」開始時在貴州安順一所中等專業學校任教。運動初期因「黑五類」出身和自己「反右」時期所犯「錯誤」，被打成「反革命」，隔離起來無休止地寫檢查和接受批判。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學校造反的「革命師生」才為他「平反」。他回憶說：

當北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馴服工具論」時，在身處內地小城裏的被困禁的知識份子內心世界會引起什麼樣的反應。……當時我感到的是一次從未有過的思想大解放，被「贖罪意識」、「改造意識」強壓下去的「反抗意識」終於引發出來，我第一次恢復了知識份子思考的本能；然而，它又不免是畸形的。……對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真誠接受，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心中鬱積著一種怨憤傾向。這是長期受壓抑的地位所形成的；也由於我們幾乎是處於社會最底層，對於黨內不正之風引起的一部分當權的幹部與群眾之間尖銳矛盾有著十分具體、強烈的感受，以至於產生了相當嚴重的對立。⁹⁶

這是一個感覺和記憶未被虛假觀念污染的知識份子對當年內心感受的真實記述，也是很多人當年的真實內心感受。

我們不能因為劉少奇和各級當權派是這一轉變的直接受害者，就不敢否定他們所沿用毛體制舊運動模式的反人道反民主特性。

我們不能因為毛澤東及其極端派是這一轉變的直接策動者，就不敢肯定他們的新運動模式最初對於下層受害民眾客觀上體現出來的人道和民主意義。

正是這個轉變，使「文革」初期舊運動模式下的千百萬受害人，沒有繼續遭受「整風」和「反右」運動中提意見者的厄運，也使他們擺脫迫害後，能夠第一次以下層民眾的身份在極權體制內公開採取反等級歧視、反政治迫害、反官僚壓迫的行動。

這是「整風」和「反右」的受害者敢想而不敢作的事。

這是兩個運動的受害者被強權粗暴扼殺的願望。

這也正是「文革」中造反行動與「反右」和「整風」中提意見行為之間的前後聯繫和明顯區別。

看起來「文革」中各種社會邊緣人群的造反活動，是以毛澤東重返權力中心的目標所劃定範圍為最大自由半徑，不可能有什麼成效。其實不然。至少在1966年8月——1969年8月三年造反時期，造反派打破中心秩序和改善自身處境的努力，還是取得了短暫而巨大的效果。例如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三結合」革委會成立之初常委以上成員總數956人中，軍隊代表和幹部代表一共560人，佔百分之五十九弱；群眾代表396人，佔百分之四十一強。群眾代表除了少數是參加了造反派的著名勞動模範和著名婦女代表，絕大多數都是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平民——儘管其中包括幾個省份的保守派群眾代表。在某些省市，群眾代表所佔比例比這還要大。比如：上海市群眾代表佔到百分之七十五，四川省群眾代表佔到百分之六十四，天津市群眾代表佔到百分之六十，河南省群眾代表佔到百分之五十五，陝西省群眾代表佔到百分之五十五，內蒙古群眾代表佔到百分之五十三，北京市群眾代表佔到百分之四十八。這不僅在「文革」前聞所未聞，就是在結束「文革」至今也再難重現。除了權力機構中的象徵，這些過去身處邊緣備受壓抑的弱勢人群，

也在社會生活的其他層面改善了自己的處境、心態和形象。比如在具體單位：他們不再是人下人而是至少成了人中人，他們不再害怕領導而是讓領導感到畏懼，他們不再受人歧視而是被人尊敬。這種情形甚至延續到1976年「揭、批、查」運動降臨之時。由於極權制度巨大的自我修復功能及其運作旋鈕朝著專制方向越擰越緊的趨勢，三年造反所打破的中心秩序很快恢復，一度出現的新型局面很快瓦解，社會生活又重返過去的格局——而且更加等級更加黑暗更加暴虐。制度的慣性連毛澤東都駕馭不了。這不是造反派的錯。

是的，三個運動中民間一面的反等級反官僚行為，其實就是極權體制內部三個時期民主的變態要求，儘管在第三時期才有了短暫的實現。

是的，三個運動中官方一面的壓制和打擊，其實就是極權體制本身三個時期專制的極端表現，儘管在第三時期集體專制被個人專制所代替。

我們不能因為三代提意見者當年行為的幼稚而嘲笑甚至否認其民主含義。他們是被時代局限的人，也是自我異化的人，更是體制內的造反者。這就註定了：他們只能基於受壓制的處境產生反壓制的願望，他們只能在遇到適當的機會時才將願望體現為相應的行為，而且，他們的願望和行為在理知層面又必須表現得符合體制的規範。民主從來是具體的。對於身處極權體制不同歷史時期的他們來說，民主要求的內容只能是這個樣子。

不能認為民主要求就必須像「五四」那樣，沖決一切體制羅網、自我全面覺醒、個性全面張揚、個人權利全面肯定。那是決堤之洪水，這是蟻穴之細流，二者不可比。因為極權體制的大堤已經築就，堤內之水有待積蓄，被牢牢鎖住之水只能尋蟻穴而曲穿折行。像「文革」中遇羅克那樣身處體制邊緣的思想先行者，也還要主動適應體制話語才能進行自己的言說，更何況三個運動中的體制內造反者。

民主要求並不意味著否定一切體制。至少在現代，它只反對超度的體制而追求適度的體制。三個運動中的民間行為，就是對所認同極權體制超度性的反抗和適度性的要求。超度越甚，反抗越強，要求也就越深。

從政治角度評價造反派，應避免兩種極端傾向：一是將他們醜化為魔鬼，二是將他們美化成天使。在我眼中，造反派在「文革」舞臺上的

表現性質並非始終如一，所以具體評價也應不同。我所指的造反派，包括1969-1976年繼續以「造反派」名義進行活動的造反派殘餘。分析他們十年中的各種表現，有的行為值得肯定，有的行為可以理解，有的行為卻必須否定。1966年10月—1967年1月要求翻案與平反以及批判當權派，屬於正義和進步行為；1967年2-7月圍繞軍隊鎮壓的對抗和反擊，屬於正義和進步行為；1967-1969年的奪權和武鬥，前者屬於無權者實現權力欲望的正常行為，後者屬於走火入魔的邪惡行為；1972-1974年要求翻案與平反，屬於正當行為；1976年4-10月要求入黨和當官，屬於非正義非進步行為。

楊小凱從法國大革命中看到，自由結社和革命一旦發生，它就會朝著激進的方向不斷分化，直到一個軍事強人用暴力恢復秩序為止。他因此認為：「從這點而言，1966年8月到1968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種政治學中所說的革命。」⁹⁷

我1973年閱讀法國學者馬迪厄所著《法國大革命史》一書時，也進行過這種對比，只不過我的結論完全不同。

法國大革命中的國民代表大會如同是由保守派、穩健派、激進派、極左派從外到內一層層包裹而成的一個轉輪，旋轉的動能確實使革命朝著激進的方向不斷演化。在這個過程中，最先被淘汰的總是裹在最外層而擔當領導職責的公民代表——保守派倒下後輪到穩健派，穩健派倒下後輪到激進派，激進派倒下後輪到極左派，最後再無輪換者時便由拿破崙出面收場。「文革」卻相反：在高層，中央文革小組中被淘汰者的順序，卻是從比較激進的王力、關鋒、戚本禹到比較穩健的陳伯達，最後剩下比較保守的康生、張春橋、姚文元——1976年10月之後被反對派連同包裹在核心中的毛澤東的身影一併收拾。江青比較激進而能保留到最後，只不過因為是毛澤東的夫人而已。造反派領導層的情形也是如此：除了少數象徵性人物外，能夠進入各級革委會而保留下來的，往往是一些比較穩健甚至傾向保守的人。

看得出楊先生是想用「文革」中造反組織內部的不斷分化來與法國大革命進行對比。然而拿造反組織來對比法國大革命各方代表組成的最高權力機構未必恰當。即使可以比較，造反派朝著激進方向的分化最遲

在1969年8月徹底解散組織時即已終止。在這之前，我所看到的仍然是最激進的最先出局：1967年1月底，上海激進的大學生造反組織「紅衛會」等被打殺；1967年8月，北京極左的大學生造反組織「五一六兵團」被取締；1968年1月，湖南極左的民眾造反組織「省無聯」被鎮壓；1968年8月，整個造反運動的激進先鋒——全國所有的學生造反組織被驅逐。甚至對於已經解散組織的兩派群眾，1971年達到高潮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也將鬥爭矛頭主要對準原造反激進派。

兩種相反的走勢表明，法國大革命和「文革」幾乎是南轅北轍。前者是體制外自發的人民革命，為了給逐漸趨於疲憊的人們不斷注入新的精神活力，必須不斷淘汰難以勝任的領導者而讓位給更為激進的領導者，直到再無更激進的領袖出現為止。後者只是體制內受控的群眾運動，中央文革、造反派領導層甚至造反組織，一旦干擾了毛澤東開展運動的部署、違背其穩定大局的考慮、妨礙其恢復正常秩序的意圖，就會被無情淘汰，保留下來的只能是那些能夠滿足控制需要的人。

中國1989年學生運動的走勢倒是與法國大革命比較相似：擔任大學生自治組織「高自聯」主席的人物，從周勇軍到吾爾開希再到柴玲，一個比一個激進；直到最後時刻繼續站在這個位置上的學生領袖，仍然是身材矮小但最為激進和最具感召力的柴玲。

領導層朝著激進方向演化的趨勢，是一切自發性革命的共有特徵。「文革」及其造反運動缺乏這個標記。將「文革」視為「人民革命」，無疑過分看高了它的形象和過度誇大了它的意義。

和楊小凱滿懷道義激情地宣稱，自己永遠熱愛「那些放蕩不羈、充滿靈感和創造性」的「文革」造反派相反，同樣移居海外的徐明旭卻試圖從個人品質角度對造反派的歷史作用進行否定。他說：「我在下廠時發現工人造反派平均文化素質十分低下，許多頭頭的道德品質十分惡劣。他們腦子裏幾乎沒有自由民主的概念，只有強烈的報復欲、翻身欲、取而代之欲與出人頭地欲。如果說許多人開始造反時還出於反抗迫害或反對特權的正義目的，那麼到了1967年『一月革命』時，便不由自主地變成了權慾薰心、不擇手段的奪權狂、同自己的戰友爭權奪利的內戰狂。」⁹⁸

這裏涉及三個比較大的問題：如何評價群眾運動中學生與其他市民階層的不同作用？如何評價群眾運動的整體作用與個人形象？如何評價造反派的道德品質？此處只能簡單說說。

我不否認造反派腦子裏確實「沒有自由民主的概念」，不僅工人造反派頭頭如此，就連包括徐先生在內的大學造反紅衛兵及其頭頭也都這樣。然而這並不能說明什麼。從古至今，人世間的事至少還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1919年，因自己的加入而使「五四」運動掀起全國性浪潮的廣大市民，腦子裏恐怕也沒有什麼自由民主概念，然而這並未影響他們對自由民主運動的支持和聲援。甚至如徐先生在《中國之春》1993年1月號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所說：「北京市民在八九民運中支持學生主要不是因為中共不民主，而是對官倒、腐敗不滿」。可見比造反派整整晚了二十年的這些市民腦子裏也還沒有自由民主概念。可是在「六四」事件發生時，表現最英勇、付出代價最大、最令人感動的，不正是這些市民嗎？歷史能不記住他們腦子裏沒有但行動中表現出來的自由民主意義嗎？至少在現代中國，自由和民主只是知識份子和青年的話題，普通百姓能有與之基本一致的利益取向就不錯了。對他們不應苛求。既然造反派許多人「開始造反時還出於反抗迫害或反對特權的正義目的」，就已經有了評價其歷史作用的現實基準，還有什麼理由可以否定這個前提？至於他們「文化素質十分低下」，當時中國工人的受教育程度就是這樣，這不是他們的錯。至於徐先生為他們歸納的四個所謂「欲」，更屬於名為領導階級實為無權階級的他們在造反之時和造反之中真實而可能的心理動機，與任何群眾運動中個人所懷動機並無二致，不是什麼罪過。至於兩個所謂「狂」，那是這個運動所特有虛張的目的性和對抗性及其慣性使然，並非他們的情願和故意。

群眾運動的整體意義和個人心態，從來就不是一碼事。以為一切稱得上正義或進步的群眾運動，所有參與者的個人形象都一定是大公無私、正義凜然、慷慨激昂、視死如歸，只是一相情願。須知運動中少數人的特例、運動後人們的願望、運動外藝術家的想像，並不等於這類運動所包含的普遍事實。構成群眾的個人實在具體而又千差萬別，除了大體相同的行為動機，每個人都難免會有屬於自身的欲望和念頭，品質的

優劣、動機的雅俗、行為的莊諧，更是參差不齊。甚至那些已成為現代中國歷史里程碑的群眾運動也莫不如此。1919年的「五四」運動堪稱偉大，可細讀參與者的回憶文字又讓人感到，5月4日這天寥寥數千人的遊行不免過於冷清，而「火燒趙家樓」的行為也未必轟轟烈烈和充滿理性。我認識1976年「四五」運動中在人民大會堂前帶頭燒軍車而被《人民日報》4月8日專題文章〈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稱為「小平頭」的抗暴鬥士，他坦言當時並沒有什麼崇高的理念，主要是滿足自我表現欲望。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我和胞弟周倫佑因個人私事正在北京。5月26日深夜到達北京時無處投宿，我們就在天安門廣場學生帳篷裏呆了半夜，靜坐學生對市民贈送飲料的肆意浪費和隨地小便的行為，確實令人不敢恭維。5月28日，號稱有五百萬人參加的「全球華人大遊行」，首都高校數十萬大學生，只有不足兩千人在大街上零零散散的跑了一圈，叫人哭笑不得。5月30日廣場上所豎「自由女神」像，材質之低劣、造型之醜陋、激起的熱情之帶調侃性，也使人覺得有些滑稽。甚至開槍前夕發生在學生領袖身上的私分「逃亡費」事件，也與廣場上崇高而悲壯的氣氛格格不入。然而，我們沒有因為這些場景及當中的個人真相未能滿足關於「崇高」和「偉大」的定義，就否定這些運動崇高和偉大的整體性質。我無意將1966-1969年的造反運動與這些運動相比，造反運動的體制內導向註定它要低一個等次。但僅就具體場景的壯觀和個人表現的壯烈而論，造反運動顯然更勝一籌。20世紀60年代，西歐和北美所爆發由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和黑人運動組成的造反運動，在西方當代史上寫下了難以磨滅的一筆。然而，不僅參與者中不少人是同性戀、暴露癖、癮君子，甚至其精神領袖的道德形象也並不高大：福柯是同性戀，薩特更是性虐待狂。難道我們能從這個角度去看待這個偉大的反體制運動嗎？

徐明旭提出造反派的「道德品質」問題，可是他列舉的那些「欲」與「狂」並不屬於道德品質範疇，甚至他在發表於《中國之春》1993年1月號的另一篇文章中使用的一連串形容詞——「野心勃勃、權慾薰心、權令智昏、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爭權奪利、自相殘殺並殃及無辜」，也與道德品質無涉。我不是一定要為造反派辯護，可是面對1992

年以來全民族的道德大淪喪，最讓我懷念的正是造反派那時的道德表現。這種道德表現不牽涉個性覺悟範疇的「自由民主概念」，也與造反運動在毛澤東「繼續革命」框架內的變態特點無關。它只是私人行為和本能欲望在公共準則和社會規範面前的自覺選擇，歸屬於一個人的公德涵養與私德水準。是的，造反派在這個範圍內的道德表現無可指責。

1966-1969三年造反運動期間，在兩派對立和衝突範圍之外他們沒有殺人放火，在社會生活範圍之內他們沒有姦淫搶掠。那些年無以數計的刑事判決佈告足以證明這個事實。對於一個億萬人參加的群眾運動來說，這肯定是個罕見的奇跡。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性觀念的全面開放，性放縱甚至成了灑脫的代名詞。這讓我經常想到1966秋季包括保守派學生在內的全國大串聯：上千萬少男少女肌體緊貼地擁擠在一節節車廂裏幾天幾夜，卻嚴守本分相安無事。你可以嘲笑他們的性蒙昧，但不能不對他們的性純潔肅然起敬。倘若換在今日，不知要用多少火車來拉私生子。1971年初，全國各地造反派全面興起，各級權力機構普遍癱瘓，儘管中國人經濟極度貧困物資極度匱乏，可是從沒有聽說過哪裏有銀行、糧庫、百貨公司、副食品公司、土產站被搶。要是換在今日會怎麼樣？不敢想像。

曾經發生在身邊的真人真事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1966年底，我所在農場知青赴京串聯，天寒地凍又缺生活費用，便向國家農業部接待站每人借了軍大衣一件和人民幣20元。返回農場後，屬於造反派的人員及時寄還了所借衣物和錢款。1968年初，因武鬥阻隔，我一個造反激進派朋友未能及時收到家裏送來的生活費。他不願白吃白喝或者賒欠，便整整忍饑挨餓三天，直至病倒在床被送進醫院搶救。1969年3月，這座城市的造反激進派將造反穩健派趕出城區。我一個造反激進派朋友見一個武鬥人員從對立派單位百貨站抱走十多條肥皂，便立即上前制止。之後又趕回總部彙報，迅速寫了三個《通令》張貼出去，嚴禁擅拿任何公私財物，還派了一隊人上街巡察，杜絕了這類現象的發生。1969年7月，造反穩健派又將對立派包括市民在內十多萬人逐至一百多公里之外的石棉縣。敗走一派中最人的中學紅衛兵組織「一〇·八」有一千多人，為了解決吃飯問題，勤務組集體研究決定從已經無人看守的某信用社留下借條

取走人民幣三千元。同年9月返回後，他們立即主動還清了這筆借款。以至這個組織的負責人後來被審查時，就連辦案軍人也對此事大為驚歎。

最近十多年，國內以梁曉聲為首的一大批「知青作家」，之所以對蒙昧、愚忠、「腦子裏沒有自由民主概念」的那一代人緬懷有加，就是因為在現實中人心大面積腐敗現象的對照下，那一代人的道德情操的確令人懷念。資本主義社會不是比封建主義社會進步嗎？這並不妨礙西方浪漫主義作家要以封建社會的個人道德形象來對資本社會的非道德現象進行質疑。歷史進步與道德進步並不成正比。

徐明旭雖然拿不出造反派道德品質問題的具體證據，下結論卻異常果斷。想不到在發表於《中國之春》1993年1月號的文章中，他堅決否定造反派的另一個所謂理由竟然是：「造反派既有憂國憂民、追求真理的仁人志士——他們後來成了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運動的骨幹，也有野心家、騙子、流氓、惡棍、無賴、地痞和不逞之徒。」凡是群眾運動，從來都魚龍混雜。就連魯迅在談到「五四」同人時，也曾感歎有的高升、有的叛變、有的消沉、有的退隱。何況「文革」造反派？這不能成為否定他們的理由。而且徐先生以一連串貶義詞所形容的七類人，除了第一類似乎成立，其他六類即使存在，也會出自社會所有人群，並非只是出自造反派。在我的記憶中，被徐先生最不恥的工人造反派當時都有相當於現在中產階級的穩定職業和穩定收入，他們沒有理由墮落為這六類人。至少我在這座生活了幾十年的城市曾經認識的兩大派造反派人士，後來極少有墮落為這六類人而讓我扼腕歎息者。也有這類墮落者，主要出自包括原保守紅衛兵在內後來成了上山下鄉知青的中學生。原因自然是理想破滅、前途渺茫、人生絕望。只是他們此時的身份早已不是所謂造反派。也許有人要說造反派小節不虧大節虧。大節是否虧我正在證明，此處主要辯駁徐先生嚴辭痛斥的小節問題。

朱學勤對「文革」中受迫害民眾的政治造反行動持難以言喻的否定態度，卻對1966年冬季全國「合同工」、「輪換工」、「臨時工」要求轉正和補發工資的「經濟主義」行為讚賞有加，認為是十年「文革」中民間唯一「有過革命性的社會行為」⁹⁹。其實大謬不然。

中國人與法國人的相近之處，除了都喜歡形象性傳達外，還有更重

要的一點：都是泛政治化的民族。所以，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部分才是政治話語；歷朝歷代才有那麼多夢想龍袍加身的農民起義；文人們遵奉的人生信條才是學而優則仕；「文革」中才有那麼多「總司令」、「總指揮」；「改革」中才會冒出那麼多「董事長」、「總經理」；中國人的異化才體現為政治異化；「官本位」思想才可能貫穿古今；毛澤東才說得出「政治是統帥、是靈魂」並為廣大群眾接受。這種政治化傾向尤其為 1949-1966 年中共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所強化。這個制度可以有許多名稱和定義，經濟上的平均主義、政治上的等級主義和文化上的獨尊主義卻是這十七年的基本內涵。經濟平均主義雖然導致普遍的貧困，但沒有造成社會成員的兩極分化和不同人群之間的貧富緊張關係。政治等級主義則不然：它在文化獨尊主義的大旗下，以荒謬的家庭階級成份和個人政治身份為標準，將社會成員劃分成三類十五等，更以不間斷的政治運動來加強這種劃分，並加劇人們之間的對立。所以「文革」爆發時，這個社會制度與廣大民眾之間最突出的矛盾，不是經濟分配上的嚴重不平均，而是政治權利上的嚴重不平等。這正是「文革」時受壓制群眾政治造反行動正義性的關鍵所在。中國人歷來習慣了勒緊褲帶幹革命，但對政治刺激卻十分敏感。十七年來，他們感受最強烈的不是餓飯，而是政治迫害。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人們仍然高呼「毛主席萬歲」，並不見從中站起一代覺悟者。從「反右」到「文革」，促使人們覺醒的原因，正是政治迫害。1966 年底至 1967 年初「全國紅色勞動者聯合造反總團」所領導「經濟主義」式的造反之所以失敗，除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聯手鎮壓，恐怕還是偏離主要社會矛盾而缺少廣泛社會支持的緣故。怎麼能對「文革」中下層民眾政治造反行動可以理解 and 值得同情的正義性視而不見，反而認為「不能肯定」呢？要知道，自由主義在行動方式上的溫和主義態度，不應該與它在價值觀念上的個體主義立場相矛盾。

第二節 造反運動與歷史進步的間接聯繫

「文革」時的造反運動與後來官方的「改革開放」和民間的民主運動

有什麼關聯？這是一個尖銳的現實提問，也是一個費解的理論難題。

從表象看：1966-1969 年的三年造反運動雖然具有某種民主含義，但其受控性質，使它看似與 1976 年後的歷史進步相距遙遠。1969-1976 年，絕大多數造反者早已從組織上和思想上全面退出造反，重新回到原來的單位中和崗位上尋找自己的利益取向，看起來也與 1976 年開始的歷史進步無關。至於直到 1976 年還在要求落實翻案平反和入黨當官政策的少數人，除了極個別曾利用「落實政策」的半合法名義進行過含有民主意味的活動之外，大多缺乏超出個人政治利益之外的行動，思想層面也一直堅守著毛澤東「繼續革命」式的理念，最終不自覺地站到了群眾意願和歷史進步的對立面。只就退出造反的大多數人而言，他們對「文革」的懷疑和不滿非常普遍，但真正能從極權主義的思想牢籠中掙扎而出的，還是其中那些遭到放逐的原造反學生和不滿現實的原造反青年。於是我們看到，能夠與後來官方的「改革開放」和民間的民主運動相銜接者，並不是造反派本身，而是否定了自己造反派身份的廣大青年和廣大市民。造反運動與歷史進步之間出現了巨大的斷裂，這個裂口更因官方「改革開放」和民間民主運動對造反運動的否定姿態而無限擴大。

這裏似乎有一個包含著兩種問題漩渦的誤區。一是將繼承了造反派的衣鉢和名聲直到 1976 年還在謀求入黨當官的造反派殘餘視為造反派本身，完全無視參加過造反派的千百萬人退場後的懷疑態度和不滿行為對於 1976 年所開始歷史進步的積極作用；二是只知道追究 1976 年之後歷史進步事件的推動者有多少著名造反人士，完全沒想到去深究造反運動所塑造的一代人對於歷史進步的隱性作用。

是的，造反運動與歷史進步之間並無直接的因果聯繫。其中的聯繫隱蔽而間接。

從民間對官方的作用看：

「整風」和「反右」中少數知識份子提意見之舉，對極權體制沒有任何觸動，反而增強了它巨大的自信。繼「整風」之後 1957 年再次開展「反右」運動大規模迫害提意見知識份子，1957 年「反右」之後毛澤東反歷史社會理想和個人獨斷方式的形成，都是這種自信的體現。唯有「文革」中的萬眾造反，全方位震撼了整個極權體制，造成了它的巨大內

部應激和深刻自我反思。這自然來自從下到上各級當權派所受到的全面衝擊。例如幾十年一貫整人、終於在「文革」中挨整的周揚，上世紀80年代深有體會地說，整人者沒有挨整，不會知道被整的滋味。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切身感受，他們才可能為「地、富、反、壞、右」摘帽，才可能決然否棄毛澤東從「階級鬥爭」到「路線鬥爭」的基本路線，並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給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權利。要是沒有造反衝擊給他們造成的災難性痛苦和覺醒式反思，不僅鄧小平不可能提出1979年之後的改革路線，就是鄧提得出各級當權派也絕對接受不了。

中國1976年以後指向體制內民主改革的政治轉變，實際上是由高層穿著「守舊派」外衣的人完成的，自命「革新派」的人，卻被歷史逼到了民主的對立面。毛體制高層內部兩種政治力量最終的角色定位，並非來自他們的自覺選擇，而是歷史趨勢和政局演變及其合力不自覺驅使的結果。「文革」中下層民眾造反行動所產生的巨大衝擊，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官方對民間的作用看：

「整風」和「反右」中的提意見者融入體制的程度不盡相同，但從提意見到挨整的大反復一次完成，心理應激和精神反思的對比空間比較小，思想的覺醒也就比較淺。所以，作家丁玲復出後仍堅持認為人在本質上是政治存在物；作家張賢亮和叢維熙復出後，在各自反映苦難經歷和受難心態的小說「牧馬人」系列和「大牆」系列中，仍然表現出強烈的政治異化傾向。「文革」中的造反者則不然。他們融入體制的程度雖然甚於前兩代人，但由於從造反到挨整幾經反復，心理應激和精神反思的對比空間較大，思想的覺醒也就更深。上世紀80年代《今天》詩派、《星星》畫展、《走向未來》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四個青年文化群體的思想指向，90年代林賢治、朱學勤、徐友漁和周倫佑、王家新等一批學者、詩人的批判鋒芒，都是證明。他們大多是從當年的造反氛圍中走出來的覺悟者。

甚至可以說，在中國80年代的文化啟蒙運動中挺身擔綱，其作用和影響一直延伸到21世紀的傑出人物，很多是「文革」中的造反者。儘管他們是在抹去「文革」的政治血跡和掙斷「文革」的精神枷鎖之後站

出來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50年代「反右」時的大鳴大放、60年代「文革」時的造反運動、80年代「改革開放」時的民主啟蒙，與同時期的世界性民主浪潮具有完全的同步性。20世紀的50年代、60年代、80年代，世界範圍出現過三波民主浪潮。1957年「反右」時的大鳴大放，屬於同時期包括「非史達林運動」、「匈牙利事件」、「波茲南事件」在內的第一波世界性民主浪潮的組成部分；1966-1969年「文革」時的造反運動，也與同時期以北美「反戰運動」、西歐「五月風暴」、東歐「布拉格之春」為重要標誌的第二波世界性民主浪潮相呼應；1979-1989年「改革開放」時的民主啟蒙，更是同時期以「蘇東劇變」為突出結果的第三波世界性民主浪潮的響亮波濤。

如果撇開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區別而只看行為特徵，也會發現國內三次民主運動與世界三波民主浪潮之間具有驚人的同一性。「反右」時的大鳴大放，在理性式的清醒性、溫和性、建設性、目的性方面，與同時期蘇聯和東歐的民主運動非常相近；「文革」時的民眾造反，在非理性式的盲目性、暴力性、破壞性、荒謬性方面，也與同時期西歐和北美的反政府運動非常相似；「改革開放」時的民主啟蒙，在理性式的清醒性、溫和性、建設性、目的性方面，更與蘇聯和東歐的民主運動非常相同。

由於世界性浪潮難以言喻的隱秘作用，國內極權體制下的三次民主運動似乎走著一條否定之否定的路線。民眾造反好像是對大鳴大放的否定，而民主啟蒙好像是對民眾造反的否定——同時又好像是對大鳴大放的肯定。其實螺旋式上升，否定中包含著肯定。

因此，我們在考察中國80年代「改革開放」時思想啟蒙和民主訴求的族譜關係時，應該看到它具有兩個維度：在橫向上它是20世紀第三波世界性民主浪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縱向上它又是中共建政後國內第二次民主運動——「文革」中民眾造反的反撥式延續。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認為：1949年10月1日以來，我們並非只生活在一種社會場景裏。迄今為止，我們至少經歷了三個時代。那就是：1949-1979年的前極權主義時代，1979-1989年的從前極權主義向後極權主義的轉變時代，1989年至今的後極權主義時代。前極權時代的統治特

徵是絕對專制主義，後極權時代的統治特徵是相對專制主義。而處於它們之間的轉變時代，除了官方的「思想解放」和民間的「文化啟蒙」，便是兩種專制共存並為轉換過程必然產生的權力衝突和政治震盪所充斥。101

對於這場極權主義框架內的社會轉型之劇，「文革」中的民眾造反所扮演的絕非反面角色。如果說「文革」是前極權時代及其絕對專制主義的葬禮，那麼廣大造反派就是它的主要掘墓人。揮動的鋤頭挖得很深——不僅劈向官僚階層視人性為仇敵的玩固秉性，而且也深入到民眾愚昧而盲從的板結之心。正是絕對專制主義在官方和民間的這個深厚文化心理基礎的大面積動搖，才最終導致了它向相對專制主義的大轉變。這不是文學形容，而是前極權時代大葬禮的參加者都能認可的心理事實：官僚們因為挨整經歷才終於意識到絕對專制主義不該再繼續，民眾因為造反遭遇才逐漸領悟到絕對專制主義不能再容忍。毛澤東發動「文革」鼓勵造反，本是為了煥發絕對專制主義的活力，阻止它向相對專制主義衰變的命運；沒想到過度的瘋狂反而耗盡了它的能量，使衰變的命運在自己高大的身軀頹然倒地之時如期來臨。他為了阻止這場轉變而自編自導的「反修防修大演習」，最後成了自作自受的大葬禮。造反派在「文革」中為悼念武鬥死去的同伴經常播放的《哀樂》，提前成了前極權時代和絕對專制主義的《葬禮進行曲》。「四人幫」成為這場葬禮的最後陪葬品，無可非議。我們沒有理由將本為掘墓人的造反派也當作這場葬禮的最後陪葬品。

我們不能因為「整風」受害者實際糾正和「反右」受害者全部平反，就追隨官方話語，對「文革」中先受迫害後造反最後又被判處政治死刑的人群，竭盡誤指、追殺、妖化之能事。須知他們曾是前兩代知識份子變態民主行為的最後繼承人和變態民主願望的最初達成者。

我們也不能因為80年代以來的思想啟蒙和民主訴求是從否定「文革」造神運動中迸發出來的，就認為當年的民眾造反毫無啟蒙意味和民主因素可言。須知造反運動不只是一座煉獄，它還是後來思想啟蒙和民主訴求的政治培養基和精神催化器。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海外學者侯一謙對「文革」造成的社會動變和造反派對官僚階層的衝擊持無比堅決的否定態度。他認為：中共若按正常的規則操作，循著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正常途徑行進，共產黨就會一步步和平演變，走上另一條道路。因為他們的方式畢竟更有理性，暗示著一種能夠走出惡性循環的方向。因為社會秩序的正常化勢必減弱一黨專制的必要性，而政治運動勢必造成社會的混亂和危機並使專制成為社會整合的藉口。102

我不否認這個假設所包含的理性反思和道德善意，遺憾的是歷史並非侯先生手中的膠泥——想怎麼捏就怎麼捏。儘管已經發生的事允許過後假設，但超假設的事實畢竟無法更改。像「文革」這樣一個歷時十年有億萬人捲入的政治運動，它的發生自然有著深刻而複雜的原因，並非個人意願所能主宰。且不說當時極權主義兩種走向以及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權力爭鬥如何難以調和，單只統治集團長期推行「階級鬥爭」所製造的等級歧視和政治迫害，即已使不同人群之間的權利關係緊張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就算沒有發生「文革」和民眾造反運動，中國社會一步步走上了和平演變之路，其前景也未必如侯先生設想的那麼樂觀。

歷史不可推測，但我們的近鄰——原蘇聯這面鏡子可以作為獨一無二的借鑒。自1956年以「非史達林化」的方式實行民主改革以來，從未發生過「文革」這樣的政治事件和造反這樣的群眾運動，一直理性、溫和、平穩、正常地走著和平演變之路。結果如何？同樣的政治專制，同樣的思想控制，同樣的經濟停滯，同樣的貧窮落後，同樣的欺世盜名。甚至近似於1979年鄧小平改革的1956年赫魯雪夫改革，也不敢為蒙冤受害的托洛斯基、布哈林、季洛維也夫等一大批位居統治集團高層的傑出人士翻案，更不用說思想領域、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涉及廣大群眾利益的深層改革了。解凍的春風只吹拂了很短的時間就被極權主義的暴風雪壓住，其間經過勃列日涅夫統治下漫長而寒冷的歲月，直到戈巴契夫時代才告終結。在這面鏡子裏，我們那個同主義同制度的鄰國在和平演變之路上艱難跋涉三十五年的痛苦景象歷歷在目，何曾有過侯先生所設想的美景？至於1991年後這個國家發生的民主變革，那就不屬於侯先生所推崇的體制內和平演變，而是自由主義者所排斥的體制外社會革命了。

是的，沒有「文革」中民眾造反運動對官僚階層的全方位衝擊及其

所導致社會心理的深層次變化，就不可能有1979年後官方如此跨度的「改革開放」和民間如此強度的民主運動。隱蔽的歷史鏈條環環相扣，缺少一個環節歷史就會有不同的走向和步態。各種事後的設想雖然是個人的良好願望，但終究代替不了嚴酷的歷史變局。

劉國凱為了證明造反運動與民主運動之間存在直接聯繫，這樣描述造反運動民主含義的連貫性：「既要看到造反派在文革早、中期所表現出的民主鬥爭性，也應該承認它在後期的蛻變，但更應看到它的分化，分化出了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先驅——『極左派』，並提出『極左思潮』哺育了一代民主戰士」的觀點。他以1974年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作為「鮮明的例證」，認為不僅大字報所運載的思想深度與「七九民運」和「八九民主運」相比毫不遜色，而且三位作者及其戰友既是廣州造反派的中堅分子，又是1976年後民主運動的英勇戰士。因此得出一個結論：「『極左派』是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先驅」。103

劉先生堅決為造反派辯護的正義精神令人欽佩，可是這樣的理解卻包含了兩個錯誤。

首先，李一哲的大字報雖然被宋永毅和徐友漁歸為「異端思想」，但它並非屬於「極左思潮」。「極左思潮」主要產生於三年造反運動中期的1967-1968年。這時群眾組織合法存在，造反正處於白熱化狀態，造反派內部再次分化，於是出現了以首都「五一六兵團」和湖南「省無聯」為代表的「極左派」及其思潮。其主觀意圖和文本內容都完全贊同「文革」和造反。典型特點是毫無疑義地將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發揮到極致，具體主張包括：打倒「紅色資本家階級」的總代表周恩來，揪出「軍內走資派」，實行「巴黎公社」式的直接選舉，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代表人物和經典文本首推湖南的楊曦光及其《中國向何處去》。雖然20世紀90年代以來，其中的「官僚資產階級」之類提法仿佛與現實境況有所對應，但並沒有超出毛澤東「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論點，與純正意義上的民主主義相距甚遠。物極必反。作為「文革」時的第二批異類造反者，北京「五一六兵團」和湖南「省無聯」與第一批異類造反者「全紅總」一樣，極有可能與80年代的民主運動順向銜接；然而必須是其中的活躍分子在中共的大牢裏長期反思並驀然驚醒之

後。包括李一哲大字報在內的思想傾向，卻產生於群眾組織徹底解散之後的1969-1976年。雖然文本內容仍然套用「文革」話語和造反腔調，但主觀意圖已截然不同——屬於反對「文革」和造反了。典型特點為：利用「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之類的合法機會，順應群眾幹部對此前軍人政權的不滿心理，沿用「文革」套話向本地當權者發難，希望爭取實際被取消的「四大自由」權利，並借機表達一些指向民主自由的隱約含義。這種思路和行為，在那個時期全國各地一些不甘沉淪而尋機表現的原造反青年中比較普遍，只不過他們內心深處已經叛離了毛澤東劃定的「文革」和「造反」，轉變成了中國最初和潛在的民主主義者。這個時期較有影響的大字報，還有貴陽李洪剛等七位原中學造反紅衛兵于1976年3月10日所張貼《對目前形勢和新的歷史任務的幾點看法》。他們的行為雖然還扯著「造反」的幌子，但在這個半合法幌子後面的思想實質卻是反毛式「文革」和「造反」的。他們此時對「文革」和造反的某種肯定，最多只限于展放青春情懷的全國大串聯、表面化的自由結社和自由言論、批判鬥爭、貫整群眾、享特權、搞腐化的當權派。這些被肯定的內容其實只是三年造反運動的積極方面，與毛式「文革」和「造反」的最終走向大相徑庭，實際包含著某種民主的意指。把李一哲與完全癡迷于毛氏「繼續革命理論」魔陣的「極左派」相混同，顯然是對他們的嚴重誤解。他們1976年後成為自覺的民主戰士，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果關係之間不存在任何斷裂。然而想用他們來填補造反運動與民主運動之間的斷裂，就顯得過於牽強了。

其次，李一哲大字報蘊涵的思想並沒有什麼堪與「七九民運」和「八九民運」媲美的深度，其真實意指和實際深度超不出上述簡單歸納。這或許不是作者本來就缺乏深度，而是當時的形勢和語境只允許作者這麼流露。我們不應該為了立論的需要，在錯誤地把他們歸為「極左派」之後，又要莫須有地從這篇大字報中挖掘什麼思想深度來。這篇大字報的影響，與其說來自它並不深刻的內容，不如說來自它應和民意並預示極權主義演變趨勢的標題。中共1979年至今自我彰顯的政治改革口號，不就是和大字報標題完全相同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嗎？的確，這個與實際內容相去甚遠的標題，在當時不僅應和民意而且符合「黨心」。

它自然會在當時產生影響並引起今日研究者的注意。

侯一謙對「文革」中的一代覺醒者給予高度評價。他注意到在那個苦難時代短短的幾年中，這些人的思想就已深化到了可與整個人類最深沉的思想比肩的程度，致使被中共專制統治和文化封鎖實際割斷的歷史在他們身上獲得了連貫性。但他認為：「文革」令人慶幸的不是產生了造反派，而是產生了這樣一批具有獨立人格的覺醒者和整個社會的獨立意識。雖然在某些人的經歷中，造反與覺醒連在一起，但二者本身並沒有必然的聯繫。 104

我完全贊同侯先生的說法，但有兩個疑問需要解釋。首先，這些人為何在「文革」前漫長的十七年不曾覺醒，卻在這短短的幾年中就覺醒了？如果不是造反運動及其引起的社會震撼和精神激變，再無什麼原因能催生出這一代人的覺悟。儘管這種作用間接而隱蔽，可是在最終的意義上，這種作用誰也無法否認。其次，造反與覺醒雖無直接的因果關係，卻有著間接的必然聯繫。一代覺悟者大多為過去的造反中人，原來的保守派人十少之又少。對於1969-1976年毛澤東反歷史社會理想的現實建構，最擁護的人不是造反派，而是保守派。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的消息公佈後，最痛苦的人不只是正在要求入黨和當官的造反派殘餘，尤其是長期在毛體制下如魚得水的原保守派骨幹。面對70年代末和整個80年代的民主運動，心理層面最抵觸者也不是原造反派，而是原保守派人群。至於原保守人群中的那批「高幹」子女，他們可能全力支持給自身帶來特權利益的「粉碎『四人幫』」和「改革開放」，一旦面對民間的民主運動就會本性畢露。1989年開槍前夕，姚依林的女婿、王震的兒子、鄧小平的子女都主張採取鎮壓措施。報告文學作家劉亞洲僅僅因為當了李先念的女婿，至今仍堅持「六四」鎮壓有理。他們雖然並不都是「文革」時參加了保守紅衛兵組織的「高幹」子女，但現實中的保守傾向一脈相承。一代覺悟者的主體不是過去的保守派，而是往昔的造反派或傾向造反的青年。從心理學視窗看，一個人激進或者保守，主要受青少年時代的家庭社會地位和個人現實處境所規定，即使以後家庭和個人境況發生改變，這種心理傾向也會有某種連續性。從造反者到民主戰士的轉變，雖然其間要經歷觀念的嬗變，但心理傾向是一貫的。

造反運動與民主運動之間雖無直接的因果關係，卻有間接的必然聯繫。

第三節 造反派與「右派」的真實關係

這裏涉及到一個問題：在「文革」中，造反派與「右派」的真實關係究竟怎樣？

說實話，想到這個問題就令人心寒。不是沒有真相可言，而是因為人們基於附勢心理的誤記、誤言和誤斷對真相的太多歪曲。

事實明擺著：1966年10月以前，造反派的前身——下層黑色和麻色青年人群，就因為與當年「右派」們同樣的出身和言論而被打「小右派」，同「老右派」一起遭受各級當權派、工作組和官辦紅衛兵的迫害。這之後，他們起來造反的主要對象，又正是當年將55萬知識份子直接打成「右派」、後來又對其使盡專政手段的各級當權派。在三年造反期間，由於大方向是鬥「走資派」，加上同病相憐，他們對「右派」實為避而遠之，從未像官辦紅衛兵那樣殘酷地進行迫害。

凡是自我稍為真實和良知尚未喪失的人，都應該從歷史真實和心理真實的雙重角度，承認或至少默認這一事實。

然而，在公共話語空間，至今為止，我只看見被視為政治異化的丁玲、劉紹棠和被譽為剛直不阿的劉賓雁、邵燕祥，摸著良心說了真話。此外，無論普通人還是文化名流，大多是昧心之言。

我記得丁、劉二人從未自撰受造反派迫害的光榮事蹟，反而在有關文字中坦言造反者曾經關照過自己或保護過自己的文稿。

劉賓雁沒有說自己與造反派的關係，而是談自己對造反派的認知，在上世紀80年代那篇引起巨大爭議的報告文學作品《未完成的埋葬》裏。他寫的是上海海運學院的事。通過調查分析，他發現至少在該學院：「文革」中的造反派大多是「文革」初期及此前政治運動的挨整者，1966年秋至1968年夏造反並得勢，1968年「工宣隊」進校後重新失勢並再度成為挨整對象，「文革」結束後繼續挨整。與此相反，「文革」中的保守派，大多是「文革」初期及此前政治運動的整人者，1966年秋

至1968年夏失勢並受壓，1968年「工宣隊」進校後重新得勢並再度製造反派，「文革」結束後繼續整人。 105

這篇報告文學後來受到批判和查禁，因為它觸及到了歷史的真實。

邵燕祥1959年9月由中央廣播事業局摘掉「右派」帽子。「文革」初期的1966年6-12月，被中央廣播電視劇團官方「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並開除公職監督勞動。1967年2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中央廣播事業局造反派「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下屬組織——「廣播電視劇團戰鬥隊」，宣佈官方「文革小組」對他的「戴帽」處理無效。劇團群眾組織分為兩派，保守派反對為他「平反」，造反派堅持為他「平反」。邵燕祥坦言「我在感情上是傾向後者的」。1967年2月起，為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和政治權利，他也起來造反了——寫大字報批判迫害自己的劇團當權派。 106

憑我所瞭解「右派」們的敏感、善良和正直，我不相信他們寧肯與歷來的整人者盡棄前嫌，也不願對後來的挨整者表示同情。須知，這些整人者也曾整過他們，這些挨整者也曾同他們一起挨整。「文革」初期的挨整者曾因造反機遇而風光一時，但他們造反的鬥爭對象主要是過去同樣整過「右派」的人。我不相信「右派」們不曾暗自高興，我不相信「右派」們不曾產生內心的共鳴，我不相信「右派」們不曾為他們的最終結局隱隱擔心——即使在自己被當作毛澤東傳統運動模式的「勝利成果」而繼續挨整之時。因為這有違心理的真實，我不相信。除非這些知識份子作為人應有的七情六欲已經被政治說教式的虛假觀念徹底代替。

我相信獄中的胡風拒絕過對周揚這位曾經置自己于死地的文化官僚落井下石。但是，除了有汗人品的卑劣之舉，我不相信他從未有過一絲暗自的快慰，除非他已處於精神分裂的邊緣。

我更相信胡風的弟子——在「整風」、「反胡風」和「反右」三個運動中連續挨整的軍旅詩人胡征，在「文革」中對整人者採取造反之舉的合情合理。因為這更符合人性的真實和心理的邏輯。儘管作者冷夢不得不為這個情節補上一大段順應大勢的政治話語解釋，但它仍然掩蓋不了胡征作為一個正常人的真實心理。

遺憾的是，偏偏有人為了成全自己觀念的崇高，不惜犧牲別人心理

的真實。

新進學人李輝在其《風雨中的雕像》一書中，有一段描寫蕭乾1966年6月間有關心態的文字：

6月，他和首都許多文化界人士一起，都集中到社會主義學院，幾百名昔日名人，在高高院牆裏，度著還算正常平靜的日日夜夜。那時的蕭乾，心裏獲得了1957年以來的第一次滿足。這個「右派」分子，看到當年把自己打成右派的人，和自己關在一個院子裏，過著和自己一樣的生活，看到昔日對自己發號施令，恥於與自己為伍的人，現在和自己處於同樣的地位，他高興了，甚至還頗為欣慰地對妻子說：都一樣了，都一樣了。

儘管蕭乾為之欣慰的，僅僅是被毛澤東支持上層紅色子弟揪出來的文化官僚們，但也同樣在情理之中，完全屬於一個正常人的真實心理反應。可是，李輝硬要將其定論為：「這是一種扭曲的心態。政治風雲的磨難，無形之中已經淡化了他心底善良的願望。這善良，人類寶貴的同情心，悄然間被他潛藏著的報復心理所淹沒。」 107

李輝在同一本書中對其他主人公相關心態的評論，也持同樣的見解。這是對真實人性的觀念式扭曲。其實，人的如此心態，勿須「政治風雲」打磨，就是日常糾葛也會導致。評論者如果沒有心思瞭解心理學知識，盡可設身處地內省一下自己的心理：如果自己是蕭乾，正常反應會不會那麼崇高？作家雖有解釋他人內心世界的思想權力，然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應該成為其中的準則，否則必將失真——從作者的觀念到人物物件的內心。

我願以幾件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來具體說明「右派」與造反派的真實關係。

我所在城市近郊有一個地區農科所，集中著來自全國各地的數百名「右派」分子。1966年11月造反派興起之後，他們中的「摘帽」者紛紛起來造反並成立了跨單位跨行業的造反組織——「一二七滄桑戰鬥團」，未摘帽者雖然無權參加組織，但大多傾向於他們的觀點，並暗地出謀畫策。造反之初，他們思想和行為的激進在這座城市非常著名，以至1967年「二月鎮反」時被定為本地第二號「反革命組織」，遭到最殘

酷的鎮壓。儘管後來為了政治合法性，他們吸收了不少原保守派中的工農分子加入組織，並主動退居次要位置，但他們激進的造反傾向一直保持，直到1969年單位革委會成立。

大學同學鄒某，其父系某省戲劇學院流放到本城農科所勞動改造的「右派」。1983年，鄒某向我講起「文革」中造反派對其家庭的歧視和迫害。我就自己所知的事實告訴他：其母參加了單位造反派，其父實為農科所造反組織的幕後參謀，他們從未遭受過造反派的歧視或迫害。相反，有兩位喜歡文學的造反青年一度成為他家的常客，一直以「老師」和「師母」尊稱其父母。要說受迫害，那是因為這兩個造反青年1971年在「一批雙清」運動中被審查而使其父母受到牽連。但整其父母的不是造反派而是掌權軍人。鄒某少年時的記憶蘇醒，連稱屬實。

造反青年Y，1969年偶獲1956年出版的《星星》詩刊一本，讀後深為被打成「大右派」的流沙河抱不平。隨之竟以一套《魯迅全集》從朋友手中換得停刊前的《星星》詩刊全套——不惜以「合法」換「非法」，而且一直珍藏。1981年，已是詩人的他借調到《星星》編輯部工作，有幸與流沙河面識，漸成知交。談起這段換書往事，以及為躲避全城大搜查而多次轉移藏書的經歷，流沙河深為感動，並為有人敢於在「文革」中珍藏下《星星》全套而大為稱奇。他隨後將這套《星星》送給了流沙河。

造反知青Z于1973年參加工作後，經朋友介紹認識了在地區醫院內科主任職位被打成「大右派」的醫生張敦仁，二人遂成忘年交。政治和經濟，歷史和現實，國家和個人，無所不談，情誼之深，幾達數日不見即感寂寞之狀。敦老之兄張默生，系原西南文聯副主席及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1957年因替流沙河〈草木篇〉鳴冤，被毛澤東點名批判打成「大右派」。默老1974年來乃弟家中作客，敦老即將忘年交引介給兄長。Z假託〈悼魯迅〉之名作抒懷言志舊體詩一首請教。默老讀後連聲稱讚，並手書一份帶回。詩如下：

風滿三更橫緇衣，
月照九州展素尺。
寂寞暗地埋舊事，

彷徨深處發新枝。
霜凝紙上雲雨醒，
雷鳴筆下春秋馳。
一枕何付瀟湘夢，
千古不朽國魂詩。

同年，Z的胞弟與另一朋友前往省城拜望默老。臨別，默老口述對句轉囑於Z：「到人之所未到，言人之所未言。」殷切之心躍然欲出。「文革」結束後，默、敦二老相繼平反。Z不願以現在身份牽連於人，遂於1977年與他們中斷交往。默老後來逝世。敦老仍健在並任地區政協常委，多次捎口信讓Z去看他，但Z心有苦衷一直迴避。

1971年「一批雙清」運動中，我在監獄認識了兩位元「右派」難友。他倆一名鍾子魴，一名肖慶偉，在此前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捕，罪名皆為「用資產階級反動思想腐蝕青年」。他們早我半年入獄，現與我同室而囚。二人得知我的名字，頗有相見恨晚之感，皆言一直很關注我的動向，曾托人介紹相識，但始終未成，不想今日相會獄中。我同樣久聞其名，有心請教，想不到心願竟在此時此地達成。鍾原係某軍區《戰友》報主編，大校軍銜，50年代曾受到毛澤東稱讚的「逢山開路，遇水造橋」口號就是由他提出。肖原係省城某高校哲學系講師。皆因1957年打成「右派」流放本市農科所勞動改造。二人對社會與人生頗有見解，特別是肖與下層黑色子女多有交往並頗多指點與啟迪。正處青春迷茫期的我，久旱逢雨一般從他們身上汲取真知的點點滴滴。追溯足跡，我思想的旅程就是從那裏邁出最初的一步。說到下層民眾造反之事，二人從不隱瞞支持心態，但更充滿擔憂。一日相互和詩，肖和我七律一首：

方剛血氣南冠詩，
遺恨白帝灘上石。
英雄亦作黃樑夢，
美女不少薄命事。
戰罷夷狄藏書劍，

了卻君王斂行志。
大馬金刀名將在，
沉爾龍泉只三尺。

1、2句，先贊我反對官方「批清」運動的大字報，後惜我入獄之事。3、4句感歎共同的造反空想。5、6句，喻「大鳴大放」後即與毛體制決裂而甘為隱士。7、8句，再歎官僚勢力太強大，造反派難以成事。二人於半年後分別被判刑離我而去，終未再見。據傳，70年代末二人的「反革命」罪名和「右派」身份皆獲平反，鍾大喜過望，狂飲之時突然辭世，肖欣喜若狂，投河自沉而亡。倘若傳聞屬實，就將這段文字作為我對他們的小小懷念。我希望傳聞是假，他們平反後依然健康、愉快、熱情地生活著。在這座城市黑霧瀰漫的年代，他們是最早在下層青年心中點播民主與自由小小火種的人。

無論從心理或社會理論角度透視，還是從歷史和現實利害關聯分析，造反派與「右派」的關係都應該明明白白，勿須多疑。

然而，就是有人要用官方話語來取代歷史和歪曲事實，好像不這樣做，自己以《反右派始末》為書名的記實作品就會失去份量。我指的自然是記實文學作家葉永烈。

在這本書中，作者用了七頁的篇幅專門論述自己關於「文革成了第二次反右運動」的立論。他的依據是什麼呢？不是事實，而是官方話語，也就是毛澤東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和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佈的《十六條》。因為這兩個文本中，既有「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用語，又有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等同於「黨內右派」的提法，作者就斷定「文革」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繼續，性質完全與「反右」運動一樣，「文革」是第二次「反右」運動，55萬「右派」分子的遭遇比1957年更加悲慘。108

這完全是政治話語對事實真相的攪和，作者在面對歷史事實時應有的判斷力，完全給攪糊塗了。比如，作者明明看到「文革」與「反右」的不同之處在於：「反右」主要整黨外民主人士，「文革」主要整黨內當權派，仍堅持認為，前者屬「黨外右派」，後者屬「黨內右派」，二

者都是「右派」，所以「文革」與「反右」都是「反右運動」。

在當下中國，這類似是而非甚至胡攪蠻纏式的言說，實在太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攪糊塗了不說，還要把受眾也攪糊塗。歷史真相豈能敞亮？

作者的糊塗之處在於，沒有看到「文革」在理念上分為兩個界線分明和特徵突出的大階段：1966年10月之前，先是劉少奇按照傳統思維和傳統方法主持整個運動，後是依舊掌握著運動領導權的各級當權者及其所支持的官辦紅衛兵繼續沿襲「階級鬥爭」模式，運動的確與「反右」一個套路：依靠物件是紅色子弟，打擊對象是包括「右派」在內的文化界知識份子和各界黑色人群及其子女。1966年10月之後，毛澤東及其極端派發起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運動模式發生了方向性的轉變，依靠物件是在前一階段與「右派」同時挨整的雜色人群，打擊對象則是各級當權派。雖然1969年8月造反派退出政治舞臺後，這一方向性轉變實際上發生了逆轉，但其理念一直未變。

例如：在1966年6月11日的文化革命彙報會上，劉少奇明確提出：「這是新的反右鬥爭」，「學生、教師中的右派分子有多少就定多少」。劉在6月13日批轉中南局和西北局的兩個報告中同樣批示：「對大學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對高中應屆畢業生中的一些人，經市委批准，可以批鬥和戴帽。」109 相信1957年當過「右派」的人，定會覺得這種聲調特別耳熟。是的，在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劉少奇就是這樣來看待和領導「文革」的。他的確認為「文革」就是「反右」的延續，他確實是要再一次從教師和學生中大抓「右派」。「文革」如果按劉少奇沿用的舊模式繼續搞下去並順利收場，或者按照隨後各級當權派和保守紅衛兵的作法——繼續將上層知識份子和下層黑色人群當作主要鬥爭對象，確實會變成一場貨真價實的「反右運動」！

但毛澤東的看法和作法完全與此相反：毛此時所說的「右派」，人人都知道指的是劉少奇等當權派和頑固保守的群眾。

如果葉永烈只以劉少奇主持的1966年5-7月或者各級當權派掌控運動和保守紅衛兵獨霸天下的1966年8-9月來證明自己的立論，尚能成

立；可是他偏偏要隱去這個階段，而以毛澤東主持並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終於端正了方向的「文革」主潮作為立論的依據，自然不能自圓其說。怎能將這之後挨整但在這之前一直整人的當權派，與「右派」拉扯在一起呢？怎能將兩者挨整的性質混為一談呢？臺上歷來的整人者即使此時挨了整，與台下歷來挨整者的根本利益也不可能一致，怎麼能將二者等量齊觀？要知道權力與知識、官僚與文人歷來就勢不兩立，更何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

在書中，作者還玩了兩個概念彎彎繞繞式的誤指遊戲：首先不提「文革」的本義是1966年10月之後所公開確立的整黨內當權派，從而讓人覺得，從「右派」附帶挨整的運動初期開始，「文革」的本義便是整「右派」——從黨外到黨內，1957年的「右派」與現在的當權派命運相連，休戚相關，原是同根生。其次，不提運動初期整「右派」的責任人是劉少奇為首的當權派和上層紅色子弟，也不指明這之後整當權派的責任人是毛澤東為首的極端派和下層雜色人群，而巧妙地用兩個抽象概念「文革」和「紅衛兵」來泛指，讓人覺得，當初整「右派」和後來整當權派的是同一夥人。是什麼人呢？只能是被宣判了政治死刑的造反派。

兩層誤指遊戲完成，作者的真實用意躍然紙上：「右派」與當權派，都是在同一運動中為同一夥人所害，所以二者屬於同一戰壕的戰友。

是的，通過論證二者在「文革」中的生死聯繫，來加強他們在現實中的親和性，正是作者的良苦用心。

由此看來，以為作者犯糊塗，純屬誤會。作者所求的其實是鄭板橋式的假糊塗！

國內學者林賢治同樣說過「文革」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放大。但他的立論依據，是「文革」和「反右」中官方行為本質上的相同之處：前期鼓勵造反，後期收拾造反者¹¹⁰。在他看來，「文革」中與「反右」中的受害者命運相同的人，不是「當權者」而是「造反者」。其立場與葉永烈完全相反，結論也更接近真實。

楊小凱因為「文革」時湖南省原《湖南日報》總編劉鳳祥為首的一些「右派」曾介入造反運動，就斷言全國「大部分右派文革時都是造反派」¹¹¹，未免過於武斷。事實上，湖南的這種現象只是全國的特例而非

通例。「文革」時的邊緣人群造反有一個嚴格的限定：必須限於所謂「人民」範疇之內。當時起來造反的雜色人群，無論顯在和隱在黑色家庭出身的青年，還是自身有「歷史問題」的成年人，或者其他受壓抑的人員，他們最低限度也必須屬於「人民」陣營——即使處在這個陣營的邊緣。「右派」造反，最大可能也只有那些摘去帽子已經屬於「人民」的人員才敢。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那個著名的《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嚴格規定了包括「右派」在內的「黑五類分子」不能參加造反的四個「不准」。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又專門下發了《關於不准地、富、反、壞、右乘機翻案問題的決定》，給包括「右派」在內被視為「階級敵人」的黑色人群關上了最後一道鐵柵欄。當時「右派」與造反派的真實關係，不是大部分親身參加造反，而是大部分內心同情造反。

第四節 公共話語中左與右的顛倒

左與右的問題，官方話語顛倒概念已久，有必要澄清。
葉永烈考證：

左與右這對方向名詞引伸為政治名詞，始於法國大革命。1789-1791年，法國國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分為三派：要求國王具有絕對否決權者，集中坐在右邊席位，得「右派」之稱。要求廢除國王否決權者，集中坐在左邊席位，稱為「左派」。「右派」意味著保守、守舊，「左派」意味著激進、革新。從此左、右成為政治概念，在全世界通行。¹¹²

這是左右概念的本義。

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完全是按本來意義使用左右概念的。例如：稱國民黨內的頑固派為右派，稱進步派為左派。稱民族資產階級附合國民黨部分為右翼，稱支援共產黨部分為左翼。依據國際共產主義的通用提法，將脫離實際而急躁冒進的政治觀念和政治實踐，稱為帶引號的「左」。帶引號的「左」即過左，「文革」中改稱「極左」。

毛這個時期對左右概念的使用，大體正確。

從1957年「反右」運動起，左右概念之所指便完全顛倒了，直至今日。

顛倒發生自1957年毛澤東對「資產階級右派」概念的錯誤沿用。

錯誤的關鍵是完全忽視了共產黨的地位從在野到執政的轉變。

國民黨統治時期，政治傾向上左派與右派的界限比較清楚：國共兩黨，共產黨是在野反對派，傾向激進革新，屬左派；國民黨是在朝當權派，傾向保守守舊，屬右派。兩黨以外各種政治勢力的左右劃分以此為座標：凡支持共產黨者屬左派，反對者屬右派；凡支持國民黨者為右派，反對者為左派。對所謂「資產階級」政治傾向的劃分也是這樣：支持共產黨主張的稱「資產階級左派」，反對共產黨主張的稱「資產階級右派」。

1949年10月1日以後，共產黨已經從在野黨變為執政黨，昔日改變現實秩序的激進傾向，已為今日維護現實秩序的統治立場所取代，以往那種以是否擁護自己來劃分黨外左派與右派的政治座標不復成立。因一黨專政，沒有了反對黨，甚至不再有其他社會政治力量，但無論黨內還是黨外，人們對現體制、現秩序和現政策，依然會有不同的看法並持不同的態度。這時的左派與右派劃分，自然應以人們在現實中的政治傾向是激進革新還是保守守舊作為標準，而不能再以是否擁護共產黨作為座標。

大鳴大放中提意見的知識份子，是激進革新還是保守守舊？當然屬於激進革新。以此為標準，他們本是黨外體制內知識份子中的左派。

一貫提倡理論聯繫實際的毛澤東，卻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常識性的錯誤。他不顧共產黨政治地位和現實傾向已經根本改變的歷史事實，看不到現實中的左派與右派劃分標準已經隨之改變，否認提意見屬於知識份子階層希望極權體制更加適度和社會生活更加進步的善意性激進行為，仍然像過去一樣以是否擁護共產黨作為劃分左與右的標準，仍然將擁護共產黨的人稱為左派，將反對共產黨的人稱為右派——而且將過去反對者「資產階級右派」的名稱套用在今日異議者的身上。

要求反對官僚主義和擴大民主範圍的知識份子，本屬今日社會的進步左派，壓制並打擊知識份子進步要求的當權者，本屬今日社會的保守

右派。現在卻一下顛倒過來：左派變成了「右派」，右派變成了「左派」，而且被貼上子虛烏有的階級標籤，變成了勢不兩立的「資產階級右派」和「無產階級左派」。

所謂的「反右」運動，就是這樣一場左右顛倒的整人慘劇。

這種顛倒，此後長期沿襲，直到「文革」以及「改革」之今日。

在官方：

「大躍進」明明形式極左，內容特右，本屬形左實右，可是至今仍稱為「極左」。

「文革」初期，明明劉少奇形右實右，毛澤東卻稱劉「形左實右」。

林彪倒臺後，明明周恩來代表左，毛澤東從形式到內容都代表右，周反批毛派之「極左」，毛反批周派之「極右」。

周逝世後，明明鄧小平繼續代表左，毛澤東仍然代表右，鄧仍批毛派之「極左」，毛仍批鄧派之「極右」。

毛澤東逝世後，明明鄧小平代表左，「四人幫」代表右，卻一直稱「四人幫」為「極左」。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明明鄧小平代表左，華國鋒代表右，卻反稱華「兩個凡是」論為「極左」，並用以指稱囿于毛體制的僵化保守思想。

十年「改革」分明是左，「六四」鎮壓分明是右，然而高層保守勢力卻說十年「改革」是「極右」，「六四」鎮壓是「極左」。

在民間：

「文革」初期，明明「前造反派」屬左，「前保守派」屬右，但挨整的前者反被定為「右派」，整人的後者反被稱為「左派」。

1976年「四五」運動，明明參預悼周擁鄧批毛者為左，反對者為右，但前者反被定為「反革命右派」，後者反被稱作「革命左派」。

1976年「批鄧」，明明廣大抵制者屬左，少數造反者演變為右，但前者反被視為「右傾」，後者反被當作「左派」。

1979年「改革開放」，明明積極擁護者屬左，消極抵觸者為右，後者卻被視為「極左思潮」。

80年代初，人道主義的文化和藝術思潮興起，明明力主者屬左，反對者屬右，前者在當時卻被視為「極右思潮」，後者至今仍被看作「極

左傾向」。

1989年「六四」鎮壓後，分明為之大唱讚歌的何新之流知識界敗類屬右派，對之堅決抵制的知識界人士屬左派，前者反被稱為「新左派」，後者反被斥為「極右勢力」。

在官民之間：

1976年「四五」運動，明明民間為左，官方為右，前者反被定為「右派」，後者反被封為「左派」。

1976年粉碎「四人幫」，明明官方屬左，少數造反派屬右，但後者反被判為「極左」。

1982年「清除精神污染」和1987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明明民間行為屬左，官方行為屬右，但前者反被視為「極右思潮」。

1989年民主運動，明明民間為左，官方為右，但前者反被視為「極右派」。

左右概念明明白白之所指，讓毛澤東1957年來了個大顛倒，並在官方話語甚至公眾話語裏沿用至今，將人們對歷史事件的正常判斷完全攪亂。政治和文化領域1957年以來的歷史，變成了一個顛倒洞，在裏面，因左右顛倒而真偽混淆，讓人頭暈目眩難以辨別。即使態度激進的政治家和思想者，要想奪路前行，也只能憑著實用理性的機變本能，讓顛倒的概念所指服務於自己的是非判斷。

例如：官方話語和公共話語至今頻頻使用的「極左」一詞，原指1967年王力等鼓勵「揪軍內一小撮」的極端傾向和首都「五一六兵團」、湖南「省無聯」將矛頭指向周恩來的極端行為。這本是1957年以來左右概念濫用中唯一正確之處。但經周恩來、鄧小平1972-1975年用來泛指「文革」傾向，其含義便完全改變——成了毛澤東形左實右路線的代名詞。毛路線明明是形式極左而內容特右，但一經官方話語確定為「極左」，人們也只好接受。好在它的貶義所指是否定性物件，於是從官方到學界，人們便根據自己的需要，樂此不疲地將「極左」的瓜皮帽一次次地拋給那些妨礙自己前進腳步的極右勢力。

還有官方既反極左又反極右的「兩個基本點」也是這樣：借用「極左」代指上層固守毛路線的守舊勢力，借用「極右」代指下層追求更多民

主與自由權利的革新力量。儘管前者實際是右，後者實際是左，如此借代純屬左右顛倒。但二者都屬否定性物件，概念的顛倒並不妨礙大局。

將國內思想界那些頑固的馬克思主義信徒稱為「左派」並與國際接軌，也屬此類混淆。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歷來稱為「左派」，因為他們繼承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傳統，站在體制外的反對派立場，堅持揭露和批判現代資本主義體制的種種弊端，試圖推動社會的變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卻相反：他們信仰並捍衛同樣的主義，只不過是為了證明極權體制的合理性和極權統治的合法性，其作用無疑是阻礙體制的進步性改革和社會的根本性變革。他們明顯屬於中國思想界典型的「右派」。現在僅僅因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西方稱為「左派」，他們也就順理接軌——同樣被稱為「左派」。這不是中國思想界眼睜睜的左右顛倒嗎？

所以，左右概念的顛倒得以延續至今，還和中國知識界的邏輯判斷力長期弱化有關。

「整風」、「反右」、「文革」三個運動中民間傾向的相互關係及歷史定位，長期無人涉及，也有這個原因。

徐友漁認為：「就總體思想傾向而言，這一代人是向右轉了，因為文革暴露了他們以前憧憬的關於『革命事業』、『革命鬥爭』、『社會主義』的種種問題。」他舉了兩個與此有關的例子：其一，幾個曾在英國牛津大學學習的中國學者，發現自己的思想傾向與英國知識份子正相對立。英國教師多持激進的自由主義態度，對保守黨的政策加以批判，中國留學生則多支持保守黨而不喜歡工黨，他們以過來人的眼光訕笑工黨的社會主義政策。其二，有一個多次參加國際政治學會議的中國學者，在與西方同行的交往中有一種明顯錯位的感覺：來自西方的學者表現出批判資本主義、理解和同情社會主義的傾向，而來自中國的學者則相反。驚奇之餘這個學者發現原因也很簡單：中國人是經歷了「文革」並發現社會主義已經失敗的前紅衛兵，西方人是經歷了1968年校園造反，對資本主義弊病仍耿耿於懷的前造反者。這一代中國人對大陸的政治體制和一般方針持懷疑或批評態度。 113

這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究竟是向右轉還是向左轉？我認為是向左轉。區分左與右的標準應該是一個人在自己國家所持的現實立場和政治

態度，而非他信奉的思想理念被人為貼上的傾向性標籤。同樣的理論體系，既可為這個國家保守守舊的統治集團服務，又可替那個國家激進革新的被統治階層效勞。當它成為統治者維護現實秩序的思想武器，原有的尖銳性也會變為掩護保守守舊姿態的盾牌和反對激進革新步伐的長矛；當它成為被統治者改造現實狀況的思想旗幟，原有的溫和性也會變為反對保守守舊姿態的長矛和掩護激進革新步伐的盾牌。某種理論體系是左還是右，並沒有世界各國通用的標準，關鍵看它在某個國家是屬於主張守成的主流觀念，還是屬於主張變革的非主流思想。至少在現代社會，知識份子階層是各種人群中最激進的一翼。其激進體現為希望以文化觀念和政治制度的革新或完善來不斷推動社會的進步。它總是以懷疑的態度和批判的姿勢站在統治秩序的對立面，絕不成為統治權力的御用者和應聲蟲。這在西方國家幾乎是通例。中國知識階層主體部分這一特質的獲得，自然歸因於「文革」和造反運動帶來的最終覺悟及其對馬克思主義和極權制度的疏離。他們轉而信奉對於中國現狀來說更為進步的西方自由理念和民主制度，純屬理所當然。思想觀念的這一轉變，不僅沒有改變他們的激進革新姿態，反而使這種姿態更加凸顯。怎麼說是向右轉呢？

中國學者到了西方國家為何會反對主張平等的「社會主義」？因為這種理念不僅在中國曾經造成深重的災難，而且至今還在扮演著統治集團堅持一黨專政和阻礙社會變革的思想守護神。疏離或者反對它，正是中國知識份子面對國家現實應有的激進革新的左派立場。他們並沒有向右轉。為何西方學者會傾向主張平等反對異化的「社會主義」？因為在全面自由和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個人無能改變的實際不平等和人性異化以及後現代社會帶來的主體碎裂化和精神平面化，仍然是知識階層面對的嚴峻現實，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文化地位及其鮮明的社會批判精神和社會改造指向，自然使它成為激進知識份子的思想武器。立足本國現實，雙方都屬於傾向激進革新的左派，基本立場並沒有錯位。

不妨設想一種可能的情景：西方式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多元主義的文化觀念和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終於在中國全面確立並獲得鞏固。現有的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平等未得到有效遏制，日趨瘋狂的金錢崇拜、人際欺詐、感官迷醉愈演愈烈，進一步加劇人性異化、道德淪喪、主體

碎裂、精神平面的傾斜幅度。那時，激進的知識份子階層還會繼續無條件追隨早已佔據統治地位的自由理念和民主制度嗎？這種可能性很小。知識者特有的理性本能和人性良知必將使他們同樣用懷疑的目光打量這個新的統治秩序，並對其中暴露的社會弊病發出批判的聲音和改造的呼籲。如果那時，馬克思主義已被改造為追求社會平等和人性完整的非主流文化，它完全可能重新成為部分激進知識份子進行社會批判的思想武器。至少對於那時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這不是沒有可能的事。並非這個主義有多大的魅力，而是迄今為止人類可利用的思想資源實在太少。於是產生一個問題：那些重新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是否屬於再次向左轉？當然不是。從現在到未來，他們改換的只是堅持激進革新傾向的思想武器，而非激進革新傾向本身。他們仍然和現在這一代知識份子一樣屬於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左翼，並沒有改變前傾的姿勢。

把信奉馬克思主義作為認定世界各國左派的標誌，本身就包含著一個隨歷史演變而來的認知誤會。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前，世界各主要國家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激進知識份子和激進工人運動都處於在野地位，他們互相呼應並結成國際統一戰線反對資本主義秩序的統治，統稱為左派還能成立。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的左翼運動雖已奪得政權，但它正與西方民主國家結為抗擊法西斯極右勢力的左翼聯盟，而東方更多國家在野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也正投身抗擊法西斯的戰鬥並伺機奪取政權，此時統稱他們為左派，也還勉強說得過去。西方近代以來的民主制度並非一產生就美妙無比。至少在20世紀以前的數百年中，它的形象未必不醜惡。對內巧取豪奪，對外恃強凌弱，甚至用武力作後盾以國家的名義瘋狂販賣黑奴和鴉片……那時這個世界上的重大罪惡幾乎都是它製造的。想一想中國十九世紀被它用大炮寫下的那一冊血跡斑斑的恥辱史吧，看一看西方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作家對它的揭露和抨擊吧。當時以激進革新的姿態反對它，未必不是正義和進步。然而當「社會主義陣營」已經形成，冷戰時代已經開始，特別是蘇聯動用武力鎮壓了1956年匈牙利民主運動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運動後，西方在野的左翼運動仍然將已經演變成專制、暴力、殺戮、反人道同義詞的極權主義政權視為盟友，就大錯特錯了。這是一種「劇場幻象」。西歐

1968年的學生造反運動就曾深深迷幻於其中。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和哲學家讓·薩特因為一度迷幻於其中而犯下終生難以辯解的錯誤。但幻象終會破滅。事實上他們隨後也與這些政權主動拉開了距離。只是過去的話語習慣繼續保持，致使不少西方知識份子囿于其中而在劃分左與右的問題上失去正常的判斷。想不到這種話語習慣通過與國際接軌也影響了不少中國知識份子。看來，克服這個迷誤的最佳途徑，還是回到左與右這對地理方位名詞引申為政治方位名詞時的本義。這個本義其實就是常識。

楊小凱看出左與右的劃分隱含著價值判斷。為了替造反派正名，他認為1966年8月至1968年掀起的工人造反運動、學生造反運動、市民造反運動，與1969後毛澤東所推行極左的經濟和文化政策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民眾造反運動的「實質是極右的」，還舉例說明：「大部分右派分子文革時都是造反派也顯示了造反派運動在反迫害這一點上的極右實質。」¹¹⁴

楊先生為造反派伸張正義不僅充滿激情而且力排眾議，有時甚至失之偏頗，看得出是個主觀性很強的人。沒想到在區分左與右的時候也會陷入西方話語習慣的迷陣。其實，除了1976年不自覺站到歷史進步對立面的少數人，三年造反運動和造反派的實質是左而非「極右」。只要把實際上傾向造反和同情造反派的「右派」還原其左派的身份，造反派的實質是左還是右也就更加清楚了。常識性的判斷被攪得這麼複雜！真不知道楊先生和其他中國知識份子自稱為保守守舊的「右派」時，心頭是否感到驚扭。至少在我眼裏，他們都是激進革新的左派。

「文革」中，官方和民間在「革新」與「守舊」的認知上都發生過巨大的錯位。「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運動時，毛澤東一派自詡「革新派」並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比喻為「守舊派」，就是官方錯位的話語表現。造反派不僅認同這種劃分，而且積極追隨毛氏中央並與劉、周、鄧對立，是民間錯位的行動證明。從所謂「革新派」推行的政治一人專制、思想一家獨斷、經濟一律平均政策來看，他們所「革」者，實為近代以來倡行的人性、人道、人權原則以及極權制度下廣大民眾在這方面的最小要求。從所謂「守舊派」推行的溫和政治、混合文

化、緩和經濟政策來看，他們所「守」者，實為這些原則在極權制度下的少量碎屑以及廣大民眾在這方面的最低權利。脫去兩派打有虛假傾向的印記的外衣，並與近代以來從西方破圍而出的歷史潮流接軌，所謂的「革新派」原來是極力阻止體制內民主改革的守舊派，所謂的「守舊派」原來是多少傾向體制內民主改革的革新派。造反派以激進的姿態去追隨真正的守舊派而反對真正的革新派，錯位之明顯令人啼笑皆非。好在1966-1969年他們為了反對等級歧視和政治迫害而歪打正著地衝擊了極權制度的官僚系統。好在1969-1974年他們只是為了再次翻案平反而艱難忙碌。好在1976年除了少數人他們大多早就背離頑固守舊的毛氏一派而站到了更為革新的劉、周、鄧一邊。這一站，使他們擺脫了因毛澤東錯誤導向而發生的錯位，激進的傾向終於獲得了正確的方位。儘管在與高層兩派之間的關係上發生過如此錯位，但是造反派作為民間左派的身份仍然十分確定。

從左與右這對概念的本義來看，「整風」、「反右」中的知識份子提意見和「文革」中的民眾造反的性質一目了然：他們都屬於極權體制內這三個時期民間左派力圖改變政治現狀的激進行為。

第五節 造反一代的雙重有效資源

「文革」如同一座廢棄的歷史礦井，官方嚴禁人們進入井下開採任何資源。可是所有想從正面評論這個歷史事件的人，還是試圖進入井下挖掘所看重的可利用資源。由於各自涉足的方向和層面不同，找到的資源也就充滿差異。

其中最明顯也最確定的要數海外極左派和國內極右派，他們幾乎完全沿著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指引的方向在當時的官方話語層面進行挖掘。找到的資源除了可供現實批判使用的「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七、八年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之外，便是旨在消滅三大差別的「鞍鋼憲法」、「五七道路」、「教育改革」、「醫療改革」、「文藝改革」、「限制資產階級階級法權」之類。據說這是毛澤東所獨創截然不同于現代西方話語的純粹中國話語，可以重建中國人理論上的民族自信心。

這種試圖從當時官方話語層面挖掘可利用資源的行為，比之那些在「文革」問題上不分官方民間一概否定的非學理性言論，雖然要算一種努力，但因找錯了挖掘方向，仍然難免徒勞與荒謬。其實，「文革」中的可利用資源，並不存在於官方話語中——無論毛澤東「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繼續革命」理論，還是官辦紅衛兵「破四舊、立四新」的反理性宣言，而是存在於民間——造反派利用官方權力之爭提供的現實機會所實踐的政治原則和自身所體現的人文形象。

它們在這個礦井中同屬一個方向，又分存於兩個層面。

第一種資源比較明顯，包含於造反派運動所掘進的政治層面，由於雜質太多和純度不夠，往往被尋礦者所棄置。它其實是「文革」中唯一政治性的精神遺產和有效資源，我稱之為民主性原則。具體包括：內容上的反等級歧視、反政治迫害、反官僚壓迫，形式上的結社、集會、遊行、靜坐、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大串連。這個包括了特定內容和特定形式的民主性原則，曾經貫穿於「延安整風」和「反右」運動的民間層面，只是到了「文革」——在造反派身上才達到了組織化和群眾化。在極權體制下，它註定了只能曲折而又變態地表現，但其內核仍然凝聚著知識份子、廣大青年和下層民眾的合理政治願望與進步政治要求。

回顧1989「六四」運動，人們不難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和外省其他廣場上看見造反派的影子。這裏說的「影子」自然不是指昔日的造反派，而是他們曾經以變態的方式實踐過的民主性原則。這個原則所包含的內容與形式，不是在全國所有的城市 and 廣場再現了嗎？只是比之昔日造反者的完全愚昧，此時的造反者比較自覺了。

徐友漁更看到「文革」後中國幾乎所有民主運動與造反派運動在形式上的聯繫：1978-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的大字報，雨後春筍般的民間刊物和傳單，赴北京上訪人員和民間藝術家的遊行；1981年高校競選活動中的大辯論，高校學生自辦刊物和學校之間與城市之間的串連；1987年和1989年的示威遊行，校園中的各種自發組織，全國各地學生赴京支援天安門堅持鬥爭的北京學生……都使人聯想到「文革」中紅衛兵的活動。當然，目標和內容完全不同了。然而，如果不是借鑒「文革」，青年學生不會那麼自然地和不假思索地一下子就採取適合於鬥爭的形式。 115

在中國，只要極權體制還存在，這些抗議形式就仍然有效；只要還有等級歧視、政治迫害和官僚壓迫，這些抗爭內容就仍然成立。

總結造反派運動經驗並參照西方國家民主制衡機制，在當下中國，似乎擁有話語優勢的知識階層更看重言論自由，而擁有數量優勢的普通民眾更看重結社自由。這也是自由派知識份子與平等派知識份子之間的一個分歧點。其實對於中國面臨的政治變革，兩種自由都同樣重要。只不過，胡平所強調的言論自由不再是造反派那種被恩賜受限制無理智的發洩行為，楊小凱所強調的結社自由也不再是造反派那種被批准受控制無目標的散裝組織。它們都具有現代特徵，而且知識階層更看重的言論自由要以普通民眾的結社自由為推動才有廣泛性，普通民眾更看重的結社自由要以知識階層的言論自由為引導才有方向性。

第二種資源是第一種資源的共生礦，包含於造反派一代異常顯著而又難以定義的人文層面，我暫且稱之為獻身型氣質。本來可將中心語稱為「精神」，由於人們已習慣把「精神」等同於理性及其各種外化形式，所以只好改稱「氣質」。中國道家文化認為人有三寶——精、氣、神。所謂「氣」，就是人之生命中高於本能欲望和低於自明理念同時又融合著二者的內部狀態。氣質——作為一種整合性的心理/行為傾向，不僅凸顯著個人之間的差異，而且標示著世代之間的區別。

20世紀80年代以來，那些瀰漫於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並偶爾乍響的革命歌曲，曾讓我迷惑不解。流行歌曲的歌詞，一般與人的生活 and 情感比較貼近，真實自然而不乏詩意，但它委婉纏綿的曲調總是令人昏昏欲睡。革命歌曲的歌詞百分之百遠離人間煙火，虛假、空洞甚至鄙俗，但它高亢激昂的旋律卻能使人感到振奮。因為這種不同的感受，我曾懷疑自己的音樂鑒賞力，硬以為連真實與虛假都不能分辨了。只是後來才意識到，當時的自我質疑其實只是針對文學性歌詞，而完全忽視了作為其本體的音樂性曲調。是的，使我產生不同感受的純粹是兩種歌曲的不同曲調，而非兩種曲調所運載的文字內容。曲調正是歌曲的氣質，它可以不需要歌詞的附著而獨立存在，也可以運載真實或虛假的歌詞。30年代的「紅軍歌曲」和70年代的「知青歌曲」，大多借曲填詞而能渾然一體，也表明曲調的獨立性質。為何附著了虛假

文字的革命歌曲至今仍然使人感到振奮？因為它表現了那個時代人們昂揚向上的陽剛之氣。為何附著了真實文字的流行歌曲反而使人感到低迷？因為環繞於狹隘個人情懷的歡樂與痛苦、發現與彷徨、獲得與失落、嚎叫與歎息所包含的陰柔之氣，必定有這樣的效應。「文革」中的偽藝術都表現了那個時代昂揚向上而又虛假誇張的特徵，為何時至今日只有音樂仍有魅力？因為其他的藝術形式主要承載虛假誇張的時代內容，惟有音樂可以純粹表現昂揚向上的時代氣質。雖然那時的美術作品現今也曾賣出天價，但其價位並非來自十分低劣的藝術價值，而是來自商業性考量中像工藝收藏品一樣不可重複的唯一性質。曲調既是音樂家個人氣質的體現，又表現著一個時代的氣質。眼下與從前兩種曲調的不同氣質，可以作為兩個時代不同氣質的音樂見證。

造反一代人身上的獻身型氣質正是這種含義：它雖然一度被異化觀念和虛假追求所附著並錯誤導向，但仍然獨立而特異。它存在於這代人身上，體現於他們過去和現在的整體性行為。如果說它過去曾被附著了太多荒謬的內容，那麼它現在照樣可以被主體觀念和真實追求所附著並正確導向。歌詞改換了，曲調還是一樣。這種氣質的內涵包括兩大構層。其一是那個時代生活著的幾代人共有的，比如對理想的憧憬、對精神的倚重、對英雄的崇拜、對道德的敬畏、對集體的皈依、對政治的熱情。其二是這代人在苦難和覺悟過程中特有的，比如敢於懷疑、勇於反叛、勤於探索、善於發現。兩方面整合狀態中的突出特徵，是他們可以超越狹隘個人利益的獻身姿態。投身於時代性錯誤的紅衛兵運動和上山下鄉運動是這樣，投身於憤怒性反抗的「四五」運動也是這樣，投身於80年代覺悟性的啟蒙運動還是這樣。後來的他們無論擠身哪個行業，都同樣有一種放射性的熱烈。在這個以利己主義為核心的商業化時代，他們的腳步難免時時踩空。與其說這是他們的原生錯誤，不如說是時代的再次錯誤。然而只要踏中與其氣質大體對稱的位置，達則兼善天下——仍然是他們不變的初衷。這種獻身型氣質，正是新生代人所缺少和這個時代所缺乏的。俗話說榜樣的力量無窮。實際生活中不乏一首歌曲、一部電影、一本小說影響一個人或一代人成長的說法。如果在歷史研究和藝術表現上，我們能對這代人多一些理解和寬容，不去過多譴責他們理

應否定的失誤，而是更多留意他們值得肯定的氣質，真實而立體地展現他們從盲目和狂熱到苦難與覺悟的特異形象，年輕的世代定會從中受益。現實的狀況卻是：在官方話語和文人們的歷史結論與文學作品中，他們的形象不是「衝鋒隊」就是「還鄉團」，他們的氣質也被歸結為愚昧的瘋狂。他們因此不願提及塑造了自己一生的那段經歷，同時不得不收斂與現實多有碰撞的氣質鋒芒，即使面對孩子的再三追問和反復打量也是竭力掩飾。眼下，他們身上的人文特徵正隨同日益枯黃的年齡紛紛退休。在這個奉行人只為自己活著而使利己主義氾濫成災的時代，無情埋葬他們身上有用的人文資源，究竟是文人們的功勞還是罪過？

這些年，國內文化界對昔日紅衛兵和上山下鄉知青懷舊活動的非議不絕於耳。僅從理性角度審視這種對荒唐歲月的過分留戀和緬懷，非議之辭似乎都能成立。然而，所有非議仿佛都忽視了人的感性存在及其心理世界，給人留下某種不真實的感覺。近代以來的自由民主理念，雖然在個人向統治者主張主體權利方面具有普適性光芒，但它並不能照徹個人生活和社會領域的一切方面。比如個人對於社會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政府對於條件和機會並不均等的個人之間在財富分配上的統籌與協調，以及純利害性的經濟領域、心理領域和超利害性的宗教領域、道德領域、哲學領域、科學領域、藝術領域，都處在它的照射範圍之外。試圖用這個理念來照亮一切，難免會捉襟見肘。

前不久，從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聽了某教授關於如果調整心態的演講。他說自己從不為已經發生之事和尚未發生之事犯愁，只關心現在正發生之事。乍聽之時頗覺在理，曾向小女轉述。過後細想，才覺實為似是而非之言。且不論所說之法他自己能否真正做到，只從過去、現在、未來三種時態的關係來看，他就沒有搞懂「現在」這個概念在時間鏈條中的真實含義。時間是流動的，每個人在涉及任何事情時的「現在」之感，轉眼就會成為過去。當我在筆下或口頭向別人敘說自以為的現時之事，就在敘說之際現時已經流逝。「現在」之謂的時間跨度，最短可以只有一秒，即使跨度較長也會轉瞬即逝。所謂「現在」，其實只是過去與未來之間快速轉換的瞬間感覺和環節現象，就算人所面臨正在解決之事需要以一天、一月、一年作為「現在」之謂的時間單位，它也

不僅包含著許多已經流逝為過去的時間，而且很快會成為一個跨度較長的過去。人的一生其實生活在對過去的記憶和對未來的期待中。現在永遠只是鬆軟的立足點，未來永遠只是空曠的可能性，而過去則是人生的經歷、體驗、思考的積澱——它不僅是人生的歷史背景，而且構成生命的厚度與質量。人對一生中的經歷，往往付出得越多的時期和物件越不願輕易忘記。這是人的自我肯定心理使然，毫不奇怪。因為遺忘同時意味著否定，人生的這段歷史就將成為空白——失去歷史的個人和失去歷史的民族一樣可悲。

「文革」一代中的多數普通人，對於那一段曾經為之獻出人生最寶貴的青春、激情、理想、信念的特殊歲月之所以難以忘懷，只是因為它包含著太多由青春時代鮮活的人物、事件、場景構成的往事，只是因為這些往事留下的生命體驗刻骨銘心一直伴隨著自己。這是他們過去真實的存在。剔除其中被時代錯誤和個人盲從加入的荒唐成分，那些在現實的映襯下更顯得可貴的精神、品德、情操、胸襟、友誼、愛情……難道不值得懷念？生命的本質不是生理層面的新陳代謝，而是意識層面對於生活世界的感受和理解。一個人的生命內涵豐厚與否，不是取決於學歷的高低、知識的多寡、生活條件的優劣，而是取決於體驗的多少與深淺。這一代人高於其後幾代之處，就是他們在那特殊的年代對於人生異常複雜的體驗。不能認為其中儘是荒唐。

我不否認發起這類懷舊聚會的人中，確有個別商界成功人士是在炫耀式作秀，但更多的召集人和贊助者完全出於真誠之心。形成鮮明對比的反倒是某些文化界成功人士：他們往往以鄙視的態度疏遠這類活動。

2004年，我原來所在農場的知識青年舉行建場四十周年紀念活動，贊助者是一百六十多人中唯一的商界成功人士X。他個人出資數萬元讓相隔千里的成都和西昌兩地知青歡聚了兩天，卻始終以低調的姿態和靦腆的表情面對大家。最不近人情的是成都知青中兩個已成為知名書法家和畫家的人物：當X委託召集人邀請他們免費參與這次聚會活動，二人竟然異口同聲地回答對那段歷史不感興趣。一百多個老知青相聚時從召集人口中得知這個回答，個個瞠目結舌，只道是這兩位成功人士不屑與眾人為伍。

無論個人還是民族，過去的經歷都與現在的狀況緊密相連，想割也割不斷。某些人今日的成功，難道離得開那一段苦難經歷的鋪墊？況且，人生既不能生活在記憶的空白裏，也不會停留在黑色的記憶中。這一代人通過緬懷過去所喚醒或加強的記憶中的存在，絕不會是那些理應否定的思想蒙昧、行為瘋狂、青春耗費、人際傾軋……而是在與當下非理想、非精神、非道德、非價值現象的對比中，自己的生命更加顯示出的某種歷史重量。儘管這種對比和感受往往是無意識的。這類活動的理性評價與感性意義，從來就是兩碼事。一個民族最可怕的並非物質的貧窮，而是精神的墮落。從1992年正式進入後極權時代以來，我們這個民族在人文層面所面臨的最大危機，不就是喪失了應有的理想性、精神性、道德性、價值性？這種人性的災難性損失，只用每個家庭都坐上小轎車的經濟繁榮來彌補，一定得不償失。「文革」一代人過瀝了荒唐成分的理想性、精神性、道德性、價值性，可以成為對現實的某種人文感召。我們不應該在否定了造反運動的直接正義性和間接進步性之後，還要對這代人中大多數普通人緬懷青春歲月特殊經歷的行為橫加譴責。這等於是在徹底埋葬不同世代之間可在縱向傳承的一份極為寶貴的人文資源。

為何一些當過知青的文化界成功人士，會對往日所屬群體的聚會不屑一顧？除了認知層面的差異，主要還是因為他們已經找到了新的群體歸屬和價值認同。只是他們忘了非文化界的成功人士和更多的不成功者，也需要某種心理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這類聚會活動的贊助者，大多是以現實證明的方式向過去所屬群體尋求價值認同。他們在過去的群體中並非都是優秀者，有的人甚至還很窩囊。今日的商业成功並不足以自我撫平往日被眾人小視留下的自卑。回到過去的群體中慷慨解囊，自然包含著向眾人證明自己的價值——尋求價值認同的動機。這很正常。而大多數非成功者之所以樂於參與，卻是基於某種背向現實的群體歸屬需要。今日現實以利己主義為核心的人際特點，正在證明著存在主義哲學著名命題的有效性：人心即孤島。昔日知青中絕大多數非成功者的人際境況也難免如此。回到過去群體中聚一聚，重新建立某種聯繫，獲得哪怕暫時的群體歸屬感，對於他們的生活狀態和心理需要，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儘管這類聚會中難免發生的隱隱對比，會使一些境況較差的人

感到某種失落，然而這並非主流。你有了自己新的群體歸屬和價值認同，盡可不再回到這個圈子，但非文化界的大多數人也有自己的認同需要和歸屬需要，理應多一些理解和寬容。

1992年以來，隨著與商業主義同步的消費主義和娛樂主義的廣泛漫延，在社會心理的軟化部位出現了一股思潮。它在普通百姓、廣大青年、甚至知識份子心中緩緩流動，只要遇到「政治人物」、「革命事件」一類堅硬的石快，就會濺起反感的浪花。細心聆聽它涓涓流響的聲音，「非政治化」和「非革命化」是它的主調。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甚至魯迅的人品形象，都被那飛濺的浪花特有的色彩塗抹成丑類；從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到太平天國起義、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紅衛兵運動，都被那飛濺的浪花特有的線條勾畫為暴亂。

在這股思潮的公共話語層面——中國思想界的主流河道上，同時也泛起一隻掛著溫和主義白帆的言說之舟。這些言說像一部合唱，最先由李澤厚和劉再復領唱，然後王元化、朱學勤相繼應和……最後就連頗有詩性哲思的朱大可也側身加入。其內容近似一部三重奏：告別革命運動，批判流氓文化，提倡和平漸變。

與過去那種「泛政治化」和「泛革命化」的民族心理相比，這自然是個巨大的進步；但也確實暴露出某種令人擔憂的後極權主義時代的苟安心態。

面對這片甚囂塵上的聲浪，雖然有不少人站出來捍衛「五四」新文化運動，但是只有林賢治一人在〈五四之魂〉一文中還為「革命」進行了正義的辯護。¹¹⁶

聆聽這部三重奏，最高亢的聲音要數「告別革命」。只是當這些告別者轉身離去時，並沒有注意到在其身後被告別的「革命」因為未被真正理解而流露出的複雜表情。

革命是社會歷時進程中最耀眼的現象。它首先呈現為舊社會制度的轟然倒塌和新社會制度的毅然建立，詳情激憤、分崩離析、萬象更新，是這個現象中的三個分層或分段的主要畫面。我們還可以用社會突變、社會質變、社會變遷、社會變革來形容它。世界上儘管有多種多樣的革命，但無不由五個要件構成：一是舊觀念形態和舊社會制度已經喪失整

合各方面力量和協調各階層利益的機能；二是整個統治集團已因自身衰變而失去自我振奮與自我調適的活力，權力中心代表民意的改革派別或強力人物已站到體制之外；三是社會各階層已將由平等心理和利益追求打造成不滿之矛共同指向整個統治集團；四是萬眾奮起或暴力衝擊或和平施壓推動整個變化進程；五是在舊的廢墟上能夠引導共同方向、整合共同力量、協調共同利益的新觀念形態和新社會制度同時建立。

將目光從其耀眼之處撤回，革命這個概念在學理上的含義實指社會制度的整體性轉變。它同時又分指兩個方面：一是轉變的性質——指整體、全面、徹底的斷裂性轉變，又引申為「革命性」；二是轉變的方式——指劇烈、激進、急速的暴力式轉變，又引申為「革命式」。二者有時可能在社會制度的整體性轉變事件中並存，有是又可能分離。革命的本義是社會制度轉變的性質而非方式，並不完全等於自由派知識份子所拒絕的暴力。從這些人對法國革命的貶斥和對英國革命的褒揚來看，他們其實是把革命完全混同於暴力方式了。

革命所指稱的社會制度整體性轉變是否可採取溫和方式呢？僅以他們所稱道的英國革命為例也完全可能。至少對於已有前車可鑒的現代社會，暴力方式未必是革命的必然伴生物。1988-1992年，旨在結束紅色極權主義統治的「蘇東巨變」並沒有採取暴力方式。2003-2005年，中亞地區從格魯吉亞到吉爾吉斯斯坦幾個國家徹底掃除紅色極權主義馬廐的「顏色革命」，採取的也是非暴力方式。把當下中國所面臨的革命完全歸結為可怕的暴力方式而堅決拒絕，無疑是因噎廢食式的偏見。面對世界上紅色極權主義統治的最後堡壘，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革命式」轉變是否必需，而在於「革命性」轉變是否必要。告別論者恰好回避了這個高懸的問號。

留意李澤厚和劉再復1995年「告別革命」男聲二重唱的舞臺背景，會發現他們一吟三歎的歌唱還另有所指。背景的深處是什麼？是對「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反思。「告別革命」正是他們從所謂的歷史教訓中得出的響亮結論。如果所要告別的僅僅是暴力，那麼當時使用暴力的並非廣大學生和市民而是統治集團，然而統治者的暴力顯然不是他們所要告別的對象——因為想告別也告別不了。既然在中共專政以來規

模最大的革命性請願運動中民眾並沒有訴諸於暴力，他們在對官方的暴力行為毫無指控的同時面向公眾發出的諄諄勸告，究竟想要阻止什麼？劉再復挑明了：「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¹¹⁷ 這就是他們在「六四」大屠殺之後的反思結論！在國際國內一片尚未平息的正義譴責聲中，他們不去奉勸「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放棄用暴力鎮壓民眾，反而奉勸民眾不要以暴力「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真是匪夷所思！只要注意到被作為暴力前置詞的「群眾」二字，就不難明白他們所要告別的還包括群眾運動。是的，「八九民運」是官方暴力的受害者，其首要特徵並非暴力行為而是群眾運動。這便是二位超然度外的智者在暴力之外還要否棄的第二個革命要件。那麼，他們心中既非群眾又非暴力更非急劇和激烈的革命模式究竟是什麼呢？就是在他們這類「精英人士」的善意推動下統治集團自動而逐漸的和平演變。寫到這裏，我心頭禁不住冒出一句話：這就是某些中國文人的德性！真不明白，像「八九民運」這樣的群眾運動怎麼會受到如此反思。不就是知識精英們始終進入不了廣場話語中心最後還深受其累流亡海外嗎？的確，只要擯棄群眾運動而採用精英們的溫和模式，一切才會倒過來：精英們佔據話語中心行使話語權利共用話語中和話語外的演變成果。

這當然是一相情願的非非之想。當暴力已成為極權統治的制度化根性，中國所面臨的社會制度轉型是否能夠完全避免以暴易暴，歷史自有公論。只就群眾運動而言，這些文化人的美好願望恐怕也會落空。看一看屬於同類項和同時代的「蘇東巨變」和「顏色革命」吧：哪個國家的這次制度轉型沒有和平方式的群眾運動造勢？群眾性的請願、抗議、甚至衝擊，都是民意的集體表達和集體施壓。沒有群眾運動對民間弱小而分散力量的聚集和顯示，極權統治強大而集中的指揮機器和暴力組織絕不可能自行崩潰。

「告別革命」的演唱不可謂不熱鬧。聽起來歌吟中不乏憂國憂民並擔心天下大亂而使專制再生和人民遭殃的深深思慮，然而其中更滲透著1989後受挫心理和1992後苟安心態的纏綿旋律。的確，我還聽到了某些人從後極權時代鬆軟的天鵝絨被窩裏發出一聲聲曖昧的呻吟。這種

令人舒服得不想改變也不願挪動的感覺，1992年代以後也蔓延到了多數知識份子身上。面對可能發生的變化，他們心頭只有一個意念：慢慢來吧，溫和些吧，穩當點吧。

中國現行的極權體制，真能通過統治者逐步的制度創新和程式安排而自行過渡到民主社會嗎？對此，不僅很多人深感懷疑，就連一貫穩重的徐友漁也認為可能性不大。¹¹⁸

撇開那些糾纏了我們近百年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之類虛假言詞，現代民主制度至少可歸納出七項內容——

權力法律化：政治權力不再是天授、神賜或者自稱代表哪個階級行使，而是由代表全體公民權力與利益的憲法規定和賦予。任何個人、團體、政黨、政府都沒有大於憲法的權力。

政黨多元化：多黨並立，競爭上崗，輪流執政，互相督促，形成交替抗衡機制。

軍隊國家化：軍隊和其他武裝力量統歸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管轄。政黨不得掌握軍隊或插手軍隊內務。

選舉直接化：民意代表由公民從競選人中直接選舉產生，民意常設機構由民意代表直接選舉產生，國家首腦由全體公民直接選舉產生。

政府責任化：政府成員對政府首腦負責並受民意常設機構監督，政府首腦對國家首腦負責並受民意常設機構監督，國家首腦對全體公民負責並受民意常設機構監督。民意常設機構有權彈劾和罷免國家首腦。

職能分散化：立法、司法、行政、監督四權分立，各自獨立行使職權，互相制約。

參與廣泛化：公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結社、組黨、參選、罷工、集會、遊行、抗議的自由，有權自由表達和實踐個人的政治意願，並參與對權力責任人和民意代表的監督、評議、舉報、控告。

這七項政治現代性的具體標高，中國至今一項也沒有達標。

雖然也有憲法，但只是一紙空文。雖然憲法也規定了公民的自由權利，但公民只要行使這些權力，就會犯下「危害國家安全」的大罪。雖

然也實行民意代表選舉，但選舉必須按官方意願進行，而且民意代表只有舉手通過一黨決定的權力。雖然也是四權分立，但必須服從一黨的最高領導。在這裏，政治現代性純粹流於形式——一切都名不符實。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完全限於經濟層面的現代性指向，沒有一個涉及政治層面。為什麼西方國家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我們明知是指「政治權」，卻偏要故意偷換概念——用「生存權」去搪塞？因為底氣不足。按理說達到七項政治現代性指標中的一項，並非太難的事，可為什麼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籌畫的「政治體制改革」至今不見啟動？因為怕危及一黨對國家政治權力的永久壟斷。如果說當初極權體制的建立尚有確立民族共同性的歷史理由支撐，那麼今日拒絕政治現代性使不能再以國家、民族、人民作為藉口了。因為世人心裏已經很清楚：是誰為何拒絕。

中國社會在政治層面距離現代之城還有很長一段路程。

中國的政治改革正陷入一個悖論：任何改動都得服從一個前提——必須保證極權主義的統治地位不動搖；然而任何一張牌的抽動——又都可能引起整個多米諾骨牌的全面倒塌。一切實質性的改革都因此而如水中之月。先不說什麼軍隊國家化和政黨多元化，就是現行憲法條文寫明的那些最基本的「自由」——哪一條敢於實行？退一步：集會自由、遊行自由、示威自由——可能嗎？退二步：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可能嗎？退三步：出版自由——可能嗎？牽一髮而動全身，都不可能。和平長入只是一廂情願。

在後極權時代金錢主義的轉移和消費主義與娛樂主義的吸引下，中國民眾的反抗意識和聚合願望已經消解殆盡。知識份子階層是社會的良知，在極權制度下更擔負著抗拒黑暗點燃燭光的責任。我們不應該在否定了「文革」中的民眾造反精神之後，還要尾隨官方把「造反派」這個抽象概念裝滿炸藥扔進「文革」後所有民主性的群眾運動中——徹底消解民眾的反抗意識和聚合願望。要知道消解了民主性群眾運動的最後可能，知識份子的民主追求只會是黑暗牆頭所攀附的幾根乞討光明的藤蔓，很難站成開滿燈盞的黎明之樹。

革命並沒有死。群眾運動並沒有死。造反精神並沒有死。

它們僅僅意味著變革的深度和強度，並不等於暴力和無序。

注釋：

- 93 冷夢：《滄海風流》，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6年1月，第111-113頁。
- 94 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1月，第91-92頁。
- 95 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1月，第397頁。
- 96 錢理群：《壓在心上的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7、38、44、46頁。
- 97 楊小凱：〈再談「文革」〉，美國：《中國之春》，1992年10月號，第79頁。
- 98 徐明旭：〈再談文革及造反派〉，美國：《北京之春》，1996年9月號，第33頁。
- 99 朱學勤：《書齋裏的革命》，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373頁。
- 100 朱學勤：《書齋裏的革命》，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368頁。
- 101 周倫佑主編：《非非》第10卷，香港：新時代出版社，2002年12月，第9頁。
- 102 侯一謙：〈對文革的再檢討〉，美國：《北京之春》，1993年10月號，第37頁。
- 103 劉國凱：〈略評文革造反派〉，美國：《北京之春》，1993年10月號，第34-35頁。
- 104 侯一謙：〈文革與造反派〉，美國：《中國之春》，1992年7月號，第62-63頁。
- 105 劉小雁編：《關於不會說假話的中國人的故事》，西安：華嶽文藝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49-313頁。
- 106 邵燕祥著：《人生敗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7、127、128頁。
- 107 李輝：《風雨中的雕像》，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年2月，第577-583頁。
- 108 葉永烈：《反右派始末》，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577-583頁。
- 109 參見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48-149頁。
- 110 林賢治：《自製的海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6月，第85頁。
- 111 楊小凱：〈六四省悟：為文革造反派翻案〉，美國：《中國之春》，1990年8月號。
- 112 葉永烈：《反右派始末》，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187-188頁。
- 113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27頁。
- 114 楊小凱：〈六四省悟：為文革造反派翻案〉，美國：《中國之春》，1990年8月號，第43頁。
- 115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55頁。
- 116 林賢治：《自製的海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6月，第115-120頁。
- 117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第4頁。
- 118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62頁。

第十一章 在苦難中擺脫異化的第二代人

我將考察的第二個歷史段落，時間跨度更大，幾乎包括整個 20 世紀；涉及的內容也更深——屬於人們比較陌生的文化層面。

第一節 中國現代變革遭遇的文化阻礙

歐洲 16-18 世紀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中國 20 世紀初的「五四」運動，都是現代變革的文化先導，共同的指向都是確立民主共同性，也就是在博愛、平等、自由的共同認知基礎上，確立個體生存和發展所必需共同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利原則和制度保障。

只是中國當時的政治局勢與歐洲國家不盡相同。在它邁出這一步之時，所面臨的不只是內部封建勢力的抵抗，而且還有外部列強的威脅。所以，「五四」運動一開始就包含著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雙重主題。雖然民主主題的啟蒙運動一度席捲全國各地的中心城市，但很快就被來勢更猛的民族救亡運動所代替。這種現象並非中國獨有，而是二十世紀以來所有後發展國家的共同經歷。結果是救亡壓倒啟蒙，確立民族共同性取代確立民主共同性。

這當然只是「五四」運動的民主啟蒙主題發生方向性改變的外部原因。

中國的現代變革從 1840 年「鴉片戰爭」算起，在抵達「五四」之前，已先後經歷了「太平天國」起義、「義和團」運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為何歷時半個多世紀尚未成功？因為綿延兩千多年的傳統文化對中國人的精神束縛太大。

為了具體感知這個結論所包容的內涵，有必要換一個視角來對文化進行整體性理解。

關於「文化」，很多學者只注目於社會領域那些可見的現象。例如符號化的文字、典籍、理論學說、藝術珍品，藝術化的建築、工藝、用具、服飾、飲食，生活化的制度、禮儀、風俗、習慣。唯有李澤厚著眼於人與文化的關係，看到人的精神活動分為認知層面與心態層面，並由

此提出了文化心理這個概念。遺憾的是李先生提出和使用這個概念已經二十多年，但是由於沒能找到一個與之相對的概念來進行比較和界定，致使文化心理這個概念至今語焉不詳。

我將人視為文化的載體，並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文化心理這個概念。在我看來：

一個民族的文化形態，可以從宏觀上劃分為文化觀念和文化心理兩大部分。文化觀念存現於符號系統，可以橫向交流和縱向傳承，並成為民族思想的顯在內容。文化心理受文化觀念影響而形成，只隱存於民族的後天習性之中，並作用於民族的文化行為反應。文化觀念相當於文化形態的上層建築，文化心理相當於文化形態的地下基礎。任何文化觀念建築都必須與文化心理基礎相適應，才能被一個民族所接受。

在一個民族的文化形態中，其文化觀念部分，存現於人們的認知層面；其文化心理部分，存現於人們的心態層面。

一個民族文化觀念的轉變，不一定導致文化心理的崩潰；一個民族文化心理的轉變，卻必然導致文化觀念的解體。文化觀念的轉變，既可以是一個民族文化心理轉變後的重新建構，又可以是一個民族發生文化衝撞時的自覺選擇。然而，無論重新建構還是自覺選擇，一個民族新的文化觀念建築都必須適應其文化心理基礎，才能得到鞏固。

對於一個民族而言，文化心理的轉變最為艱難、最為緩慢又最為重要，它需要經過很多代承擔者因挫折、傷痛和苦難而產生的巨大應激、對比、反思，才能逐步實現，並決定著該民族新的歷史走向。

民族文化的核心內涵，是個人在群體中的主觀價值取向，在文化觀念上體現為價值取向認同，在文化心理中體現為價值取向定勢。按價值取向劃分，無論橫看世界範圍的東方與西方，還是縱觀中國範圍的古代與現代，統括著民族文化觀念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民族文化，都可分為群體主義與個體主義兩大類型。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傾向，是以國為家的群體主義。

現在都知道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民主啟蒙運動——「五四」運動，是以爆發了愛國學生運動的 1919 年 5 月 4 日來命名的。實際上這一天反

倒是這個偉大運動衰微的開始。這之前，以民主啟蒙為主題的新文化運動已經發軔多年，並且摧毀了以儒學為軸心的傳統群體主義文化觀念。這一天之後，啟蒙之火雖然借救亡之風迅速從北京輻射到全國，但很快被聲勢更猛的民族救亡運動所淹沒。可以說正是從這一天起，世人的目光開始從關注個體的權利轉向了關注群體的命運，並最終導致了馬克思主義和極權體制在中國的統治。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理論界在討論「五四」運動先行的民主啟蒙主題由於這一方向性改變而遭致挫折的原因時，大多贊成李澤厚的觀點，認為是「救亡壓倒啟蒙」。其實這只是事情的外因——在其背後還隱藏著更深層次的文化問題。

驅使世人將目光從民主主題轉向民族主題的內在動力，不是別的什麼，而是人們依然牢固的傳統群體主義文化心理。

「五四」一代所接受的西方個體主義文化觀念，之所以沒能在中國長期紮根生長，就是因為它不能適應中國民眾未曾轉變的傳統群體主義文化心理土壤。

同樣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念，為何能夠在中國站住腳？因為它正好與中國民眾的傳統群體主義文化心理土壤相契合。

中國的文化大轉變早在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的歷史時段即已開始，緊接著最大最公開的歷史事件，自然是1915年興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代知識份子高舉「科學與民主」之旗，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聲中向傳統儒學發起了猛烈的攻擊，宣告了這個籠罩國人思想近兩千年的封建性群體主義文化觀念的終結。與此同時，西方以個體主義為主題而又色彩斑斕的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尼采主義……紛紛登陸中國，馬克思主義也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歡呼聲中進入中國各種文化觀念的角逐場。這是中華民族封建性文化觀念的全面斷裂和現代性文化觀念的嶄新選擇，人們激烈震盪的思想空間自然充斥著各種主義的對立與交鋒，人們急於建構新型文化觀念的努力必然包含著對各種主義的對比與認同。

由於這些新穎的主義不是從本土縱向產生，而是從西方橫向移植而來，它們要想在中國紮根生長，就必須適合這裏的「土壤」和「氣候」。

這個「土壤」，便是國人在封建性群體主義文化觀念的千年投射下積澱而成的群體主義文化心理。文化心理——人們在認同一定文化觀念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心理/行為定勢，是區別於人的第一/自然本能的人的第二/社會本能，具有很強的慣性。

中華民族的群體主義文化心理基礎與其群體主義文化觀念建築相呼應：習慣於以民族、國家、君主作為個人存在的價值源，下意識的以民族、國家、君主的利益作為個人行為的標準儀。

雖然新文化運動斷然否定了傳統儒學群體主義文化觀念的合理性，但人們身上千年積澱並世代相傳的群體主義文化心理不可能短短幾年就完成轉換，加之新文化運動的風暴主要在中心城市呼嘯，廣闊的農村沒有受到多少衝擊，在汪洋大海般的億萬農民中間，不僅孔孟之道仍然保持著合理性的權威，而且認同於民族、國家、君主的習慣心理更是絲毫未變。這樣特殊的文化心理「土壤」，對移植來的主義之「苗」自然有特殊的要求——必須具有群體主義特性。

中國當時的「氣候」也比較特殊：在反封建的同時還須反列強，而且緊要性還置於反封建之前。這就決定了移植來的主義不僅不能是西方列強的主流文化，而且還必須對其具有消毒和滅殺的功能。

經過這兩個要求的嚴刻篩選，馬克思主義終於伴著俄國革命的勝利喜訊隻身勝出，其他參與競選的眾多主義漸漸退場。

可以說馬克思主義與當時的中國現實達成了多層面的契合：它作為西方最具社會批判鋒芒的非主流文化，對西方主流文化具有天然的免疫性和抗拒力；它的公有制建構和集體至上理念，廣泛適應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群體主義文化心理；它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與中國的專制主義政治傳統不謀而合；它對剝削階級及其剝削行為的抨擊和對勞苦大眾的同情，贏得了中國下層民眾的擁護；它以全面平等為核心的社會理想，極大地調動了中國變革參與者的獻身激情；它的唯物主義基礎，適宜於在中國撐起近代科學的旗幟；它以「代表世界上最先進階級行使權力」的新觀念代替天賦皇權的舊觀念，從而在統治權威的認定上獲得世俗的合法性。

這個新群體主義的文化觀念，自然不是傳統儒學的翻版。

這使得它在應對當時的世界變局時，具有較強的對內整合力與對外抗爭力。因此，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立住腳，完全是第三國際「輸出革命」的強加或國內激進知識份子「人為實驗」的結果，未免顯得太淺薄。當然，在多層契合中，最重要的還是一——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群體主義文化觀念與中華民族舊的群體主義文化心理的契合。在這一點上，與其說馬克思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在中國社會剛走出封建時代的土地上，不如說它紮根於中華民族尚未擺脫封建性質的心理土壤中。這個心理土壤，既成為強制主義經濟模式的「路徑依賴」，又構成極權主義政治制度的「心理支撐」。馬克思主義入主中國後，中華民族的群體主義文化心理不僅未改變，反而在其強勁呼應下繼續延展。

是的，馬克思主義是以其公字當頭、國家至上和集體第一的新群體主義文化觀念特性，在中華民族傳承千年的文化心理土壤上，驟然紮下根的。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經毛澤東之手而最終實現的。在他以哲學原理、歷史學說、經濟理論、階級觀點、政治建構、鬥爭策略為框架建立起來的龐雜體系中，有關個人規範的部分逐漸演變成了一個足以代替舊群體主義倫理觀念的新群體主義倫理綱要。核心要點包括：**忠**——絕對忠於政黨及其最高領袖；**公**——國家、民族、集體至上，大公無私、公字當頭、一心為公；**順**——無條件服從命令聽指揮、絕對服從組織和領導；**儉**——克人欲、克物欲、克利欲、克名欲，將人生需求降至最低限度；**鬥**——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與己鬥，其樂無窮。這些倫理原則主要包含在毛澤東、劉少奇的有關論著和共產黨的有關文件當中，並經過1942年的「延安整風」和後來的一系列思想整治運動而得以全面推行。它如果僅限於在戰爭年代的政黨和軍隊內部推行，本無可厚非。可共產黨從在野者變為執政者之後，這套倫理原則推行到了全國？成了全國民眾必須遵循的新群體主義倫理觀念。「五四」之後的三代激進青年知識份子——「大革命」一代、「抗戰」一代、「解放」一代，就這樣一代比一代步伐更快地重新融入了新群體主義的文化觀念，而且至死都懷著一種無可質疑的崇高感和光榮感。

現代文化人轉變，本來是要以現代個體主義代替傳統群體主義，經

過一番大折騰，現在卻回到了新的群體主義！這是中國現代變革在政治挫折之外遭受到的另一個大挫折。1949-1979年，中國人就生活在這個新群體主義文化觀念的規範之下。雷鋒便是這個新倫理規範塑造出來的新良民典型。那時候，大多數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和雷鋒差不多：一方面是無條件地將一生交給領袖、交給政黨、交給集體安排，另一方面是個人自主意識、自主地位、自主權力、自主要求的全面喪失。這種狀態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升級為史無前例的造神運動。對政黨的忠誠全部歸結為忠於毛澤東，而且必須是「三忠於」、「四無限」。仍然溫良順從，但只對毛澤東一人，各級領導可以一律打倒。依舊節儉如故，但不惜破四舊、打武鬥，空前大破壞。尤其鬥氣沖天，鬥帝修反，鬥封資修，鬥親鬥友還要鬥自己的靈魂。

馬克思主義也並非沒有一點現代性。它既然屬於西方前期現代社會極端的非主流批判文化，在批判中就一定包含著某種矯正性的現代性質——例如唯物主義傾向、社會平等觀念、生產交換分配的宏觀調控。但它落腳中國後，自身的群體主義「基因」加上特殊的「土壤」和「氣候」，就變異了？變成了中國人在西方列強威脅下建立民族國家的文化武器。建立民族國家雖是一個民族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層面推進現代性的必備條件，但還不是現代性本身。馬克思主義變異為毛澤東思想後，除了動用國家權力集中調配全國資源強制完成蘇聯式的工業化運動之外，在政治層面和文化層面完全是反現代性的。

現代性的文化觀念又可稱為工具理性。它至少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以自身利益為最高動力的個人主義、以自身喜好為最高標準的相對主義、以自身成效為最高真理的實用主義。馬克思/毛澤東式的文化觀念並不具備工具理性的內容和功能。在個人規範方面，它和封建性的文化觀念——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國的儒學一樣，完全是一種道德理性。只不過它出現在中國從封建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路上，可稱為新道德理性。由於擁有比歷朝歷代封建統治嚴密百倍的極權建制，極權之刃可以深入到中國最偏僻的鄉村和人們最隱蔽的夢境，它以暴力威脅為後盾對個人精神上的剝奪也超過封建倫理一百倍，它對人們心中世代積存的人性美德的搖撼和破壞更是毀滅性的。

無論新還是舊，道德理性的特徵都必然是：為了群體秩序和統治利益，不惜將個體完全抽空甚至泯滅。為了達到以弱化個體來強化群體的目的，任何道德理性都需要一個「最高者」：西方中世紀是「上帝」，中國封建時代是「天」，1949-1979年的中國，則是頭戴「三個絕對」和「四個偉大」神聖光環的「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造神」運動並非沒有來由。神早就在造了，只是這時達到了頂峰。只要是道德理性就要造神，這是必然。不然怎麼說它是封建性的呢？與儒學相比，馬克思/毛澤東式的道德理性還有一優一劣兩個特點。優者提倡「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只不過女性雖然獲得了相對於男性的社會身份，但和男性一樣並沒有獲得相對於群體的個體身份。劣者是將儒學體現永恆人性的仁義觀念當作與其「階級性」不相容的「人性論」來否定，使中國人數十年生活在絕缺人道、人性、人情的冷酷之境，更使那些為滿足政治私欲而不擇手段的人徹底喪失了應守的道德底線。

中國現代變革所遭遇的文化阻礙，既來自廣大民眾傳統的群體主義文化心理，更來自馬克思新群體主義文化觀念對它的強勁呼應。

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民眾傳統群體主義文化心理的強勁呼應，一方面推進了確立民族共同性主題的完成，另一方面又打斷了確立民主共同性主題的進程。

第二節 八代人在中國現代文化轉變中擔負的使命

一個民族文化的轉變，其實就是世人所認同的文化觀念和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的轉變。對於一個民族來說，這種轉變需要經過幾代人自覺或不自覺的努力才能實現。

中國現代文化大轉變的承擔者，至少包括了整個20世紀中的八代人。

現在來看包括「文革」造反派在內的八代人，在這場大轉變中的文化走向和人文體現。

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上，大概每隔十年左右就有一批人步入青年行列。如李澤厚所說，他們在確立人生觀的關鍵時期，所面臨的相同社會環境和所具有的相同人生經歷，使他們形成了包括共同的思維模式、情

感態度、人生觀念、價值尺度、道德標準和行為習慣的歷史性格，並展示出某種時代的進程，成為賦有鮮明歷史特色的一代人¹¹⁹。其中最重要年代的最重要人群所形成的一代人，往往成為一定歷史時期人文走向的標誌性存在。

中國20世紀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八代人的劃分，並非主觀臆造，而是客觀存在。在稱為「文化啟蒙」的20世紀80年代，李澤厚專門進行了中國近百年七代知識份子的劃分；四川民間詩界曾於1983-1988年，先後在《第三代人》、《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和《非非》等刊物上，對20世紀後五十年的三代詩人進行了劃代。

李澤厚劃分的七代人是：「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抗戰」一代、「解放」一代、「紅衛兵」一代和80年代剛出現的「新一代」。¹²⁰

四川民間詩界劃分的是：「解放」一代、「文革」一代和「改革」一代。¹²¹

代的劃分，無疑是80年代文化啟蒙的思想成果之一。

不足之處在於：李澤厚僅限於從文藝創作者的心態，來觀察中國近現代思想歷程的邏輯，沒能看出分屬於解放前和解放後的七代知識份子截然不同的形成機制和人文走向，而且大多流於印象性描述。四川民間詩界的提法，只限於對詩人代屬問題的感受性判斷，未能將所劃三代詩人納入社會人文範圍，並與解放前的另幾代知識份子聯繫起來統一考察。

我將中國近百年的知識人群劃分為八代人，解放前的五代人沿用李澤厚的提法，仍稱為「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抗戰」一代、「解放」一代；解放後的三代人，我稱為「反右」一代、「文革」一代、「六四」一代。

我與李澤厚的劃代有兩個明顯的差異：

第一，20世紀後50年的三代人，我以當代中國的三大負性歷史事件為標誌，稱為「反右」一代、「文革」一代、「六四」一代，而不是頗為含糊的「解放」一代、「紅衛兵」一代、「新一代」。

第二，李澤厚將「反右」時期的一代人包括在「解放」一代之中，顯然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解放」是個十分特殊的時期，是中國激進

知識份子所歸屬的政治集團從在野者變為執政者的分界線，是20世紀前50年與後50年的交接點。在時間的銜接關係上，「解放」時期既是群體主義主題的完成又是個體主義主題的開端，它一身二任，包含了中國激進知識份子文化走向轉換的可能——從群體主義再度轉向個體主義。而「解放」一代只是前三代人一脈相承的群體主義舊主題和群體主義舊走向的最後完成者，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完全不具有「反右」一代那異常鮮明的人文特徵，根本沒有資格進入新中國第一代反思者的行列。李澤厚籠統地將新中國的第一代人與舊中國的最後一代人都歸入「解放」一代，我卻必須從「解放」一代中明確地將「反右」一代分離出來——認定為新中國的第一代反思者。

八代人總的歷史走向是從傳統群體主義轉變為現代個體主義，但轉變的佇列並非都踏著個體主義的步調前進。這是因為傳統群體主義文化觀念和文化心理的強力牽制、外部列強對民族生存的強大威脅、以及馬克思主義對國民群體主義文化心理的強勁呼應，使得這條轉變之路沒有呈現為直線，而是充滿了曲折甚至反復。

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八代人的文化轉變演出，很像是分為最初兩代人的預演和隨後六代人的正演。

「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具有中國20世紀知識份子人文大轉變的預演性質；而「大革命」一代、「抗戰」一代、「解放」一代和新中國的三代人，屬於同一文化觀念框架內的正演——又表現為兩種人文走向。

是的，「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的身影、口號和行動，近似于中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時代人文趨向的先行預演——先是群體主義主題，後是個體主義主題。

「辛亥」一代仍然是群體主義的。他們儘管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個人主義，但他們的心態並不是西方近現代的個體主義，仍然是自屈原開始中國傳統的承續。他們身上所體現的，不過是士大夫傳統光芒的最後照耀。他們即使選擇死亡，也不是因為個人活不下去，而是為了把自己與民族和國家聯結起來，以一己之死喚醒大眾之生。 122

「五四」一代的情形完全不同：由於皇權政治體制的覆滅，傳統觀

念的崩潰，學而優則仕道路的終結，個體不再完全依附於官場、制度和群體。這必然造成個體在國家、社會、家庭中的地位和價值的重新確定，並帶來對人生、生命、社會、宇宙的全新感受、體驗、思索和追求，使觀念的解放和個性的覺醒，成為普遍的人文事實。 123

李澤厚放眼百年並以七代人作為中國知識份子思想歷程的路標時，沒能看出最初兩代人只是中國現代變革人文狀態大轉變的先行預演，卻誤認為「辛亥」一代是這一大轉變的序幕，「五四」一代是正式揭幕。 124

事實上，這兩代人承擔的預演所預示的人文大轉變，要由其後的六代人來正式演出。

這六代人——「大革命」一代、「抗戰」一代、「解放」一代和「反右」一代、「文革」一代、「六四」一代，屬於同一文化觀念框架。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分界線，將其分為前三代和後三代。兩者的人文走向截然不同。

細心對比，會發現一組鮮明的現象：

前三代人的人文走向，是逐步融入新群體主義的文化觀念。

後三代人的人文走向，是逐步疏離新群體主義的文化觀念。

兩者的人文走向正好相反。

前三代人的走向發生於1921-1955年。個體以正在覺醒的姿態，義無反顧地投身於群體的事業。投入趨勢愈演愈烈，直到將有待確立的個體權利以及對個體權利的自我意識，完全歸附于代表新社會體制的政治團體為止。如李澤厚所說，從「大革命」一代經過「抗戰」一代到了「解放」一代，甚至他們的情感生活也被號稱集體的理性徹底吞食甚至異化掉了。結果必然是群體的進步伴隨個體的異化。個體以放棄自我為代價換取了新社會體制的勝利還不自知，仍然心醉神迷地將自我完全融入新社會體制的統治觀念和統治秩序，使其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仿佛是「辛亥」一代全面實踐但隨後被個性解放和民主啟蒙所蓋過的群體主義主題的重複和放大。 1

客觀看，前三代知識份子的人文走向並非他們的不幸。在舊體制轟然解體、整個民族危機四伏、廣大民眾苦難叢生的歷史關頭，他們毅然放棄個人的一切，投身于建立理想新體制的群體事業，無疑是他們人生

的光榮。異化，只是他們人文走向的結果，而非他們人生選擇的初衷。

後三代人的人文走向出現于建立了理想新體制之後的 1956-1990 年。這就是：中國知識份子自我意識的逐步覺醒，對自身權利的逐步明確，對自身與新群體主義社會體制之間關係的逐步認清和調整。整個進程，從「反右」一代開始，經過「文革」一代，到「六四」一代結束。其人文走向與前三代人截然相反：不再是無條件地融入新群體主義社會體制的文化觀念，而是有條件地疏離新群體主義社會體制的文化觀念。仿佛是「五四」一代響亮提出但隨後被權力角逐和戰爭拼搏掩沒了的個體主義主題的恢復和延伸。

前三代人的人文走向是新群體主義主題，後三代人的人文走向是新個體主義主題，可稱為群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雙重主題變奏。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卻忽視這兩個主題的交替演奏以及後三代人的新個體主義主題走向，無疑是巨大的缺失。

僅從「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之後六代人文化走向的起點和終點來看，歷史仿佛完成了一個大循環：從個體主義重新走進群體主義，再從群體主義重新走向個體主義。其實，六代人只是在迂回曲折地完成「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提出的民族和民主雙重任務。

附表 1：中國百年人文演出的一覽表

演出 主題	預 演		正 演	
	群體主義	個體主義	新群體主義	新個體主義
時間	1901-1914	1915-1920	1921-1955	1956-1990
演員	辛亥一代	五四一代	大革命一代 抗戰一代 解放一代	反右一代 文革一代 六四一代

看起來，中國人的文化觀念再次從群體主義向個體主義的轉變，是在 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開始的：毛澤東逝世後因「四人幫」被抓和中共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如同號角，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全方位震盪所帶來的精神反思是其全面的預備，官方提出的「思想解放」更是一個現實機會。這次轉變的社會化表現則是 20 世紀 80 年代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啟蒙」運動。再次引進西方近現代個體主義的文化觀念，在隱蔽的比較中對馬克思/毛澤東式的新群體主義文化觀念進行消解。近百年來幾代人的巨大苦難和無數人的生死悲劇，終於使個人的自我意識再次覺醒，終於使個人對自身地位、自身權力、自身利益的要求再次明確。人們不僅開始將個人的價值取向從領袖、政黨、政府那裏撤回到自身，而且通過 1989 年「六四」事件正式宣告了與新群體主義文化觀念的決裂。

但這只是公開的轉變。更深刻的轉變發生在公開現象的背後——這就是 20 世紀後 50 年新群體主義文化觀念統治時期，「反右」一代、「文革」一代、「六四」一代所體現指向現代個體主義主題的疏離運動。1989 年由最年輕的一代為這個疏離運動的完成豎起一塊歷史的尖碑。他們是極權主義時代人文路標式的三代人，其疏離運動代表著中國民眾的文化心理——終於從封建性的群體主義向現代性的個體主義艱難轉變。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將在這裏找到新的「路徑依賴」，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將在這裏找到新的「心理支撐」，多元主義的思想原則將在這裏找到新的「人文天空」。

從 1989 年至今，馬克思/毛澤東式的新群體主義文化觀念，除了還被統治者供奉為維護極權制度合法性的最後守護神，在全國民眾甚至統治階層心中已經上崩瓦解。這期間，社會生活中再沒有發生重大的應激事件，新群體主義文化觀念的大面積坍塌，不只來自「六四平暴」導致的統治合法性危機，更來自市場化經濟掀起的金錢主義大潮的衝擊。這是統治集團為緩解合法性危機而不得不推動經濟現代化進程的意外後果。一浪高過一浪的潮水從人們的致富欲望中湧出而在經濟利益層面席捲，看起來衝擊物件僅僅是人心深處重義輕利的傳統理念。但事情並不這麼簡單：潮水進一步漫延，就衝擊到了群體主義文化觀念的人心基礎——人們公字當頭的心理習慣。人們心中的公字地基因此大面積下沉，新群體主義價值觀念因此大面積塌陷。至少在絕大多數知識份子、商人和青年中間，個體主義的價值觀念已經確立而且很難再次改變——儘管

除了在三代反思者中間還表現為對理想目標、道德境界、批判立場的堅持外，它暫時還只表現為90年代以來廣大民眾普遍的利己主義、金錢主義、相對主義、實用主義。經過一個世紀的艱難跋涉和多次兜圈，「五四」時代只是少數知識份子人生信念的個體主義，現在終於成了絕大多數人的第二本能。在中華民族從文化層面走向現代之城的人流中，知識群體、商人群體和青年群體已經入城，其他階層的民眾依次緊隨其後，統治集團則扛舉著那杆寫有「四個堅持」字樣的極權主義大旗遠遠地落在最後喘息。

中華民族從道德理性向工具理性的公開轉變也是自1979年開始，1992年之後逐步趨向全面化。傳統的理想、信仰、道德、價值正在被拋棄，追求物質財富正在成為人生的最高目的，有用性正在成為衡量倫理價值的唯一標準。與1979年以前相比，個人思想和民眾言談空間的巨大變化刀切一般明顯。但還不是完整的轉變——因為統治階層並沒有忘記以權力為剎車柄進行最後的阻止。

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當屬統治階層的文化觀念從道德理性向工具理性傾斜的經典名言，1992年南巡講話中的「姓資姓社」說，更是這一名言的具體闡釋。在推進經濟現代性的過程中，昔日被奉為「經濟學之王」的政治經濟學遭到冷落，各種有用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一陣熱過一陣。甚至馬克思主義也不再被當作理想和信仰，而只成了維護極權統治合法性的理論咒語。但在涉及極權制度合理性的文化觀念核心區，統治階層不得不緊急制動。於是人們看到：統治階層繼續控制全國的文化機構和新聞機器構築極權主義的輿論障地，並在四周布下「四項基本原則」的雷區。過去那個全社會必須遵循的封建性文化觀念因此繼續擁有裝腔作勢的權力，文化現代性的最後禁區不許世人涉足。現代性的工具理性必須是一種多元化的形態：除了顯性的法律公理、隱性的道德規範和半顯半隱的政治原則，全社會不存在任何統一的觀念，更不存在由權力支撐的壟斷性文化。雖然各個時代也有學院派認同和闡釋並為主流社會廣泛接受的主流文化，但並不強迫全社會遵從。學術、思想、文學、藝術完全自由，政府和個人一樣——盡可自由選擇並擇善而用，誰也不強迫誰。中國歷時百年的文化大轉變，只剩下這最後的一大步了。

第三節 新三代人的歷史遭遇與群體覺醒

相比之下，後三代人對個體主義主題的恢復要比前三代人對群體主義主題的重複更為艱難。

前三代人融入新群體主義的人文歷程要順利得多。因為他們未曾轉變的傳統群體主義文化心理，本來就有國家至上的強烈傾向，要融入新群體主義的文化觀念，十分自然，無須強制。加上這是一種賦有個人光榮感的融入，融入過程更是心甘情願和自然而然。所以前三代人的融入步伐，一代比一代快，直到個人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完全體制化了還其樂無窮。

後三代人要與所追隨的新群體主義疏離，註定異常艱難。因為這不僅意味著從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念長期的精神統治中擺脫出來，特別表現為要從傳統群體主義文化心理向現代個體主義文化心理的轉變。幾千年的心理積澱，幾代人的意識認同，要讓這些為了「革命事業」不惜犧牲身家性命的人，從心理層面把自我與所獻身的群體事業分離開來，要讓這些夫妻互稱只知「同志」，情書家信只有「革命」的人，從意識層面把自我與所追求的理想體制區別開來，談何容易。而且，當這種事業和體制被認定為古今最先進和世間最美好之時，要想疏離開來就更加艱難了，因為它難免會伴隨某種背叛神聖事業和美好理想的負罪感。

如果說前三代人的行為是一種自然投入，那麼後三代人的行為便是一種強行退出。自然投入，在向度上屬正面順行，不帶強制性。強行退出，在向度上屬反面逆行，必帶強制性。後三代人要想踏著現代個體主義主題的節拍邁出新的步伐，就必須在青春期間遭受人生的巨大創擊；否則他們就不會有生命的震撼和精神的危機，就不會發生心理的應激和意識的反思，就不可能與新群體主義文化觀念決裂，並開始從傳統群體主義文化心理向現代個體主義文化心理的轉變。

這就是我要以「反右」、「文革」和「六四」三大負性事件，作為劃分後三代人歷史標誌的根本依據。□

1949年10月1日，新群體主義社會體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義全面確立，歷時百年的民族救亡主題正式宣告完成。歷史無形之手必然會

重新奏響指向個體權利的民主啟蒙主題。它雖然塵封已久，畢竟是現代變革的真正主題，儘管長期被民族主義主題所掩蓋，然而民族主義主題一旦完成，它就會從沉睡中逐漸蘇醒，重新開始自己的必然進程。只不過，這次開始不是發生在「五四」時代那樣舊體制完全崩潰之時，而是在新體制徹底確立之後，所以，它不僅異常艱難，而且難免採取變態的方式。「反右」一代、「文革」一代和「六四」一代的人文指向，便是這個主題。其中最具變態性的，當然是「反右」和「文革」兩代人。變態原因不言自明：第一是個體的精神異化太深，第二是新體制的權力控制太嚴，第三是個人自由表現的機會太少。其主題便不能不變調為在認可極權體制合法性的前提下，反對其超度性而要求其適度性。這就是世人所熟知三代人由弱到強的共同口號：反等級反官僚反特權，要求更多的個人民主權利。

口號只是疏離的表現，而非疏離本身。真正的疏離發生在三代人的內心深處，甚至他們自己也未必意識到。

要深入瞭解新中國三代疏離者的形成機制和人文走向，就必須注意以下三個關鍵字並透視其中包含的內容。

第一個關鍵字——精神反思：

我所說的新三代人，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民眾之中具有自覺文化意識的三大群體。從1949年到1989年，按十年一代人的慣例計算，這五十年可劃分出五代人。然而我的劃代依據不只是自然年齡，而且是人文特徵。放眼五十年來的中國社會，具有自覺文化意識這個人文特徵，並對中華民族的人文走向產生重要影響的只有三代人：「反右」時期的一代人，「文革」時期的一代人，「六四」時期的一代人。當然，我所指的不是在這三個時期出生的人，而是在這三個時期步入青年行列的人。

自覺的文化意識來自反思，所以我認為這三代人最具思想者的特徵。以反思特徵為尺度，必然產生四個方面的限定：

(1) 他們現在反思，表明他們原先曾經將自身認同於現存體制。這就排除了國民黨時代遺存於體制外的負罪之士。

(2) 他們反思的內容，是現存體制的弊端以及自己曾經有過的認同態度，這就排除了共處同一時期但屬於體制代表者的官僚階層。

(3) 他們能夠進行深度反思必定具有相應的文化素養，這就排除了處於同一時期但缺乏相應文化素養的其他社會人群。

(4) 他們的反思來源於自身行為與現存體制發生衝突所導致的巨大心理應激，這就排除了處於同一時期也具有文化素養但沒有同類行為衝突和心理應激的其他文化人。

經過層層剝離，我將具有自覺文化意識的三大群體限定為：或輕或重遭受「反右」迫害的人，或淺或深遭受「文革」矇騙的人，或遠或近遭受「六四」挫折的人。

第二個關鍵字——心理應激：

這三代人之所以能夠形成，只是因為他們恰好遇上了極權制度下三個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三大事件，在發動者看來未必是反面的，但在經受者的感受中卻是負性的。

最初是開門整風，恭請大鳴大放，人們披肝瀝膽紛紛獻言，最後一個急轉彎來了「反右」運動，近百萬知識份子淪為罪人。

開始是鼓勵造反，無數激進的學生、工人、職員、藝員、機關幹部和農民無限忠於，奮起緊跟，後來從否定造反紅衛兵開始逐步否定全部造反派，讓他們終生承受不赦的罪名。

起先是改革開放，倡導政治民主，號召反對腐敗，廣大學生積極回應，最後被視為「反革命暴亂」，以轟隆隆之聲作答，無數青春以身試礪。

這樣的歷史遭遇會在他們心理上造成什麼反應呢？應激。
在心理學上，人對外界刺激的應答叫反應。人們在反應過程中輸出自己的行為作用於物件的結果不外乎兩類：肯定或否定。肯定產生正反饋，使既有的行為趨於固定和加強，使二次行為繼續進行。否定產生負反饋，使既有的行為趨於猶豫和削弱，使二次行為被迫中止。

負反饋刺激導致的心理反應，就叫應激，它是人們的一種超常無序

的心理反應狀態。又分兩種情形：消極應激和積極應激。人處於消極應激時，心理上難免發生紊亂、迷惘和退避。人處於積極應激時，心理狀態會經過震盪達到調整並趨於進取。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遭遇挫折時，有的可能長期處於消極應激狀態，有的則可能掙出消極應激而達于積極應激。積極應激導致反思認知以及對主體與物件之間關係的調整。

不難想像，「反右」、「文革」、「六四」三大事件的最後打擊，會給無數的經受者造成怎樣的心理應激。

當他們變態地喊出反對官僚、要求民主的口號，他們本來是認同極權體制的，他們本來是聽從極權體制發出的指令行事的，他們本來是按照極權體制認可的方式輸出行為的。他們絕對想不到，會遭致鎮壓式的應答和悲劇性的結局。於是，巨大的心理應激不可避免地在他們內心深處發生。

心理應激得以發生的時態特徵一般表現為：事先不知，突然降臨，猝不及防，手足無措，痛不欲生，後悔莫及。這一切，「反右」、「文革」和「六四」三大負性事件的經受者都親歷了，他們的心理應激能不深嗎？

好在他們大多數都能掙出消極應激而達于積極應激，並經過心理的震盪、調整而確立進取的姿態，最後上升為對自身與極權體制之間關係的反思和調整。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開始了對新群體主義文化觀念的質疑，同時逐步開始了由傳統群體主義文化心理向現代個體主義文化心理的艱難轉變，有幸成為逐步疏離極權體制的三大人文群體。

只有他們，才構成中國當代人文史上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三代人。

造反派正是遭受「文革」矇騙的人，他們構成新中國第二代人的主體。

「文革」中遭受衝擊的人群，首先是「反動學術權威」其次是「黑五類」及其子女和有政治嫌疑的青年，然後是「走資派」，隨之是保守派，最後才是造反派；而且從時間順序看，受打擊最重的首先要數「反動學術權威」，其次是「走資派」，最後才算造反派。要說心理應激，幾個人群都有，何以只有造反派才是應激主體？

被稱為「反動學術權威」的上層知識份子受害最早。但他們的心理應激，沒能導向意識層面對體制意識形態的質疑和心理層面向現代個體主義的轉變，加上年齡偏大和人數很少，不足以構成作為新生一代人的群體，其有限的反思也不具有廣泛性的代表意義。

至於可憐的「黑五類」人群，就更不用說了。他們本來就屬於體制外的「另類」，一直生存於非人的悲慘境地，1949年以來批判鬥爭早已習以為常，「文革」中的衝擊並不異常突然，所以無所謂應激不應激。

被稱為「走資派」的當權者人群，本屬極權體制的特權階層。他們受害雖深，但心理應激不能不具有認同體制的消極趨態，不可能上升為意識上的懷疑和心理上的轉變。而且，隨著「文革」被官方徹底否定，他們的地位和特權重新恢復，其消極性的應激心理也就完全消除了。即使少數明智者有過精神的反思，它所導向的也只是與極權體制的親和而使少數明智者有過精神的反思，它所導向的也只是與極權體制的親和而最非疏離，它所能做出的，最多是統治階層對民眾統治方式的調整——最終屬於體制的自我調適。

被稱為「保守派」的人群，本來受害就輕，隨著造反被宣佈為有罪，他們的保守立場反而成了未來先知式的正確，僅有的一點心理應激早就煙消雲散，不可能給他們造成任何意識層面的震撼和心理層面的改變。

統稱為「造反派」的學生、工人、職員、藝員、幹部、農民中的邊緣激進人群則不然。「文革」中幾經反復的坎坷遭遇，「文革」後難以磨滅的不赦罪名，能不給他們造成巨大的心理應激嗎？他們能不在意識層面對新群體主義的文化觀念提出質疑嗎？他們能不在心態層面逐步轉變自己的傳統群體主義文化心理嗎？他們能不與極權體制疏離嗎？正因為如此，他們必然構成新中國具有人文路標意義的第二代人。

他們在「文革」初期挨整，被毛老人家解放出來後，便感恩戴德地為捍衛老人家被修正的路線和被篡奪的權力而大造「走資派」的反。他們雖然風光一時，但十年期間災難不斷：先是「二月鎮反」大批被抓，接著是大打武鬥自相殘殺，隨著是「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整風」、「全面整頓」，一連串的運動整得他們威風掃地，一塌糊塗。他們曾想利用「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之機討回一點可憐的人身和政治權利，但緊接而來的「揭、批、查」運

動最終將他們打入了地獄。其中遭遇最慘的要數構成造反派生命活力層的「黑五類」子女和政治嫌疑青年。他們因血統太黑和個性太強而長期受壓抑，他們大多有才，卻總是在升學、入團、參軍、求職、提升上遭受歧視。他們是「文革」初期官方工作組和官辦紅衛兵殘酷迫害的物件，又是整個「文革」期間從「二月鎮反」開始所有官方運動的清理重點，開除、戴帽、坐牢、殺頭的專政待遇總是落在他們頭上，直到1976年的「揭、批、查」運動也不例外。

如今一說起「文革」，人們就把它與造反派劃等號。運動初期官辦紅衛兵大搞打砸搶、大搞「破四舊」、揪鬥「反動學術權威」和「黑五類」的惡行，被說成是造反派幹的。官方發動群眾大揪「三家村」、「四家店」、大劃「三類人」、「四類人」的行徑，被說成是造反派幹的。官方通過牢牢控制的軍隊、公檢法和各級革委會，在「文革」中製造的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被說成是造反派幹的。反之，造反派在「文革」期間從「二月鎮反」開始的十數次官方運動中，被抓過、鬥過、整過的達數百萬之眾，從來無人同情。造反派在「文革」後期的反思以及在「四五」之類場合以非造反派的名義發出的抗議，從來無人過問。直到今日，從官方到知識界到社會各階層，對造反派仍然是一片否定之聲。

前期以激進學生為主和後期以激進工人為主的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坎坷遭遇，在「文革」後的不赦罪名，能不造成他們巨大的心理應激嗎？他們之中具有文化素養的一層，能不變消極應激為積極應激而上升為精神反思並對自身與現存體制之間的關係進行調整嗎？他們能不構成具有自覺文化意識的一大群體嗎？

對於個人的認知活動而言，文化的本意無非是通過反思而對主體與物件之間關係的進行調整。新三代人的心理應激和精神反思所導致的，不能不是個體與現存體制之間關係的調整，調整的結果必然是趨於疏離而非親和。在「文革」時期的受害人群中，只有造反派通過應激、反思、關係調整而導向疏離。

個人生活在群體中。群體秩序由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的道德、法律和統治階層的職權來維持。個人對群體的疏離只是一種人生態度，這種態度並不針對真實的共同利益和合理的道德與法律，而只針對統治階

層化裝成群體利益代表的虛假觀念宣傳和濫用權力行為。因此，疏離的本意只不過是：把個人的角色從統治意志所需要的螺絲釘變成自己的主人，並知道主張自身的正當權利。這便是應激、反思的人本意義。顯然，在「文革」時期受迫害的各種人群中，唯有造反派的應激、反思和關係調整，才具有這種意義。

第三個關鍵字——群體創傷：

人生的挫折和應激，即使上升為精神反思，也會在人的心理上留下創傷，重大的挫折和應激留下的創傷，可以保持終生。三代人的巨大挫折和應激，同樣在群體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創傷——我稱為群體創傷。

群體創傷無疑是一代人的心理共鳴點。從外部看它來自共同的經歷和創擊，從內部看它來自共同的挫折和應激。正是它使得無數不同的個體能夠同疼痛、同愛憎、同記憶、同話題、同情緒，從而把他們緊緊聯繫在一起，去思去行。

群體創傷的輕重，取決於一代人中不同的個人距離事件中心的遠近，距離越近越重，距離越遠越輕。例如：「反右」受創最重的首推人文知識份子，科技人士次之，學生職員又次之。「文革」受創最重的是學生，其次是工人、職員、藝員、幹部、農民。「六四」受創最重的是大學生，其次是文化人，再後是市民。

個人所受群體創傷的程度，決定了他們對群體創痛的感受，傷輕者感受弱，傷重者感受強。

三代人的群體創傷同時是中華民族的創傷，它不僅會長久地影響三大群體的心理行為方式，而且將影響到整個民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心理行為方向。

人的一生，並非任何時期心理都容易受傷。最易受傷的只是他的心理敏感期。雖然西方精神分析學派最看重人的童年時代，但在我的關注範圍，我所看重的卻是人的青春期：青春心理最易受傷。一個人在青春所受的創傷，我稱為青春創傷。

三代人的群體創傷同時又是青春創傷，可稱為**群體青春創傷**。

這絕非理論杜撰，而是事實。「反右」、「文革」、「六四」三大事件中受傷最重的，不都是青年嗎？是的，他們都是青年，年齡大約在 15-25 歲之間。比如，「反右」中那一大批青年作家，比如「文革」中的中學生和大學生，比如「六四」中的大學生。他們所受的都是青春的創傷。

人在青春心理上為什麼容易受傷？因為這是人生的精神斷乳期，這是人生的第二次站立時期，這是人生繼第一次斷乳和第一次站立之後的又一個關鍵時刻，一旦受挫便會受傷並且影響終生。

青春創傷同時是精神創傷。因為這次所斷之乳已是精神之乳，這次站立已是精神的站立，因為這時人的一生正處於確立人生觀的精神轉捩點。所以三代人的群體創傷，既是青春創傷又是精神創傷，可稱為**群體青春精神創傷**。

青春期既是人生心理上最易於受傷的時期，又是人生精神上最長於反思的時期。三代人反思的深度和廣度尤其得力於此。這種優勢，就是身處事件之中但年齡沒處在青春期的的人也難以具備。

由此來考察對同一事件人們巨大的反思差異，就不難明白了。為什麼 20 世紀 80 年代復出後，艾青、丁玲等人的批判精神遠不如劉賓雁、王若水等人？因為受傷時，前者已是中年不再有青春反思，後者正當青年剛好處於青春反思期。為什麼這幾年「文革」時期的老三屆中學生紛紛站出來反思往昔，而老三屆大學生卻一直遮遮掩掩沈默不語？還是同樣的道理：受傷時前者正處於青春期的中段，後者已臨近青春期的邊緣。

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同一代人中反思程度的深淺，取決於他們受傷時距離青春期的遠近。

說到負性事件，自然不能回避三年大饑荒。三年饑荒，餓死幾千多萬人，世界罕見，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獨有。要說負性，它不知比「反右」、「文革」和「六四」超出了多少倍。這個時期自然也有大批進入青年行列的人，為什麼他們沒能形成人文路標式的一代？這有兩個原因：第一，三年大饑荒禍及全社會，受害最深的又是農民和普通居民，並非專門針對文化領域和青年知識份子。第二，我所說的負性事件，主要是政治性的，它所觸及的主要是青年一代的靈魂而非肉體，它所帶來的主要是精神的打擊而非肉體的摧殘，它所造成的主要是精神的創傷而

非肉體的殘疾。三年大饑荒並未使人們的精神陷入全面紊亂，因為諸如「蘇修逼債」和「自然災害」之類虛假解釋緩解了人們的焦慮，肉體的痛苦未能成為一代人自我反思的催化劑。

這說明，作為新中國三代反思者形成標誌的歷史事件，不僅必須是負性的，而且必須是政治性的。因此，從三代人的精神創傷上生長出來的思想指向，便不能不是：經由疏離，在精神上達於自覺，在政治上達于民主。

第一代人是懷疑的一代，他們的創傷是冤屈的創傷，受創時的精神狀態全不自覺。

第二代人是驚醒的一代，他們的創傷是噩夢的創傷，受創時的精神狀態少許自覺。

第三代人是覺悟的一代，他們的創傷是光榮的創傷，受創時的精神狀態多半自覺。

試作三代人傷勢一覽表供參考。

附表 2：三代人傷勢一覽表

傷號	傷名	傷態	傷式	傷情	傷感
1	冤屈的創傷	不自覺	弱	輕	深
2	噩夢的創傷	不自覺	中	中	中
3	光榮的創傷	不自覺	強	重	淺

說明：

傷態，指受傷時的精神狀態。

傷式，指創擊方式。

傷情，指受傷程度。

傷感，指對傷痛的感受。

為何第一代人受創方式最弱傷情也最輕，傷感反而最深？因為全國人民一邊倒，無人同情又無處申冤，冤屈至深而痛徹於心。為何第二代人千夫所指，傷感反而不如「右派」們？因為參加過造反的人太多，責

任分擔，痛感擴散，傷感自然減半。為何第三代人受創方式最強傷情最重，傷感反而最淺呢？因為光榮感，因為自覺性，更因為國內外民眾同情，傷感肯定不深。

指向個體主義主題的人文進步，在第三代人身上體現得最明顯最突出最鮮明。

自覺的意識，徹底的態度，公開的方式，光榮的創傷深刻在「六四」的尖碑上。尖碑插下之時，歷史之劍同時將鋒面隨同鋒刃一齊插下，於是斷面呈現於界線的兩邊，疏離宣告完成。尖碑立起之際，一塊在精神上達於自覺在政治上達于民主的路標同時立起，三代人的人文步伐將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

三代反思者，無疑是中國當代思想史的人文主體。他們的集合，必將孕育出21世紀文化變革的風雷。

第四節 「文革」一代的驚醒與疏離

實際上，這一代人的質疑和轉變，早在「文革」中期就已開始。

懷疑之火，1968年左右即在少數中學造反紅衛兵中間點燃；隨著1969年中學生大規模上山下鄉，便在他們中間廣泛漫延；1972年林彪事件公開後，更以迅不可擋之勢燃遍所有企事業單位和機關團體造反青年疑雲重重的心理空間。懷疑的最初切入點，大多是對「主義之爭」、「路線之爭」之類虛假言詞的識破。他們憑著由多年來的政治見聞打磨出的政治敏感，驀然發現在這些虛假言詞下面原來還隱藏著歸屬於個人權力之爭的內幕。對於長期認同於虛假言詞的人來說，這絕對是個足以動搖其精神信仰的重大發現。於是，這些虛假言詞所包含的群體主義價值觀念，在他們心中動變成巨大的問號。

這是中國歷史上文化專制和思想控制登峰造極的時期，又是權力鐵幕出現裂縫和青年思想空前活躍的時期。因懷疑而苦悶異常的廣大青年，以青春為薪，苦苦尋找自我引燃的火種。為此，他們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書籍，大膽接近一切有知識的人——即使打入另冊的「黑五類」也在所不避。我前面提及與「右派」分子親密交往的造反青年，便屬這

一類尋找火種的人。只有對於他們，孟子所說的「朝聞道夕死可已」，才是真實的精神寫照。

當然，為他們提供真正思想火種的最終還是書籍。主要是翻譯書，大多是西方名著。一類是文學書籍，一類是哲學、思想史著作，一類是歷史、政治、傳記方面的內部讀物，還有一類便是馬克思主義經典。前三類都為「文革」前翻譯出版，「破四舊」時僥倖被人私藏下來，暗自流傳民間。後者則公開發行，屬官方大力提倡閱讀之書。從第一類書中，他們找到永恆不滅的人性的支持，以及對現實非人性狀態的否定。從第二類書中，他們接觸到了西方關於民主、自由和個人價值、個人權利的思想。從第三類書中，他們瞭解到被官方謊言嚴加掩蓋的許多中外重大事件的真相。對第四類書，他們大多將其作為「正版」經典，來與「盜版」現實相對照，力圖證明中國現存社會體制的不合理及其對「正版」原文和本義的背叛，認為一旦恢復經典本義，理想社會體制就會合情合理。他們所看重的本義，自然是馬克思早期著作中關於共產主義制度下人性、人道、民主、自由的人本主義思想。

這類書，因為屬於合法經典讀物，也就成了不少在獄造反青年的唯一精神食糧。他們希望從中找到救國救民之道，監獄管理人員卻以為他們是在加強思想改造，從不敢禁止家人送書，也不敢干涉他們的日夜苦讀。

造反知青Z「文革」中兩次入獄。他利用在獄中先後度過的四年時間，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細讀了《資本論》兩遍，並用牙膏頭在書頁上記下了十多萬字的思想隨感。通過對後發展國家社會主義之謎的破解和對馬克思主義非個人化本質的挖掘，最終找到了苦苦以求的思想答案。

他們的思想之火由此被點燃。他們寫詩、寫小說、寫歌曲，甚至鑽研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美學和哲學。他們秘密串聯，暗地交流，甚至成立各種合法名稱的秘密組織。在農村，在工廠，在街道。1969年5月，我住院治病時認識一位王醫生。他是上海某醫科大學畢業生，因在校參加了「紅革會」的下屬造反紅衛兵組織，畢業分配時發配到了遠離家鄉萬里之遙的西南山區。他告訴我，上海「紅革會」遭取締後，部分同學成立了一個名叫「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的組織，目的是尋求救

國救民的真理。1969年5月，上面提到的造反知青Z，曾與幾位青年朋友秘密商議成立名為「魯迅研究會」的組織。重慶西南師範學院造反紅衛兵領袖張闖，曾于70年代初為首成立「馬列主義研究會」。全國各地，這類地下思想組織何止上千，其中一些甚至有了政黨組織的雛形。朱學勤稱這個時期青年人的地下思想活動為「地火在奔突」，非常準確。我一位造反中學生朋友，1968年6月寫了一首詩，名為〈夜幕下的金沙江〉，以深夜峽谷中渾然潛行的金沙江暗喻青年一代的迷惘和探索，其中每段結尾的重復句就是「地下火在奔突」。他們的存在必然會引起中共專政機關的警覺。事實上其中一些學習和探索小組也遭到了殘酷鎮壓。例如：寧夏銀川一批原造反紅衛兵成立的「共產主義自修大學」，1970年初被定為「反革命集團」，成員全部遭到逮捕，三人被處死刑，另有一人自殺，一個受牽連者判刑三年並在虐待中病死。四川萬縣的「馬列主義研究會」，1975年8月被定為「反革命集團」遭到取締，成員被捕判刑。從未進入公共話語層面的此類案件，全國不知有多少。

就個人而言，他們從迷狂中忽然驚醒過來的具體動因多種多樣。挨整是其中之一，例如上海「紅革會」的造反人學生。西師的張闖和我前面提到為劉少奇鳴不平而入獄的造反知青雷某，就是因為1970年在北京學習班挨了中央文革的批評，回到四川後又挨批鬥，才醒悟的。廣大中學造反紅衛兵，主要是放逐農村後感受到的冷遇和受騙。造反知青Z醒悟的動因更為具體。1968年5月4日，其女友被同派武裝人員不慎走火打死。巨大的打擊讓他三天三夜水米不沾，整個人如同癡呆一般。他反復推論女友致死原因，最終認定：要是沒有武鬥，人們手中就不會有槍，女友就不會被槍支走火打死；要是沒有「文革」，就不會發生武鬥，人們手中也就不會有槍；要是沒有毛澤東的個人爭權行為，就不會有「文革」，也就不會發生武鬥……。他由此醒悟過來，從此開始用懷疑的目光打量「文革」和毛澤東，並苦苦探索人生的真實出路。醒悟之日，他在日記本扉頁上寫下一句話：血的警鐘已經敲響，死人使活人開眼。

就個人稟賦而言，「文革」中的造反青年無疑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個體。要是沒有「文革」，他們的優秀稟賦完全可能被等級歧視和政治迫害的巨型鐵磨逐漸磨滅。因為遇上「文革」，他們的優秀稟賦看似可

以在黑暗中閃光了一——卻又被導入了一場巨大的觀念騙局。這是他們在那個病態社會裏難逃的厄運。好在他們終於及時驚醒，並在極其黑暗的時刻和極其艱難的地方，重新開始探索國家和個人的出路。

據我所知，「文革」中的思想探索者較少有上層紅色子弟。這和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直接相關。運動中，他們的父母雖然一度靠邊，他們自己也很快被擠到政治舞臺的邊緣，但他們的等級本能天然與極權體制親和的，任何可能的懷疑和反思都難以超逸這個向度。特別是父母很快就官復原職，自己又能避免上山下鄉而直接當兵、參加工作、上大學，他們的懷疑和反思就更為有限了。不錯，他們曾經最早起來反對「文革」。但反對「文革」並不就意味著思想覺醒。關鍵要看反對的是什麼，又是認同和參照什麼來反對。他們反對的，只是毛澤東將整下層民眾的「階級鬥爭」變為整上層當權者的「路線鬥爭」的政治實踐，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國社會「階級關係」的一時變動。他們認同並參照的，僅僅是「文革」前十七年的「階級關係」、「階級路線」和「階級政策」——其中自然包含了他們鐵定的特權地位和特權利益。惟下有層造反青年對「文革」的懷疑和反思，大多基於自身的磨難並指向整個極權體制，而且是以生命中僅存的人性需求和書籍裏少量的民主自由思想為參照系。

中國詩界20世紀80年代崛起的朦朧派詩人中有兩個代表人物：食指和北島。他們都在「文革」後期開始地下詩歌創作。象徵食指精神向度的著名詩句是「我相信」，象徵北島精神向度的著名詩句是「我不相信」。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參加過北京市的中學紅衛兵以及「文革」中的傾向是造反還是保守，但有一點確定無疑：食指屬上層紅色子弟，北島是下層黑色子弟。他們對當時中國現實狀況的感受和態度截然相反。這絕非偶然。

「文革」中造反青年的懷疑與探索，在深度和廣度上遠勝於「反右」一代，雖然收穫並不輝煌。在感性層面，他們對毛澤東、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產生著巨大的懷疑和抵觸，不少人甚至心懷必推翻而後快的激憤。但進入理性層面尋找答案時，又苦於早已洗白的頭腦中缺少足夠的思想資源，而不得不回到馬克思主義框架。他們的詩歌和小說，除了少數高品質者，大多不入流。歌曲多為借曲填詞，無創造可言。理論探索的局限，從廣州李一哲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重慶張闖等

「文革」造反派真相

人的《中國向何處去》，可見一斑。他們的可貴之處，不是探索的結果，而是探索的過程，是貫穿在探索過程中的激情和精神。正是這真正可貴之處，使他們在意識決裂和心理轉變上，邁出了比「反右」一代更為有力的一步。

「文革」結束後，他們疏離的姿態完全呈現出來。

李澤厚從文藝現象的角度，熱情洋溢地描述了他們不同于以往世代的身姿和人文指向：

十億神州從「文革」惡夢中驚醒過來，紅衛兵一代的心聲如不可阻擋的洪流傾泄而出。它最敏銳地反映在文藝上。

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時代。人的啟蒙，人的覺醒，人道主義，人性復歸……，都圍繞個體要求從異化中解放出來的主題旋轉。一個造神來統治自己的時代過去了，又回到五四時代的感傷、憧憬、迷茫、歎息和歡樂。但這是經歷了六十年慘痛之後的復歸，歷史不會完全重複。幾代人付出的沉重代價沒有白費。新一代的心聲比五四一代更深刻、沉重、絢麗和豐滿。

經歷了十年動亂，看遍了社會上下層的悲慘和陰暗，嘗過了造反、奪權、派仗、武鬥、插隊和待業的酸甜苦辣。政治上的憤怒，情感上的悲傷，思想上的懷疑，對往事的感歎與回想，對未來的苦悶與彷徨，對前途的期待和疑慮，對青春年華的悼念痛惜，對人生的探索追求，都在近年的文藝作品中表現出來，傳達了飽經苦難的青年一代的心聲。 125

這是指上世紀80年代文化啟蒙運動中，以「今天」詩派和「星星畫展」為代表的文藝上的表現。在啟蒙運動的另一個主戰場——理論方面，這一代人的表現同樣精彩。一個個准民間文化團體相繼成立，一套套叢書和一本本雜誌應運而生。雖然原創性和批判性相對較弱，但多數翻譯和著述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一個共同的主題：以人性取代階級性，以科學取代迷信，以理性取代異化，以民主取代專制。

這一代人意識層面的覺悟和心理層面的轉變，的確甚於此前的「反右」一代。

這裏，不必多說世人熟知的《走向未來》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兩大青年文化群體，我只想對一個外省青年文化團體少為人知的文化事蹟，略作介紹。

它全稱「四川省智力開發工作者協會」，1984年7月成立，會員廣布于成渝兩地各大專院校和人文科研單位。據我所知，它常務理事會的核心成員大多為「文革」時期的中學造反紅衛兵。1984年11月，它創辦了一本刊物，取名《大時代》。一批當時和以後在中國思想界十分活躍的青年學者，紛紛在上面發表自己的獨立言論，一度在省內外產生較大影響。這批青年文化人包括：周國平、劉小楓、陳維綱、墨哲蘭、許金聲、馮川、張在林、肖雪慧、蘇丁、陳維正、周倫佐等等。這些人不少也是當年的中學造反紅衛兵。1986年底，它和四川人民出版社聯手，決定推出一套《大時代叢書》，第一、第二輯擬出書目就達19種：

第一輯

《一九五七年》

劉賓雁、高爾泰 著

《一九七九年》

高爾泰、王亦平著

《一九八三年》

王若水、向嶽著

《異化與自由》

高爾泰著

《時代的報告》

方勵之著

《坎坷的理論之路》

郭羅基著

《論言論自由》

胡平著

《文學與現實》

劉賓雁著

《文化革命大事記》

盧明明、劉旭著

第二輯

《人的解放》

王守昌著

《人的哲學》

張尚仁著

《東方人格》

許金聲著

《主體心理學》

肖雪慧著

《愛的哲學》

周倫佐著

《前文化》	藍馬著
《東西方文化心理比較》	劉小楓著
《新儒學批判》	黃克劍著
《文化哲學》	黃萬盛著
《美的哲學》	尤西林、張在林著

這套叢書如果順利誕生，必將給中國 80 年代的文化空間帶來一聲巨響，並改變思想啟蒙浪潮的流向。

1987 年 1 月，開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大時代》因故停刊，《大時代叢書》也夭折在徵訂單上。但憑三期刊物所載文章和兩輯叢書所定書目，也不難看出 80 年代後期文化啟蒙運動在批判性和原創性兩方面向前推進的意圖。

這套叢書的策劃者，全是當年的中學造反紅衛兵。

在中國社會幾十年來被新群體主義文化觀念嚴密籠罩的天空下，「文革」一代人的呼聲，的確不同凡響。

疏離絕對專制主義的毛澤東體制雖是這一代人的共同特徵，但其內部又充滿區別。區別多種多樣，比較突出的現象有兩種。

第一是少數與多數的區別。與任何特殊時代一樣，超越狹隘個人利益而上升到精神領域和理論層面進行思索的只是少數傑出青年；大多數人僅限於不滿和懷疑而在庸庸碌碌甚至完全世俗化的生活中保持疏離狀態。

第二是正常化與極端化的區別。如果說第一種現象都在正常化範圍，那麼極端化現象就包括了結社反叛、遠走異國、墮落犯罪。這方面的情況我不可能作全國範圍的調查，只能以長期生活的城市為例：

第一類極端大多發生在走投無路而又不甘屈服的下層青年中，和同代人中絕大多數苟且偷生者相比，他們更具青春的勇氣和反抗的膽量，思想上與極權體制的決裂，比當時遇難的張志新、李九蓮、史雲峰等和 80 年代成名的文化鬥士走得更遠。毛體制在組織上終結後的 1976 年 12 月，這個城市公安機關破獲了一個所謂「反革命集團」，其綱領為反對專制獨裁呼籲民主自由。參加人員以街道青年和待業學生為主，近十名待業學生都是當年家庭出身「黑五類」的中學造反紅衛兵。判決結果，

兩位為首的街道青年 M 和 W 被執行槍決，其他成員被判勞動改造的刑期加起來超過 200 年。我熟悉的五個原造反中學生都在其中——他們的家庭出身一人為「資本家」、四人為「右派」。我認為此案涉及人員所反叛的實為毛澤東體制，又判決於華國鋒主政時那「不明不白的三年」，內心為之深感不平。1981 年我出獄不久，就向前面多次提到的雷姓朋友介紹了此事。也是剛出獄不久的他立即動員時為省人大代表的女友一道仗義申訴。四川省公、檢、法聯合調查組三次下來並三易結論，歷時二載只獲「量刑過重」的最終定性，釋放了所有的青年學生，但對槍決者至今不予平反。在全國各地，這絕非個案。「文革」結束後，這批人大多對人生重新定位，在為之付出巨大代價的追求方向上很少有作為。

第二類極端大多發生在邊境省份，當時稱為「叛國投敵」。大部分帶有正統色彩，投向緬甸和越南，名為「獻身世界革命」，實為在少許合法的名義下另尋人生的出路。成都、重慶、上海、昆明下放到雲南軍墾農場的中學生，有些就跨過邊界線參加了緬甸解放軍和越南人民軍。還有一些包括原「老紅衛兵」在內的北京中學生，也千里迢迢趕來投身邊界對面的異國革命。我認識的三個本地原中學造反紅衛兵也選擇了這條兇險密佈的道路。1996 年，三人中已成為緬甸富商的 X 來訪，仍然難以抑制的政治熱情讓我驚訝。生活在廣東、吉林、黑龍江、內蒙的這類青年，則逃向當時與中共敵對的香港、朝鮮、蘇聯、蒙古。沒有「世界革命」的理由作掩護，自然成了膽大妄為的「叛國」。

第三類極端多發生在返城無望的下鄉知青和無業可待的街道青年中。這些人，有的屬於悲觀絕望，有的屬於憤世嫉俗，有的屬於報復社會，有的屬於天性惡劣。偷盜、搶劫、詐騙、販毒，不一而足。當時的刑事判決佈告上不時有他們的名字。我當年認識的造反青年中有兩夥人走上這條自我毀滅之路。一夥是街道無業青年，1970-1977 年在境內攜槍販毒，首犯 F 被槍決，其餘皆判重刑。一夥是下鄉插隊知青，三人的父親分別是某高校的黨委書記、副院長、教授，1973-1976 年，先是在本地瘋狂盜竊，後又穿梭於中緬兩國販毒。首犯 W 兩次入獄，都因提供破案線索有功而免死罪，至今仍在服刑。

這代人的主體自然是極端化的第一類青年和正常化的兩類青年。如

果說其中的少數傑出者是後來官方「改革開放」和民間民主啟蒙的思想先鋒，那麼其中的多數普通人就是這兩個進步潮流的人文基礎。

但是，他們遠不能與「五四」一代相比。「五四」一代的覺悟，發生在徹底拋棄傳承千年的傳統群體主義文化觀念的大背景下，意識走向是全面確立現代個體主義文化觀念，而心理走向也是向現代個體主義文化心理全面轉變。「文革」一代的覺悟，則是將新群體主義文化觀念的信仰推向極端，然後因利益損害和信仰動搖而猛然跌落下來的結果，其意識層面和心理層面所發生的事件，只屬於有限制的背叛，而非無限制的全新建立。儘管他們經受的人生苦難遠大於「五四」一代，但屬於「以專制的犁頭疏鬆專制的土壤」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們在現代個體主義人文方向上實際邁出的步伐，與「五四」一代有質的差別。

第五節 三代人逐代加速的疏離步伐

個人對某種意識形態的認同或拒斥，至少體現於行動、意識和心理三個層面。這樣來看「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之後六代人的兩種人文走向，不僅能看清他們與前兩代人的聯繫和區別，而且可以看出他們那種逐代加速的步伐節律。

走出「辛亥」和「五四」兩個大時代以後，前三代人轉而踏著近似于「辛亥」一代的民族救亡主題行進，個人重新融入新群體主義的步伐，逐代加速。「大革命」一代，主要是基於實用理性的行動層面的融入，在意識層面和心理層面保留了更多個體主義的內容。「抗戰」一代的融入，加進了意識層面的認同，這就是「延安整風」所要解決從「思想上加入共產黨」的問題，這一代人的情感生活尚未完全體制化。全面化的融入是在「解放」一代身上實現的。這一代人投身革命事業之初，不僅行動上和思想上已經完全認同極權體制，而且情感上也與「黨組織」和「工農兵」完全水乳交融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後三代人的人文走向轉而重奏民主啟蒙主題，看似回到「五四」一代標出的個體主義之路。雖然走向與前三代相反，但疏離新群體主義的進程同樣逐代加速。「反右」一代的疏離，

主要在心理層面——因平白無故受傷害，首先在情感上拉開距離，思想上和行動上仍然保持認同態度。「文革」一代對新群體主義的疏離進了一步：除了身心反復遭受傷害，思想上更蒙受了巨大的欺騙，疏離不可能不包括心理層面和意識層面，但行動層面仍趨於認同。徹底的疏離者是「六四」一代：不僅心理層面和意識層面始終與新群體主義拉開距離，而且行動層面也一開始就表現出鮮明的個體主義特色。下表中的左右對照，試圖反映前三代人融入步伐的加速和後三代人疏離步伐的加速及其對比關係。

附表3：六代人加速式行進對照表

代名	融入	離疏	代名
大革命一代	行為層面	面層理心	代一右反
抗戰一代	行為層面 意識層面	面層理心 面層識意	代一革文
解放一代	行為層面 意識層面 心理層面	面層理心 面層識意 面層為行	代一四六

從這一對比中可以看出：

(1) 在心理層面、意識層面、行為層面這三大步驟中，前三代人的融入是從行為層面開始而逐代增進，後三代的疏離卻是從心理層面開始而逐代增進。

(2) 前三代人完成融入運動和後三代人開始疏離運動的關鍵，都是被稱為人的第二本能的心理層面這一步。

(3) 每一種文化走向的三大步都全部邁出，便顯示融入運動或疏離運動正式完成。

是的，從「反右」一代開始經過「文革」一代再到「六四」一代，新中國三代知識份子和青年群體的疏離運動已經完成。這正是當代中國人文狀況的最大現實。

從1949年10月1日至今歷時半個世紀的中國社會，被他們的疏離步伐所推動的歷史進步，顯然是由前極權時代向後極權時代的轉變。不能認為這種轉變僅僅是歷史的自然進程，或者僅僅是統治者的明智選擇。不。轉變得以發生和實現的內在動力，正是三代人歷盡艱難的疏離運動。

辨析六代人的精神形象，前三代人是一代低於一代，後三代人則是一代高於一代。決定他們形象高矮的主導因素，顯然是內在的人文支架。前三代人的人文走向，是個體主義支架的逐步倒塌，後三代人的人文走向則是個體主義支架的逐步豎立。個體主義的文化觀念和文化心理，無疑是高挺精神形象的內在依傍。

個體主義應該是人生的主體意識，但它同時還有一個關注面問題。

在以個人為主體的前提下，你的精神關注面是廣闊的存在世界呢，還是狹小的個人利益？這將決定你高挺的形象是否厚實。在這一點上，處於疏離終點的「六四」一代，不僅遠遜於處於疏離起點的「反右」一代，而且遠不如疏離進程的第二代人——「文革」一代。

「文革」一代，由於特殊年代的大動盪閱歷、大場面見聞、大事件磨勵和大苦難熬煉，及其帶來的大覺悟感召，至今仍然保持著對於國家和民族的使命感、責任感以及獻身的激情。雖然他們對新群體主義的疏離遠不如「六四」一代徹底，但他們的精神形象卻比「六四」一代更為豐厚和堅實。

「六四」一代大多為自己活著。儘管有過以天下為己任的光榮時刻，但青春期的使命感、責任感和獻身激情很快就被一時的挫折擊得粉碎，紛紛轉向對自身利益和個人前途的關注，並以種種假冒「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品牌的低度清酒來獨飲自慰。雖然他們的疏離遠比「文革」一代徹底，但他們的精神形象，卻不能不顯得單薄、文弱而瘦削。

這也難怪。因為他們恰好生活在一個全面商品化和普遍個人主義時代的開始之際。這個時代早在「五四」之後就該到來，僅僅因為民族主義的轉移、群體主義文化心理的牽制和極權主義的阻礙，才延遲了大半

個世紀。這個時代姍姍來遲，就被他們迎頭趕上。這不是他們的錯。作為「五四」時代個體主義人文主題的非常態完成者，他們身上既有喜劇的一面，又有悲劇的一面。他們是中國現代人文史上最後的理想主義者和最初的現實主義者，身上必然疊現著前幾代人異常陌生和難以認同的行為特徵。

這當然不是個體主義人文走向的永久現象。它將逐步發展，並在發展中不斷調整和完善。個人成為社會的主體，並不意味著自私和貪婪永遠主宰一切。當物質追求上升為精神追求，當個人將關注的目光重新從自身轉向環繞著他的廣大世界，社會將最終成為自覺個體的共同體。當下普遍的個人主義，儘管把人變得又薄又窄，但它畢竟為中國人苦苦追求了一個世紀的民主社會，奠定了廣泛的人文基礎。

當我說後三代人重新回到「五四」時代的現代個體主義主題，不單指「五四」一代所接受的西方個體主義文化觀念再次得到承認，尤其指這一觀念賴以紮根的土壤——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終於從傳統群體主義傾向轉為現代個體主義傾向。這一轉變，涉及到數千年的文化心理積澱，付出的代價十分巨大。幾代人在新群體主義體制下絕缺人道關懷和理性照耀的畸形生活，在這種生活中個人意志、個人思想、個人價值和個人權利的徹底剝奪，在剝奪過程中千百萬人痛徹古今的血淚悲歌。它必然帶來對新群體主義文化觀念的全面質疑和對現代個體主義文化觀念的重新關注。與此同時，傳統性的群體主義文化心理不能不逐步消解，現代性的個體主義文化心理不會不逐步生成。在「五四」時代落地不生根的個體主義文化觀念，現在終於有了紮根生長的土壤——中國人的個體主義文化心理。可以說，隨著「六四」一代所宣告的後三代知識份子疏離運動的完成，中國才首次具備了走向現代世界的人文條件，才真正逼近了現代社會的大門。統治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新群體主義文化觀念——馬克思主義，已經失去自身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礎，必將被新個體主義文化觀念所代替。

在中國現代人文史上，「文革」一代佔有重要的位置。它不僅是三大疏離人群的承先啟後者，還將成為現代變革最後一躍的精神引領力量。

第六節 「文革」身上的第五張皮

八代人的文藝歷程，隱存於歷史之中，又處在常見的歷史理論視野之外。即使超離了官方話語，人們在言說中國近現代史或者「文革」時，也往往只看到國家、社會、民族之類實體，對這類實體背後的真正實體——個人及其文化轉換歷程，很少有人注意。朱學勤注意到「文革」有兩張皮¹²⁶，已是頗具理論直感力的表現。其實，「文革」豈只兩張皮。除了官方「文革」一張和「反文革」一張，反權威的青春非制度化行為是第三張，黑色子弟和雜色人群的反等級歧視反政治迫害反官僚壓迫是第四張，造反派作為極權體制下第二代疏離者的人文走向，要算第五張了。最裏層的一張皮藏得最深，但同樣真實，一旦剝離，自然另有深意。

真正客觀的言說，必須看到「文革」內部的各種區別，而且目光不可偏離具有自身立場、自身利益、自身要求的個體存在。

是的，許多人在將「文革」作為一個無區別的否定物件來看待的時候，其理性認知的角度，恰好不是個體存在，而是群體利益。從這個角度看到的，自然只是個體造反行為否定性的一面？比如被個人迷信所驅使和被毛澤東所操縱而對社會常態造成的破壞，自然看不見「文革」身上屬於個體自我表現和自我肯定性質的第三、第四、第五張皮。

無論看問題還是行事，都免不了關涉群體利益，這既是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心理特徵，又是思想上的局限。要知道很多理論和現實問題，只從群體利益角度是看不透徹的。「文革」問題尤其如此。

20世紀60年代，幾乎在中國爆發紅衛兵運動的同時，西方也發生了青年學生造反。它雖然發生在全面確立了現代個體主義原則和民主制度的國家，而且是自發自主的，但無論美國1967年的「反戰運動」，還是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其造反口號之荒唐偏執，其造反言論之空洞幼稚，其造反行為之激烈放肆，都很難讓人聯想到理性、文明、法制。可是西方研究者並沒有去聲討學生們扔炸彈、放火、搗毀公共設施……的暴行，也沒有只批判青年人擾亂公共秩序、破壞社會安定、影響正常生活……的一面。他們關注的是現代社會對人性的肢解和異化、

個人對異化現實的不滿和反抗、造反事件對現代社會的消毒作用。他們看問題的立足點是個人而非社會。在他們眼中，個體的反抗不僅十分正當，而且長遠看對社會也並非無益。

同時期的中國下層青年造反，不是對更為可怕的政治異化的反抗嗎？不是對極權社會實際起到了巨大的解毒作用嗎？即使反抗行為和解毒作用是通過畸形而變態的方式表現的，不也值得我們關注嗎？身為法國造反學生精神旗幟之一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曾從「個人存在」的角度，將中國紅衛兵的造反行為歸於「存在實踐」範疇而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作為當事人的我們自己，事後卻只看到本國青年造反的消極面。反差之大，不能不令人驚歎！看待同一個事件，為何我們有不起現代個體主義立場的積極視角？

從深存的人文層面看，西方學生造反所呼應的，是從現代個體主義向後現代個體主義轉變的「垮掉的一代」，中國青年造反所導致的，是從傳統群體主義向現代個體主義轉變的「驚醒的一代」。後者具有的人文姿態無疑更為向上。我們為什麼看不到「文革」一代所體現的人文進步呢？

歷史進步的主體究竟是什麼？是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各種經濟、技術、政治、倫理、科學、教育、藝術……條件，還是人本身？當然是人本身。人們在論說歷史時，已經習慣於用人所創造的各種條件來說明甚至代替人本身，無疑步入了一個巨大的誤區。不是條件的發展決定人的進步，而是人的進步決定條件的發展。人的進步體現為人文進步？人的文化觀念和文化心理的轉換。「文革」一代在人文歷程上的進步異常明顯：第一，造反之初的個性解放，使他們由個性完全湮沒的馴服工具變為有獨立個性的人；第二，造反之中的精神反思，使他們由體制意識形態的可憐應聲蟲變為體制意識形態的大膽質疑者；第三，造反之後的信仰破滅，使他們由個人權利的完全無知者變為個人權利的積極爭取者；第四，這三個方面綜合導致的文化轉換，使他們邁出了從傳統群體主義向現代個體主義轉變的重要一步。這一代人，自然不限於80年代以來「浮出水面」的少數精英，還包括「水面下」默默無聞的大多數——他們共同推進了中華民族人文基質的巨大轉變。

可以說，正是這個巨大的人文進步及其所帶來的不滿和思變心理，

最終導致了以1979年為標誌——官方「毛澤東時代」的結束和「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我們記得很清楚：發生這一大轉變時，中國社會的各種經濟、技術、政治、科學……條件甚至還不如「文革」前。那麼這一歷史性轉變的驅動力是什麼？無疑是人的進步，而非條件的發展。而且，這一進步的歷史指向絕不限於極權體制現行的「改革開放」，它高舉的手勢指向的目標，還包括以現代個體主義為基礎的現代民主制度和現代多元文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超出官方「改革開放」範疇的文化啟蒙、民主請願、思想批判、政治訴求，無不是受其強力驅動的自覺行為——雖然有「反右」一代和「六四」一代參與其中，同時少不了1979年以來逐步發展的各種社會條件的互動作用。

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沒有「文革」中的民眾造反，今日中國會是什麼樣子。讓我們以毛澤東決心除掉劉少奇的鐵定目標和運動已有的既成步驟為出發點來進行設想：中央打倒「彭、羅、陸、楊」和地方黨委拋出主管宣傳的負責人已成定局，保守紅衛兵「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已成定論，毛澤東趁勢驅逐劉少奇，全國很快按三個月或半年的預定期限轉向止軌。然後繼續以「階級鬥爭」為綱，同時逐步推行發展經濟、重視科學和技術的務實政策——只要大權在握，哪一個統治者不希望國富民強？因為沒有歷時十年的動盪和停滯，時至今日，經濟實力可能同樣增強，人民生活可能同樣改善。可是中國人的精神和心理會是什麼樣子呢？完全可能繼續「文革」前的人文狀態——仍然蒙昧、愚忠、空洞，如同現在的朝鮮一樣。絕不可能邁出由傳統群體主義向現代個體主義轉變的第二步，更不用說在現代個體主義基礎上對民主自由權利的自覺訴求和積極爭取。這不是胡亂推想，而是完全可能的歷史走向。如果真是那樣，難道不可怕嗎？

徐友漁對此寫道：「我的同齡人經常提出這個問題：如果沒有『文革』，我現在會是什麼樣子？我也常常這麼問自己。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應當感謝『文革』，它使我從虛幻中清醒。如果沒有『文革』，很可能，我只是一塊磚，一顆螺絲釘。在建設社會主義大廈時，想把我安放在什麼地方，我就心甘情願、無聲無息地在那裏呆一輩子。領袖在驅動那龐大的政治運動機器時，如果碰巧在工具箱檢出我這顆螺絲釘，

把我往哪個部件上安裝，我就在那裏機械地隨著整部機器運動，沒有獨立的思想 and 意志。『文革』改變了一切，我成了真正的人。但是，我並不因此而歌頌『文革』。」¹²⁷

這不只是個人的切身感受，而是一代人的內心寫照。

這一代人大多「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看起來，他們和其他世代一樣：頭頂高天腳踩大地，置身城市和村莊，面對河流與山嶺，並在社會中與各種人交往。其實這只是物態現象。在精神和情感領域，他們自小便生活在一間由虛假觀念建構成的鐵屋子裏。家長和老師口中經常說出的話語，連環畫和電影裏經常現出的場面，課本小說報紙雜誌上經常寫出的文字，廣播和歌曲裏經常傳出的聲音，便是這間屋子那變形螢幕上的全部知覺要素。它們構成不透明的四牆和望板上凸出的資訊圖案，將一個自認為是最本質的世界呈現在白板一般的認知者面前。世間的美醜、善惡、真偽，都在上面黑白分明，而且是抽象概念和形象說明的綜合結構。第一層是關於國內情況的，他們自小便獲得的最好記也最牢固的兩組資訊分別是：正面——毛主席、共產黨、解放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美好的新社會、英雄的革命者；反面——蔣介石、國民黨、蔣匪軍、賣國賊、反動政府、剝削階級、黑暗的舊社會、萬惡的反革命。落實到身邊的人和事以及自己的思想言行，凡歸屬於前者的便是偉大光榮，凡歸屬於後者的便是腐朽罪惡。第二層關於國際情況，同樣是正反兩組資訊：正面是國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陣營、世界革命、幸福天堂、和平衛士；反面是國際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世界、帝國主義、人間地獄、戰爭狂人。中國在其中的神聖地位和個人應有的立場選擇明確無誤。還有第三層關於社會歷史、第四層關於自然現象、第五層關於認識規律……層層重疊環環相扣，都是膚淺得可憐、幼稚得可笑、簡陋得可怕的兩極對立式描述。對於一個自小精神和情感便置身於這樣一間屋子的人來說，他不接受這樣的世界圖景還能接受什麼？不錯，還有收音機可以接收屋子外面的信號。可是如同今日還要嚴格控制電視資訊和電腦資訊一樣，當時對收音機的管制更為嚴格——凡是收聽境外廣播都被視為「收聽敵臺」，無數青年因此而鋸鐺入獄。不錯，翻譯書籍記載著外面世界的情況。可是，不僅這類書籍的出版要經過嚴格

篩選，而且允許出版的小說詩歌劇本回憶錄和其他讀物，在「內容提要」裏都要毫無例外地先進行一番批判性消毒處理——生怕這些年輕人的免役力還不夠強。在這間屋子裏面，自然還走動著很多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和從海外歸來的人，其中還有不少「文化泰斗」，可是他們不願也不敢透露任何關於過去社會和外面世界的點滴真相。於是，從這間屋子裏望去，真實的世界完全塗黑了，你所看到的只能是你所能接觸到的資訊為你呈現出來的世界。在這個虛假世界的反射下，處在這間屋子中的個人註定要消融。不僅一個人生下來就擁有的個人尊嚴、個人地位、個人價值和個人權利，甚至包括人性中最起碼的親情、愛情、友情、同情，都全部幻化於那虛假世界投射出的耀眼光輝。於是，「一生交給黨安排，黨叫幹啥就幹啥」，就成了他們人生的最高信條。

我至今保留著60年代下鄉當知青後寫給三弟的幾封信，每封信不足千字的篇幅全是空洞的政治套話和革命口號，沒有一句是今天任何一個正常人說得出口的。活生生的人完全被掏空了，自己還沒有一點知覺。

1971年「一批雙清」運動時我被捕入獄，至今難忘當時的那一番恐怖感受。是在入獄當天，我獨自踉伏在單人小監裏的破草席上睡醒一覺之後。忽然意識到這是在獄中，而且是共產黨的監獄！過去蹲國民黨的監獄是光榮，今天蹲共產黨的監獄意味著什麼？——肯定是罪犯，而且一輩子就徹底毀了！一時間我渾身顫抖，整個人從裏到外完全籠罩在巨大的恐怖之中。之後，每天夜裏都要從睡夢中突然驚醒，為自己成了罪犯的可怕事實而渾身發抖，然後陷入深深的絕望之中。這種情形至少保持了一個月之久，濃密的頭髮從此變得稀薄。雖然入獄前我早已對毛澤東和「文革」產生了很大的懷疑，並且開始了思想的探索，但直到身陷牢獄時，在精神和情感的「鐵屋子」裏所認同的第一層、第二層……虛假世界及其包含的價值標準，仍然牢牢地控制著我的是非判斷。直到兩年後走出監獄，我才同時從這間可以將一個人的思想和情感徹底異化的「鐵屋子」裏走出來。

真的，要是沒有「文革」所帶來非常的人生經歷和生命震撼，要是沒有造反所帶來超常的內心體驗和思想嬗變，不知這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會是什麼狀態。

遺憾的是，不少「文革」研究者通常只看到常態社會秩序和各種條件的破壞，而完全忽視在這背後發生的人文大轉變和人文大進步。

由於特殊的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的惰性作用，中國人的人文轉變歷來十分艱難，從具體的個人到整個民族，往往需要通過追求一定目標時發生的現實挫折、心理應激和精神反思才能實現。由傳統群體主義向現代個體主義的轉變尤其如此。這種轉變大多發生在個人的青春年代和民族的青年群體。其表現形式，通常是個人和民族所遭遇異於常態而顯得驚心動魄的重大事件。「文革」將這一切都包含了：它既是這一代人的重要人生經歷，又是整個民族的重大歷史變故；它產生的造反行為和所帶來的人文轉變，既發生於這個時期個人的青春年代，又集中體現於這個時期民族的青年群體；它既是造反者的盛大節日，又是造反者和被造反對象的巨人災難。我們沒有必要為這種異態震盪和變態表現所導致的人文進步疑惑不解。中國人就是這樣——尤其在傳統文化與極權體制雙重阻礙下向現代個體主義的轉變。無論個人還是民族，為實現這一進步所付出的代價都是痛苦而輝煌的。

中國和俄國都是著名的「專制主義」國家。20世紀，中國後於俄國信奉同樣的主義和實行同樣的制度，經濟水平和國民素質也比俄國低，而且民族文化還屬於東方群體主義傳統。中國1949年建政——比俄國的1917年晚三十二年。鄧小平1979年推行的體制內改革也比俄國赫魯雪夫1956年的改革晚二十三年。為何中國第一次體制內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都超過俄國？除了70年代與50年代的國際環境和歷史條件不同之外，另一個原因，便是中國發生了「文革」這樣促成一代人向現代個體主義轉變的社會事件。第一次體制內改革發生之前，從普通群眾到知識份子——俄國人血脈中仍然流淌著西方文化範疇的個體主義傳統，頭腦中並不只供奉著馬、恩、列、斯四座神像，改革很容易獲得贊同；延續著群體主義文化傳統的中國人——從普通群眾到知識份子，思想的天空中除了馬、恩、列、斯、毛五個太陽便一無所有，改革很難得到擁護。「文革」中的造反運動不自覺地擔負了這個隱秘的歷史任務：使專制的土壤和天空大面積疏鬆。

俄國1991年的改革一步到位，但那是它第二次民主改革——而且是

體制外的，目標是將後極權主義改變為現代民主制度。這一步，中國仍然落在它的後面。不難推想，中國下一步的第二次民主改革必定會超過今日的俄國。俄國人雖有傳統性的個體主義血脈在暗自推動，中國人卻有現代性的個體主義潮流在破關奔湧。

19世紀末，恩格斯在試圖解釋諸多歷史現象時遇到理論上的障礙，不能自圓其說的苦惱使他多少感覺到馬克思主義線性歷史觀的局限而多次慨歎：「在歷史上進步這個概念很不好把握。」令他感到困惑的歷史現象包括藝術、哲學、道德、宗教甚至科學。在他看來，這些人類精神的外化形式似乎與生產力和經濟制度的發展並不同步。太多的歷史事實提出的質疑至今仍擺在這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面前。的確，物質與精神、經濟與道德、社會與藝術、自由與平等、進步與正義之間，並無直接的因果關係，它們都處於一種二律悖反的怪圈之中。其中，社會與藝術、進步與正義的二律悖反現象，直接涉及到人類群體與人類個體之間的二律悖反關係。在社會中和歷史上，個體與群體的權利要求和前進步伐從不一致。所以，一切純粹表現個體存在特性的精神形式和心理要求，與群體對自然界的支配力和對個體的控制力並不同步。歷史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向度和不同的層面，研究中國「文革」造反派時，卻不能不注意到他們作為社會邊緣人群和弱勢個體應有的權利要求。只從群體利益角度來看待其造反行為並從群體進步方向來審視其造反結果，顯然站歪了一隻腳。當這個群體置身于非正義的極權主義秩序，當造反行為表現為對這個非正義秩序的某種打破，當造反結果還包含著一代人對這個非正義秩序的疏離，我們更沒有理由繼續歪著一隻腳來評價當年的民眾造反運動。

我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中談到藝術表現所涉及個體存在與群體進步的關係時，曾經寫到：

正因為個體自我肯定與群體自我肯定絕不同一，所以任何危害個體存在的歷史現象，總會刺痛藝術家的良知並激起藝術家的抗議，不管這些現象對於群體來說是否代表著進步。

因此，當科西嘉的驕子成了法蘭西的皇帝，個體自我肯定的表率成

了否定個體權利的象徵，貝多芬憤然將《英雄交響曲》上獻給拿破崙的題辭刪去。

因此，面對現代社會個體在物欲狂流中的滅頂之災，巴爾扎克的小說和葉芝的詩歌毅然將肯定的目光朝後投向溫情脈脈的中古社會。

因此，當法國大革命從多數人的主權演變為少數人的專制之後，普希金——這個俄羅斯的自由歌手，忿然在1817年所寫的《自由頌》中對雅各賓專政發出了厲聲的詛咒：

在無言的後代的見證下，
路易昂揚地升向死亡，
他把黜免了皇冠的頭，
垂放在背信的血腥刑臺上；
法理沈默了——人們沈默了，
罪惡的斧頭降臨了……
於是，在帶枷鎖的高盧人身上，
覆下了惡徒的紫袍。

由此可見，群體的進步只有在與個人的肯定相一致的時候，才會得到藝術的肯定。

當恩格斯責備拉薩爾的劇本《馮·濟金根》的主題不是德國十六世紀進步的農民戰爭而是落後的騎士內訌時，當恩格斯批評哈克奈斯的小說《城市姑娘》只塑造了消極的工人群眾形象而沒有反映出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英國工人階級的積極鬥爭時，他顯然認為藝術正面表現的物件，必須是從群體發展角度來看具有進步意義的歷史事件和具有進步作用的社會力量。

這當然只是歷史理論的觀點而非藝術本身的要求。

這種觀點顯然違反藝術本性。

把是否站在群體進步的立場，作為衡量藝術家進步與落後甚至革命與反動的標準，無疑是巨大的謬誤！

事實上，藝術家只能站在個體存在的立場而非相反，藝術家只能遵

循個體肯定的原則而非相反。

雖然由於現實處境及現實應激的差異，藝術家所持的具體立場各不相同，雖然由於文化背景和價值取向的差異，藝術家奉行的具體原則大不一樣，但是，無論立足於向後對比還是朝前展望，無論著眼於消極方面還是積極力量，藝術表現的目的，都是否定現實異己力量而肯定個體自我形象。

這種異己力量，不僅包括取消個體地位的落後群體秩序，而且包括削弱個體獨立的群體進步運動。

這種自我形象，既可以是歷史上和現實中站在群體進步正面的，又可以是現實中和歷史上站在進步群體反面的。

藝術家依據的標準首先是普遍的美、善、真價值，而非特殊的群體進步觀念。

否則，伯夷便只是迂腐、荊軻便只是亡命、屈原便只是愚忠、項羽便只是殉舊，而不會成為藝術歌頌的對象了！

在此，不僅「革命與反動」之分是反藝術的論斷，而且「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矛盾」也是非藝術的臆造。

實踐證明，一旦套上歷史主義的籠頭，藝術家的創造就會失去自由，藝術的道路就會日趨狹窄，藝術品的座席就會嚴重傾斜。高爾基及其《母親》藝術上的失敗當是明證。原蘇聯和中國「革命藝術」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及其災難性後果，更是教訓。

1992年以來，商品大潮在中國大陸掀起。物欲狂流所裹動的人格畸變和道德淪喪引起了少數有良知作家的巨大不安。北京作家梁曉聲和山東作家張煒在自己的有關作品中對此進行了否定性的表現。沒想到立即招來一片反對之聲，而且反對者主要是一些激進的自由派作家。理由是二人留戀改革前的落後狀態，「抗拒市場經濟大潮」。作家本應站在人性和人道的立場來評價社會進步，他們卻要求作家站在社會進步一邊來看待人性和人道遭受的災難。可見馬克思式的歷史主義對中國作家毒害之深！

藝術的本性是反歷史的。

藝術對歷史的態度絕不受歷史主義的圈定。 128

這一節文字的標題是〈藝術的反歷史主義本性〉。

我說的雖然是藝術和藝術家必須具備的個體主義立場，其實也是歷史研究和歷史研究者應該兼備的個體主義視角。

中華民族從傳統文化觀念和文化心理兩方面向現代個體主義的轉變，是「五四」時代所標出而又未能完成的歷史任務。「文革」一代的人文轉變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沒有這一步，中華民族的人文基質就不可能快速完成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五四」一代所追求的自由主義經濟、民主主義政治、多元主義文化，仍將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遠境。「文革」一代的驚醒及其對極權主義的抵觸和對人心的帶動，終於使世人迷信的眼睛睜開同時使國家轉變的步伐加快。現代之城已經近在眼前。

中國即將跨入現代社會之門，當下只缺少最後一張現代性的門票？政治民主和個人自由。這一步的跨出，其實就是政治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個人自由權利的獲得。這一步即將邁出也必將邁出。

2001年2月15日——4月3日初稿

2005年3月4日——4月30日第一次修改

2005年11月1日——2006年2月22日第二次修改

注釋：

- 119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1月，第343頁。
120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1月，第210-263頁。
121 四川省青年詩人協會主辦：《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成都：內部印製，1985年1月，第3頁。

- 122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1月，第211-212頁。
123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1月，第218-220頁。
124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1月，第218頁。
125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1月，第255-256頁。
126 朱學勤：《書齋裏的革命》，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82頁。
127 徐友漁：《自由的言說》，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16頁。
128 周倫佑、周倫佐：《藝術人本論》，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年5月，第86-87頁。

主要參考文獻：

- 劉魯風、何流、唐玉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1949-1989]》，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
高皋、嚴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
師東兵著：《文革檔案》，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9年10月。
徐友漁著：《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徐友漁著：《自由的言說》，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
徐友漁著：《精神生成語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社，2002年7月。

後記

周倫佐

寫這部書的最初念頭萌生於 1967 年底。當時我所在地區的造反派已分裂為兩大派並嚴重對立，地縣兩級印刷廠都由對立派控制。為了印製一張我所屬派別的報紙，我去了一百公里外的涼山州首府昭覺。原以為找到《涼山報》社同觀點的造反組織印這張報紙不成問題，沒想到昭覺造反派與保守派正發生衝突並波及到了報社內部。我不得不為這張報紙的檢字、排版、校對、製版、印刷而在報社等了近一個月時間。昭覺地勢高，這段時間一直下雪。白天許多時候，我都在報社編輯部的辦公室裏烤火看書打發時光。辦公室幾間屋子的角落裏都堆滿了書，多數是中外名著，沒有人敢去收拾，更沒有人敢於閱讀。我仗著是外地人，便坐在火盆邊讀了起來。《靜靜的頓河》、《毀滅》、《苦難的歷程》、《西歐十大音樂家故事》……讀書之餘，有時也會靜下心來，圍繞造反派的分裂和自己懷有的疑惑，對「文化大革命」現象進行思索。我暗自決定回西昌後便退出造反並遠離運動，開始有意識地收集運動中的各種資料，為今後寫一本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書做個準備。為此，我還給西昌的一位朋友寫了一封信暢談自己的設想。十六歲的年齡，既無思想資源又無知識儲備，這個念頭當然只能算是青春期的不甘平庸而渴望有所建樹的生命衝動。

1971-1973 年「清查五一六」運動中，我坐了兩年監獄。胞弟周倫佑送到獄中來的二十多冊厚厚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成了我抵禦精神饑餓和肉體饑餓雙重煎熬的唯一依託。在黑牢中對人生之光和國家之光的艱難尋覓，使我第一次有可能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置於近代以來世界歷史走向及其變局的框架中來考察。在探索 16 世紀興起的民主主義潮流轉變為 20 世紀的民族主義潮流的歷史動因時，我似乎發現了 20 世紀 50 年代「社會主義陣營」民主主義的復興與失敗，同隨後中國「文化大革命」中造反運動的某種關聯。寫這部書的念頭再次浮起並變得有所

明確。為此，我用牙膏頭和自己才看得懂的特殊符號，在書頁的空白處記下了對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一系列問題的思考結論。

1978-1980 年「揭、批、查」運動中，我再次入獄。也是兩年，也是靠周倫佑送來的《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文選》、《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列寧文選》、《普列漢洛夫哲學著作選集》等書籍，抵禦雙重煎熬——只不過這次抵禦的不再是饑餓，而是最終打擊帶來的精神絕望和大病纏身導致的肉體痛苦。思考銜接上七年前第一次坐牢時的進程，並從社會轉向了個人。其中必然要牽涉到讓我兩次身陷囹圄的「文化大革命」。但這時已將它放在「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現代變革的人文文化大革命」中來考察，從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雙重主題的變奏來探尋「文化大革命」中造反運動的實質及其變態性。寫這部書的念頭更為確定。

出獄後，嚴酷的現實迫使我將這件事完全擱下。第一次出獄是「無罪釋放」，這一次卻是「免於起訴」。儘管我早已從昔日的造反者轉變為今日的自由思想者，但頭上仍然高懸著「造反派」的不赦罪名。為了改善一落千丈的生存環境，我不得不在罰到生產車間從事苦力勞動後去掙大學文憑。這之後，自然還要成家並擔當丈夫與父親的雙重角色，也還寫一些思想鋒芒隱藏得深一些的學術性文字。就這樣直到 2000 年。

在最初的念頭萌生三十多年後，我又才想起提筆做這件事。促使我想做這件事的主要動力，自然不再是早已淡漠的功利需要，而是一種難以釋懷的義憤。80 年代以來，國內某些體制內、體制邊緣甚至體制外的知識份子，對「文化大革命」民間場景的歪曲和對民眾造反運動的醜化，使我感到良知蒙塵的可怕；而普通群眾談到當年的造反派時幾乎異口同聲的撻伐，更讓我看到這個民族集體失憶的深重。面對這種狀況，我既感不平又覺無奈。因為甚至在這種與官方相區別的所謂「民間話語空間」，對「文化大革命」中民眾造反運動的否定和控訴，已經成了一種任何人都無法抗拒也無力反撥的「公共思維」和「公共話語」。我由此意識到：為「文化大革命」這個歷史事件寫一點編年史一類的文字，不僅無力完成而且也毫無必要。嚴格講，除了歷時三年的民眾造反運動，這個由極權體制的最高領袖一手發動和領導的反文化「大革命」，並沒有任何值得正面研究和正面評價的內涵。於是我決定從還原歷史真相的角度寫

一篇為造反派伸張正義的駁論。為此我寫下了作為本書四條梳理線索的四句話——它們略經修改後成為本書四篇文章的標題：「一是要從性質上分清造反與保守的區別；二是對造反又要從時間上分清三年與十年的區別；三是對三年又要從動機上分清上層官方與下層民眾的區別；四是對下層民眾又要從歷史上看到與現代民主進程的聯繫。」我將文章的標題暫定為《造反派的今日妖化與昨日真相》。最後才改為現在的書名。

這部書雖然由我執筆完成，但實際上又是不少朋友熱心幫助的結果。

2001年春節，我對胞弟周倫佑談了包括四條梳理線索的寫作構想。作為一個很具歷史厚重感和現實批判性的先鋒詩人，他立即鼓勵我迅速寫出來，還說可在他主辦的民間體制外刊物《非非》上刊發。由於對自己的文字表達力缺乏自信，我從來寫文章都儘量長話短說。這次也一樣——預定只寫一萬字左右。沒想到動筆後一口氣寫了十多萬字，還嫌過於簡略。由於篇幅過長，加之不願讓《非非》承擔太大政治風險，我沒有滿足倫佑的用稿要求。直到2003年底，倫佑不忍這篇文稿被長期閒置而荒廢，便主動將它發送給國內「文化大革命」研究學者徐友漁先生，希望得到他的指教。2004年初他又借在北京小住的機會，向徐友漁先生徵求意見並尋求幫助，使這篇文稿擺脫了供作者一人獨自欣賞的命運。

徐友漁的名字我聽說得很早——在三十年前的1975年。是兩位和他那遠在西昌工作的表姐夫有過密切交往的傑出女性告訴我的，她們說他是個有思想有追求的優秀青年。1989年「六四」後，因為倫佑入獄之事，這兩位女性中的一位——倫佑的妻子亞琴，曾去北京找過他。他為倫佑之事出了不少力。2000年，我從他贈送給倫佑的兩部著作中讀到了現在的他。這兩部著作是《精神生成語言》和《自由的言說》。我為一個自己二十多年前就知道名字的同代人取得的學術成就感到高興。但是，我與他從未謀面，而且對他在「文化大革命」研究專著中關於「造反」的定義又持有異議，所以我對倫佑將包含著這些異議的本書初稿發送給他，並沒有抱什麼期望。想不到他讀了這篇文稿後十分欣賞，除了贈送相關書籍供我修改文稿時參考，還給美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學者宋永毅先生作了鄭重推薦，請他提供進一步的幫助。徐友漁先生的熱忱助人之心令我感動，他在學術上包容異見的胸懷更給我留下深刻的印

象。這對於他也許很平常，但在文壇學界已不多見。我在他身上似乎看到了寬厚的個人品性與自由主義信念的完美結合。

我對宋永毅先生的瞭解，僅限於讀過一本他主編的《文革大屠殺》。書是徐友漁先生贈送的。我對宋先生為此書所寫前言中的基本思想完全認同。幾位朋友曾來借閱此書，我都向他們特別推薦這篇前言。然而從未想到會和此書的編者和前言的作者發生什麼關係。收到徐友漁先生發送的推薦信和文稿時，他正在校外開會。在匆忙的行程中讀了文稿後，他不僅同意聯繫出版，還答應給寫序言。他立即給我來信，鼓勵我將書稿修改成高水準的學術著作，並隨信發來幾份我所需的資料。與此同時，他還吩咐在家裡的妻子用國際快件給我寄來海外中文刊物關於造反派問題的爭論文章，又託付國內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學者何蜀先生發送給我一批所需的「文化大革命」資料。難怪倫佑得知此事後，說我這次遇到了好心人。

何蜀先生我也不認識，只從徐友漁先生贈送的一本《當代中國研究》上讀過他的一篇文章〈「揪軍內一小撮」溯源〉並見過他的名字。和我素昧平生，他卻把宋先生的託付和我的需要看得很重，接連三次給我發來所需的資料。雖然遠隔千里，但從電話中和發來的大作裏，我依然能感覺到他人正直、處世達觀、治學嚴謹、做事認真的秉性。

如果沒有這些朋友的熱心幫助，這部書不可能最終完成和最後出版。我感謝他們。

還要感謝身邊的朋友：和我相知相交二十年的黃懿女士，于繁忙的教學工作之餘在電腦上不厭其煩的為我打出本書的初稿。王甯向我敞開自己的藏書，使我查到不少有用的資料。雷啟鴻將保管多年的個人檔案提供給我，使我對相關問題的認識有了第一手材料。幸代遠送我一台小巧靈敏的日立電腦，使我能在鍵盤上修改完本書全稿。

我把歷史研究的要領歸結為六個字：擺事實講道理。從我有限的瞭解範圍看國內外造反派問題的研究現狀，似乎擺事實方面明顯強於講道理方面。無論對造反派是肯定還是否定，道理都在講——每個研究者都在闡述自己用有選擇的事實給予證明的各種觀念、理念、信念。但是感到，對造反派持肯定態度者所講的道理，似乎在造反派與歷史進步的關

「文革」造反派真相

係命題面前有所牽強；對造反派持否定態度者所講的道理，似乎在造反派與社會正義的關係命題面前有所迴避。我嘗試著涉入其中未被道理敞亮的歷史暗區，期望某些隱約的事實有所凸現。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歪理冒充正理我謂之一忌，事實掩蓋道理我謂之二忌，淺理代替深理我謂之三忌。雖然這樣告誡自己，自己又未必能夠做到。特別是在強調深層道理之時，自己對事實的掌握和使用，是否會有疏漏、強加甚至歪曲？矯枉過正，可能難免。只有請讀者批評指正了。

在結束本文時，我想起一位少女。她是已經追隨我三十七年的一段美好而殘酷的記憶。她叫劉曉蕙，被譽為這座城市「文化大革命」時期最美麗的女孩，和我同為本地造反激進派廣播站的播音員。1968年5月4日夜裏，被本派守衛廣播站的武裝人員劉某不慎走火打死。她突如其來地倒在我的身邊，默默無語地死在我的懷裏。才十六歲，就徹底告別了寶貴的生命及其所感知的世界，把永遠的悲痛留給善良忠厚的父母和同樣美麗的妹妹，還有傾心相向的我。她聰明好學，雖然只是初中六七級的學生，但思想早慧，對社會和人生已有自己獨立的見解。我在那段時間讀到的西方小說，便是她一次又一次冒著風險尋來的。她毫無意義的死，成了我精神反思的觸發點——我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全面質疑就從這時開始。1984-1985年，我在幾所大學講《愛的哲學》時提到過當時的絕望感受：「當我意識到她永遠不會再活過來，突然感到整個世界一下從腳底抽空了。」1985年，又在大學寫作課的一篇作文中專門寫到她，標題叫〈早醒的少女〉。我寫了四句詩作為這篇作文的題詞：

我的窗外有一隻小鳥，
天不見亮就在樹枝上啼叫；
我的心中有一位少女，
她比小鳥醒得還早。

1970年，我曾去原激進的造反派自建的「烈士公墓」探望她。才兩年時間，數百座墳墓已經墓碑盡毀，只能憑著記憶在大概是她的墳前種

了一棵仙人掌。1981年再去，整個墓園早已夷為平地，有的地方還種上了旱地作物；十年前種下的那棵仙人掌還在，只有腿部這麼高，在記憶中安葬她的那個方向舉著幾個長滿尖刺的腳印。孤寂的心有一種很深的痛感。這以後再沒有去了，只當把早逝的她和長久的懷念一起埋在心裏。

我想用這部書來祭奠她的亡靈。

2006年1月28日寫于森林居

宋永毅 主編
Yongyi Song
Editor-in-Chief

21世紀中國叢書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Series

The Historical Truth about Rebel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文革」造反派真相

作者 / 周倫佐

主編 / 宋永毅

出版印行 / 田園書屋

地址 /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56 號 2 樓

電話 / 852-2385 8031

傳真 / 852-2770 2484

電郵 / gfbbook@netvigator.com

初版一刷 / 2006 年 8 月

國際書號 / ISBN 962-339-063-7

定價 / 港幣 80 元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62-339-063-7



9 789623 390637

HK\$ 80.00

田園書屋
80